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
德加·胡佛秘史

开场白

1971年10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尼克松、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和主要的顾问们正在研究一个难办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老人；对他，连国家元首都有几分害怕。

尼克松说，“有许多理由，他应当辞职。……他应当离开那里。……现在，也许，我有点儿怀疑……或许，我可以叫他来，跟他谈谈，让他辞职吧……有些问题……如果他辞职，他应当出于自愿……这就是我们难办的原因……我想，他会呆在那里，呆到一百岁。”

米切尔说，“他会呆在那里，直到埋葬在那里。”

尼克松说，“我们应当避免他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下离开……他会搞得天都塌下来，连我也遭殃。……”

7个月以后，即1972年5月2日，总统的“问题”解决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死了，终年77岁。据说，他的尸体是他的女管家发现的，他躺在他的华盛顿寓所卧室的四柱卧床旁。看样子，好像是夜里又犯了心脏病，没有进行尸体解剖。

甚至在胡佛逝世以后，华盛顿有人——有权有势的人——也感受到威胁。到房间搬运尸体的殡仪人员看到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在楼梯口，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椅子上，茫然凝视前方。在他周围，一些年轻人进进出出，忙着完成神秘的任务。

在发现尸体4个小时以后，人们来房间进行搜查，从上到下，翻箱倒柜，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一页一页地翻。那个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是死者最亲密的男朋友，据有些人说，是他的情人。老人对人们正在干的事情，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

次日，胡佛的尸体被隆重地运往美国国会大厦，停放在一个黑色灵柩里供人们瞻仰。在那个灵柩里曾经安放过林肯和另外八位总统的尸体。在大厅里，公民们以每小时1000人的行进速度鱼贯而过，向死者致哀。在大厦外面，有几百名抗议者朗读在越南战争中牺牲的4.8万名美国人的名单。

有十名白宫便衣人员混在这些抗议人群中，他们的使命是挑起事端，破坏集会。其中有几名古巴流亡者，他们曾卷入了以前的水门事件。那天夜里，他们站在离国会大厦几码远的地方，其中两人谈论着胡佛。

一个人悄悄说，胡佛的寓所成为白宫最近盗窃的对象。他的话使他的同伴大吃一惊。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说，如果透露更多的东西，那将有“危险”。

为了给公众做做样子，尼克松总统把胡佛之死当作美国英雄来纪念。他下令把胡佛尸体停放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文职官员享此殊荣，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颂扬胡佛是“一个伟人，……是勇敢、爱国主义和忠诚老实的全国性象征”。

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胡佛是一个英雄。早在二十年代，实际上是由他创建了联邦调查局。胡佛不仅仅是美国的高级执法者。罗斯福总统曾经责成他保护美国的内部安全，胡佛成了同美国最阴险的敌人作斗争的勇士，起初同纳粹分子斗，后来同共产党人斗，同一切持不同政见者斗。

他不断抛头露面，成为人们心目中活的偶像，生前就获得许多殊荣。杜鲁门总统授予他“对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勋章。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

选为联邦杰出文职人员奖章的第一个获得者。

胡佛的名字成为国家安全的同义词，成为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同义词，当然也成为畏惧的同义词，不过，后者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出来。像胡佛曾经为之服务过的八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领会过这种畏惧。他同胡佛有着长期关系，而且充满了讽刺意味。他曾申请到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当过特工人员，当他当上国会议员时，他曾参与胡佛操纵的对左派的讨伐。他给胡佛出过力，深受其青睐。他同这位老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秘密，两人都渴望获得权力。当尼克松爬上总统宝座的时候，他们两人似乎应该是天然的同盟者。

然而，尼克松总统同胡佛也有矛盾。早期，这位年迈的局长颇难相处，他割断了同其他一切情报机构的联系。为了自我保护，而不是为了原则，他抵制了总统同激进分子进行情报战的计划。后来，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有关越南战争的文件泄露给新闻界，尼克松下令调查此事，而胡佛竟敷衍了事，令尼克松大怒。尽管如此，尼克松也不敢把他解职。

尼克松多次想把他搞掉。1971年秋季，尼克松召集胡佛举行一次摊牌会议。官员们看着手表，等待这位局长终于下台的消息。然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这位老人竟避开了临头的大难，他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的知识，了解内幕。

胡佛掌握了在水门事件以前白宫就犯下的一些罪行。他甚至知道尼克松同一个女人的丑闻。像了解其他许多人的私生活一样，他对尼克松的秘密和劣迹是了如指掌的。他一死，人们就赶忙到他办公室搜索机密材料。

在国会，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惴惴不安，生怕胡佛掌握他们的见不得人的材料。现在，由于有了新闻自由法，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定期详细汇报政界人士的性活动，既包括异性恋，也包括同性恋。据目睹者说，一位著名的参议员读了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吓得魂不附体。

胡佛的一位最亲密的同事威廉·沙利文在胡佛死后，说他是一个“讹诈能手”。然而，这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新的证据表明，这位权力极大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致命弱点。他的童年是痛苦不幸的，父亲有精神病，母亲飞扬跋扈；他长大成人以后，经历了感情上的动荡和性淫乱。胡佛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要求别人讲道德，而他自己却偷偷摸摸地搞同性恋，患有易装癖，喜欢穿异性服装。

正如胡佛本人多次警告的那样，搞同性恋的人总是受到敌对的情报机关（也包括胡佛所讨厌的苏联情报机关）的要挟。他深为自己这个见不得人的弱点所苦恼，他曾经求助于华盛顿的一个精神病医生。

讹诈者自己受到了讹诈，不过，这种讹诈来自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方向。许多人问，为什么胡佛长期以来不大注意搜捕最阴险的犯罪势力——黑手党呢？有些黑手党的人现在说，据他们所知，胡佛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他同有组织的犯罪人物达成了“谅解”。

据黑社会的人说，在胡佛从事特工生涯的早期，他搞同性恋时被人当场捉住过。黑手党的头头迈那·兰斯基专门利用隐私情报来操纵公职人员，据说他掌握了胡佛乱搞性关系的照片。后来，当肯尼迪兄弟对犯罪组织展开进攻的时候，兰斯基私下吹嘘说，黑手党利用了胡佛。

胡佛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其实，这位美国英雄是贪污腐化

的。据前司法部副部长说，他的生活“像东方君主一样豪华”，他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金和设备，为自己谋利，供个人享用。富有的朋友挥金如土地款待他，告诉他投资的信息。他显然保护了他们，不去调查他们触犯刑律的行为。

在联邦调查局迫害民权积极分子和自由派人士方面，胡佛无所不用其极。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更是大为震怒，因为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此奖应该由他获得。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对他的批评使他怀恨在心，他竟下令唆使黑社会袭击这位表演艺术家。

公众本来应当意识到，把胡佛说得那么好，恐怕很难符合实际。然而由于新闻界禁若寒蝉，公众竟被蒙在鼓里。

一位电视观众在胡佛逝世以前不久，给全国广播公司写信说，“如果没有胡佛先生和联邦调查局，我不知道你和我会怎样生活？”许多普通公民也有同样的看法。

但也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诗人西奥多·罗特克把胡佛称为“思想警察的头头，一个对别人要求严格的人、一个乖戾反常的人、一个毫无趣味的人”。一位小儿科医生听到胡佛死亡的消息时说，“此人不再说话了，这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他不理解我们政府的基本哲学或我们的权利法；他拥有极大的权力，用来骚扰跟他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他做了许多事情，迫使千百万美国人放弃自己判断政治是非的权利。”

此人的言行举止为什么引起如此不同的反应呢？《纽约邮报》说，“人们像对待华盛顿的其他大人物一样，对他既敬又畏。所不同的是，公众对他的生活是不了解的。”这样一个心理反常的、干了许多坏事的人竟然被人们信奉为保证我们生活安全美好的象征，这是对我们时代多么大的讽刺啊。同样矛盾的是，司法部长沃伦·伯格在胡佛死后称赞他“体现了美国梦”，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则认为他倒适宜在纳粹德国当大官。

尽管最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不利于胡佛的资料，而国会也要求把“埃德加·胡佛”的字样从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墙上去掉，但他的名字依然以金光闪闪的大字留在这所建筑物上，好像一切如故，没有任何变化一样。

为了揭示这些矛盾现象，有必要对我们这个世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自由和我们的英雄们所作的种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作一番重要的探索。胡佛的一生经历了美国梦破灭的整个阶段，因此，了解他，也许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期

埃德加·胡佛(以下全用埃德加)出生于1895年1月1日上午七点半钟,那天是星期日。

那时,人们对美国的内战记忆犹新;林肯被刺杀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情:他所铸造的联邦只有45个成员州。美国城市当时已经很拥挤了,但大批移民尚未到来。最早进入美国的黑人移民重新遭到迫害,因为南方各州实行种族隔离法。就在埃德加诞生的那天早上,一个黑人遭到南方暴民的私刑拷打,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埃德加诞生时的那座房子,是粉刷白色的木板房,离白宫有一英里多远。那时,他的父亲迪克森·胡佛年满38岁。迪克森是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在十九世纪初移居华盛顿的。

埃德加的母亲当时34岁,她叫安娜,亲朋好友称她为安妮。她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在瑞士的克洛斯特斯(现在成为滑雪胜地)当过高级官吏。安妮的祖父移居美国,他曾担任瑞士第一任驻美国总领事。她的祖母生了13个子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在内战时期曾在国会山看护联邦军的伤员。

埃德加的父母是在埃德加出生13年以前结婚的,当时举行了“国会山附近最盛大的婚礼”。对安妮这个出身名门的女子来说,这乃是平常的事情,而对出身卑微的迪克森来说,这可非同小可。迪克森是政府制图部门的一个印刷工。

埃德加是他家4个子女中的最后一个。老大是男孩子,名叫小迪克森;接着是两个女儿,分别叫莉莲和萨迪。当母亲怀着埃德加的时候,萨迪不幸死于白喉症。

从埃德加幼年的照片看来,他是个阴郁的孩子,总是偎依在父母的身边。1901年,他6岁时开始上学。那时,西奥多·罗斯福即将成为总统。埃德加从上学一开始,就是个明星学生。他在一年级的平均分数是93.8。从三年级到八年级,他的数学、代数、文法、语言、书法、阅读、历史等都是“优”或“良”。

1906年,埃德加11岁的时候,他开始办自己的报纸。他每周收集两页的材料,说服他的哥哥帮他打印出来。他的报纸叫《每周评论》,以一分钱一份的价格卖给家人和亲友。

《每周评论》除家庭的短论外,还有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消息。早期的一则头版消息报道了总统的女儿艾丽斯·罗斯福和众议院议长喜结良缘。

1908年,埃德加13岁的时候,他开始记日记。他把每天的温度、天气变化、家庭成员的出生和死亡、他打零工的收入,甚至他的帽子、袜子、衣领的尺寸全都记录下来。

埃德加的父母都不怎么虔信宗教。迪克森认为自己是个路德教徒,而安妮则是个天主教徒。这些不同的教派引起思想混乱。埃德加的姐姐莉莲一气之下,曾把家里的圣经扔进火里。埃德加13岁时接受洗礼,参加了路德教会。

1909年秋季,埃德加开始上新的学校,早上走3英里上学,晚上走3英里回家。这是他走向名利和权势的第一步。他上的是中区中学,它是培养华

盛顿精英的温床，是走向成功的跳板。这个学校不仅重视学业，也很强调体育。埃德加学习之余，投入了学校的其他活动——学生军训队。中区中学定期送学生到西点军校接受培训。

埃德加在学校得了个外号，叫“快捷”。有人说，这是指他在踢足球时快速敏捷。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弗朗西斯·格雷在1988年回忆说，“我们之所以叫他‘快捷胡佛’，是因为他说话快，思维也快。”有人说，他说话像“机关枪”似的。有一位采访法院的记者说，“我1分钟可以记200个字，但那家伙（埃德加）1分钟大概说400个字。”

埃德加在青少年时代就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中学辩论协会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在辩论备忘录中，有一条关于应当废除死刑的建议，他在旁边作出否定的答复。他的理由是：

1. 圣经主张有死刑。
2. 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有死刑。
3. 取消死刑，会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埃德加终生都主张保持死刑。

在辩论协会中有一次辩论妇女权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是否应当给妇女以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埃德加持反对态度，结果他获胜了。

埃德加在中学继续保持好成绩，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上都是“优”等，平均分数为90分或90分以上，4年中只有4次旷课。

在学生军训中，埃德加担任一个学生连的连长。他的连在训练比赛中未能获胜，他十分伤心，他不能容忍屈居人下。

1913年3月，埃德加连长率领他的学生连参加了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游行。共和党执政16年后下台了，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动荡时期。革命和战争席卷俄国和欧洲，而在美国，劳资纠纷也成为一个大问题。近半数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加班加点工作，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贫民窟家里。美国即将爆发罢工浪潮。美国有100万名社会主义者要求推翻资本主义。

在此期间，中区中学平静如常。18岁的埃德加和他的同学们忙于毕业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埃德加·胡佛、弗朗西斯·格雷等同学穿着蓝白色的制服，仪表堂堂地去开罗饭店参加舞会。

“我们不大跳舞，”格雷回忆说，“我们全都挎着马刀，它们很碍事。”那时候的舞会是非常正规的社交活动。每个年轻男子都带有一本舞册，要把女舞伴的名字和她的陪伴人的名字记在上面。埃德加的舞册表明，他的陪伴人是他的父母。他没有跟任何女子跳舞。

埃德加的男朋友嘲笑地说，“他没有任何女朋友。他只爱军训队。”埃德加在军训队的最后报告中写道，“再没有比同军训队的军官和男同学在一起更快活的事情了，大家心连心，亲如手足。我觉得最令人伤心的是，不得不与已经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伙伴们分手。”

埃德加长大成人，要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了。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幸：他父亲迪克森精神失常了。医生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病情也未见好转。他患的是忧郁症，于1921年去世。

埃德加的哥哥、姐姐都已结婚，离开家。只剩下他和他的母亲安妮相依为命。当安妮于1938年离开人世时，埃德加另找了一个寓所，独自一人住在那里。

第二章

青年时代初出茅庐

1913 年，埃德加 18 岁，从中学毕业，考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这个学院不算太有名气，但它有个优点：有夜校。这样，就使穷学生可以在白天挣钱糊口。

这时，埃德加的哥哥和姐姐都已有家室之累，父亲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他必须找份工作。安妮的侄子威廉·希茨在司法部当高级法官，他给埃德加在国会图书馆找了一个当信使的差事，每周挣 30 美元。

在以后的 4 年中，埃德加每天从他家所在地西沃德广场走几个街区到国会图书馆上班，下午 5 点到 7 点，他到法学院上课；然后回家再学习几个小时。他记录学习心得的笔记本有 26 本之多。他终生保留了这些写得很工整的笔记本。

埃德加 1916 年夏季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那时，美国接近于参加欧洲的战争。国内问题成堆：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工潮、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亨利·福特被迫同意男女同工同酬，每天也付给女工 5 美元，妇女第一次被选入国会当议员。威尔逊总统许诺，所有的妇女不久将获得选举权。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对德国宣战。

埃德加说，他自己在政府找到了一个工作。其实，那是他的亲戚威廉·希茨帮了他的忙。埃德加到司法部当了办事员。他的人事档案说他是一名“特殊雇员”。实际上，他是在邮件室工作。一位高级官员布鲁斯·比拉斯基回忆说，1917 年他乘有轨电车上上班途中，同他的邻居、邮件室主任乔治·迈克尔森谈起工作。

迈克尔森提到这个分拣邮件的年轻律师的名字。他说，“这是个极其聪明的青年。”比拉斯基说，“你那里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聪明小伙子。”迈克尔森回答说，“如果你需要他，你可以把他要去。”

电车上的这番对话对美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后果。布鲁斯·比拉斯基当时是调查局（即后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的局长。

调查局创建于 1908 年，其原来的使命是：调查州际罪行、破坏反托拉斯法和银行法的罪行以及为了“不道德的目的”携带妇女跨越州界的罪行等。

比拉斯基没有忘记他的邻居向他推荐的这个年轻人，不过，他没有把埃德加带入调查局。他把埃德加介绍给战时应急处处长洛德·奥布赖恩。1917 年 12 月 14 日，“特工人员胡佛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奥布赖恩的备忘录上。

当时埃德加差一个月就 23 岁了，他从分拣信件的工作，一下子转而对付可疑的外国人。3 年的反德宣传使全国都对德国的间谍和破坏活动惴惴不安，不过，调查局并未抓到任何一个间谍或破坏分子。许多德国侨民的命运掌握在司法部的手里。

一个 18 岁的德国侨民，由于在得克萨斯州边界动员人们支持德国而被捕。埃德加建议把他拘留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才释放。另一个德国人把威尔逊总统称作“贼”。埃德加又主张把他拘留起来。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因为有关当局认为，不能因为有过激之词就给予如此严厉的惩处。

1918 年，埃德加展开一项运动，把在美国的所有德国女人都登记注册。

同年6月,《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他立即加以否认。他终生都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因为他认为它们“歪曲事实”。

1918年,埃德加每周工作7天,常常干到深夜。他的上司注意到了这一点,奥布赖恩后来说,“胡佛是一个勤奋诚实的小伙子。”

他在司法部的第一年,先后三次增加工资,比最初的工资翻了一番。然而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23岁的小伙子没有参军?

在对德宣战的几周内,21岁至30岁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都必须登记入伍。在华盛顿开办了第一个军官训练营。300万人被征召参军,15万人在战场上阵亡。人们对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感到义愤。在一次搜查中,在纽约市抓到了6万名逃避兵役者,在芝加哥抓到了2.7万人。

如果埃德加应征入伍,那是非常理想的:20岁出头,正当年;在中学受过军训,同西点军校有密切联系。他的许多同班同学都进入军官训练营,有些开赴前线。唯独埃德加例外。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大显身手。1922年,他在美国陆军军官后备队中获得少校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40来岁,是军事情报后备队的中校军官。但是,陆军部长坚持让他辞职,去当联邦调查局局长。

20年以后,埃德加对一家报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之所以没有参军,也是因为他的“上级认为他从事间谍工作可以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

埃德加一直是单身一人,这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

给他当了53年机要秘书的海伦·甘迪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甘迪一直守口如瓶,但1988年逝世以前,她吐露了内情。

她说,埃德加24岁时,认识了一个名叫艾丽斯的年轻女子。艾丽斯也在战时应急处工作。她是华盛顿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容貌倾城。

1918年11月11日——休战日,埃德加的朋友西德尼·考夫曼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考夫曼和他的女朋友那天晚上要在华盛顿的哈维饭店举行订婚仪式,邀请埃德加和艾丽斯去助兴。

埃德加决定,他与艾丽斯也在同一天晚上订婚。他给她写了个便条,要她在去哈维饭店的途中,在拉斐特饭店同他见面商量此事。然而,艾丽斯没有来。不久,她与另一个年轻军官订了婚。这个军官不同于埃德加,他上了前线。

甘迪出席了那天晚上的宴会,目睹了埃德加的沮丧情绪。孤独的埃德加第一次注意到她。他们有过几次约会,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没有发展到恋爱的程度,后来就冷了下来。但当他需要秘书时,他把她找来了。她在调查局当了几个月信使,就担任了他的机要秘书,此后一直呆在他的身边。

甘迪说,艾丽斯对埃德加的打击太大了,使他的感情受到创伤。当他得知艾丽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跟他来往,另一方面却同前线的那个军官鸿雁传情,把心交给了他,埃德加更受刺激。这可能是埃德加再也不信任女人、从不结婚的原因之一吧。

1955年,当他谈到他同女人的关系时,他大概是指艾丽斯。他对记者弗莱彻·克内贝尔说,“我年轻时,曾经谈过一次恋爱。我想,可以把它叫作初恋。”他对另一位采访者说,他想与之结婚的女人往往总是同别的男人有些勾搭。

1939 年，埃德加作了一项相当坦率的谈话。他说，“我要承认，如果我娶一个姑娘，她不再爱我，我们的婚姻破裂，那会毁了我的。我的精神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在同一次谈话中，埃德加谈了他对婚姻的态度。“我始终崇敬姑娘们和女人们。她们是男人仰慕的对象。如果男人们把这一点铭记在心，保持下去，那么，结婚以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就是我终生对女人的态度。”

埃德加的外甥女玛格丽特亲眼看到她舅舅在失去艾丽斯以后，再也没有跟同龄的女子来往过。她把这归咎于埃德加的母亲。她说，“姨妈独断专行。一有风吹草动，她就出来制止。埃德加永远结不了婚。”

埃德加的母亲曾经干涉她长子的婚事，说他找的对象跟他不般配。他儿子没有理会她。然而，埃德加却被她牢牢控制在手心里。

埃德加多年以后说，他“初恋”失败后，一头扑在工作里，取代了女人的地位。“我成天泡在调查局，我想，任何妻子都无法忍受我的这种情况。”

多年来，除了他妈妈以外，埃德加同任何女人都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他每天晚上回到她妈妈给他布置得非常舒适的家。他对她很好，给她许多礼物，如珍珠宝石等。他吃饭很挑剔。虽然家里有厨师，但还得她妈妈亲自给他做早餐。他喜欢吃煎鸡蛋，而且必须是囫圇的，一碎了，他就不吃。

在司法部，埃德加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8 年 11 月，再过两个月他就 24 周岁，他被提升为特别法官，年薪 2000 美元，即相当于他父亲 60 岁时挣的工资。

曾经帮助埃德加走向权势道路的奥布赖恩活到 98 岁高龄，比埃德加还多活了几个月。在他去世以前，有人问他，在促成那个名叫埃德加·胡佛的年轻人的事业方面，他起了什么作用时，这位老人承认：

“这一点，我要在黑暗的角落里悄悄地说，这是我应当赎的罪过之一。”

第三章

进调查局

埃德加的被提拔，要感谢看风使舵的司法部长和他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没有机遇，没有各种条件的配合，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当美国庆祝欧战的结束时，埃德加的前途还没有着落。战时应急处解散后，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他申请到移民局工作，遭到拒绝；他找他的上司奥布赖恩，要求把他转移到调查局，也未能如愿。不过，奥布赖恩把他介绍给已被提名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

帕尔默一被提名为司法部长，包括奥布赖恩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就离开调查局。战争期间，帕尔默担任侨民财产管理局局长，被没收的千百万美元的德侨财产落入民主党的亲信手中。帕尔默野心勃勃，志在总统，司法部只不过是它的一块跳板而已。正当他窥测时机之际，一场政治风暴来临了，这就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歇斯底里浪潮。

帕尔默 1919 年春季走马上任。那时，列宁正在号召世界革命。欧洲社会主义大动荡的可怕消息使美国中产阶级惊魂未定，他们又被美国国内此伏彼起的罢工烽火所震撼。仅仅是那一年，罢工就有 3000 多起。接踵而来的是炸弹袭击事件，连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的寓所也在半夜遭到袭击。参议院要求调查传说中的推翻政府的阴谋计划。国会提供经费，开展了对激进团体的全面调查。

对赤色分子的大调查开始了。帕尔默雇佣了前特工处处长威廉·弗林担任调查局局长，特工处俄国问题专家弗兰克·帕克为副局长。当他为司法部物色几名助理时，想起了埃德加·胡佛。在战时的法律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要求留下来，埃德加是其中的一个。

特工处对埃德加进行了调查，发现他除了父亲重病，住进精神病院，由他负担费用之外，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24 岁的埃德加当了帕尔默的特别助理，领导一个新成立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收集“革命的和极端激进的团体”的材料。

他的日常工作是由司法部助理部长弗朗西斯·加文指导的。加文是一个反颠覆的狂热分子，他对外国人有着本能的仇恨。埃德加很快就成为加文的“宠儿”。这个工作对他颇为合适，因为他过去曾经喜欢整理图书和记录他的衣物的尺寸，后来又在国会图书馆搞过编目工作。他现在可以利用他这方面的经验来编制左翼分子的资料索引卡片了。

他编写的索引卡片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是效率极高的，接近于今天的计算机检索。人名和相互参见条目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查到。埃德加的第一项庞大工作就是编制 50 万人的索引卡片。并编写了 6 万人的简历。

埃德加埋头于读共产党的文献和著作。他回忆说，“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第三国际的文献。”他向上级报告说，这些理论“威胁到社会的安全、个人的幸福……它们会破坏美国的和平生活。”

这对苏联共产主义作了准确的描写。然而，当时很少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有出现暴力革命的实际危险。不过，炸弹袭击事件使全国惊醒了，当然，帕尔默和他手下的年轻人的工作也起了作用。

埃德加的助理乔治·鲁赫是他中学时代的朋友，此人持有极右观点。他

不同意让左翼分子像其他公民那样发表反政府言论。他离开调查局后，到匹兹堡一家煤炭公司当工业警察的头头。埃德加派特工人员帮助他训练对付工人积极分子的打手，鲁赫对埃德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叫埃德加·胡佛。

他俩给上级提出了一个对付危险的激进分子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马萨诸塞州法官劳伦斯·布鲁克斯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插曲，比参议员麦卡锡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镇压行动有意识地选择在俄国革命两周年的 1919 年 11 月 7 日这一天开始。数以百计的革命嫌疑犯被逮捕，许多人遭到毒打。这些袭击是由警察局和调查局进行的，但是“处理”则是在司法部由埃德加掌握的。

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使埃德加第一次抛头露面。他向法院控告了埃玛·戈德曼，结果把她驱逐出境。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她是无政府主义者；她在电影《赤色分子》中批评了有组织的宗教，鼓吹了节制生育。她还宣传性解放、自由同居。埃德加说，搜查到的她的信件“读起来令人肉麻”。

早在埃德加出生以前，戈德曼就来到美国，她在美国居住了 34 年。她的父亲及其前夫都是美国人。但是，埃德加进行深入调查以后，说她丈夫的美国籍是用欺骗手段弄到的；18 年以前麦金莱遇刺身死，刺客是受了她讲话的煽动。

1919 年圣诞节的前 4 天，凌晨 2 时，埃德加和调查局局长弗林乘快艇赶到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他们目送戈德曼、她的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和其他 247 名被流放者登上军舰，把他们送往俄国。次日，埃德加美滋滋地向报界描述了他的这次经历。他说，“一俟必要，将把其他亲苏分子送往欧洲，从而把危险的激进分子清除出美国。”

新年元旦，埃德加也顾不上过自己的生日。最大的一次对赤色分子的袭击就要开始了。1 月 2 日，警察局和调查局在 23 个城市逮捕了大约 1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证明是无辜的，予以释放。

司法部和帕尔默部长受到社会严厉的批评。对流放作出裁决的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波斯特说这个行动是“残酷的巨大骗局”。虽然埃德加自称“与此事无关”，但他和鲁赫显然是夜间袭击的主要指挥者。

调查局助理局长弗兰克·伯克下达的命令说，“在逮捕过程中，遇有重要事情，即与胡佛先生联系。”埃德加利用调查局的力量对那些代表被捕者、揭露侵犯人权行为的律师进行了侦察。目标之一是著名的哈佛法学院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他后来当了最高法院法官。埃德加监视弗兰克福特达半个世纪之久，私下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人物”。1961 年，弗兰克福特到最高法院工作后，一份过去的报告成了埃德加的心头病。由“埃·胡佛”签署的 1921 年的这份报告说弗兰克福特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传播者”。事情败露后，埃德加为自己开脱，说这份报告是别人搞的。

不论是埃德加，还是司法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对共产党的袭击而受到惩罚。国会的调查拖了很长时间，结果是新总统上台，换了司法部长，当事人不了了之。

埃德加取得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首先，他知道了，进行全国性镇压，在美国是行得通的。尽管舆论大哗，对赤色分子的镇压毕竟使美国共产党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它的党员人数从袭击以前的 8 万人下降到 1920 年底的 6000 人。

埃德加还发现，可以不根据罪行，而根据政治信仰，对人们进行侦察和迫害。为了不被抓住，必须至少在法律上遵守“适当的程序”。一定不要让公众知道调查者的宝贵财富——秘密档案。在关于袭击赤色分子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许多文件，造成被动局面。埃德加当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后，完善了档案制度，局外人是无法看到这些档案的，只有在对埃德加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档案。

他还懂得了党派斗争和只忠于一个人的危险性。1920年6月，当帕尔默部长去旧金山的民主党年会上竞争总统提名时，埃德加跟着去了，他超越他的职权范围，动员他的一切力量来为帕尔默效劳。

帕尔默未能获得提名，民主党也在大选中被击败。参议院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埃德加和其他三名官员去旧金山的旅差费是由纳税人的钱支付的。埃德加辩解说，他去那里是调查激进分子的情况的。

这次调查差一点儿把他的工作搞掉。因此，从这以后，他以超越党派的面目出现。他从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喜欢在公开场合说，“我不喜欢贴上政党的标签，我是不关心政治的。”

这不符合事实。从1921年到他逝世为止，他始终是共和党的右翼支持者。在赫伯特·胡佛于1929年当选为总统以后，埃德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对他以前的一位同事丹尼斯·迪克森说，“我关心共和党的利益，这次大选的结果特别使我感到欣慰。”司法部的老资格官员柯林斯说，“埃德加从始至终一直是共和党人。”

不过，埃德加不露声色，政治上多变。威廉·沙利文说，“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一个自由派来，他走的时候会认为，‘天哪，埃德加是个自由派。’如果一个小时后又来了一个伯奇分子，他走的时候会说，‘我认为他心灵深处是一个伯奇分子。’他是一个出色的变色龙。”

他还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调查局助理局长弗兰克·伯克为提拔埃德加出力不少，然而他的这位门生竟在背后骂他为“政治上的废物”。气得伯克扬言要踢他几脚。后来，两人见面时，埃德加用公家的钱雇了三个彪形大汉当保镖。

司法部的情况每况愈下。哈丁当总统时，任命哈里·多尔蒂担任司法部长。此人在政治上一意孤行，还不如帕尔默。1921年多尔蒂进行改组时，埃德加进了调查局，这里成了他的终生老窝。8月22日，他被任命为调查局助理局长。新的局长是威廉·伯恩斯。他曾当过纽约市的侦探，是一位花花公子，把封官许愿当作政治上的报偿。

多尔蒂像他的前任一样，对镇压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不遗余力。他的手法包括侦察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侦察的结果有一部分交到埃德加手中。埃德加常常说，他担任局长以后，再没有对国会进行刺探。这不符合事实，只不过他更善于掩盖罢了。

埃德加的哥哥迪克森对埃德加当个助理局长的官衔不大感兴趣，不断嘲弄他弟弟。一天晚上，埃德加沿着西沃德广场往家走，觉得身后有人盯梢。一个黑影窜进了后面的灌木丛，接着，突然冲过来，向他大吼一声——原来是迪克森！埃德加不喜欢开这种玩笑。

二十年代，爵士乐和舞蹈风靡美国，但埃德加却过着古板拘谨的生活。他仍然没有女朋友。但同弗兰克·鲍曼过从甚密。鲍曼是他带到司法部的男同学。星期日晚上，两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同去电影院消遣。然而，鲍曼后

来结婚了。

1922 年，埃德加唯一可以倾注他的爱心的，是一条名叫斯普丽的小狗。每天早上，它陪伴主人去取报纸，然后坐在桌旁吃埃德加扔下来的东西。埃德加在办公桌上放的不是亲友的照片。而是斯普丽的玉照。埃德加先后有过 7 只狗，这是其中的第一只。

几年以后，斯普丽死了，埃德加为它举行了葬礼。他和他的三个男友驱车到阿斯平山的狗公墓，脱帽立正，看着白布裹着的小狗尸体慢慢放进土坑里。埃德加对公墓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

联邦调查局的宣传人员常常拿狗作文章。一位助理在耶鲁大学对听众说，“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被电椅处死的前夕，写信给胡佛先生，请胡佛先生照顾他的狗，并对此表示感谢。”埃德加走出楼，去迎接斯普丽的继承者的到来，它叫斯科蒂。

埃德加回到家，大多数晚上工作到深夜。24 岁的埃德加过着一种孤独而紧张的生活。但是，他在事业上即将迈出重大的一步，这个成就将使他的母亲非常高兴。

第四章

担任调查局长

1924 年的母亲节，安妮·胡佛送给她儿子一个蓝宝石戒指，他每天戴着，直到最后一息。前一天，5 月 10 日，是未来的特工人员应当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埃德加被提拔为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说，那个星期六，他被以整顿司法部为己任的新部长哈伦·斯通叫去。斯通上任后，首先解雇了伯恩斯。埃德加心里七上八下，以为自己也要被打发走。不料，斯通大声说，“小伙子，我要你当代理局长。”

斯通接管司法部时，不认得任何人，不知道谁可以信任。因此，他开始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其中也包括当时担任商业部长的赫伯特·胡佛。

埃德加早就同这位同姓的部长的工作人员有接触，特别是同胡佛关系最密切的助理劳伦斯·里奇尤其要好，因为他曾经在调查局工作过。听说新的司法部长要物色新的调查局局长，他一下子就想到埃德加。“干吗要舍近求远，目前在职的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年轻干将嘛。”这样，埃德加的名字就传到了斯通那里。埃德加的任命没有见报。斯通讲明，这项任命不是永久性的。他说，“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前，我想先亲自抓抓调查局。”多尔蒂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斯通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人们的信心。埃德加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必须作出成绩，使斯通相信他就是恰当的人选。

在调查局，过去有一间办公室叫作“贪懒者之家”，游手好闲的人聚集那里，饮酒作乐，言不及义。埃德加封闭了它，解雇了许多人。

在埃德加的建树中，对特工队伍的整顿最值得称道。从他就任直到今天，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队伍中消除了腐败现象。这在警察队伍中是罕见的。他们的忠诚正直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称赞。

埃德加试图任命他的好朋友、右翼极端分子乔治·鲁赫为他的最高助理，但由于群众意见很大，这项计划未能获得批准。不过，司法部长批准他为调查局的永久性局长。这个消息在 1924 年 12 月 22 日公布于众，再过 10 天就是埃德加 30 岁生日。1935 年调查局才加上“联邦”两字，成为“联邦调查局”，简称调查局。他担任这个职务达 48 年之久。

埃德加逐步把调查局建立为美国最有势力的组织。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结合：社会的迅速变化、政治上的变动、机遇、他自己的组织能力，善于掌握全国人心的动向以及善于自我宣传。

埃德加上台，恰逢其时。在哈丁总统执政时，美国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国人希望政府官员有效率、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现代技术。新局长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

埃德加弃庸人而选良才，撤掉 20 多个各地办事处。5 年之内，他把人员精简到 339 人，比他接管时差不多减少了四分之一的人力。新来的人都是 25 岁到 35 岁的青年，懂得法律和会计。

新的特工人员拥有埃德加的委任状，年薪 2700 美元，外加旅差费，要随时准备去美国任何地方出差。特工人员上班时，穿制服，白衬衫，打领带，戴一顶普通草帽；要宣誓捍卫宪法，打击外国和国内的一切敌人。

新招募来的爱德华·安布拉斯特从 1926 年一直工作到 1977 年。他是个银行诈骗案专家。此君是新一代特工人员的典型，不沾烟酒。他原是星期日

学校的教师，他把他的 7 个学生介绍到调查局。埃德加认为他堪称楷模，让他超过退休年龄，继续工作。

一个著名的第一代特工人员利昂·图罗对埃德加所需要的人作了这样的描绘：“他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吃的好，穿的好，但并不挥霍浪费。他一天 24 小时都想着工作。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局里。他学会从工作的角度重新估价他的生活，摒弃普通人的普通乐趣，常常忘记休息。他的座右铭是：‘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埃德加·胡佛。’”

特工人员把埃德加称作“小拿破仑”。他简直是个独裁者。他个头矮小，为弥补这个缺陷，他设计了一种旋转椅，可以旋转到最大高度，坐在上面俯视来访者，他们被领到低矮的沙发上就坐。他有专门给他制鞋的工匠，他的鞋底垫得较高，以使他显得高大一些。

埃德加要求职工很严。他当权的第一个 10 年正当禁酒时期，特工人员喝酒，一律开除，即使下班以后喝酒，也不行。

未结婚的特工人员绝对不许乱搞两性关系。有一次，一个特工人员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办事处同一名女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他得知后，不仅把这一对男女解雇，而且几乎把全国各地来自诺克斯维尔的工作人员全都解散了。

虽然埃德加表示他无意不让他手下的人结婚，但是，他早期总是阻挠他不满意的婚姻。特工人员一旦结婚，埃德加便严密监视他们。各地办事处的头头接到指示，一旦他的同事有婚外恋，必须立即禀告埃德加。

特工人员生活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随时有“打手队”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有越轨行为，轻则警告，重则立即调动工作。最重的处罚是开除，一旦开除，那就永世不能翻身，在联邦系统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特工人员的生活是危险的，在三十年代的动荡时期，尤其是如此。在 1934 年以前，特工人员只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才携带武器。埃德加当局长期间，共有 22 人殉职。尽管工作危险、纪律严格，人们还是愿意在埃德加手下工作，因为那里的工资和福利比同类政府雇员要优厚，而且有一种团结精神，这是其他部门比不上的。如果工作人员遇难牺牲，埃德加总是亲自监督追捕在逃的凶手，给死难者家属以抚恤金，还可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做法深得人心。

埃德加喜怒无常，时而仁慈，时而残暴。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妻子怀孕，埃德加把他调到近处，以便照顾。另一个工作人员原定要提升，但他要求推迟一个月上任，以便照顾新生的婴儿，结果他被取消了提升的资格。

埃德加手下的人对他既爱，又恨。他把调查局变成了集体的家庭，非常象武装部队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外界隔绝。教官们严肃地对新来者说：“这是人的头脑所能够设想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新人必须记住美国作家爱默生的一句话：“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的延伸了的影子”，其含义当然是指局长啦。调查局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埃德加有点像十九世纪的家长，根据他的爱憎来表扬或惩罚一个人。

埃德加使调查局成为独一无二、不可缺少的机构。他使执法工作走向现代化。1924 年，他把几箱翻旧了的指纹卡片搬进局长的办公室。此外，还保存了监狱送来的 80 万个指纹。

埃德加曾经梦想实行“普遍指纹”制，即不仅留下犯罪者的指纹，而且也留下所有公民的指纹。这一点没有做到。但他保存了全国警察的指纹、联邦工作人员的指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陆海空三军战士和军工企业职工

的指纹。

埃德加的指纹室从一间小的房间发展到占司法部的一间大楼，最后扩大到六层楼房，占据一整个街区。到六十年代，如果把指纹卡一层层摞起来，那就有帝国大厦 113 倍那么高。到埃德加逝世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脑化指纹处，可以在一瞬间查到 1.59 亿人的指纹。

埃德加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犯罪实验室，大批专家在研究弹道轨迹的特点，对毒药、头发和纤维进行分析。还有一些人花毕生的精力埋头研究橡皮图章和印刷标准档案、开支票者标准档案、安全纸标准档案、打字机标准档案、机要人员档案或匿名信档案。

调查局的犯罪实验室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部门。这是埃德加帝国不断扩大的关键。第一步是说服美国的警察头子们，在一个流动性日益加强的国度里，建立一个集中化的指纹系统是十分必要的。当各地每天大量向华盛顿输送指纹的复印件时，这大大便利了逮捕和判罪工作。

仅仅是指纹和犯罪实验两项工作就使调查局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权力有限的机构变成为一个其他执法部门都要依靠的重要机关。不久，它又提出了标准化犯罪报告制度，协调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的犯罪统计材料。接着，它出版了执法公报，成为第一份由中央刊登通缉名单、把调查局的观点——或者说是埃德加的观点——传达给全国每一个警察的第一流刊物。调查局很快就实际上垄断了犯罪信息的供应。

同警察的联系是 1935 年建立起来的，当时埃德加创建了警察训练学校，它变成了调查局的全国警察学院。当时还没有培养警官的地方，因此，参加警官学院培训的警官回到原单位后，便成为业务尖子。警官学院毕业生有五分之一的人成为警察部门的领导人。毕业典礼十分隆重，有总统和司法部长参加。

埃德加深知，人们很害怕出现一支全国性的警察力量，所以他力求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不肯接受缉查贩毒的任务，因为这个工作一方面不容易取得成就，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工作人员的腐化。在他当局长期间，调查局只负责美国境内犯罪活动的极小一部分工作。

埃德加最善于搞自我宣传工作，他用纳税人的钱建立了第八处，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犯罪记录和信息处”。担任处长的是他的亲信路易斯·尼科尔斯，他也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他把这个部门建成了为埃德加和调查局赢得更大名声的单位。

犯罪记录处有多种任务。其中之一是根据埃德加的意图向公众进行宣传，使用一些打动人心的语言，如，“道德沦丧”、“人们漠不关心公德”、“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政府主义分子”、“新闻界的恶棍”、“我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一个新的幽灵在西方世界游荡”。其含义是，只有埃德加和他的调查局才能保护美国免遭劫难。

到 1946 年，调查局的人马扩大到 3000 多人。罗斯福总统交给埃德加一个新的任务，即保卫国家的安全。这个任务本来主要是调查法西斯分子，埃德加却借此迫害他的主要敌人——激进分子。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调查局的镇压。埃德加把美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性淫乱到少年犯罪，全部归咎于共产党。

埃德加使一大批有势力的组织全都俯首帖耳，为他所用，其中包括警察、联邦和州的检察机关、依靠调查局从事安全工作的许多单位以及像美国军团

（退伍军人组织）这样的爱国团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埃德加甚至把国会也掌握在他的手心。调查局同所有的国会议员进行了接触，整理了他们的档案。调查局千方百计地讨好居于关键岗位的议员。大部分议员也乐于借此出出风头。

埃德加一年一度参加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会议。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拨款，他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犯罪统计材料；一一列举调查局的成绩；并提出许多严重的警告，为他要求的拨款找根据。他总是有求必应，从来没有遭到拒绝。从 1924 年到 1971 年，从未就调查局的预算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

埃德加对上级装出一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样子，从理论上说，司法部长是他的上司。然而，实际上，自从三十年代埃德加成为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以来，连司法部长也不敢跟他发生正面的对抗。

埃德加先后为八个总统服务过。有几个总统曾经想换掉他，但都没有成功。埃德加善于使总统觉得他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

埃德加的庞大的档案系统是他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以此为骄傲，正像他以其科研工作的进展为骄傲一样。不过，总统们和政治家们却不得不为这些档案而惴惴不安，因为它们可能给他们带来灾难。埃德加多得如山的档案既有例行汇报、零碎的情报，也有详细的分析和丑闻记录。即使到今天，局外人也不大清楚埃德加的档案系统。

埃德加的档案系统包括“淫秽档案”、“性越轨档案”、“官方机密档案”、“个人机密档案”、“6 月邮件”等；甚至还有一个“不入档”系统，它收存的是中央档案系统以外的调查局非法潜入的汇报材料。

这些档案的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埃德加一人手中。埃德加手下的高级人物，有的可能是有业务专长的出色人才；有的只不过是趋炎附势的走狗；有一些是忠诚的好人；也有一些是可能干坏事的恶人。在那个封闭的、互相隔绝的天地里；他们全部依靠埃德加，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威胁埃德加的地位。

第五章

整顿调查局

乍一看，埃德加的特工队伍似乎颇有代表性，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农民、飞行员、记者、烤面包师傅、职业足球运动员、牧童、铁路工人、矿工等。有些人有军事经验。埃德加特别欣赏以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的人。他对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妇女不感兴趣。他歧视犹太人。

埃德加 1924 年当局长时，有 3 名女特工人员。他在一个月之内就解雇了两人。第三名妇女利奥诺·豪斯顿之所以能够留任，是因为她的国会议员对埃德加施加了压力。然而，她也没呆多久。调查局的档案表明，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扬言，“她一出院，就杀死胡佛先生”。

从那时以后，埃德加就再也没有招募女特工人员，说她们“不会手枪格斗，而我们所有的特工人员都必须掌握这门技术”。50 年以后，两名女权主义者控告调查局，说它拒绝妇女是对她们的宪法权利的侵犯。对此，埃德加置之不理。不过，他一死，政策就变了。今天，调查局大约有 900 名女特工人员，她们全部接受了武器训练。

但他雇佣妇女担任办公室事务性工作。他对她们特别严格。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妇女在公开场合吸烟，是要遭逮捕的。所以，他禁止她们在办公室吸烟。他让女工作人员穿裙子，不准穿裤子。直到 1971 年，他自己的秘书劝说他，女工作人员冬天寒冷，需要穿裤子；他才让步。有一个女工作人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他发现她同一个搞同性恋的男人睡觉，便立即把她开除了。

埃德加歧视犹太人。每年他都在迈阿密海滩过圣诞节，他总是选择那些挂有“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饭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一直是如此。后来，也有过两个犹太人当助理局长。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中大约有 0.5% 是犹太人。但调查局的篮球队曾经一度大部分是犹太人。

埃德加没有外国朋友。他对外国人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他除了到加拿大和墨西哥边界地带作过两三次一日游之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有一次，他曾作出这样的决定：《新闻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作为采访者不受欢迎”，因为他的来自香港的中国妻子在给一个水兵当助手时结识了许多海军军官，埃德加担心她是个间谍。

埃德加对黑人的态度，类似他那一代大部分南方白人。他们认为黑人当佣人满不错，但不适合从事正式职业。埃德加排斥黑人的时间相当长。埃德加上任时，有一个黑人特工人员，名叫詹姆斯·阿莫斯，外号叫“托姆叔叔”。最初，他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孩子。他之所以当上特工人员，还得感谢埃德加的前任威廉·伯恩斯。他被用来渗透黑人积极分子中间进行活动。他是第一个黑人特工人员。

在埃德加当权的头 40 年中，有 9 名黑人被从下层提拔上来，其中 5 人给他当仆人。他的第一个仆人是萨姆·诺伊塞特。他从信使提升为埃德加办公室的看门人。每天早上，主人的汽车一开进地下室的汽车库，蜂音器便响了，诺伊塞特赶忙迎候在电梯处。他一直呆在埃德加身边，伺候到晚上下班为止。

诺伊塞特会画画，受到埃德加的鼓励。他给局长的狗斯普丽作的画像挂在埃德加的家里。他的其他画在办公室的休息厅每年展出一次，有些官员为了讨好主子而购买一些画，那些不来看画展的助理们往往受到局长的申斥。

一些黑人的被提拔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安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而已，因为它公开指责调查局执行一种“纯白种人”雇佣政策。在六十年代以前，调查局是白种人的天下。1961年接受训练的犹太人特工人员杰克·莱文惊讶地听到教官们公开地把黑人称作“黑鬼”。有一个教官对新人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位急救教官说，最有效的急救办法是嘴对嘴地进行吸气，如果伤员是黑人，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

罗伯特·肯尼迪当司法部长时，督促埃德加雇佣更多的黑人。他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往往当埃德加离开房间时，又把他叫回来，“噢，顺便问一句，埃德加，这个月雇佣了多少黑人？”调查局只用白人的政策第一次受到严重的压力。

一些黑人突然被要求参加调查局的工作。奥布里·刘易斯以前是“圣母”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当了教练。在肯尼迪总统参加的名人纪念馆宴会上，他发现自己坐在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身旁。不久，他就被吸收参加它的队伍。1962年6月，他进了调查局在弗吉尼亚的警官学院。除了他这个黑人外，进入这个学府的还有一个黑人，名叫詹姆斯·巴罗，他以前是调查局的办事员。《黑檀》月刊很快就精心撰文，介绍他们两人的情况。1962年年底，调查局在总数6000人的特工队伍中。有了13名黑人。

埃德加逝世的时候，调查局有70名黑人特工人员，但没有一人担任高级职务。到199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0人，不过，在10,360名特工人员总数中，这仍然只占4.8%。歧视黑人特工人员的丑恶现象今天仍然不断浮现。

当1929年，埃德加庆祝他的34岁生日时，他还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就。经过他整顿的调查局虽然干净利落了，但仍然默默无闻。埃德加也是这样。有一篇文章介绍6个碰巧都叫胡佛的华盛顿官员，他名居末位，比他的哥哥迪克森都低两个名次，迪克森当时是商业部的重要官员。

当时华盛顿的气氛是萎靡不振的。在卡尔文·柯立芝的领导下，美国度过了几年放任自流的岁月。接着，赫伯特·胡佛入主白宫。开始了共和党的连续第三次执政。这位曾经当过商业部长的总统未能认识到华尔街经济恐慌的严重性，上台才几个月就宣布经济大萧条“已经过去”，其实真正的灾难尚未到来。

1932年，1300多万美国人失业了，约占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成千上万的男女排队领救济粮。100多万人无家可归。胡佛总统的名字成了经济困境的同义语。所谓胡佛毯子，就是穷人用来御寒的报纸；所谓胡佛旗帜，就是空空如也的钱袋；所谓胡佛村，就是无家可归者居住的简陋棚屋群。

埃德加利用调查局为总统效劳，打击那些敢于批评总统的人。《华尔街预测报》的发行人乔治·门希尼克是经常抨击总统的人之一。他刊登了许多文章，报道美国银行的困境。埃德加派了5名特工人员对他进行诘问。埃德加满意地向上级汇报说，“门希尼克见到特工人员来访，大力慌张。他被吓坏了。我认为他不敢再散布关于银行的任何消息了。”

1932年3月的一个夜间，新泽西一家托儿所的一个孩子失踪了。这个消息转移了公众对总统的注意，并使埃德加第一次大出风头。美国著名飞行员林白的儿子被绑架，后来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总统派埃德加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这个案件的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人们把埃德加吹捧为“犯罪问题的世界性权威”，然而，他的插手并没有带来惊人的突破。当地警察嘲笑了这位

来自华盛顿的大侦探：埃德加发现一只鸽子栖息在林白寓所的屋檐上，竟以为它从绑架者那里带回了信息。

在这个案件中，最聪明的人之一是埃尔默·艾雷，他是国内税收局情报处处长。他建议赎金的一部分用可以辨认的美钞和证券付给，这个措施导致谋杀者理查德·豪普特曼的被抓获。然而，埃德加后来把艾雷排斥在这个案件之外，他叫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监视艾雷和他的一个助理。甚至在这个案件结束5年以后，艾雷的电话仍然被调查局窃听。

1932年夏初，国内经济一团糟。民主党意识到，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它可能获胜。当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时，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对埃德加非常不满。他就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10年以前，在袭击赤色分子的岁月里，是他使埃德加崭露头角。但是，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出卖了他。散布他贪污腐化的流言蜚语的人中有埃德加。现在他是民主党纲领委员会主席，他主张，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埃德加应予以解职。

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向美国人民许诺实行“新政”，以压倒多数当选为总统。1933年初，随着总统就职典礼的临近，盛传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将出任司法部长。他说，他打算对司法部进行大规模改组，要彻底更换人马。

埃德加立即行动起来，阻挡大难临头。新当选的政治家们抵达华盛顿的火车站时，惊奇地发现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满面笑容地迎接他们。埃德加表示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给予协助。

埃德加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沃尔什在乘火车来华盛顿途中患心脏病突然逝世。这使他松了一口气。然而，埃德加将被解职的传说继续流传。他的共和党朋友们起来帮忙了。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在最后时刻，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为他说情。

在罗斯福就职的那一天，全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这是发生全国危机的一天。然而，胡佛同新总统一起坐在高级轿车里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驶的时候，他抽时间为埃德加说了些好话，他希望调查局的高层领导不要有什么变动。他说，埃德加“工作出色”。罗斯福表示，他要研究此事。

事实上，新总统对埃德加有严重的怀疑，他的决定推迟了几个月。埃德加显然感到不安。突然，有人查询了他的开支情况。为什么他去纽约坐火车的一等车厢？埃德加在曼哈顿一家饭店的卧室是公用，还是私用？白宫接到一份报告，说埃德加是三K党成员。他在国会的盟友约翰·麦科马克赶忙加以反驳。

拨款委员会的高级民主党人、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要求新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搞掉埃德加。国会其他一些议员也有同样的要求。在胡佛当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麦凯勒的办公室被搜查过。他认为是调查局干的。

卡明斯考虑由司法部的一个官员华莱士·福斯特接替埃德加的工作，此君不幸死亡。另一个竞争这个职务的主要对手是纽约的私人侦探瓦尔·奥法雷尔。埃德加向部长说他的坏话。

经过几个月的勾心斗角后，埃德加的去留最后还是要由罗斯福亲自来决定。他听取了许多人的意见，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加文。在袭击赤色分子的岁月里，加文曾是埃德加的上司。加文写信给总统说，“不要让他们给你搞掉胡佛这个小伙子。你同他或他的调查局打交道的越多，就会发现越离不开他们。”

决定性的意见可能是来自司法部长卡明斯，他需要埃德加留任。罗斯福

表示同意。1933年7月29日，此项任命被宣布了。总统的这一步以及其他一些做法不仅使埃德加保住了官位，而且使他和她领导的机构成为美国有翼进行镇压的最强大的一支力量。

卡明斯后来回忆此事时，颇感后悔。他说，“这是我犯的最大错误之一。”他发现，埃德加“很难驾驭，无法控制”。

罗斯福上台伊始，很需要做几件事，引起国人注意。他首先抓犯罪问题。当时中西部地区局势严重，土地荒芜，商店关闭，银行被抢，富人被绑架。

这只是地区性问题，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犯罪浪潮，但政府认为这是建立自己威信的好机会。司法部长说，“我们现在要从事一场斗争，打击危及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由于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卡明斯请一些著名记者吃饭，共商对策。据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回忆说，“他对我们说，对付绑架的最好办法是加强调查局，不仅要加强它的实力，而且要加强舆论界对它的支持。……他想任命一位第一流的公共关系官员，他就其人选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座的人，包括卡明斯，一致同意亨利·休达姆。”

休达姆以前是战地记者，曾为《布鲁克林鹰报》工作过。他当过国务院新闻署署长，跟总统的个人关系很好，后来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时代当过杜勒斯国务卿的助理，还给伊朗国王当过顾问。

在此期间，埃德加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笔杆子，名叫考待尼·赖利·库珀。这是个怪人。他最初给马戏团当丑角，后来给威廉·科迪上校当新闻官。今天他以“野牛比尔”鸣于世。他还给西部低级杂志写了不少东西，写的短篇小说达750篇之多。

他同休达姆一起搞宣传工作，使埃德加的名字家喻户晓。1940年，他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上吊自杀。据他的遗孀说，他是被埃德加的一些错误做法逼死的。

许多匪徒，以及不少勇敢的律师，在三十年代中期死于血泊中。卡明斯当了一任司法部长，不久，便被人遗忘了。唯有埃德加像以往一样，岿然独存，在经济大萧条之后成为一个民族英雄。

第六章

在调查绑架案中大出风头

在打击匪徒的斗争中，埃德加的主要帮手是梅尔文·珀维斯，他是芝加哥地区的特工头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朋友到仇人的过程。在埃德加的个人生活中，只有这个插曲有案可查。琅维斯家保存了这两人在1927年至1936年之间两人来往的大约500封信。许多信件的内容十分亲热，说明埃德加对这个年轻人是另眼看待的。

珀维斯的青少年时代有点类似埃德加的经历。他诞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他当过学生军训连的连长，获得法学学位。他参加了大学生联谊会和共济会。他工作十分勤奋，生活上极为讲究，每天要换三次衬衣。

他到调查局工作后，埃德加很喜欢他，抛弃了通常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严格礼仪，写信时称他为“亲爱的梅尔文”。珀维斯感到不安，仍坚持称埃德加为“胡佛先生”。后来，埃德加要他“不再用先生两字”，他便改称他为“亲爱的局长”。

1933年6月，在埃德加被重新任命一个月前，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酿酒公司总裁小威廉·哈姆被绑架，后来交了10万美元赎金，才获释。次日，在堪萨斯市，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和三名警察被匪徒用机关枪打死。两周以后，另一个富翁约翰·法克特在芝加哥失踪。在林白的悲剧发生后，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特工人员携带枪支，调查绑架事件。调查局行动起来了。

从表面上看，珀维斯干得很出色。他逮捕了伊利诺斯州大名鼎鼎的非法酿酒商罗杰·图伊，似乎在两周之内就解决了哈姆和法克特绑架案件。埃德加把图伊称为“美国犯罪史上最凶恶、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之一”。他说，抓住他，是“整个调查局的功劳”。

实际上，图伊并不是埃德加手下的人发现的，而是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警察去钓鱼时发现的。经过调查，他没有参与哈姆的绑架，但他由于法克特案件而被判刑，在监狱里呆了20多年。最后查明，他是被其他犯罪分子栽赃的。联邦法官于1959年释放了图伊。法官十分恼火的是，调查局不让法院看有关的档案。

1933年夏季，埃德加又大出风头。当时石油大王查尔斯·厄谢尔在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家中被绑架。在交赎金后，厄谢尔获释。调查局横跨六个州追捕匪徒。有一个名叫乔治·凯利的头头发出一系列信，嘲笑埃德加和他的“草包大学生”抓不到他。他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打了威胁电话。不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枪。

埃德加手下的人终于还是抓到了凯利。埃德加认为，厄谢尔被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凯利的妻子凯思林，说那封要求赎金的信就是她写的。到1970年才发现调查局手迹专家的报告说，那不是出自凯思林之手，然而调查局扣下了这份报告。结果让她白白蹲了27年监狱。

埃德加曾说，“当一个女人变成职业罪犯时，她会比男人更凶恶危险一百倍。”他还说，女罪犯总是红头发，或者戴红色假发，或者把头发染成红色。凯思林就戴着这样的假发。埃德加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奇怪理论。

1934 年，埃德加就要满 40 岁了。他同珀维斯仍然保持着经常通信的关系，而且变得越来越亲密。人们只能把这解释为同性恋的求爱。不过，珀维斯并没有这种意图。

1934 年春季，一个名叫约翰·迪林杰的匪徒越狱而逃，他是因抢劫被判刑的。他组织监狱的囚犯集体越狱，从警察局偷了一些机关枪和防弹衣，在 4 个月的时间里流窜中西部各州，接连抢劫许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 3 名警察被打死。

当这个匪徒在印第安纳州再次锒铛入狱时，他又玩惯技，挥动一支假枪，冲出监狱，坐上监狱的汽车，向邻近的伊利诺斯州急驰而去。他成为珀维斯的主要打击目标。

4 月底，帕维斯得到一个不利的情报，这个匪徒藏匿在小波希米亚城，那里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湖畔游览胜地。帕维斯给埃德加打电话请求，商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带着大批特工人员赶赴小波希米亚。

帕维斯又恼又急，不惜一切代价，带着他的人马冲进游览地，连那些离开饭馆的无辜顾客也没有放过，一人被打死，两人被打伤。迪林杰的一个匪徒打死一名特工人员，打伤另一人。匪徒全都逃走了。

在三个星期之内，迪林杰第二次使得调查局丢脸。据说，在波希米亚，特工人员造反，拘留了他们的上级。舆论哗然，要求帕维斯辞职，甚至要求埃德加辞职。

埃德加很少公开谈论此事。幕后，他派了一个他所信任的华盛顿督导员萨姆·考利，带领 30 名精选的人员在芝加哥组成了迪林杰特别行动队。

埃德加把迪林杰称为“头号人民公敌”，在全国各地张贴了通缉他的布告。迪林杰不把这位局长放在眼里，竟发出了许多嘲笑他的明信片。

从芝加哥并没有传来什么突破。他同帕维斯的通信一改过去亲密口气，变得严厉起来。正当帕维斯的前途岌岌可危时，7 月 21 日他接到一个电话。印第安纳的一个警察对他说，芝加哥一位名叫安那·塞奇的女士说她知道迪林杰的下落，准备出卖他。塞奇是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作为交换条件，她希望能允许她在美国居留。

次日，埃德加被告知迪林杰即将被抓获。在芝加哥，帕维斯和督导员考利向精选的特工队通报了新情况。傍晚，他们接到塞奇的电话后，立即在比奥格拉夫戏院周围埋伏起来。在华盛顿，埃德加在家里同母亲一起等待着消息。

迪林杰在晚上十点半从戏院走出来。帕维斯发出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信号。“我十分紧张，”他回忆说，“我大概去叫了一声：‘打！你被包围了。’……迪林杰掏出了自动手枪，但他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倒在地上，他被打死了。”

在首都，埃德加急忙赶到办公室，举行午夜记者招待会。他赞扬帕维斯“难以想象的勇敢”，司法部长卡明斯也致电祝贺。埃德加对死去的匪徒表示藐视，说他的特工人员只是在迪林杰掏枪时才打死他的。事实恰恰相反。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埃德加总算去了一块心病。他说，“迪林杰死了，我很高兴。”

有人说，在芝加哥打死的不是迪林杰，而是他的替身。埃德加很恼火，他坚持说，死者是迪林杰，指纹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迪林杰被打死几天以后，埃德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示了死者的草帽、被打碎的眼镜、烟卷和损坏了的手枪。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陈列在埃

德加的接待室。然而，公众认为这支手枪是假的，它的编号是 119702，而这个号码的手枪是在迪林杰被打死几个月以后的 1934 年 12 月才从科尔特兵工厂制造出来。

在迪林杰事件以后，埃德加在华盛顿火车站迎接帕维斯从芝加哥胜利归来。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两位反迪林杰英雄会晤。”

那年秋季，当帕维斯担任领导工作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据说参加堪萨斯城大屠杀的人弗洛伊德在俄亥俄的稻田里被打死。埃德加和帕维斯再次被拍照片，共庆胜利。据在现场的一位警官说，帕维斯命令另一个特工人员向受伤躺在地上的这个匪徒打了一枪。

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被通缉的人被抓获或被打死。在芝加哥郊区，一个名叫“娃娃脸”纳尔逊的匪徒打死了两个特工人员，他在汽车追逐中受伤而死。在佛罗里达，特工人员打死了“妈妈”贝克和她的儿子弗雷德。弗雷德是哈姆绑架案中的主犯。

在节节取得胜利的高潮中，埃德加搞掉了帕维斯。“他忌妒帕维斯，”帕维斯的秘书多里斯·洛克曼在 1988 年说。“只有你不断讨好这个国王，你才能继续受宠……他们使帕维斯再也得不到可以抛头露面的任务了。他们竭力贬低他，难为他。他真受不了。”

1935 年 3 月，埃德加给帕维斯写了一封短信，要他汇报一下他在芝加哥的一次晚会上喝醉酒的事。帕维斯说这纯属造谣。还有一家报纸说，帕维斯在辛辛那提的一家商店里挥动着手枪。洛克曼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知是谁捏造的。

同年 7 月 10 日，帕维斯打电报，辞职不干了。埃德加曾经口口声声称作“最亲密朋友”的这个人现在竟成为他不断泄愤的对象。当电影制片厂的头头达里尔·扎纳克请帕维斯当好莱坞的犯罪问题顾问时，埃德加进行了阻挠。当帕维斯准备写自传时，埃德加对他布置了侦探。其实，帕维斯并没有出卖埃德加，他从来没有公布他们之间的私人函件。如果把那些书信公之于众，调查局局长会成为全国的笑料。帕维斯后来结了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了上校，干得很出色；之后，主持了一个地方广播电台，在国会的许多委员会担任工作。

据调查局的老资格官员说，在埃德加面前提及帕维斯的名字，就“好像往维苏威火山里扔一颗炸弹”。在 1956 年被批准出版的《联邦调查局史》中根本没有帕维斯的名字。在埃德加监督摄制的同名好莱坞电影中，也没有叫作帕维斯的角色。当帕维斯谋求参议院的工作时，埃德加命令他手下的官员散布贬低他的信息。

1952 年，埃德加破坏了帕维斯谋求联邦法官的机会，帕维斯的妻子试图使两人和解。调查局的记录表明，两人的确会晤了 6 分钟。“我记得我被带到了胡佛的办公室，”帕维斯的儿子阿尔斯顿回忆说：“胡佛正在打电话，大约有一分钟没有理我父亲。我看见我的父亲的手开始发抖。接着，他对胡佛说，‘你这个该死的、婊子养的家伙，当我带进我的妻子时，你给我站起来。’胡佛的确站起来了……但是，这也结束了和解。”

1960 年的一个早上，在帕维斯被任命为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两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听见一声响亮的手枪声。她发现丈夫死了，终年 56 岁，手里还攥着一把自动手枪。据报界报道说，几个月来帕维斯患脊骨疼痛症，终于自杀身死，对此，帕维斯的家庭是不大相信的。帕维斯之死发生在罗杰·图

伊被打死几周以后。图伊是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被打死的，他是以所谓绑架的罪名入狱，而这种事他并没有干过。这个案子是在帕维斯的指导下进行的。帕维斯自杀 36 小时以前，有一个人开着大型黑色轿车访问过他。次日上午，他找了一个律师讨论他的遗嘱。他收藏有大量武器，他自杀时手中的武器是三十年代一个匪徒的手枪。

埃德加没有表现出什么悲痛，没有向新闻界发表什么谈话，也没有向帕维斯的遗孀发唁电。然而，帕维斯夫人却向埃德加发了一份痛苦的电报：

“ 你没有理会梅尔文之死，我们感到荣幸，你的忌妒深深伤害了他，然而我认为，他却至死都爱着你。 ”

除了埃德加外，帕维斯死后在档案中对他作出否定评价的还有一个调查局官员，他就是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在此以后很久，在同社会名流安尼塔·科尔比谈话时，埃德加给约翰·迪林杰之谜又加一个新的疑点。“ 埃德加对我说， ” 科尔比回忆道， “ 抓到迪林杰的不是帕维斯，而是克莱德·托尔森。他说，他们把功劳记在帕维斯身上，而真干此事的是克莱德。 ”

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埃德加多么会编造谎言。调查局记录表明，迪林杰死的那一天，托尔森在总部。不过，埃德加和帕维斯之间关系的恶化，他可能起了主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克莱德·托尔森是经常陪伴埃德加的男友，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如此。

第七章

埃德加的男友克莱德

克莱德·安德森·托尔森 1900 年生于密苏里州拉雷多的一个穷苦人家里。他的父亲是浸礼会教徒，务农为生，后来到铁路部门当货运警卫。他对两个儿子说，到社会上闯闯，改善自己的命运吧。

克莱德在商学院上了一年学，当他 18 岁时坐火车到了华盛顿。他仪表堂堂，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体格结实，衣着讲究，但又不太豪华。看这副打扮，人家还以为他是经纪公司的小老板呢。

克莱德在陆军部当上了办事员，干得满不错。由于他工作十分努力，善于吸收许多知识，20 岁就当上了陆军部长的机要秘书。8 年以后，他想调动一下工作，便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夜校进修。

1927 年，他获得法律学位后，到调查局申请当特工人员。起初，他失望了，那里没有空缺。第二年年初，陆军部长亲自写了推荐信。埃德加看了附有克莱德照片的申请书。从照片上看，眉目清秀，相貌不凡。

埃德加读了许多要人对克莱德赞不绝口的评语，这个年轻人，颇有点像埃德加的经历，他在大学当过班长、学生会委员，积极参加联谊会的活动。据说，他“行为拘谨，一点也不放荡，对女人不怎么感兴趣”。

埃德加雇佣了他，对他特别赏识，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就把他从一个新手提拔为局长助理。克莱德没有在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他在波士顿仅仅工作了 4 个月，就由于紧急任务被埃德加调回华盛顿。在总部，他汇报加班加点的情况，他像埃德加一样对人特别严格。他在纽约州布法罗象征性地当了半个月的特工头头，就被擢升为督导员，永远调回首都。

一年之后，克莱德就成为负责行政事务的两名局长助理中的一个。在他被任命为局长助理的几周之内，埃德加坚持把克莱德列入白宫邀请名单。

这个年轻人如此飞快地擢升，这在政府部门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之所以如此走好运，是因为他正是埃德加所需要的那种人：既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助手，又是合得来的伴侣。

埃德加好出风头，说话像机关枪似的非常快，而克莱德则是个“影子人物”、“进一样的人”、“灰色人物”。许多特工人员对埃德加有好感，而对克莱德则不大感兴趣。

克莱德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的乐趣是惩罚和开除下级。调查局流传一则笑话：克莱德对埃德加说，“我情绪不好，今天我想回家去睡觉。”“别那么干，”埃德加说，“你看看花名册，挑一个人，把他开除，你就会感觉好一些。”克莱德一下子就来神儿了。

“克莱德·托尔森是我的知己，”埃德加常常说。“他能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是埃德加不愿意放弃的，即使对克莱德也不例外，那就是：全面的控制。

在克莱德的眼里，埃德加是不会做错事的。“首长要这么办，”克莱德对高级官员说，于是停止辩论，作出决定。克莱德逢人便说，“我们局长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可怜虫，他卑躬屈膝地跟在埃德加身后，有时还得换换步子，以便跟埃德加的步伐保持一致。

起初，埃德加称呼克莱德为“小伙计”，后来叫他“克莱德”。在公开场合，甚至在局长的高级轿车里，克莱德始终称呼埃德加为“胡佛先生”。不过，有时他叫首长为“埃迪”（埃德加的昵称），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他。

从日常的举止来看，他们两人的关系远不止是同事关系。每天中午，他俩坐着高级轿车到“5月花”饭店吃午饭。有一次埃德加发现调查局的第三号通缉犯坐在两个桌子以外的地方，便起来逮捕了他，然后继续吃饭。

40多年来，每周有5个晚上，他们俩总是到哈维饭店吃饭，坐在一个小高台上。克莱德面对大门，埃德加背对墙壁，以便观察进来的人。后来埃德加出名以后，经理在通道上放一辆手推车，把他同那些不受欢迎的陌生人隔开。

埃德加喜欢牛排和元鱼汤。他参加饭店的吃牡蛎比赛，总是获胜。吃完饭时，经理给他一包火腿和火鸡，以便他回家喂狗。多年来，饭费是由埃德加的朋友哈里·瓦伊纳付的，瓦伊纳经营一个很大的洗衣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瓦伊纳的一个亲戚被埃德加雇佣为特工人员。

埃德加不准自己的部下喝酒，但他喜欢喝威士忌酒。在同事面前，他从来不多喝。他们没见他醉过。在私人宴会上则不同了，他往往喝得酩酊大醉。

这一对儿在华盛顿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说他们在搞同性恋。《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关于埃德加的文章，说他“经常带着一位男朋友，大部分时间是面部表情严肃的克莱德·托尔森”。

学者们提到埃德加收藏的许多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埃德加给克莱德拍摄的：睡觉时的克莱德、穿着浴衣的克莱德、在游泳池边的克莱德，等等。不过，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公开居住在一起。埃德加在母亲去世以后买了一所房子，而克莱德则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在办公室，他们两人没有表现得过份亲热。然而在44年中，他们始终是密友。

在三十年代最了解他们的是盖伊·霍特尔。他是艾特纳保险公司的年轻经理，曾经多年跟克莱德住在同一个公寓里。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去钓鱼。1938年，埃德加雇佣霍特尔为特工人员，略加培训后，派他当华盛顿办事处主任。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一直是埃德加和克莱德的经常伴侣和亲信。

当霍特尔喝酒时，他去不同的酒吧间，酒醉话多之时，便讲到在埃德加的房间里性晚会的情况，当然是同性男子。他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晚会。在调查局担任高级职务的男子也参加了。埃德加没有解雇他，因为他知道的内情太多了。

老资格电影制片人乔·帕斯特纳克认识埃德加，了解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丑闻。他说，“埃德加是个同性恋者，每年都要带一个男青年来德尔马尔比赛场。他在浴室作爱时，被一个记者看到了。他们不让记者讲出去。他的确也没有说。因为埃德加有权威，任何人都不敢讲。”

关于埃德加和克莱德的故事多得很。有一次，埃德加在机场接人，租了一辆出租汽车。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克莱德，埃德加迎上去，又是亲嘴，又是摸屁股，那种肉麻劲儿，司机从来没有见到过。

哈里·海伊是马塔辛协会的创建人。这个协会是美国第一个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组织。他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经常去加利福尼亚的德尔马尔比赛场。海伊说，“在四十年代，我认识的人回来对我说，‘胡佛和托尔森又去那里了。’我是同性恋者。讲这个情况的也是同性恋者。胡佛和托尔森使用的包厢是属

于同性恋者。那里的人全都是同性恋者。不是同性恋的人到不了那里。”

在三十年代，埃德加同一位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他写了一些吹捧埃德加的东西。通过温切尔，埃德加第一次参加了纽约市白鹤俱乐部的活动。在1934年至1965年，有许多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光顾那里，其中包括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蒋介石夫人、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等。

1936年新年前夕的午夜，一位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古斯塔夫·盖尔给温切尔一伙人拍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照片的画面是：克莱德偎依在埃德加的身旁哈哈大笑，佯装向一个拿着玩具枪的秀丽少女举手投降。

像其他情人一样，埃德加和克莱德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曲折的。就在白鹤俱乐部发生那个插曲一个月以前，克莱德患了盲肠炎，埃德加用汽车把他送进医院。在办公室，埃德加像爱唠叨的丈夫一样，对克莱德不断絮叨，发脾气。

后来，埃德加和克莱德多次参加温切尔和他的妻子在曼哈顿公寓举行的星期日午餐会。有一个星期日，埃德加独自一人去了，没有带克莱德，说他病了。埃德加走后，有人说，克莱德没有病，他们两人打架了，埃德加发现克莱德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

有一个圣诞节，埃德加、克莱德和霍特尔三人住在迈阿密的“湾流”饭店。埃德加跟克莱德发生争吵，竟冲进浴室，把门锁了起来。霍特尔不得不强行打开门，抓住这位局长的肩膀，让他冷静一点。

浴室的闹剧也是争风吃醋引起的，不过，这次却不是针对另一个男人。霍特尔是个寻花问柳之人，他要求克莱德陪他一起跟两个女人过夜。克莱德同意了。孤零零地剩下埃德加一个人，他不禁怒火中烧。

霍特尔不得不安慰埃德加，劝他不要动感情。他和克莱德一起精心照料歇斯底里的埃德加。这个美国极有权势的人物实际上暂时被他们软禁起来。

第八章

性心理的反常

埃德加对女人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但他并不躲避女人，有时，他还故意让人们看见他跟女人在一起，以驱散他搞同性恋的流言。他想证明。他能够同异性保持关系，然而，在这方面并无所成。他在感情上受到的创伤太大了，无法跟任何人（包括克莱德）建立永恒的关系。

埃德加和克莱德相识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两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年迈了。他们除了爱自己的母亲，也把爱分给了自己的情人。克莱德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赠送情人节卡片。

1939年，当克莱德爱上了纽约的一个女人，开始考虑结婚时，埃德加百般加以阻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同女人来往了。

在他母亲逝世几周以后，人们看见他同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吃饭。她就是莱拉·罗杰斯，结过两次婚，比埃德加大4岁。她很厉害，是海军陆战队征召的第一批女兵，负责编辑《海军陆战队》月刊。在政治上，她是极右派。她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一个电影脚本里宣场“共同分享，就是民主”，这是危险的共产党宣传。她是维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不久，盛传罗杰斯和埃德加打算结婚。罗杰斯送了他许多礼品：刻有他的名字的戒指和纯金烟盒。她认为他们只是密切的朋友关系，还没有发展为爱情。她记得埃德加的母亲说过，他是一个孤独者。

但埃德加则对他的好朋友说，他们谈恋爱是认真的。她使他神魂颠倒。他要娶她。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理查德·奥尔巴克参与此事。他们在佛罗里达的会见是由他安排的。这种关系持续到1955年，有一天，他带给她一个消息：总统要他次日上午赶回华盛顿。她说，“这可不行。我要回洛杉矶了。”她转身，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房间。奥尔巴克送她上了飞机。他再也没有看到她。从此，埃德加便疏远了她，罗杰斯来信，他也不予答复。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还有两个女人闯入埃德加的生活。第一个是电影剧本作家弗朗西丝·马里恩，她得过奥斯卡奖。她比埃德加大7岁，先后多次结婚，埃德加狂热地追求她，但是，她由于自己的孩子们而不想跟他结婚。

另一个女人也许是最重要的，她就是女演员多萝西·拉穆尔。她是《走向新加坡之路》和《走向香港之路》这两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早在1931年她就认识了埃德加，当时她20岁，是白鹤俱乐部的歌星。在她跟她的第一个丈夫离婚，而埃德加也失去母亲以后，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拉穆尔在她的自传中只说埃德加是她的“终生朋友”。但她70来岁的时候私下谈到跟他有着“更深的感情”。一提到埃德加的名字，她就容光焕发。但她知道，他们俩结婚是不行的，因为两人的事业心太重。

1942年，拉穆尔跟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尔·霍华德结婚。埃德加成为他们家的常客。她仍然偶尔同埃德加在哈维饭店吃饭。当拉穆尔的剧本需要资助时，埃德加帮助她同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进行联系。

有一次，他为拉穆尔举行了一次晚会。她唱的全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埃

德加让调查局展览处在他花园里的树上安装了一盏球形电灯，看起来像月亮一样。

现年已经 78 岁的拉穆尔除了自传里的那些内容外，不肯讲更多的关于埃德加的事情。然而，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

埃德加的性磨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个人的生活。如同今天一样，当时搞同性恋是会毁掉一个公职人员的政治生命的。埃德加深知其危险，因此作出过份的反应。他对别的搞同性恋的人往往心狠手毒，结果导致一个著名政治家的垮台。

1943 年秋季，罗斯福总统宣布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辞职。47 岁的韦尔斯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总统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妻子生病，需要照顾。而真实的原因是他有一桩同性恋丑闻。埃德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主要作用。

3 年以前，韦尔斯同其他阁员一起乘火车夜间旅行时，用钱买通一些黑人乘务员在他的隔间里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总统保护了他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让他辞职。

埃德加关于这件事的档案说，他是根据总统的要求，公正无私地调查此事的。

然而据现在已经退休的一个调查局官员说，埃德加同韦尔斯的死敌威廉·布利特串通一气来搞垮韦尔斯。火车上的事件是调查局的一个圈套，去韦尔斯隔间的一些乘务员是被收买了的。

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埃德加还诬蔑其他一些名人（包括艾德莱·史蒂文森、马丁·路德·金、尼克松总统的三个助理）是同性恋者。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韦尔斯事件发生在高级政府官员中盛传埃德加搞同性恋的时候。这些传说使埃德加十分恼火。他指示各地的特工人员查明谣言的来龙去脉，对散布谣言的人要进行盘查，迫其公开认错。

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跟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埃德加发表公开声明，他要彻查“政府部门里性变态行为”。他指示特工人员打入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团体，收集成员名单，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录音录像。这种监视活动进行了 23 年之久，尽管调查局早就得出结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是“颠覆性活动”。

埃德加和克莱德终生都努力保持一种男子汉大丈夫假象。埃德加在公开场合谴责色情的东西，不断要求严惩“淫秽读物贩子”。1960 年，一个特工人员，由于拥有一本《花花公子》杂志而受到当众批评。调查局的官员说，“局长认为读这类杂志的人是道德蜕化分子。”

然而，埃德加自己不仅读《花花公子》杂志，而且看黄色电影。在调查局的搜查行动中查获的淫秽材料，必须马上送到埃德加的办公室。有一次，特工人员偷录了黑人活动分子安吉拉·戴维斯跟她的情人性交的丑恶情节，但没有送给埃德加，他大发脾气。

埃德加私下醉心于性，而表面上则俨然是全国的英雄人物。这种心理上的矛盾终于使他不得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他就诊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芬博士。拉芬逝世以前，把他掌握的许多名人（包括埃德加在内）的病历放在自己家的火炉子里烧掉了。

1946 年埃德加就诊于拉芬时，他在三十年代那种辉煌的形象早已失去了

光泽。他的私生活，讳莫如深，实际上转入地下。华盛顿市谢弗氏花店的年轻职工威廉·斯图茨讲的一些情况，可见一斑。

他说，“每天早上有一辆高级轿车停在外面。司机通常是黑人，他进来挑一束我们空运来的石竹花。在一般情况下，他把花拿到汽车里开走。可是有一天，他示意我到汽车跟前，汽车的玻璃窗打开了，后座上的一个男人问我是否有专用线；如果有，他将用它订货。哦，原来是胡佛先生。我的老板给我一条专线来接受他的订货。

“专线的电话铃一响，我赶忙拿起话筒，通常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胡佛先生每天上午都订购石竹花，但是到 12 点钟才要。他抱怨说，到那时，花已经不新鲜了。他往往另要一种花送给朋友。他喜欢带绿色和棕色斑点的兰花。送这种花，显得大方，有男子汉的气度。它放在特制锻铁底座的小玻璃瓶子里，售价 2.5 美元。”

斯图茨回忆说，埃德加每月买花的钱大约为 250 美元。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些花是送给谁的。”有时，埃德加让斯图茨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

“人家用信封交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兰花送到指定地点，第二天上午汽车开来时，我把钥匙交还回去。有一段时间，交给我的钥匙是沃德曼·帕克饭店的房间的。那里的布置很阔气，白色的家具配着反差很大的地毯。有一束花放在纸袋里，纸袋封了口。我不知道那是送给女士的，还是送给男士的。”

第九章

抓宣传树形象

1937 年夏季，埃德加庆祝了他在司法部工作 20 周年。他被授予联邦调查局第一号金质奖章。他和克莱德在鲜花的海洋里，穿着米黄色的衣服，照了一张合影。

他知道，他之所以心满意足。不仅是因为他继续在罗斯福总统的政府中供职，而且更加兴旺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尝到了真正的政治权力的滋味。一旦罗斯福懂得了埃德加这个反犯罪活动的英雄的潜在力量，他便充分地利用了埃德加。他签署了新的反犯罪活动特别法案，得到埃德加的支持。他亲自为司法部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新建的有柱廊的办公大楼剪彩。新闻界的报道说，“这个新的现代化建筑群耗资 1100 万美元，它使英国的警察厅相形见绌。它是美国打击犯罪活动的司令部。”

虽然犯罪活动被夸大了，不过，埃德加的调查局的确迈出了一大步。指纹业务、犯罪侦察技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这些都是它所取得的真正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局长的埃德加受到赞扬、夸奖、甚至被偶像化了。

有一些人提出了抗议。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里指责埃德加利用公共关系来大树他个人的形象。埃德加回避这样的问题，隐瞒了下列事实：他拥有一些专门为他搞宣传的人员。

几天之后，另一位国会议员马里恩·蔡恩切克嘲笑埃德加是“小说中的人物，……是独裁者”。埃德加作出惊人的反应，说他是“公敌”，应当被革除公职。

两天以后，埃德加有机会显示他的英雄气概。新奥尔良的特工人员发现了绑架团伙的头目阿尔文·卡皮斯，埃德加立即租了一架 14 个座位的飞机——这在当时尚属首创——飞往南方，当由 18 个特工人员组成的一队人马于 1936 年 5 月 1 日乘其不备，一举抓获卡皮斯的时候，埃德加也在现场。

埃德加说，他亲自解除了卡皮斯的武装。可是，这个土匪头子在 28 年以后获释时说，当时埃德加藏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特工人员为他清除了现场。克莱德甚至吹嘘说，“用机关枪打断了卡皮斯的关节”。而实际情况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枪战。此外，追踪卡皮斯的是财政部的特工人员，他们把他的下落告诉了调查局。

不管怎么说，这次逮捕使埃德加名声大振。他成了报纸头版的重要新闻人物。卡皮斯戴着手铐脚镣，被用飞机送往明尼苏达受审。一周以后，埃德加又租了一架飞机，同克莱德一起去逮捕卡皮斯的一个同谋犯。他的行动使国会批评他的人哑口无言了。他向全国表明，他是一个打击罪犯的强硬人物。

埃德加把执法部门的宣传工作全都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他对公关工作的组织是政府其他部门无法想象的。首先，他把司法部长卡明斯雇佣的宣传秘书亨利·休达姆搞掉了。接着，在考特尼·赖利·库珀不断发表吹捧埃德加的书籍和文章的同时，埃德加又物色了路易斯·尼古拉斯来为调查局树立形象。

尼古拉斯为埃德加效劳 20 多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律学位，曾是大学足球队明星。他既是工作狂，又是马屁精，一心一意效忠自己的主子。

调查局的第八处，即犯罪记录处，就是他出主意建立的。在他的档案室里收集了地痞流氓、律师等各行各业有代表性人物的简历，以及电影脚本、讲稿等各种材料，反映了他作出巨大的努力，想要操纵美国思想界，为埃德加猎取更大的荣誉。

埃德加对新闻出版界并不是公平对待的。他偏爱赫斯特、科普利、甘尼特等报系的报纸、《旧金山考察家报》、《华盛顿明星报》和《芝加哥论坛报》。

而对《华盛顿邮报》，则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对一位同事说，“如果我发现我的观点同该报一致，那么，我就要重新研究我的立场了。”六十年代，在克莱德的建议下，他正式作出决定，不要向《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提供关于他的背景材料，从而歧视这三家大新闻单位。

对待记者，或讨好，或迫害，区别对待。对他们所喜欢的记者，总是周到地加以照顾，甚至不断送些礼品。而这些记者感激之余，必然作一些使埃德加满意的报道。

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雷蒙德·亨利收到了埃德加送给他的一本书《欺骗能手》，这是犯罪记录处以局长的名义编写的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他给埃德加写信致谢：“亲爱的首长，十分感谢你亲笔签名的赠书。……你又一次站在保卫祖国、防止共产主义祸害的第一线。”

在调查局的档案中，有的记者被说成是“非常可靠的联系人”或“调查局的好朋友”。杰里迈亚·奥利里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当时为《华盛顿明星报》工作。有一位作者被埃德加视为仇敌，奥利里把他写的一本书说得一无是处。调查局把奥利里的这篇书评向全国各地散发了数千份。奥利里还帮助调查局了解另一位记者的消息来源。

那些不欣赏调查局的记者被埃德加说成是“新闻界的娼妓”。德鲁·皮尔逊为《华盛顿邮报》写了37年的专栏文章。埃德加一方面跟皮尔逊保持礼节性的通信关系，另一方面在私下对他大骂不已。他为皮尔逊建立了4000页的档案。据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德加一直监视着皮尔逊。

然而，这位专栏作家始终不屈服，不断抨击埃德加对有组织的犯罪采取放任态度。1969年皮尔逊逝世以后，埃德加说，“这个狗崽子的阴魂不散”，说他的著作是“变态心理者的谎言”。

在埃德加看来，《纽约邮报》的主编詹姆斯·韦克斯勒是个“讨厌鬼”，才华横溢的沃尔特·李普曼是“新闻界的狼”，而《纽约时报》的托姆·威克则是“满嘴喷粪的怪物”。

记者们受到调查局的秘密骚扰。《民族》周刊的主编凯里·麦克威廉斯被监视达32年之久，调查他是否是共产党人。事实上，他当然不是。

一旦发现记者与自己作对，埃德加会不择手段地搞臭他们。他对白宫说，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是个同性恋者；对《洛杉矶时报》的经理说，记者杰克·纳尔逊是个酒鬼。他的这两种说法都是无中生有、捏造的。

这种手法颇为有效。在埃德加独裁统治调查局的头35年中，除了《纽约人》周刊敢于翘尾巴外，其他报刊莫不就范。

埃德加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后者认为调查局的一些案件颇有娱乐价值。1935年，埃德加通过记者雷克斯·科利尔，同电台签署了合同。播放了调查局的一些著名案件。后来。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路易斯·尼古拉斯组织编写了《联邦调查局故事》；接着，以此为依据，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同名电影系列片。

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老板杰克·华纳多年来一直受到埃德加的特殊照顾。他出国旅行，特工人员在机场迎接他，并为他开路。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主角的吉米·斯图尔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1965 年开始摄制的电视系列片《联邦调查局》受到调查局的全面控制。脚本由埃德加和克莱德亲自审阅，拍摄工作由特工人员监督进行。

早在 1935 年埃德加就深深感受到大规模自我宣传的好处，当时《时代》周刊在封面刊登了他的像片。并说他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许多大学和组织纷纷表彰他。他的母校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纽约大学也跟着这样做。

到 1936 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看 G—Man（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电影和文学书籍，青少年戴 G—Man 徽章，玩 G—Man 玩具枪，穿 G—Man 睡衣。有一个人给埃德加写信时，称他为“美国的耶稣”。

同年，对 1.1 万名中小學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在美国最孚众望的人中，埃德加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罗伯特·里普莱。罗斯福总统屈居第七位。据民意测验说，大部分青少年宁愿当埃德加，而不愿当美国总统。

埃德加似乎很相信自己的宣传。1936 年春，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夺提名的时候，他派特工人员去了解他在政治上的运气。其中的一人是查尔斯·温斯特德，他同威廉·沙利文谈及此事。

沙利文说，“埃德加认为他可以跟罗斯福竞选总统……他相信他已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他认为，如果他得到联邦、州、市、县整个执法机关的支持的话，他可以作为共和党人参加竞选，把罗斯福和他的自由派人马挤下台去。……埃德加选派一些他最信任的老特卫人员去执行一项高度机密任务，去南方和西南方了解那里的政治气候，因为局长认为那里支持他的人最多。”

温斯特德说，反应是非常不好的。于是，埃德加放弃了当总统的野心。大选的结果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次获得大多数信任票。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在作为他的机密办公室的八角亭接见了作家杰克·亚历山大，他后来当了《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编。亚历山大看见埃德加坐在他的大红木写字台的后面，周围布满鲜花、仙人掌和旗帜。他发现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

亚历山大写道，“离局长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是两个高大的黄铜灯台，上面有几只铜鹰，周围有几面卷起来的美国国旗。局长的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地在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里度过的。除了黑社会外，其他阶层的人士对他现在可能考虑的问题也会感到不安。对那些持有自由主义观点和左派观点的人来说，这些象征性的鹰预示着不祥的未来。” e

罗伯特·里普莱（1893—1949），美国漫画家，1918 年创《信不信由你》专栏，全世界有 300 多家报纸刊载，内容多为荒诞不经的奇闻异事。——译注。

第十章

罗斯福授予埃德加大权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的时候没有谈到他对埃德加的真实看法。多年以后，埃德加说，他同这位总统“在公与私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真有假。

在公事方面，埃德加是一个忠实的部属。他对任何一位总统的服务都是无瑕可指的。他毕恭毕敬地给白宫提供各种备忘录。他陪同罗斯福夫人巡视调查局总部。在打死迪林杰以后，罗斯福宴请他，他请求总统送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然而，据威廉·沙利文说，“埃德加并不喜欢罗斯福。当人们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也总免不了说一句挖苦的话……在内部的文件中，他表达了对总统的真实看法。当我到研究处任职时，我看到了用蓝色钢笔写的关于罗斯福的批语。有一条批语说，‘他有帝王思想。’”

埃德加怀疑罗斯福属于左翼。沙利文说，“埃德加不信任自由派。而罗斯福被自由派所包围。埃德加讨厌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他讨厌负责‘新政’的一些重要项目的哈里·霍普金斯。总统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局长不能接受的。埃德加曾对他的一位朋友、未来的参议员乔治·墨菲说，罗斯福的‘新政’是共产党策划出来的。”

如果同他对总统夫人的厌恶相比较，他对总统的态度算是温和的了。他对总统夫人、对她热心于左翼事业和左翼朋友是极为疑虑的。他向总统谈过这一点。有一次，美国劳联领导人罗伯特·瓦特抱怨说，调查局在对他进行调查，罗斯福听后无可奈何地一笑。他说，“那同埃德加·胡佛对我妻子的态度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总统容忍了埃德加，甚至依靠他去做工作。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罗斯福比他的共和党前任在对待总统权力问题上有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他认为调查局这个工具不仅可以用来执法，而且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和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总统赋予埃德加新的大权，而后者滥用这种权力近40年之久。

罗斯福宣布就职一个月前，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不久以后，他开办了第一个集中营。当埃德加庆祝捕获凯利的胜利时，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宣布了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当埃德加庆祝打死迪林杰的时候，纳粹暗杀了奥地利总理。

到1934年春天，人们担心，包括美国纳粹运动在内的右派集团阴谋颠覆政府。5月8日，埃德加去白宫同总统和高级阁员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是，埃德加第一次被官方批准进行政治侦察。

他首先调查美国的纳粹分子，但很快把矛头指向许多政治团体。那年秋季，罗斯福指示埃德加去调查罗得岛罢工的纺织工人。圣诞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要求会见总统。白宫要求调查局汇报一下它的情况。这个联盟是埃德加最恨的团体之一。在他的建议下，总统拒绝了它的要求。罗斯福及其顾问很快就习惯于碰到什么问题都要求调查局来汇报情况，尽管这些问题同执法毫无关系。埃德加总是热心地照办不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成了“总统的情报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独揽大权。纳粹分子进军莱茵兰。西班牙爆发内战。罗斯福收到令人不安的警告：国内的右翼阴谋推翻他。外国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1936年8月24日上午，他召集埃德加举行产生深远影响的秘密会议。当时讲了些什么，现在只有埃德加的一家之言。

据埃德加称，总统说，“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情，要保密。”罗斯福想知道，他如何才能搞到关于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在美国活动的可靠情报。埃德加说，虽然这不属于执法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国务院提出这样的要求，调查局可以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次日，当着埃德加的面，罗斯福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美国受到苏联间谍和法西斯间谍的威胁。赫尔马上作出反应：“立即行动，调查这些间谍！”

据埃德加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说，为了防止泄露消息，总统没有让国务院给调查局下达书面指示。总统说，他将“手写一份备忘录，放在白宫他的保险柜里，说明他指示国务卿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在罗斯福总统的图书馆找不到这样的备忘录，无从了解总统的指示要求搞到何种规模。现在清楚的是，他的指示是秘密下达的，未经国会批准；埃德加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是在事后被告知的。

通过白宫的这些会议，埃德加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前，新闻媒介的宣传已经使他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神秘人物，大家的安全系于他的一身。现在，总统的命令又使他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

1936年埃德加同罗斯福会晤后，甚至还没有同司法部长卡明斯讨论此事，就立即对工会人士和激进分子布置了大规模的监视行动。调查局现在仍然保存的一份监视名单包括：钢铁、煤矿、服装等行业、教育机构和工会。调查局还开始招募告密者，并建立政治颠覆分子的档案。

1938年春天，有18名所谓的纳粹间谍受审。在公众的压力下，总统给情报机关批了更多的资金。埃德加建议，这笔钱可用于国内的情报，不必经过专门的立法审核。他给总统写信说，对国内美国人的侦察“要极其保密，以免引起不了解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批评或反对”。罗斯福批准了他的要求。

调查局开始大批雇佣新特工人员，从1937年的1000人猛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4000人。他们固然在战时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但他们也收集了大量关于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普通人的情报。他们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局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档案透露，1939年1月，埃德加会见了亨利·福特的干将哈里·贝内特。贝内特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工会的能手。他的特殊成就是，同福特和黑社会的头头建立了密切关系。

贝内特利用他的黑社会关系来对付福特公司的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瑟是埃德加经常注意的对象之一。有一次，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工厂附近散发传单，贝内特组织打手殴打了他。贝内特集合了一批被雇佣的歹徒，他们带着手枪，穿着黑色皮茄克，拿着橡皮水龙头，冲散工会组织的群众大会，袭击了工会积极分子。埃德加同贝内特的关系非常好，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照片亲笔签名，送给他。调查局在底特律的特工头子约翰·巴加斯可以经常查阅贝内特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档案”。

调查局后来发现，贝内特的许多共产党人档案是从当地的一个法西斯领导人杰拉德·史密斯那里买来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埃德加对他的热情。

1939 年底，埃德加未经上级批准，就大胆地指示他的部下拟定战时可以被拘留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仅包括同情德国及其盟国的人，而且包括“同情共产党”的人，还有像《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一些并无什么嫌疑的人。

1942 年，当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国外当记者时，他弄不到护照。40 年以后，根据新闻自由法他搞到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是一个古怪的女邻居向当局告密，说他“受雇于德国政府”，是一个密码专家，家里有录音装置。调查局对他家进行了秘密搜查，为他立了档案。他当时之所以搞不到护照，原因就在这里。他的名字上了拘留名单。在 1970 年以前，如果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他随时可以被拘留。

1940 年，司法部长杰克逊坚持，拘留名单应由司法部掌握，而不应由调查局管。但埃德加坚决反对。1943 年比德尔当司法部长后决定，司法部只追究违法者，不能按照公民的“危险性”而编制他们的档案，并下令取消拘留名单。埃德加阳奉阴违，把“危险人物索引”改名为“安全索引”，继续保留这个名单。1975 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现了这件事，但没有告诉他的顶头上司比德尔。

大多数司法部长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表明他们同埃德加的关系很好。而在非公开场合，他们同他往往有尖锐的磨擦。1939 年担任司法部长的弗兰克·墨菲认为埃德加想当司法部长。他认为调查局局长的行为举止令人不安。“他简直是一个病态的人，”墨菲对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说。“如果他对谁进行调查，他总是可以找到岔子的。这就是他的倾向。”

埃德加甚至对墨菲也立了档案，包括他的私生活，直到他去世为止。部分档案至今仍未交出。

1939 年 6 月，当欧洲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同意调查局同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起负责全部情报工作。9 月份，希特勒同斯大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入侵波兰；罗斯福公开宣布，由埃德加领导反对外国间谍和破坏的斗争。与此同时，他授权埃德加收集关于“颠覆活动”的情报。这些命令是含糊的，怎么解释都可以。它们实际上正是埃德加梦寐以求的从事国内情报的依据。

埃德加首次使用新得到的权力，就引起广泛的抗议。1940 年 1 月份，调查局以阴谋推翻政府为理由，逮捕了一些反犹太主义者，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原来这是调查局雇佣的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所有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接着，调查局在底特律和密尔沃活基的特工人员抓了 12 名激进分子，理由是：他们 3 年以前曾招募志愿人员站在保皇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根据一项老法律，美国公民不得在美国境内组织军队参加外国的冲突。这次逮捕是荒谬的，因为这些所谓的罪行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为历史。新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赶快了结此事。然而为时已晚，未能平息公众的忿怒。

新闻界把调查局比作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秘密警察。在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说调查局是“美国的盖世太保”，埃德加是“美洲大陆上最大的迫害者”。调查局的档案现在透露，1940 年埃德加在诺里斯的工作人员中安插了密探。

底特律袭击三天以后，埃德加被总统召见。接着，他在克莱德陪同下，出人意外地到迈阿密海滩“度假”。他隐居在一个供巨富休养的小岛上，以

逃避社会的谴责。

在华盛顿，埃德加的助理们大肆活动，以图反击。幕后，特工人员对每一个敢于批评他们的人都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埃德加力图让司法部长杰克逊发表为他辩护的声明。杰克逊犹豫不决。他的前任弗兰克·墨菲使他对埃德加产生怀疑。墨菲警告说，调查局对政府官员进行侦察，窃听他们的电话。埃德加否认这种指责，并扬言要辞职。杰克逊只好发表一项妥协性声明，既表示信任埃德加，又表示要保护公民自由。

埃德加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危机，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总统。罗斯福不大重视这个争吵。他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招待会上问道，“埃德加，他们想对你干什么？”“我不知道，总统先生，”埃德加回答说。罗斯福把双手的大拇指朝下作了个姿势，大声说，“他们想干掉你。”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近期内埃德加是倒不了的。

“埃德加继续任职，而且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因为他善于取得总统的完全信任。”埃德加把政治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白宫。因而取得历届总统的信任。

“他开始讨好总统，”威廉·沙利文说，“他听到高级官员的一些小道消息，都要向他汇报。”接替杰克逊担任司法部长的弗朗西斯·比德尔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回忆说，“埃德加单独地跟我共进午餐时，给我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我的内阁同僚的隐情，谈到他们的好恶、弱点和同外界的联系。”

1940年6月，罗斯福写信给埃德加，感谢他做的“出色的工作”。埃德加大捧总统，说总统的信是“我有幸收到的最令人鼓舞的信件之一……是我国坚持的那些原则的一个象征”。

总统和司法部长都知道埃德加所做的工作大大超越了调查局局长的职责。罗斯福发表关于国防的广播演说后，要求调查局搜集反应。埃德加有名有姓地了解数以百计的美国公民的意见。

调查局为白宫进行政治侦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1940年底，总统要求埃德加派一名特工人员到棕榈滩了解美国政府的朋友和敌人的动向，埃德加完全照办。

当《芝加哥论坛报》反对罗斯福的防务计划时，总统请埃德加帮助他找一家与它作对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沃尔特·特罗安变成了调查局信赖的接头人，他说，“罗斯福利用调查局干各种卑鄙的勾当。当新出版的《芝加哥太阳报》企图挤垮《芝加哥论坛报》，政府利用调查局对《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进行恫吓。我同埃德加一起办这件事。他说，‘我得到了指示我干此事的信件。’他向我出示了这方面的命令。他干这类事以前，总是先拿到证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往往越过司法部长，直接同埃德加打交道。管辖调查局局长的未来的许多司法部长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委屈。正如内政部长伊克斯在194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埃德加的势力变得“十分强大，他显然可以左右司法部长的人选，尽管在名义上司法部长是他的上级”。

弗朗西斯·比德尔的一位高级助理爱德华·恩尼斯认为，历届司法部长都慑于他同总统的密切关系，尤其害怕他掌握每一个人的档案。在美国的历史上，一个联邦官员第一次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他可以经常地严重侵犯公民的自由。

1940年5月，罗斯福同意调查局可以使用任何秘密警察都使用的重要手

段——窃听电话。埃德加表面上是反对窃听电话的，他向国会保证，任何特工人员在窃听电话时被抓，都将受到开除的处罚。1928 年发布的调查局的第一部守则规定，窃听电话是“不适当的、非法的、不道德的”，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6 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有 5 名调查局特工人员在法庭透露，在纽约调查一个州际盗窃案时，调查局进行了昼夜 24 小时的电话窃听。事实表明，他们经常接受这样的任务。

据其他特工员说，埃德加有时还利用窃听电话的手段来维护个人的私利。他曾经下令窃听罗斯福的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的电话，因为他想要撤掉埃德加的局长职务。特工人员说，他们的部分任务是搞那些同埃德加不和的警官的材料。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弗莱写道，“大概只有胡佛先生自己才知道他究竟下了多少次命令让他的部下干违法的事情。”1940 年，埃德加悄悄地进行活动，要求制定一项关于窃听电话的法律；由于弗莱在国会作证，这项法律未能制定。从此，埃德加对弗莱怀恨在心。甚至 20 年以后，弗莱已经退休了，仍不敢在自己家里会见记者，因为他担心调查局在他家安装了窃听器。

1940 年春季，鉴于窃听电话这一手段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罗斯福总统授权司法部长可以对“那些被怀疑进行颠覆美国活动的人，包括间谍嫌疑犯”进行窃听。这一命令为窃听电话打开了大门。

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对此十分不满，他同此事保持距离，让埃德加决定对谁进行窃听。

35 岁的哈里·布里奇斯是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领导人，他早已是资方的眼中钉，埃德加也很讨厌他，5 年以前，当埃德加向罗斯福汇报共产党对美国国内构成的威胁时，他曾提到布里奇斯，说他可能使美国的海运工作陷入瘫痪。甚至当这位工会领导人愿意跟资方达成和解协议时，埃德加对他的迫害仍然没有放松。

布里奇斯有一个弱点：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埃德加说他是共产党人。外国出生的共产党人如果参加一个“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可以被驱逐出境。布里奇斯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他承认，他欣赏“苏联的工人国家”。

1941 年 8 月，纽约《下午报》的记者利昂·古德尔曼接到公民委员会秘书打来的电话，说布里奇斯现在住在爱迪生饭店，他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窃听，请记者亲自去看看。

古德尔曼用指甲挫把布里奇斯房间的电话匣子撬开，发现里面装了一个两用窃听器，可以把电话中的对话和房间里的谈话传输出去。警察被叫来了，在隔壁房间值班的特工人员仓皇逃走，丢下了穿过墙壁通向布里奇斯电话的电线和一块复写纸，复写纸上写着：“特工人员埃维尔·扬格”。

调查局被当场抓获。同一个月接任司法部长职务的弗朗西斯·比德尔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碰到一些难堪的问题。他说，“当这一切见诸报端的时候，我不禁建议埃德加·胡佛把窃听电话的不幸事件直接向总统汇报。我们一起去了白宫。罗斯福很高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了汇报，当埃德加讲完以后，他大笑着朝埃德加的脊背拍了一巴掌。‘天哪，埃德加，这是你们第一次被人家当场捉住吧！’”

如果罗斯福知道埃德加在背后说了些什么话，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大笑了。“埃德加坦率地说，”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重新审理布里奇斯的案子，他上法庭作证的话，他将直言不讳地说，他窃听电话是总统授权的。”

罗斯福自己无疑也采用过窃听电话这一手段。据说，他曾让埃德加对他以前的一个顾问汤米·科伦进行窃听，甚至要求对一个正在任职的阁员、邮政部长吉姆·法利也进行窃听。埃德加对此有点畏缩。但是，调查局对别人进行电话窃听时，顺便听到了法利的谈话，埃德加如实向总统作了汇报。在1944年大选以前，他向白宫提供了对共和党政治家进行电话窃听的结果。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实际上在30年以前就有了。

据尼克松说，埃德加曾对他说，“自罗斯福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给他布置过窃听任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975年发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都为了党派斗争的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进行过窃听和监视等活动。他们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利用调查局为自己谋利，从而给埃德加留下了把柄。

在这种背景下，毫不奇怪，埃德加认为可以放手地在这方面蒙骗国会。调查局的一个老资格监视专家韦斯利·斯韦林根回忆说，“在芝加哥，当埃德加要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一两天前，总部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我们把窃听电话的数目尽量减少到只有一处，比如说，只对共产党总部进行窃听。而实际上，仅仅在我们那个城市，窃听电话就达数十处之多。于是我们到电话公司说，‘从星期二午夜至星期三午夜，我们在芝加哥只有一处窃听任务。’胡佛先在国会作证时列举的窃听数目很低（这在当天是准确的），给国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星期三午夜一过，一切如旧。”

未经司法部长批准，由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自作主张进行的窃听，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种窃听的记录是由被指定的助理局长负责保管的。1953年，埃德加指示，助理局长办公室的档案每六个月销毁一次。唯一保存下来的这类档案是关于路易斯·尼古拉斯的档案，其中包括大量关于电话窃听情报。

从1941年开始的调查局监视索引达1.35万条。被窃听的有13个工会、85个激进的政治组织和22个民权团体。至于被窃听个人的姓名，则以保密为理由，没有透露。

1940年，埃德加同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大权。他在这种情况下，迎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第十一章

珍珠港事变和埃德加

对埃德加来说，这场战争在珍珠港事变两年前，当一位退休的拳击师递给他一封信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这位二十年代无敌于天下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吉恩·滕尼经常在扬基体育场会见埃德加和克莱德。现在，1940年初，他在为一个人传递重要情报。此人是他年轻时代在军事拳击比赛中首次认识的，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

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斯蒂芬森。畅销书《大无畏之人》就是描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迹的。他是加拿大人，年纪跟埃德加一样大。他是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委托，要求滕尼同埃德加进行接触的。

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总统很想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美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卷入战争，而且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在此紧急关头，丘吉尔挑选斯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

1940年4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39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军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认为，现在应当让罗斯福总统知道此事。他对斯蒂芬森说，“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而且只能告诉他一个人。……每天把我们的情报摘要通过调查局传递给他。”

埃德加的合作是很重要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共同朋友吉恩·滕尼被用来传送斯蒂芬森的第一封非正式信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埃德加被说服了。他给滕尼打电话说，他要见见丘吉尔的人。

同一个月，这两个人在埃德加的新居相会了。这所房子是他母亲逝世以前花了2.5万美元买来的，位于西北第三十区。安妮不喜欢它，但是，在她去世两年后，埃德加搬过来了，独自一人住。斯蒂芬森在谈正事以前，仔细端详了屋内的摆设，借以了解调查局局长的性格。他看到房间的许多装饰品安放得井然有序，有不少埃德加本人的照片，特别是有大量男子裸体照片。

斯蒂芬森回忆说，“到处摆着男子裸体雕像和许多作出各种姿势的男子裸体像片。”他很快就看到埃德加同克莱德在一起，认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者。斯蒂芬森认为埃德加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人物，跟他自己大不相同。

斯蒂芬森要求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埃德加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他是无能为力的。斯蒂芬森回伦敦呆了几天，又匆匆于5月份重返华盛顿。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首相。

那一个月在英国，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的时候，他的儿子伦道夫对他说，他不知道英国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人。丘吉尔转过身来说，他要“把美国拉进来”。

不久以后，斯蒂芬森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罗斯福下令在美国处于平时时期同一个外国进行这种合作，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甚至可能被弹劾。埃德加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多年以后，埃德加说他收到总统的书面指示，然而实际上却找不到这样的文件。埃德加当时坚

持，关于此事，要对国务院保密。

关于斯蒂芬森行动的英国官方文件说，埃德加的卷入需要“勇气和远见”。但它对埃德加的性格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说他是一个只能当主角的人，不能容忍竞争对手，英国人认识到，同埃德加合作的代价是，必须“始终让调查局处于主导地位”。

在长期的备战期间，美国政府仍然受到亲德情绪的影响。埃德加私下倾向于哪一方，还不明朗，在希特勒政权的性质已经很明显的1938年，他接见了希姆莱的一个高级助理。一直到1939年他还同纳粹警官保持友好的通信关系。同年，他原打算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警察大会，后来才取消了。

批评者指出，调查局只是在珍珠港多变三天以前才同德国最终割断执法方面的联系。美国决心同德国对抗后，埃德加作出了热烈的响应。

埃德加给斯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调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斯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

不过，这种合作是双向的，调查局很快发现它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殖民地百慕大岛上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

斯蒂芬森把他的特工人员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其中包括在拉丁美洲的情报）交给了埃德加。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10万件。

同英国人合作，使埃德加感到他自己也成了第一个勇敢的第一线特工人员。1940年8月，纳粹分子企图截获在华盛顿的一个英国官员掌握的一批科学材料，埃德加亲自开着汽车保住了这批材料。

斯蒂芬森知道埃德加虚荣心很大，因此，英国人在对付德国间谍方面取得什么突破性成绩，总是把功劳归于联邦调查局局长。

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埃德加以及军界的同行却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早在1939年，总统就对部门之间的争吵感到厌烦了，他指示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把这些部门的头头找到一起谈谈。除了埃德加以外，全都来了。后来总统给他打电话，他再不来，就要解除他的职务，他才出席了下次会议。

很难使互相勾心斗角的官员们和好。罗斯福开始考虑让威廉·杜诺万上校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杜诺万1941年已满58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勋章，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虽然他是共和党人，但却受到罗斯福的极大敬重，认为他具有总统之才。

1942年，杜诺万担任助理司法部长时，曾极力推荐埃德加当调查局局长。不过，自那时以来，他颇感后悔。他曾说，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政，他将设法搞掉埃德加。埃德加的特工人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当他获悉杜诺万正主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时，他更为烦恼。

而杜诺万和斯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埃德加失望了，他们认为他没有很好地利用向他提供的情报。斯蒂芬森需要一个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杜诺万正是这样的人才。新闻界把杜诺万称作“野比尔”，把斯蒂芬森称作“小比尔”。不久，两个比尔飞抵欧洲，去熟悉英国情报的

技术。英国人在这方面比美国同行更有经验。杜诺万对此表示欣赏，而埃德加则忿忿不平。

英国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海军少将和司令伊恩·弗莱明（后来他由于塑造了詹姆斯·邦德这个小说人物而出名）于 1941 年 5 月抵达美国，协助把美国的情报系统合并于杜诺万和埃德加的领导之下。据弗莱明回忆说，埃德加“对我们彬彬有礼，但并不支持我们的使命。他的反对不是硬顶，而是软磨，像猫的爪子一样。他领我们参观调查局的实验室、档案处和地下室的射击场。……然后，毫无表情地跟我们握握手，便把我们送走。”

1941 年 6 月，杜诺万果然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这使威廉·斯蒂芬森感到高兴，却使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头们和埃德加大为不快。他们认为这项任命是罗斯福干了一件蠢事，埃德加深知杜诺万在极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斯蒂芬森的班子，便开始对外国人暗怀不满。1941 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前，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成为真正的敌意，结果成为导致美国这个国耻的因素之一。

1941 年 8 月 14 日，即珍珠港事变 4 个月以前，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埃德加送去一份关于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南斯拉夫人，刚刚抵达纽约。他是个双重间谍，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30 年以后，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使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曾经事先警告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埃德加，不料反而遭到冷遇。

波波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家庭。1941 年，他 29 岁。战前，他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富有的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很要好。1940 年，耶布森到贝尔格莱德对波波夫说，他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请他也参加进来。从此，两人开始了艰难危险的历程。

波波夫公开反对纳粹分子，而耶布森在德国军事情报处的作用也仅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他实际上是反对希特勒的。他同军情处的头头卡纳里斯关系密切。现在学者认为，卡纳里斯在战争期间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耶布森要求波波夫作为德国间谍去英国。波波夫一到英国，就同英国情报部门进行联系。英国人要他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

波波夫取道中立的葡萄牙去伦敦，途中同他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少校会见。在伦敦，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的一位高级军官罗伯逊中校认为，这个南斯拉夫人可能很有用处。经过一段训练后，波波夫回到里斯本，给德国人提供了大量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军情五处给波波夫起的代号为“三轮车”，他在 1941 年上半年来往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那年 5 月，冯奥恩罗德说德国在美国的间谍工作很差，要求波波夫去纽约建立间谍网。如果他想保持德国人对他的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

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埃德加和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让美国人自己搞它的两面活动去。埃德加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

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英国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6个月内，大概在1941年年底，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问，进攻哪里？那布森回答说，“日本将进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的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97个问题中，有35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地址。冯奥恩罗德说，“你要尽快地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

波波夫立即把这一切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十分认真地对待。罗伯逊上校回忆说，“我马上看了问题清单。我极为重视。我认为，首要的事情是把有关日本的情报赶快传给美国。”

对波波夫的控制现在转到了英国军情六处，它指示波波夫，一到纽约，立即把这个情报转达给美国人。他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1941年8月12月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头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他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还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波波夫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在纽约，波波夫很不安。调查局方面经常跟他联系的查尔斯·兰曼对他说，“胡佛先生将在两周以后来纽约，那时将会见你。”

波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纽约的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埃德加。“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

埃德加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部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为埃德加辩护的人说，他没有理由特别重视波波夫的情报。其实，1941年8月，埃德加本来应当认真听听波波夫的意见的。波波夫的情报并非突如其来的，也并非仅仅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泛泛推荐。据英国军情五处的罗伯逊上校说，这个组织的反间谍主任盖伊·利德尔事先作了周到的安排，曾经来自见过埃德加，他认为，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派波波夫去把情报交给埃德加。然而他们估计错了。他们后悔没有把这个情报也给罗斯福总统送一份去。

不久，波波夫发现，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41年10月20日，即珍珠港事变7周以前，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的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陆军和海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三个月前，埃德加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

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 24 小时内就看了这些东西。但他们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埃德加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 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埃德加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第十二章

珍珠港事变以后的争吵

当日本飞机在夏威夷上空发出尖叫声的时候，埃德加正在纽约度周末。他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在格里菲思体育场观看表演。那是东海岸时间下午 1 点 25 分，珍珠港时间上午 7 点 55 分。情报总头目杜诺万也在不远的地方观看布鲁克林“神鬼莫测队”同纽约“巨人队”的足球赛。

4500 英里以外的檀香山调查局办事处，一个年轻的无线电技术员杜安·埃斯克里奇正在检测设备。埃斯克里奇是调查局第一个这样的专家，他是 4 个月以前被雇佣的，负责建立调查局的新的通讯系统。他在华盛顿头儿周的工作是安装总部的 WFI 无线电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只同埃德加的高级轿车和另一辆轿车的 FBI 系统相连。埃斯克里奇必须早上一起床就赶快上班，以便埃德加乘车上班的途中一宣布“FBI 开始工作”，就马上作出反应。那天由于没有别的信息，所以埃斯克里奇整天坐着，等待埃德加晚上回家的途中再次呼叫。1941 年 12 月 7 日不料忘记了这件事。“当日本飞机飞来的时候，我正在检查无线电，”埃斯克里奇回忆说。“我跑到房顶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日本飞机低空掠过，连戴着钢盔的飞行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从仓库里拿了一支冲锋枪，向他们射击。那当然没有什么帛处，但这是我作出的反应。”

埃斯克里奇想起自己是无线电操作者，并非神枪手，他赶忙回去发报，这可能是关于这次袭击的首批消息。“我用摩尔斯的明码把这个消息发到圣迭戈，”埃斯克里奇说。“那里的报务员还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不得不重复一次。于是，他立即报告他的头头，后者又报告华盛顿的周末值班主任。我总以为他会报告胡佛，然后胡佛报告白宫。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快。”

事实上，关于这场灾难的第一消息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传到总统那里，那是海军通讯网的功劳。尽管埃斯克里奇作了最大努力，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总部的工作人员才把来自檀香山特工头头罗伯特·希弗斯的消息报告给埃德加。埃德加立即行动起来。在最后伤亡的消息来到以前，他已经乘飞机赶回华盛顿。最后损失的数字是：死 2400 人，伤 1300 人，11 艘军舰被击沉，118 架飞机被摧毁。

回到总部，埃德加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日本外交使团的住处安置了岗哨。港口和机场对日本人关闭，同日本的邮政和电话被切断。对被怀疑的数百名日本人发布了逮捕令。那天晚上埃德加向白宫报告，为应急而事先拟定好的这些措施都已执行。

在美国对日宣战后的一个星期内，埃德加起着政府检查官的作用。12 月 12 日，当白宫获悉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将发表海军损失的详细情况时，它要求埃德加进行干预。皮尔逊回忆说，“在吃饭的时候，埃德加·胡佛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发表关于珍珠港事变真实情况的文章，否则，就要把我关进监狱。我对埃德加说，他发疯了，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监禁我，而且他也不是解释法律的人。他承认这一切。但他说，白宫的史蒂夫·厄尔利给他打电话，要他对我提出严重警告。”

这篇文章给枪毙了。皮尔逊很快了解到埃德加已经深深渗入新闻界。根据参谋长的命令，两位将军到全国广播公司要求不要广播皮尔逊和沃尔特·温

切尔的文章。皮尔逊回忆说，奇怪的是，埃德加后来在一次电话通话中透露，他拥有“关于开会情况的录音稿”。这说明，全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器。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当然仍然是人们激烈辩论的主题。只有两件事情是十分清楚的。美国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悲剧发生以后，赶忙掩盖真实情况并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军方挨骂不少，然而很少有人对调查局提出怀疑。

日本突袭之后不久，埃德加就开始倭过于人。6天以后，他写给总统的报告说，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曾经事先把日本袭击的“整个计划”和时间告诉夏威夷军方。然而并没有证据说明军方收到这样的警告。埃德加的报告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在这份报告中，埃德加还谈到，在突袭36个小时以前，调查局截获了夏威夷一名牙医的妻子莫里夫人和日本一个打电话者之间的通话。他们的谈话持续了40分钟，耗资200美元，其中谈到夏威夷的天气、探照灯和现在开什么样的花。埃德加说，特工负责人希弗斯星期六下午一看到这份电话通话录音稿，就产生怀疑。他立即把这一情况通知海军和陆军，但军方的反应冷淡。

诚然，夏威夷司令官肖特将军对莫里的通话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新的研究报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截获这个神秘的通话以后，调查局自己做得怎么样呢？核对档案和访问健在的目击者以后，发现在日期上有不同的说法。埃德加对白宫说，这次通话是在12月5日下午截获的，经过翻译、抄写，于12月6日星期六晚上（即突袭的前夕）送交军方的。特工负责人希弗斯也说通话是在5日进行的。

但是，正式的录音稿记载的通话日期是12月3日星期三。有4个健在的前特工人员，我于1990年采访了其中的两人，他们肯定截获这个通话是在星期三。当时安装窃听器的乔治·艾伦在1990年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星期三晚上窃听的，星期四早上完成了。”

虽然那次通话的含义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明白，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那次通话是同日本间谍用暗语进行的一次交谈。既然埃德加和调查局总部在偷袭4天前就掌握了那次通话，它是否立即转达给军事当局呢？既然有更多的富余时间，情报官员本来可以进行追踪研究，对莫里夫人进行讯问。

还有一个线索表明在莫里通话以前调查局已经掌握了一些具体情报，表明日本人将在何时何地动手。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檀香山警方侦探局局长约翰·伯恩斯永远忘不了在日本突然袭击一周以前希弗斯对他的一次访问。惴惴不安的希弗斯让伯恩斯关上办公室的门，然后悄悄对他说，“我不想让我手下的人知道，便我要告诉你……在一周以内，我们将遭到袭击。”希弗斯十分激动，两眼泪汪汪的。伯恩斯的印象是，希弗斯的情报是来自华盛顿总部。

珍珠港事变一个月以后，当罗伯茨委员会在夏威夷举行听证会时，希弗斯说了一些更为奇怪的话：“你将是被调查询问的人之一，你将说些什么呢？”伯恩斯说，他将讲真实情况。希弗斯又追问一句，“你真的要讲真话吗？”“是的，先生，”伯恩斯回答说，“包括你给我讲的那些话。”

实际情况是，委员会并没有讯问他。它倒是向希弗斯作了调查，但他并没有讲他跟伯恩斯说的那些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埃德加对国内安全

负责，但任何官方的调查都没有就珍珠港事变问题询问过埃德加本人。

陆军部长亨利·克劳森进行的最彻底的调查直到 1992 年才公之于众，当时他的著作《最终的判断》出版问世。其中透露了部门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致贻误大事。珍珠港事变 5 天前，海军情报部门突然停止监听日本驻檀香山领有的电话。原因是，调查局特工人员希弗斯同海军情报部门欧文·梅菲尔德海军上校“怄气”。克劳森认为，如果继续监听日本人的电话，也许可以搞到日本人袭击的最后重要线索。

而埃德加方面，他则继续埋怨别人，说他曾经建议对日本驻夏威夷的外交官员们进行窃听，但是被置之不理。日本领事的大部分报告是通过商业无线电路发出的。海外电话线路可以由司法部长批准进行窃听，而商业无线电路则不论是调查局，还是军方，都无权进行窃听。如果埃德加要求这样做，他就同他的老对手——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弗莱发生冲突。

档案表明，埃德加曾经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监听美国同日本以及同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电信来往，并把结果提供给调查局。弗莱和他的官员们屡次加以拒绝，说这种窃听是违法的。弗莱说，只有修改了法律或者有总统的直接命令，才能进行这样的合作。

埃德加批准的《联邦调查局史》说，当珍珠港遭到进攻时，弗莱仍然拒绝合作。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是弗莱顽固地不愿合作的话，这场灾难也许可以避免。然而弗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他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无线电情报处对外国的和潜在的敌人的通讯，特别是东京—柏林线路上的密码通讯进行了监视……我们没有密码破译员。无线电情报处收到的珍珠港事变前的通讯，全都转给了调查局、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门以及国务院。最终，胡佛要求我们停止这项工作，因为他说调查局没有能力破译密码。但在我的指示下，联邦通讯委员会继续向调查局提供这种情报。在这方面，无线电情报处收到了极其重要的‘气象’密电。这些密电在 12 月 7 日星期日已经放在联邦调查局的桌子上，而当时胡佛正在纽约度周末。于是，我们的舰队被击沉了。”

“气象”电报是日本应变计划的基础，已于 11 月 19 日发给各外交使团，通知它们：一旦正常的通讯渠道被切断，销毁密码的命令将以气象报告的形式下达。“东风，雨”表示即将同美国决裂。美国的监听人员于 12 月 4 日截获了这样的电报，但没有立即通知夏威夷的司令官。关于这方面的文件后来隐藏起来，没有让官方的调查委员会知道。

档案表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确监听了日本的通讯，于 12 月 4 日截获了关键性的“气象”报告，并在 24 小时内转达海军情报部门。弗莱说，这个情报在日本突袭以前也交给了调查局。对这个说法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杜斯科·波波夫在乘轮船回纽约的途中，在加勒比海听到了关于日本袭击的第一批令人迷惑不解的消息。他回忆道，“每个人的脸上都露着严肃的表情。只有我不是这样。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消息。……我确信美国舰队打了个大胜仗。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在 4 个月以前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接着，又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成功地进行了突然袭击……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嘛……必须设法弄个清楚。”

到纽约以后，波波夫问他的调查局接头人，哪儿出了问题。是没有理会他的警告吗？特工头子福克斯沃思对他说，别提问题，“跟着走吧。在你的范围以外去寻求真理，可能是危险。那可能使胡佛先生的头脑里产生想法……

胡佛先生是非常有道德的人。”

跟他们在一起的有两个英国军官尤恩·蒙塔古和蒙哥马利·海德，他们看到了波波夫当时的表情。海德回忆说，“我可以看出，他对调查局十分生气，他确信，他们对他以前提出的关于日本可能对珍珠港动手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波波夫同调查局的关系终于彻底破裂。调查局不让他知道通过一个“秘密”电台以他的名义给德国发了一些什么情报。蒙塔古回忆说，“在德国人看来，他突然变了。他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情报。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间谍网。最危险的是，德国人正在追问以他的名义发的许多情报，他无法作出回答。”

1942年夏天，尽管他作为盟国间谍的面目极有可能暴露，他还是回葡萄牙工作。他设法使德国人继续信任他，接着向他们提供了盟国将入侵欧洲被德国占领领土的假情报。

波波夫的朋友那布森曾经向他透露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的计划，并不断告诉他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可惜这位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严刑审问，最后枪毙。

1942年夏季，在珍珠港事变6个月以后，美国的一批特工人员承担了一项极其机密的使命。他们不顾国际准则，竟去盗窃同德国友好的中立国家大使馆使用的密码。这要在深夜行动，撬开保险柜，把密码本照相录制，然后溜走。

这批人是根据埃德加的对手杜诺万的指示行事的，已经干过多次。然而有一天深夜，当他们在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执行任务时，调查局的两辆汽车突然嘎吱停在外面，故意开了警报器和闪光灯。杜诺万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其中的几个人被捕。杜诺万毫不怀疑，这是埃德加干的事。

埃德加控制了整个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情报工作，但他还不满足。他颇为恼火的是，现在已经当了将军的杜诺万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局长，处处跟他作对。杜诺万认为调查局对付德国军事情报处，比他搞得好。他在西班牙大使馆的行动妨碍了调查局的监视工作，所以埃德加要加以破坏。在盟国在北非登陆的前夕，埃德加的行动差一点儿暴露了盟军的作战计划。尽管他们有许多矛盾，但是，形势迫使这两个情报头子不得不携手合作。

国内安全和美洲情报的控制权都掌握在埃德加的手里，他本该踌躇满志了。然而他却梦想猎取更大的名声。

据埃德加的助理路易斯·尼科尔斯的儿子埃德加·尼科尔斯说，他还有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胡佛先生、我父亲，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想打入德国的后方，暗杀希特勒。他们把这个计划呈交白宫。他们想成立一个三人暗杀小组。我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肯定希望搞出点名堂。”

如果埃德加想寻找机会出出风头，他就可以找到。正当他同杜诺万争吵得不可开交时，他得到了一个扬名的大好机会。1942年6月13日午夜，一艘德国潜水艇在纽约长岛东端浮出水面，吐出四个携带着武器、炸药和现金的德国人，他们的任务是在同军事有关的工厂制造破坏并在居民中引起恐慌。如果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一下子就暴露了这个行动的话，他们也许会取得成功。

这个突击队的领导人是39岁的乔治·达希。战前，他曾在美国居住多年。

他返回德国后，很快就对纳粹政权丧失信心。在接受执行这项任务的训练时，他并不热心，对破坏技术不感兴趣。他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说，他认为他的任务是使这次行动流产。

德国人跑到海滩上一个孤零零的海岸警卫队员身边，塞给他一大叠钞票，让他别讲话，然后放他走了。当他发出警报时，德国人已经无影无踪，把枪支炸药放在一个隐蔽得并不好的小坑里。

调查局立即搜寻破坏分子。埃德加赶到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那里报功。“他的眼睛射出喜悦的光芒，”比德尔回忆说，“他的鼻孔兴奋地掀动着。”

两周以后，埃德加喜气洋洋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先后共抓到了 8 名破坏者，第二批人是在佛罗里达抓到的。

军事法庭判处所有的突击队员死刑。只有两人后来减为无期徒刑，他们是乔治·达希和他的同伴厄恩斯特·伯格。

30 年以后，埃德加仍然把这件事当作他的“最重要成就”之一。1979 年，一块纪念此事的铜牌挂在司法部的过厅里。实际上，埃德加心里很清楚，在这次捕获中，调查局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达希并不是被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抓到的，而是他有意识地出卖他的同伙。他一到美国，就给纽约的调查局办事处打电话，说他是“弗朗兹·丹尼尔·帕斯托里厄斯”（这次行动的德国代号）。他说，他刚从德国来，要向埃德加·胡佛提供重要情报，并要求告诉华盛顿。

当时，调查局差一点儿把事情闹糟。接达希电话的特工人员不耐烦地回答说，“昨天，拿破仑还打来电话呢！”便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向华盛顿的调查局自首，向调查局提供了找到他的同伙的情报。他解释说，他的行动得到他的同志厄恩斯特·伯格的完全支持。他后来回忆说，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要求他承认自己有罪，不要讲他向调查局自首，并向他保证在几十月之内由总统赦免他。然而，他蹲了 5 年的监狱，战后被驱逐出境。

美国军事情报单位认为，埃德加逮捕这些破坏者为时过早，破坏了截获以后几周可能登陆的其他破坏者的计划。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十分生气，说埃德加只顾自己沽名钓誉，出风头。

此话不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建议授予他国会勋章，这种荣誉通常只有那些有赫赫战功的人才能获得。埃德加赶快给国会的支持者写了许多感谢信，但后来这个建议未能成为现实。不过，7 月 25 日，他到司法部工作 25 周年，却大肆庆祝了一番。他坐在一个巨大的庆祝卡旁边，同克莱德挽着胳膊，照了一张彩色相片。接着，在克莱德陪同下，度假去了。

他特别高兴的是，总统也向他表示祝贺。埃德加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说在他的领导下，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他写道，“你可以继续信赖和依靠联邦调查局的全体人员……”

表面上的恭维是一码事，而实际做的则是另一码事。长期以来，埃德加一直在刺探总统夫人的活动。

第十三章

跟罗斯福夫人斗

埃德加和克莱德讨厌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埃德加喜欢说，他之所以没有结婚，其原因之一就是“上帝造了像埃莉诺这样的女人”。他把她称为“老猫头鹰”，并在调查局的高级官员面前模仿她那尖声尖气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夫人已经50多岁，快60岁了，长得不怎么讨人喜欢。她的丈夫从别的女人身上寻找乐趣，而她也常在白宫以外寻欢作乐。埃德加在第一夫人的背后，拿她的这些丑闻取笑。

有一次在白宫开完会回家途中，他对一个助理说，“总统说，这个老家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容忍她。”有一回他甚至要求喜剧演员菲尔兹让他看一些“有趣的画”。菲尔兹的确有三张总统夫人的小画像。从正面往上看，是正常的人像，然而颠倒过来看，则像女人阴道的解剖图。埃德加认为是瞎胡闹，便把这些画拿走了。

不过，埃德加最不能容忍的，是埃莉诺的政治观点。她支持了许多自由派事业。许多人认为，她的做法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妇女的范围。最大胆的是，她不断鼓吹让美国的黑人得到像样的居住条件和公平的待遇。这一点最使埃德加不满。有一次，他看到她把两个黑人带进“五月花”饭店，颇为生气。他听说南方的黑人妇女参加了“埃莉诺·罗斯福俱乐部”，便指示特工人员去调查此事。

罗斯福夫人有时引起一些麻烦，因为她在支持自由派事业的过程中，碰到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她似乎以为，作为总统夫人，干这些事可以不受惩罚似的。

埃德加早就打入共产党内部。他获悉，罗斯福夫人对一个共产党朋友谈到他时说，“你现在看到，混帐胡佛是个什么玩艺儿。他在掩盖他的法西斯态度。你应当见见富兰克林……他说，这又一次证明这类希姆莱之流的人物是两面派。”

这些传说使埃德加更为恼火。到了1960年，他还说，已经死了丈夫的埃莉诺是“真正的危险分子”。据以前的特工人员戈登·利迪说，“他把罗斯福的许多左派立场都归咎于她的恶劣影响。他同共产党发生的一些问题，如果导源于埃莉诺，他便去找她的大夫，罗斯福总是站在他的一边，否决她的做法。”

埃德加关于这位第一夫人的档案达449页之多，作为高度机密材料保存在另外的文件柜里，只有少数高级官员可以查阅，这些材料涉及许多名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私生活的，可以作为进行讹诈的炮弹。

1941年1月，罗斯福夫人听说调查局特工人员调查了她的两位秘书伊迪丝·赫尔姆和马尔维纳·汤普生。特工人员深入调查了这两个女人的私生活，盘问了汤普生的邻居，向服务员了解了她的旅馆房间来往人员的情况。他们甚至到赫尔姆在伊利诺斯的老家进行了调查。

罗斯福夫人提出了抗议。埃德加说，对赫尔姆女士之所以进行调查，是因为她曾在一个同国防委员会有关系的单位工作过。他说，如果调查局知道她们为总统夫人工作，他们就不会调查了。第一夫人不满意，又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种调查颇像盖世太保的做法。”埃德加表示道歉。这使他对罗

斯福夫人更加生气。

1992 年罗斯福夫人传记作者布兰奇·库克说，埃莉诺可能同她的保镖厄尔·米勒和采访白宫的美联社记者洛雷纳·希科克发生过肉体关系。埃德加则怀疑她同她的黑人司机、她的医生、一个上校和全国海员工会的两个领导人发生过性关系。

这两个工会领导人以前都是海员，他们常开玩笑说，培养同第一夫人的感情，以便接近总统。调查局的窃听器记录了两人的谈话，“他妈的，我已经作够了牺牲。下一次该你去为这个老臊货服务了！”

这是大有用场的情报：总统的妻子跟两个工会领导人睡觉，其中一人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埃德加把这两人的许多情况汇报给总统，但把他们同第一夫人的性关系的材料保留在他那里。在战争的高潮期间，他集中注意于埃莉诺的一个左翼男朋友约瑟夫·拉希。

拉希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1939 年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埃莉诺，她当时已经 55 岁，而他只有 30 岁。拉希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一个狂热的反法西斯分子，他访问过苏联和打内战时的西班牙，后来变成一个激进的学生领袖。在埃德加看来，他是一个颠覆分子，值得加以监视。而埃莉诺则保护他，请他到白宫会见总统，借给他钱，支持他的事业。

根据埃德加的指示，调查局的官员在 1941 年整理了 11 页关于拉希的备忘录。1942 年 1 月，特工人员闯进拉希领导的美国青年大会的纽约总部，拍摄了第一夫人同这个团体的负责人的通信。同年，拉希参加海军的申请被拒绝，罗斯福夫人写信给司法部长比德尔。

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你通过联邦调查局了解一下，他们调查拉希干什么。”比德尔把此信交给埃德加，他回答说，“调查局并没有进行调查。”这是调查局惯用的一种遁辞。在调查局的语言里，搜集情报是跟正式的调查不同的。事实是，埃德加的助理同海军当局讨论了拉希的问题。

拉希参加了陆军。他同罗斯福夫人共同度过了几周。拉希在纽约举行的告别晚会，由埃莉诺付钱。拉希在华盛顿附近的部队基地休假时，住在白宫里。埃德加注意到了这一切。

1942 年 11 月，埃德加给陆军情报部门的一位将军送去了一份“极端秘密的”情报。12 月，调查局在国际学生服务处的办公室盗窃了它的文件，它的一份报告提到了拉希和埃莉诺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

1943 年 4 月，拉希被派驻伊利诺斯，埃德加给军事当局、特别是给陆军反间谍团提供了更多的情报。三个月以后，根据白宫的指示，反间谍团的人数大大减少，并同另一个单位合并。到 1944 年，它实际上被完全取消。为什么呢？

答案包含在 1943 年 12 月 31 日送给埃德加办公室的一份两页的报告中。这份报告自那时以来一直保存在他的档案中。它出自特工人员乔治·伯顿之手。伯顿的报告说，反间谍团监视了拉希同罗斯福夫人在芝加哥一家饭店的会晤。他们给房间安装了监视器。罗斯福夫人和拉希性交的全过程被录了下来。罗斯福夫人被叫到会议室，当面对质。这导致总统和夫人的争吵。次日清早 5 点钟，总统把阿诺德将军找去，命令他把拉希派往国外。

陆军情报部门曾经在 3 月 5 日监视了拉希在伊利诺斯的旅馆同罗斯福夫人的幽会。她住进了厄巴纳的林肯饭店的 332 号房间，陪同她的有她的助理汤普森。她嘱咐服务员不要声张，并预定了隔壁的 330 号房间，说是一位“年

轻的朋友”住的。那天晚上，拉希住进了那间房子。他和第一夫人除了到食堂去过一次外，一直呆在楼上，36个小时以后才离开。

罗斯福夫人在火车上给拉希写了一封信，称他为“最亲爱的”。她说，“两个相爱的人的分别，使得每一次重新相聚都像一次新的发现……祝福你，亲爱的。感谢这样幸福的时刻。”

拉希同总统夫人的另一次幽会是在芝加哥的布莱克斯通饭店。在房间隐藏的录音机录下了他们性交的种种声音。

在那次幽会以后，两人又写了许多肉麻的信。第一夫人写道，“我真不愿意说再见。我喜欢当你睡着的时候坐在你的身边。”拉希回基地后也给埃莉诺写信说，“我很抱歉，吃饭以后总是贪睡。但是，在黑暗中睡在你的身旁，让你轻轻拍打着我的头，比玩牌可有趣得多。”

据拉希说，埃莉诺获悉她在布莱克斯通饭店的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十分恼火，回华盛顿以后，在白宫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对陆军反间谍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拉希被派往太平洋的时候，总统夫人到旧金山为他送行。她后来写道，“同相爱的人分手是很难过的，我往往不得不放走我爱着的人。”

总统夫人真的在布莱克斯通饭店或任何其他地方跟拉希睡过觉吗？拉希在1978年弄到了调查局和军方的档案，他否认此事。他写过一本回忆录《爱和埃莉诺》，谈到了他同罗斯福夫人的亲密而纯洁的友谊，对上述说法表示忿怒。他的遗孀特鲁德在1992年说，“我不知道罗斯福夫人和拉希在任何时候有过不正当关系。至于所谓的录音带，那可能是：拉希从部队基地回到饭店时太累了，罗斯福夫人可能说，‘躺在我床上，休息一会儿吧。’她可能坐在他旁边，轻轻拍打着他的额头。她是非常有感情的人，但是，性交之说则是荒谬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所谓的性关系，而是因为对他的夫人搞窃听。罗斯福夫人说，许多人由于此事而受到处罚。”

罗斯福的一个儿子小富兰克林同意拉希的否认。他的姐姐安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她回忆说，在布莱克斯通事件发生一年以后的1944年，一位检查官把他查获的拉希写给埃莉诺的一摞“情书”交给她，要求她转交给她爸爸。她照办了。罗斯福从她手中接过信，没有说任何话。

1943年的这些信说明，第一夫人的行为是不够检点的。如果她认为她可以不受监督地在饭店卧室里多次会见一个年轻人，那她就太天真了。不过，她当时已经58岁，比拉希大20多岁，而且她还正在促成拉希和他的女朋友的婚事。看来，她似乎不大可能同这个年轻人睡觉。

然而的确存在性动作的录音。这会不会是军方情报部门把拉希同其未婚妻特鲁德的性交同关于拉希跟罗斯福夫人会见的报告混淆起来了呢？

埃德加把特工人员伯顿的报告以及陆军情报机关的报告和罗斯福夫人写给拉希的信件的复印件全都存入调查局的机密档案室。到了1953年，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用场。

1953年，共和党的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想把埃莉诺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搞掉，调查局助理局长路易斯·尼科尔斯把她同拉希的所谓性关系告诉了艾森豪威尔的助理们。他们便以此作为把柄。1954年，当《纽约邮报》对艾森豪威尔持批评态度时，尼科尔斯又搬出了这个老底。他指出，拉希现在是该报的记者，罗斯福夫人同该报的主编关系密切。他建议埃德加把这件事告诉艾森豪威尔本人。

以后，当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跟埃德加闹翻了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激

烈抨击调查局的信。他写道：

“胡佛先生，你经常对公众说，调查局的档案是安全的、不可侵犯的、神圣的，几年以前，我第一次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力震惊。我们在调查局造成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气氛……你也知道，我们不适当地泄露了关于个人和机构的情况。我首先想到，泄露了你所讨厌的罗斯福夫人的情况。”

不管在多大程度上罗斯福总统知道埃德加在拉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就对埃德加失去了耐心。特鲁德回忆说，“罗斯福夫人说，她的大夫对胡佛非常生气。总统要她不要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他显然疏远了他。胡佛意识到这一点，他努力调查一些总统必须知道的事情，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据我了解，总统私下表示，他要尽快地撤换他。”

对总统来说，拉希事件不是唯一的因素。他生气的是，1943年秋季他曾被迫解除了同他私交甚好的、得力的副国务卿萨默·韦尔斯的职务，以制止关于他搞同性恋的丑闻。据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的遗孀比阿特丽斯说，由于埃德加散布关于韦尔斯的流言蜚语，导致局长和总统之间的最后决裂。从此以后，罗斯福再也没有接见过埃德加。

罗斯福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授予埃德加以大权，战争结束时又计划对他削权，甚至想把他解职。然而他生前未能做到这一点，就离开了人世。

第十四章

杜鲁门上台埃德加不安

1945年4月12日下午5点钟，哈里·杜鲁门，没有带警卫，独自一人，在国会山下的空旷道路上急匆匆地走着。这位60岁的副总统大概也猜想到了召唤他去白宫的含义，他不由得小跑了起来。两个小时以后，他在内阁室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33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的岗位上操劳12年，患大面积脑溢血而死。

在国外，战争的结束已经在望。美国军队正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挺进，在那里，5万犹太人被杀害。苏联军队在柏林附近战斗着。不久，希特勒在他的地堡自杀；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打死。德国投降了；三个月以后，杜鲁门总统下令投了原子弹，日本也投降了。

在此节节胜利声中，杜鲁门为埃德加和调查局而大伤脑筋。对他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他当参议员的时候，就公开反对过免除调查局在珍珠港事变上的罪责。现在，他当总统的头几周，就看到罗斯福给他留下了一个在人数上和权力上大大膨胀起来的联邦调查局，不禁大为吃惊。

杜鲁门上任一个月以后，在他给自己写的一份有名的备忘录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秘密警察。调查局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他们的职责本来应该是抓犯罪分子，然而他们却热衷于搞性生活丑闻和讹诈。他们还习惯于藐视地方执法官员。必须停止这种做法。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1945年5月12日”

埃德加赶快起来维护他的地位，在调查局里物色了一个为杜鲁门所熟悉的人作为调查局同白宫保持联系的新的联络官。此人对总统说，“胡佛先生想让你知道，他和调查局是听从你的支配的，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杜鲁门反驳说，“我需要调查局出力时，我将通过我的司法部长这样做。”

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回忆说，当这位特使把这个信息带给埃德加时，“埃德加恨透了杜鲁门。除了肯尼迪总统外，只有杜鲁门使埃德加就范，剥夺了他攫取权力的特殊地位。”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埃德加也想方设法把杜鲁门的白宫拉入他的圈套。总统同意让他的军事助理哈里·沃恩直接同埃德加联系，埃德加很快使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串通一气的共谋关系。他告诫沃恩说，“我们要共同商量许多事情。当你来我这儿时，我告诉你怎么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到我们这里上电梯，到第七层以后，转到电梯的另一侧，下到第三层，再到电梯的正面，上第五层，就到了我的办公室。你我在这里要谈论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只能让总统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知道。”

杜鲁门的另一名助理约翰·斯蒂尔曼有意识地鼓励在调查局和白宫之间建立一种新的隐蔽的沟通形式。以前，在罗斯福当总统时，埃德加的人传递政治情报时，通常是把内容念给总统助理，然后把文件带回调查局总部，以免留下痕迹。现在，埃德加的一个新密使柯蒂斯·利纳姆想出一个改进的办法。

他回忆说，“有一天，我把我要读的备忘录，掐头去尾以后，交给了斯

蒂尔曼。他说：‘为什么你带来的所有文件，不都这样做呢？’我答应回去同胡佛先生讨论一下这件事。”埃德加欣然同意。从此以后送给杜鲁门的白宫的敏感情报部使用无水印图案的纸，没有调查局的抬头，也没有签名，从而无法追踪文件的来源。

据哈里·沃恩说，杜鲁门当总统的头几周就获悉罗斯福曾利用埃德加去窃听电话，搞政治情报。据说，当他看到关于背叛罗斯福阵营的政治投机分子汤米·科科伦的电话窃听录音稿时，大叫起来，“这是什么玩艺儿？别这样搞了。告诉调查局，我们没有时间看这类臭东西。”

虽然杜鲁门这么说，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在杜鲁门执政的年代里，对科科伦电话窃听的材料达5,000页之多。埃德加亲自监督了这种窃听。

除了电话窃听外，埃德加还给杜鲁门的白宫送去各种各样的政治情报，如，哪里出现丑闻，哪家报纸要对总统提出一系列批评，等等。而杜鲁门也接受了这些做法。他觉得，只要限制调查局对公民自由的较为严重的侵犯，那么，利用一下埃德加的政治情报倒也没有什么害处。不过，这样一来，他就授埃德加以把柄，一旦暴露，就会危及政府。这正是埃德加所喜欢的。

更重要的是，杜鲁门在政治上并非没有污点，他同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名声不好的民主党机关有着长期的联系。杜鲁门的飞黄腾达得力于政界头目托姆·彭德格斯特的提携，后者是靠黑手党的帮助维持统治的。杜鲁门之所以能当参议员，乃是得力于彭德格斯特的推荐。

这一点，埃德加当然是知道的。几年以前，当彭德格斯特被指控偷税漏税时，他正在堪萨斯市。他知道他掌握了一个可能有用的武器。1948年举行总统大选时，他透露了堪萨斯市贪污腐化的情况，从而帮助了杜鲁门的对手杜威州长。

然而鉴于杜鲁门不喜欢他，埃德加仍然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

他叫他的特工人员随时向他汇报政治动向和危及他的职务的谣言，他简直成了一个猜疑狂。

威廉·沙利文回忆说，“在杜鲁门执政期间，胡佛惴惴不安。杜鲁门从来不同胡佛打交道，不让胡佛接近他。”

杜鲁门上台两年，就使埃德加企图控制国外情报的这个最雄心勃勃的梦想破灭了。早在1940年，他就瞄准这个目标，主张联邦调查局设立一个特别情报处，向世界各地派遣特工人员。他正是怀抱着这样一个幻想，同他的死对头杜诺万争夺海外情报控制权的。虽然他争得了拉丁美洲，但他的真正野心仍然志在全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德加私下又在谈论建立调查局全球间谍网。在伦敦，美国的外交官怀疑，埃德加已经在大使馆的密码室秘密地安插了他的人，刺探国务院的通讯。杜诺万的人不安地注视着调查局。

1944年11月，在罗斯福的要求下，杜诺万将军制定了一个和平时期情报工作蓝图。它主张建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由总统亲自监督，杜诺万希望由他来领导。埃德加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样的机构。他极力主张恢复战前的安排，由调查局控制一切情报。突然，报界对杜诺万的计划发动了一系列攻击，警告有可能出现一个“超级间谍系统”杜诺万确信，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埃德加故意指使搞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材料是一份绝密的备忘录。

不过，由于杜鲁门入主白宫，埃德加的这一番阴谋策划只是枉费心机而已，总统对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说，他“非常反对调查局建立一个盖

世太保”。他不但没有让它扩大，反而认为应当“尽快把它缩减到战前的水平”。

埃德加到处游说，以便保住他的地盘。将军们、众议员、参议员们都被他鼓动起来去白宫维护他的事业。他们之所以愿意为他效劳，是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保护，还因为其中一些人早在战争时期就相信埃德加的说法：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雇佣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然而战后埃德加的特工人员进行的调查并没有发现这个机构里有共产党人。

杜鲁门对埃德加想把国内外的情报都管起来的要求置之不理。“这两项工作不应由一个人管，”他对自己的助理哈里·沃恩说，“胡佛的手伸得太长了。”总统很少同意接见埃德加。有一次，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统狠狠地克了他一通。“胡佛同总统争辩，”沃恩说，“杜鲁门表示反对。胡佛继续坚持己见，总统说，‘你超越自己的权限范围了。’”

总统终于批准建立中央情报局，以对付苏联进行颠覆活动的实际威胁，但是没有让埃德加插手。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总统负责。它的重点是情报评估，而不是实地调查。（现在中央情报局最有名的是“秘密活动”，这是以后的发展。）

虽然杜诺万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但埃德加不得不承认它主要是出自这位将军的策划。中央情报局的建立甚至剥夺了埃德加在战时取得的势力范围，即墨西哥边界以南的广大拉丁美洲地盘。调查局在伦敦、巴黎、罗马、渥太华和墨西哥市的许多海外站还保存着，但只起联络作用。然而，埃德加不顾明文规定的职权范围，继续在墨西哥搜集情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重复了。

威廉·沙利文说，埃德加对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十分恼火，他下达指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给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提供任何文件或情报……”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胡佛执行了一种焦土政策，他把所有的档案全都清理掉了，不让他的特工人员对中央情报局的人谈论情报来源。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他清理完地方后，便闷闷不乐地回家了。”

埃德加同中央情报局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时为止。沙利文说，“当中央情报局提出要求时，这都是合理合法、得到上级批准的要求，胡佛总是拖很长时间才办，而且只满足一部分要求，另一部分要求则置之不理。”这种心胸偏狭的做法终于导致同杜鲁门的第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杰出的将军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正面冲突。

史密斯对埃德加说，“你有义务同中央情报局充分合作。如果你要同我斗，我将在华盛顿跟你斗到底。”埃德加让步了，但他关于史密斯的档案则表现出鄙夷的态度。埃德加在一份报告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史密斯是个刺儿头，而且是个大刺儿头。”他同中央情报局其他头头的关系甚至更糟。据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头头詹姆斯·安格尔顿说，在埃德加的一生中，他同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一起的时间从来不超过5分钟。

战后有一段时间，埃德加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该怎么办，不那么有把握。他希望将来在共和党的某届政府中当司法部长。当总统的梦想早已抛在身后。有些人认为，他可能离开调查局。还有人猜测，他可能当棒球专员。

正是在这个时候，关于埃德加搞同性恋的传说又盛行起来。有一次，在有美国最高的司法官员参加的宴会上，邓肯姊妹娱乐公司的一位女演员突然

坐在埃德加的膝盖上，使他大为尴尬。据在场的人说，他赶忙跑出房间。这个插曲在几天之内传遍整个华盛顿。美国母亲委员会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居然提名埃德加为美国“当年最佳父亲”之一。报纸嘲笑说，“天哪，胡佛先生是个光棍儿呀。”谁都领会其言外之意。

此时，埃德加对他的同性恋癖颇感烦恼，不得不就诊于华盛顿的著名心理学家拉芬博士。但不久便中断治疗，因为他连医生也不敢信任。从此以后，一出现关于他搞同性恋的谣言，便加以制止，甚至让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会恫吓报界。

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埃德加必须永远同一个真实的敌人或者想象中的敌人去作斗争，这样才能动员广大公众的支持。这样的敌人始终是共产主义。正当埃德加的声望日趋低落的时候，历史的发展又授他以良机。对苏联及其附庸国进行的冷战给埃德加这位美国英雄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十五章

冷战给埃德加注入活力

1946 年的元旦是埃德加 51 岁生日，这一天，他打开了他在岩溪公园寓所的门，走进来的是长老会牧师埃尔森。接着，两人一起祈祷。这已经成为埃德加每年元旦必做的事。

一周以后，他在纽约冠军俱乐部的礼拜仪式上，跪下来吻了纽约天主教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手上的蓝宝石戒指，然后对与会的教徒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当 3000 万天主教徒聚会时，全国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而有组织的共产党人不过 10 万人而已，驱使他们的是狂热的思想。”

其实，这种狂热性来自埃德加以及像斯佩尔曼这样的右翼狂热分子。埃德加曾对高级警官说，美国的共产党人“恶毒地散布不信任，致力于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分裂……厚颜无耻地、公开地鼓吹搞垮美国。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敌人。”

对美国长期的反共歇斯底里，埃德加比任何其他人员有更大的责任。杜鲁门总统说得对，“人们过份担心共产主义‘魔鬼’了。我认为，就对付共产主义而论，我们国家是完全安全的。我们思想健康的人要多得多。”但是，总统的想法被右翼要求采取行动的大合唱所淹没了。

1947 年，为了安抚右翼，杜鲁门下令对联邦政府的所有新雇员进行“忠诚”调查。凡是被怀疑“不忠诚”的雇员将由忠诚委员会进行审查。杜鲁门有意识地把这方面的大部分工作交给文官委员会，而没有交给联邦调查局。对埃德加的冷遇促使他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

埃德加要求国会让他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发表一次演说。他过去从来没这么做过。1947 年 3 月他这么干，实际上是公然同他服务的政府对立起来。政府也对他没有办法，说明他在美国掌握权力之大。

他对国会议员说，“一些从事非美活动的阴险人们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传播共产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美国的自由派被“诱骗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

埃德加差一点儿没有点自由派总统的名，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杜鲁门十分生气。他的一位助理说，“总统对联邦调查局非常反感，决心要压一压调查局，害怕出现盖世太保。”然而杜鲁门又是现实主义者。他对克拉克·克利福德说，“埃德加极有可能从保守的国会那里得到他需要的一切。这是危险的。”

埃德加的确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对忠诚调查的完全控制权。他成为反共讨伐的旗手。

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上，埃德加答复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些问题。律师布雷德肖·明特纳倾身过去，悄悄对埃德加说，在最近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依靠捏造的诽谤材料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埃德加回答说，“我知道这一切，但是，在执法方面，我看他可能对我们有用。”

10 年以前，当尼克松还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年轻大学生时，他曾经申请当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的申请本来已经被批准了，但后来又被取消，因为调查局认为他“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现在，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埃德加对他再没有什么怀疑了。同年，两人相识后，不久便共同致力于搞垮国务院

官员阿尔杰·希斯。这是尼克松在通向白宫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埃德加突然成为 1947 年的英雄。他的像片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他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在告诉国人“如何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大清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好莱坞首当其冲。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电影界展开了进攻。埃德加认为好莱坞有“共产主义潮气”，他从一开始就在幕后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听证会开始几个月前，他对助理们说，“我要在各方面给委员会以帮助。”他在洛杉矶的特工头子理查德·胡德把有关电影界可疑分子的情报交给调查局存档。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组的头头是艾伦·史密斯，他是调查局的老手，同埃德加的关系密切。

听证会的会场是圆形的，一群群叽叽咯咯笑着的女人们围着“友好的”证人打闹。沃尔特·迪斯尼作证说，他的电影制片厂的共产党人正利用“米老鼠”来宣传共产主义。

埃德加以前的女朋友莉拉·罗杰斯说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话。她认为，克利福德·奥德茨导演的《唯有孤独的心》大可怀疑，因为其中有一个场景，儿子对妈妈说，“你别在这里工作，榨取比我们更穷的人的钱。”委员会说，罗杰斯是“美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之一”。

“不友好的”见证人和反对听证会的人受到辱骂中伤。一批拒绝说出自己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艺术家以藐视国会罪被下狱。当他们出狱时发现自己的职业给毁掉了，因为好莱坞的影业者板为了表示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支持，已经宣布他们上了“黑名单”。

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好莱坞的进攻一直持续到 1953 年，埃德加暗中扮演了打手的角色。演员斯特林·海登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海登曾经当过一段时期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不安，通过自己的律师写信征求埃德加的意见。埃德加建议说，“记录下来吧，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会帮忙的。”这个演员立即向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写了一份正式的但白书，表示悔过。

对埃德加来说，这是进行新的迫害的机会。他不但没有保护海登，反而把他的悔过书转给了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位演员被叫去作证。他惊慌之中，供出了许多参加过共产党的朋友和同事。他后来悔恨自己充当了埃德加的工具。

调查局的 100—382196 号档案包含有好莱坞一个次要演员的材料：“6.1 英尺高，175 英磅重，蓝眼睛，棕色头发”。他的名字叫罗纳德·里根。这位未来的总统当时既当演员，也参加工会活动。他还是艺术、科学和专业公民委员会的理事。调查局认为这个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里根的兄弟尼尔为调查局监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告诫里根最好辞去理事职务。后来，里根也当了调查局的工具。

不久之后的一天午夜，他在公用电话亭给他的兄弟打电话，传送关于该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情报。里根当了调查局的机密情报员，代号为 T—10。他给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打电话，要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来他家，他要汇报电影演员工会中“追随共产党路线的小集团”的情况。他讲了有关的男女演员的名字。在埃德加的亲自安排下，他又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秘密作证。

埃德加调查的一些公民，其实既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干非法的事情。埃德加认为，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严重地、不公正地抵毁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命令特工人员调查一些著名作家和编辑的背景，查查他们的“颠覆性因素”。特工人员随便挑选了 100 人，发现其中 40 人有问题，便为他们立了档

案。

多年来，埃德加在文学界的扫击目标包括一些最著名的作家。其中一些人的确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事业。他们被盯梢、监视，他们的信件被拆开检查。达希尔·哈米特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作家。他逝世以后，调查局进行阻挠，不让他安葬在阿林顿公墓。

有许多其他的著名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并无联系，然而也同样受到调查。关于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赛珍珠的档案有 400 页之多。特工人员拆阅她的信件。其实，她只不过是写了一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参加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而已。

我们现今获悉，埃德加也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辛克莱·刘易斯等人立了档案。调查局称海明威为“左倾分子”，给他的妻子玛丽也立了档案。作家斯坦贝克因为“描写了美国生活的肮脏贫穷的一面”，使调查局大为不安。

画家、雕刻家也被立了档案。甚至那个从未到过美国的毕加索也在调查局的档案里有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成为调查的对象。发现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博士受到怀疑，调查局给白宫写了 4 页的汇报材料，因为他是美苏医学学会的成员，有一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被定为“中间极左派”。

埃德加 1940 年就开始搜集爱因斯坦的材料，因为他出席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和平主义集会，并且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派。战后，当这位物理学家知道他被监视的时候，他深感失望。他在 1947 年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到他逝世的时候，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达数千页之多，其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不忠于美国。

电影演员卓别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他出生于英国，过着富裕的两性生活。他是一个乌托邦“国际主义者”，同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使埃德加感到恐惧和忿怒。况且他还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比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名声要大得多。他受到普遍的爱戴。

早在埃德加当局长以前，调查局就认为卓别麟是一个危险分子。官员们不安的是，他那些“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电影可能毒害“人们的心灵”。1942 年，他们更加担心，因为他竟呼吁美国帮助苏联反对纳粹分子。当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琼·巴里由于精神错乱而指控卓别麟是她的尚未出生的儿子的父亲时，埃德加终于找到机会来迫害他。卓别麟曾经资助这位女演员在国内旅行。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调查了卓别麟的财务状况，询问了他的朋友、同事和仆人，了解卓别麟是否举行过“女人裸体狂欢晚会”。

血液检测证明，卓别麟不是那个婴儿的父亲，巴里的控告未能成立。但是，埃德加对他的骚扰并未终止。他把关于这位演员的情报送给好莱坞问题专栏作家们，甚至派人到国会图书馆追踪一条消息，25 年以前，苏联《真理报》称卓别麟是“一位共产党员和人类的朋友”。

调查局花了数千个小时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不过，埃德加最终还是把卓别麟赶出美国。在他的建议下，司法部于 1952 年以其性格不受欢迎为理由禁止他进入美国。埃德加还对移民官员说，卓别麟“道德堕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用的是普通信纸，以免暴露调查局的来源。有关的报告仔细地删去了提及调查局使用窃听器 and 匿名情报员的地方。

卓别麟在瑞士定居多年以后，埃德加仍然把他的名字保存在“安全索引卡”里，一旦出现全国性紧急情况，这些人是要被逮捕的。1972年，当这位演员应邀到洛杉矶接受奥斯卡特别奖时，埃德加进行游说，反对发给他入境签证。卓别麟还是被允许入境，结果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调查局给他立的档案长达1，900页。

1975年，在埃德加逝世3年以后，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下令对调查局10个最大的办公室的国内安全档案进行仔细检查，发现调查局的全部活动只有19%是调查颠覆分子的。然而在1.97万起这类调查中，只有4起发现有罪行，而且都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间谍或恐怖活动。

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在野已经15年了，它的领导希望重新入主白宫。一向自诩超越政治的埃德加想法帮助他们击败现任总统，这个办法就是再次在国内煽动起对共产党的恐怖感。这回是揭露在杜鲁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所谓共产党分子。

这个浪潮始于1948年7月，一个被新闻界称作“金发间谍皇后”的女人出现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她就是伊丽莎白·本特利。她已进入中年，体态丰满，以前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她的情人为苏联效劳，颇有些名气，现已逝世。

本特利说，在1938年至1944年她充当过共产党的信使，把华盛顿高级人士的敏感情报送给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上级。这些高级人士包括罗斯福总统的一位高级助理和杜鲁门政府的两名官员，其中一名是商业部的威廉·雷明顿，另一名是以前的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4天以后，本特利引起的轰动还没有平息下去，《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又前来作证。他以前也参加过共产党。他的惊人的揭露成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案件。

钱伯斯说，以前曾在国务院工作过的一位著名官员阿尔杰·希斯也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了一个以打入政府部门为目的的支部。希斯否认这一点。但钱伯斯拿出希斯送给他的大批秘密文件。

不管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说法有多少真实性，反正许多人的生命给毁掉了，4个人死了。怀特在委员会激烈地为自己辩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雷明顿以伪证判罪后，在监狱被用木棒打死。被钱伯斯诬告的前国务院官员劳伦斯·达根突然从纽约办公大楼的第16层坠楼而死。在希斯案件中被牵连的司法部官员马文·史密斯自杀身死。钱伯斯自己也曾企图自杀。

阿尔杰·希斯以伪证判罪。他说他没有向钱伯斯传递过文件。法官认为他在撒谎。他在监狱服刑三年半，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仍表白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1992年，从共产党解体后的莫斯科传来消息：俄国官方人士支持阿尔杰·希斯的否认。叶利钦总统的顾问、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宣布了他研究苏联档案的结果。他说，指责希斯当过间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杜鲁门总统从来不相信希斯是有罪的。这个案件的目的何在，他心里是有数的。多年以后，杜鲁门说，“他们想把我搞出白宫。共和党在野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竭力想重新执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括政治迫害……”

在埃德加担任调查局局长期间，只有4个美国共产党人由于间谍罪而被判刑。

1948 年埃德加的当务之急是搞垮杜鲁门，以便巩固他的权力基地。那年春天，他同记者沃尔特·温切尔私下谈到即将来临的大选。他说，他对杜鲁门很恼火，因为这位总统限制了他的权力。他希望别人取代杜鲁门。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最有可能当选，所以埃德加给他当了吹鼓手。调查局搜集杜威的情报已经有 6 年了。在上次竞选运动中，杜威曾经私下说，埃德加的恰当地方是牢房。

后来的消息变好了。据沙利文说，1948 年埃德加梦想在杜威当总统后他会得到提拔。在预选活动开始后，他秘密地把调查局置于杜威的支配之下。

杜威接受了埃德加的帮助。特工人员收集材料，帮助杜威草拟他的广播辩论稿。沙利文说，“这些材料要得很急，所以派专机送到纽约的奥尔巴尼。杜威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我们制造一种印象：杜鲁门无视正在出现的共产党威胁。”

埃德加得了严重的肺炎。1948 年 11 月 2 日大选那一天，他正在迈阿密海滩疗养。克莱德和尼科尔斯把大多数人的看法告诉了他：杜威肯定会获胜。次日，《芝加哥论坛报》登出了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料后来的消息恰恰相反，杜鲁门重新入主白宫。

“一种沉重的情绪笼罩了调查局。”沙利文回忆说。埃德加从佛罗里达发回了一封信，愤然指责尼科尔斯把他“推向危险的境地”。

不过，1949 年 1 月 20 日总统宣誓就职那一天，埃德加仍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邀请 21 岁的女演员雪莉·坦普尔同他一起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观看车队和人群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缓缓行进。埃德加满面笑容地送她一件礼品——自来水笔式的催泪瓦斯枪。

埃德加幸存下来了，但他并不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像往常一样，不管他的其他担心是什么，对他最大的威胁是他自己的性生活。

第十六章

压制言论自由

根据现在掌握的档案材料，1949年3月，关于埃德加私生活的详细档案材料送到了杜鲁门总统手中。

这些“坏消息”极有可能是关于埃德加的同性恋问题的。杜鲁门对一位作家默尔·米勒说，“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我带来大量关于他的私生活的材料。我对他们说，我对此不感兴趣。他在业余时间干些什么，我管不着。我关心的是，他工作时干些什么。”

三个月以后，他收到了调查局关于他的两个助理跟妇女调情的报告，他大为光火。他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划船时“在码头上追逐两个姑娘”。他的行政助理戴夫·奈尔斯也爱寻花问柳。杜鲁门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拜倒在石榴裙下，总不能说是受莫斯科宣传的影响吧。”

美国总统现在面临两个难题：他的助理跟妇女调情；埃德加自己也行为不轨。相比之下，埃德加行为更值得担心。负责美国国内安全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竟是个同性恋者，这岂不成为敌对情报机关、特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攻击目标。

1949年6月，埃德加在朱迪思·科普朗案件上公开丢脸。科普朗是司法部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她在同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接头时，被当场抓获，她的手提包里装满了调查局报告的摘要。使埃德加极为害怕的是，法官在审判她时决定，为了确定她手提包里的东西的真实性，联邦调查局必须拿出这些文件的原件。

这将是调查局原始档案第一次被公开。埃德加之所以担心，不仅是因为其中包含有极端机密的材料，而且还因为其中有一些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的东西。埃德加表示抗议，一直告到总统那里，但是白搭。文件拿到了法庭，结果使埃德加颇为尴尬。

甚至在审判期间，调查局还窃听了科普朗和她的律师之间的合法谈话。特工人员赶忙销毁了录音带和软盘，这肯定是得到了埃德加的批准。埃德加认为那几周是“相当难熬的”，杜鲁门总统差一点儿解除他的职务。

埃德加的敌人名单扩大了。他的矛头现在也指向自由派人士、教会、甚至出版界。那年秋天《哈泼氏杂志》的一篇文章激怒了他，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托在文章中写道，科普朗案件揭发出来的调查局报告“简直像弱智儿童的谈话一样不负责任”。埃德加非常生气，叫特工人员调查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情况。

在大学校园，人们也担心调查局。它的特工人员向大学负责人提供贬低教师的材料，从而影响他们在学术方面的任命。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亨利·马杰瑙教授肉于给调查局所反对的一个青年团体讲话而受到指责。他屈服了，以后再接受讲话的邀请，总是先征求一下调查局的意见。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调查局打入了50多所大专院校，在许多高级负责人，包括那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的合作下，查出了教职员中的共产党人和极左派人士，并把他们清除出去。

甚至宗教界的人士也不能幸免。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会，威廉·梅利什牧师和他的父亲由于提倡美苏友谊而遭到右翼的严厉抨击。虽然他们父子

俩受到教区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还是被赶出了教会。

1950 年夏季和秋季，埃德加滥用自己的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纽约的威廉·斯隆合伙出版公司即将出版一本关于调查局的书籍，作行马克斯·洛温撒尔是杜鲁门总统的好朋友。当他担任全国执法委员会秘书时，他就开始搜集二十年代末以来调查局及其局长的材料。他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不安，终于写出了 500 页的批评性论著。

埃德加一听说此事，就开始阻挠此书的出版。他请求纽约的一位著名律师莫里斯·欧内斯特在幕后同这家出版商进行交涉，不要出版此书。

9 月，共和党议员乔治·唐德罗在众议院发表了 10 分钟讲话，猛烈抨击洛温撒尔。唐德罗是埃德加的驯服的议员之一。这回，他根据埃德加的旨意，诬蔑洛温撒尔跟共产党有联系。接着，非美活动委员会突然要求作者前来作证。听证会的记录在 11 月份洛温撒尔的著作出版以前透露给了调查局在新闻界的朋友。此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埃德加在国会的另一位朋友伯克·希肯卢珀在参议院对这位书评作者进行了攻击。

埃德加的主管宣传的头头路易斯·尼科尔斯在自己家里的钢柜里锁着一些档案，它们透露了一些内幕。尼科尔斯的档案中保存着唐德罗谴责洛温撒尔的草稿。这位国会议员的发言逐段逐句重复了埃德加写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攻击之词。

调查风关于洛温撒尔的档案表明，特工人员搜集他的情报已经有将近 30 年的历史了，并且长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尼科尔斯对埃德加说，为搞臭洛温撒尔而使用的其他材料是通过“黑包工作”得来的。“黑包工作”是黑话，意思是非法盗窃。手写的字表明，交给唐德罗宣读的调查局最后定稿是埃德加亲自加工敲定的。

洛温撒尔的书销路并不好，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受到了国会的攻击。其实，这种攻击不仅不会减少销路，反而会增加销路。“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使这部书销不出去，”威廉·沙利文在多年以后透露说。“我们甚至到一些书店，要求它们不要贮存此书……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钱财。”

埃德加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说洛温撒尔的坏话。杜鲁门置之不理。他只是把此信转给洛温撒尔。总统早已青过此书的手稿。他说，读此书，“得到极大乐趣”。他赞扬作者“为国家作了一件极好的事情”。

这当然是在私下说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否读过此书，他则说没有读过。在公开场合，他不敢流露自己对埃德加的真实看法，更不敢解除他的职务。在全国，埃德加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度。新一代人是在恐惧中长大的：苏联有了原子弹，朝鲜战争爆发，罗森堡间谍案，以及最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控告。他们很容易相信埃德加的说法：有许多颠覆分子在美国活动。

用当时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的后来说，埃德加的“权势太大，无法驾驭了”。

第十七章

麦卡锡和埃德加

1950年2月，约瑟夫·麦卡锡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说杜鲁门的国务院有意识地窝藏了200多名共产党人。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但在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感的美国，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注定要成为一个英雄。

麦卡锡是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在以后的4年中，他俨然以大审问官自居，对两位总统、数十位体面的官员和许多清白无辜的公民横加罪名。今天，“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字典中的一个词，其含义是：“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往往是无根据的指责，耸人听闻的手法，审问官式的调查方法。”埃德加培养了这位参议员，给他提供情报，当他横行霸道的时候不断给他以帮助。

在麦卡锡疯狂地指责国务院的两个月前，埃德加到参议院的无线电广播室，同41岁的麦卡锡一起，对他的老家威斯康星州的人民发表了15分钟的广播演说。这是少有的对一个资格较浅的议员的支持，同埃德加所谓的不参与党派斗争的说法是矛盾的。这件事没有在华盛顿宣扬。后来，在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上，埃德加支持麦卡锡的连任。

特工人员向埃德加汇报麦卡锡的情况，正如同他们汇报每一个国会议员的情况一样。那次广播讲话是录了音的，他赞扬这位参议员以前当法官时的政绩。这段话后来从录音带中删去了。麦卡锡后来遭到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弹劾，差一点儿被取消律师资格。

埃德加知道麦卡锡的名声不好，然而他在麦卡锡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以前就庇护他。当国务院要求麦卡锡拿出指责它的证据时，他给埃德加打电话，请求给以帮助。调查局给麦卡锡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材料。

麦卡锡的第一个首席调查员唐纳德·苏赖因以前曾在调查局当过特工人员，其他主要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背景。

埃德加在写给麦卡锡的一封信中说，“调查局取得任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力于你这样一位好朋友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与合作。”

1951年，当美国准备大选时，共和党的一位议员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埃德加当总统候选人。“这对美国的青年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一位芝加哥公民作出反应说，“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品质：有本事，有领导才能，忠诚老实，有理想。我觉得，埃德加·胡佛具备所有这些品质。”密苏里的一位商人写道，“如果他竞选，他得到的票数将是所有总统中得票最多的。”

然而他没有竞选总统，这位自称超越政治的人成了造就总统的人。他同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先后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理查德·尼克松推上总统的宝座。

8月份的一个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豪华的饭店里举行了为尼克松筹款的宴会，埃德加谨慎地在贵宾中间走来走去。虽然他也是主持人之一，但报刊上并没有提到他的作用，来宾并不多。据作为来宾之一的巴巴拉·科夫曼说，“总共只有20来人。有一位姑娘走到我跟前说，‘我只弄到100万美元。你怎么办呢？’这是一次有趣的晚会。”

出席的大富翁中，有两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克林

特·默奇森和西德·理查森。理查森当时 61 岁，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终生未娶妻子，喜欢喝酒和玩扑克。57 岁的默奇森精力充沛，充满活力。他们俩的财产超过 7 亿美元，还不算尚未开发的油田。

这两位石油大王意识到埃德加作为一个全国性人物的影响，在四十年代末就开始拉拢他，请他到得克萨斯作客、打猎等等。埃德加同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身分。虽然默奇森的周围有一些有组织的犯罪人物，但埃德加仍把他当作“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这位亿万富翁说，“钱好像肥料一样，你把它撒在周围，是会有好处的。”默奇森和他的朋友们在政治的土壤上撒了不少“金钱”肥料。他们一向是民主党的保守支持者，但杜鲁门当总统以后得罪了他们，因为他公开谴责他们在赋税方面享受的特权，否决了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财富的法案。

默奇森的政治观点是极右翼的。他给反犹太报刊提供经济支持。美国纳粹党及其领导人林肯·罗克韦尔的主要财源就靠他。罗克韦尔把埃德加视为“自己的人”。

在杜鲁门执政的年代里，埃德加私下考虑他认为完美的政治阵容时，把默奇森和理查森当作可以担任高位的候选人，至少也是给他所喜欢的人提供财政支持的后盾，默奇森非常感激，在经济上支持埃德加的朋友麦卡锡，给这位参议员提供飞机供他使用。

1952 年总统大选时，得克萨斯的大亨们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大量资金。前一年，理查森乘飞机到这位将军在巴黎的总部，向他提交了一份 5 页的文件，阐述为什么他应该竞选总统。从那时以后，便不断施加压力，让他参政。默奇森游说，也不遗余力。

8 月份，艾森豪威尔在加利福尼亚同埃德加和默奇森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民主党的竞选人、伊利诺斯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蒂文森将“被激进派用来催毁美国引以为自豪的传统”。同一个月，有人在华盛顿散布谣言说，这位州长是一个“可疑的人物”。这肯定是调查局搞的鬼。

三年以前，史蒂文森对调查局的效率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自此以后，埃德加就对他怀恨在心。特工人员多方搜集贬低他的材料。埃德加向艾森豪威尔提供了史蒂文森 1949 年离婚的情况。1952 年春天，在史蒂文森就要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前，埃德加收到一份报告，说史蒂文森和布雷德利大学校长戴维·欧文是“伊利诺斯州最有名的两位同性恋者”。据说，史蒂文森在同性恋者中间以“艾德琳”这样的名字闻名。

7 月份，在史蒂文森宣布参加竞选的同一天，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草拟了一份 17 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所谓同性恋的丑闻以及他曾经同情共产党。

10 月份，在竞选运动的关键时刻，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了全国电视演说，提出了关于史蒂文森的“确凿有据的背景材料”。他挥动着手中的文件，说民主党的这位候选人在战时曾经是共产党的合作者，是左翼组织的秘密成员。这些文件是调查局以前的特工人员唐纳德·苏赖因提供的。他现在是麦卡锡和调查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这是美国最肮脏的竞选运动中的最卑鄙打击。在此以后，史蒂文森的情绪大为低落，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继续竞选下去。1952 年 11 月，即艾森豪威尔在加利福尼亚同埃德加和默奇森举行战略会议 3 个月以后，他获得了压

倒多数的胜利。

艾森豪威尔的朋友乔治·艾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政治这玩艺儿是要靠金钱和势力的，只有这样，恰当的人选才能得到一张门票。”艾伦是新总统、默奇森、理查森和埃德加的共同朋友。

甚至在新总统宣誓就职以前，艾伦和比利·拜厄斯就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作出安排，为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提供资金。拜厄斯也是埃德加在石油界的一位朋友。理查森则给不久以后当了财政部长的罗伯特·安德森秘密提供资金。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对总统的政策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国内的石油公司。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颁发了 60 项关于政府储备油田的开采租约，而以前的 55 年中只有 16 项。

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是得克萨斯人，他很了解石油大王们的做法，他绝望地看到艾森豪威尔把联邦的重要职务分给商业巨子们担任。他咆哮说，“胡佛这家伙帮助他这样做。胡佛这家伙是多年来钻进政府的最大的坏蛋。”

“我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很密切。”埃德加回忆说。“他是一位伟人、一位伟大的总统。”埃德加认为，艾森豪威尔当政的 8 年是他一生中“最好、最愉快的时期”。从他的地位绝对稳固这一点来说，的确是如此。亲密的信件经常来往于调查局总部和白宫之间。

艾森豪威尔给埃德加颁发了国家安全勋章。而埃德加则给总统颁发了第一枚“联邦调查局荣誉成员金质徽章”。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以后对埃德加说，“我希望有一千位埃德加·胡佛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但是，在这些恭维之词的背后，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文件表明，他认为忠实的美国人不应以所谓共产主义的罪名而受到迫害。他讨厌麦卡锡主义，而埃德加则极力予以支持。艾森豪威尔决定欢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美国来，埃德加对此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会在美国人中间造成一种“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气氛”。

跟他的民主党前任不一样，他不大愿意利用调查局来为自己搞政治情报。他可能完全没有这样做。埃德加所信任的一位记者拉尔夫·德特勒达诺回忆说，“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时，胡佛既没有受到表扬，也没有受到指责……实际上，他非常不喜欢艾森豪威尔。”埃德加本性难改，他刺探艾森豪威尔的私生活，就像他曾经刺探罗斯福总统的私生活一样。

艾森豪威尔在战时曾同他的女司机、年轻的爱尔兰姑娘凯·萨默斯比有过一段浪漫史，在 1952 年的竞选运动中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共和党领导人认为萨默斯比 1948 年出版的回忆录《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可能具有爆炸性，不过书中并没有谈及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后来，这本书神秘地从华盛顿的书店里消失了，纽约公共图书馆里也找不到此书。

3 年以后，1955 年 9 月，麦卡锡的助理唐纳德·苏赖因给调查局传递了一份情报，说在过去 6 周中，萨默斯比以化名呆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里。埃德加立即下令进行调查。特工人员托同时这家饭店进行了许多访问，还对萨默斯比进行了一次访问，以便查明她是否真的呆在华盛顿。

埃德加之所以对她如此感兴趣，只有一个解释，它想了解总统是否对萨默斯比重萌旧情。他习惯于让总统们知道他掌握他们生活上不检点的一些小过失。埃德加用有关萨默斯比的情报干了些什么事，档案上没有记载。埃德加收到这个情报一天前，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首次发作。

自 1953 年以来，埃德加和克莱德经常作为默奇森的客人到南加利福尼亚的拉霍亚度暑假，住在默奇森拥有的德尔查罗饭店里。自三十年代以来，埃德加就是这个城市的常客。他曾对报界说，在这个地方，他“感到上帝就在跟前”。1953 年默奇森买下这个饭店后，埃德加和克莱德就再也不住别的饭店了。

他们一年一度来这里度假，对当地的调查局特工人员来说，成为一场磨难，稍有招待不周，便遭到他们的责骂。有一年，部下忘了准备埃德加喜欢吃的冰淇淋。已经深夜了，他仍坚持要吃。特工人员只好请当地的冰淇淋厂赶制一些，由调查局的一位速记员打扮成女侍者给这个上司送去。

默奇森确保埃德加和克莱德在德尔查罗饭店要什么有什么。埃德加提到，他在佛罗里达度假时，“可以在门口从树上摘水果吃”。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他的院子里栽满了橘树、桃树、李子树和葡萄树。这是连夜移栽的。

埃德加素以廉洁俭朴自诩，他从默奇森那里得到的种种好处对他的自我标榜是一个极大的嘲讽。据德尔查罗饭店的经理艾伦·威特沃回忆说，“夏季快完了，胡佛还无意付帐。所以我找默奇森，问他怎么办。他说，‘记在我的帐上。’我照办了。”

埃德加每年都去德尔查罗度夏，持续了差不多 20 年，直到他逝世为止。光是 1953 年的费用就达 3,100 美元，按今天的币值计算约为 15,755 美元。如果按这个平均数计算，那么随后 18 个夏季招待埃德加的费用加在一起，接近 30 万美元。

自 1950 年以来，埃德加在调查局的薪金比一个国会议员或一个内阁阁员还要多。

美国的成年人大概都记得，1958 年出版了一部由埃德加署名的书《欺骗大师》。由于它的作者是埃德加，它成为畅销书，精装本卖了 25 万册，平装本卖了 200 万册。它成为许多学校的必读书。它被吹捧为“关于美国共产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的手册。司法部宣布，此书的稿酬用作联邦调查局的娱乐基金。

《欺骗大师》一书既不是埃德加写的，主意也不是他出的。此书是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建议写的，由四五个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执笔，最后由在犯罪记录处工作的、获得博士学位的弗恩·斯图肯布罗克加工润色而成。全国的特工人员负责推销此书，把调查局事先写好的书评刊登在对调查局友好的报纸上。

埃德加死后官方进行的调查表明，此书的收入只有五分之一被用作联邦调查局娱乐基金。其余的钱被埃德加、克莱德、路易斯·尼科尔斯和比尔·尼科尔斯（他同此书毫无关系）以及一个帮助起草此书的记者分了。据埃德加私下承认，他们 4 人每人分得了 7.2 万美元，按今天的币值计算约合 34 万美元。

调查局禁止工作人员在股票市场上搞投机，但是埃德加和克莱德则由于消息灵通和有石油大亨们的帮助而在石油、保险公司和铁路等方面进行投资，发了财。

马萨诸塞州商人彼得·斯普拉格 1961 年整理其已故父亲的遗产时，发现一些通信，说明埃德加和克莱德是得克萨斯一个石油钻探公司——圣地亚哥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他们投入巨额款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75

万美元。斯普拉格说：“他们在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肯定不是靠节余薪金得来的。”他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纽约区检察长罗伯特·摩根索。

摩根索在 1988 年说，“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发给胡佛的电报，告诉他石油钻探公司的情况。我注意的是，这涉及到联邦租借权。胡佛作为一个联邦政府官员可能帮助公司取得租借权，因而从中捞取好处。这对胡佛这样的官员来说是不适合的。”

关于埃德加和默奇森之间关系的一些情报可能毁掉埃德加的前程。肯尼迪当总统期间在司法部犯罪处担任处长的威廉·亨德利回忆说，“这些材料还不足以构成犯罪，但却是错误的，他不应当干这些事。”

据沙利文说，埃德加“跟默奇森的关系很深，他给油井钻探工作投资，如果打出石油，有他一份利润；如果打不出石油，他则不承担费用。……有一段时间，他在收入税的处理上碰到了严重的麻烦。后来他对我说，‘天哪，如果暴露真实情况，我就要倒霉了……’胡佛显然干了一些严重违法的事。”

1953 年夏末，正当埃德加在德尔查罗第一次享受默奇森的盛情款待时，麦卡锡出人意外地也来到这个饭店。埃德加对记者说，这是一种巧合。但事实证明，这两人是在开一次对付危机的会议。

1952 年艾森豪威尔开始当总统时，这位参议员担任了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的首席顾问是埃德加最喜欢的一个助理罗伊·科恩。

科恩是纽约最高法院一个法官的儿子。他在许多方面跟埃德加有共同之处。他到华盛顿时 25 岁，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极右分子。他是个同性恋者，但他自己否认这一点。他在 1986 年死于艾滋病。

埃德加把科恩推荐给麦卡锡。科恩又带来一个不要报酬的“首席顾问”，即戴维·沙因。26 岁的沙因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人们说他跟科恩是一对同性恋者。

麦卡锡 1953 年去拉霍亚时，他的名声正在下降。包括总统和许多右翼人士在内的各种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对他那一套感到腻味了。这位参议员到德尔查罗饭店时，心情很坏，常常喝得醉醺醺的，骂饭店职工，甚至把他的尚未换上游泳衣的未婚妻推到游泳池里。

当别人都疏远麦卡锡时，埃德加却对他说了许多热情的话。他对一位记者说，“我把他当作朋友。他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是诚实真挚的。他树立了许多敌人。不管你攻击的是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还是三 K 党人，你都会遭到极为恶毒的批评。”

如果麦卡锡希望从埃德加那里得到公开的支持，那他就要失望了，鉴于总统讨厌麦卡锡，埃德加对艾森豪威尔说，这位参议员的活动现在妨碍了对共产党人的调查。

在参议院正式对麦卡锡提出批评以后，他仍同调查局保持接触。他晚年酗酒严重，但还认为埃德加是接替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恰当人选。1957 年，麦卡锡死于肝硬化症，埃德加、科恩和尼克松参加了他的葬礼。某些认识麦卡锡的人说，其实他自己从来不相信他的反共言论，他那么干完全是看风使舵，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

到 1956 年，除其他因素外，也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强大压力，美国共产党员人数从 1944 年最高峰时期的 8 万人下降到只有 2 万人。到 1962 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 8,500 人，而到 1971 年只有 2,800 人。

虽然美共继续存在，但由于联邦调查局许多情报员的打入，它受到很大

破坏。埃德加在 1963 年对国务院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巴·施瓦茨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美国共产党甚至无法存在了，因为我给共产党提供了资金，为的是了解他们在干什么。”

埃德加晚年曾经对威廉·沙利文大发脾气，“如果你不断贬低美共，我怎么从国会搞到拨款？”专门监视美共活动的沙利文曾经公开说，所谓共产党“威胁”早就是一个“吓唬美国公众的谎言”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到麦卡锡时代结束时，连埃德加自己也不真心相信联邦调查局搞的反共活动了。

用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话说，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埃德加控制了国会，他“掌握的权力比总统都要大”。

第十八章

整理名人的黑材料。

埃德加一再否认他整理了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个人生活的档案。他说，“这样的所谓秘密档案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政界人士不相信他的话。1958年，一批老资格美国参议员专门举行了会议，讨论如果埃德加突然死去，怎么办。

参议员卡尔·蒙特是共和党的极右分子。他忠实于非美活动委员会，虽然是埃德加的有力支持者之一。然而，就是他，在1960年的一个晚上，突然向他的助理亨利·埃金斯倾诉了他的真实看法。

他说，“胡佛是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据我所知，胡佛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干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整了他们的材料。”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露骨了，便恳求埃金斯，当埃德加还在台上的时候，千万不要重复他所说的话。1975年参议院进行的调查表明，联邦调查局对许多著名的国会议员搞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档案。埃德加死后几个月，当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在俄亥俄搞一个民主党候选人的情报时被当场抓获。据透露，20多年来，犯罪记录处有一个“国会关系室”，专门搜集政界人士的情报，以供“内部使用”。

威廉·沙利文说，“胡佛对每一位新的国会议员都有一整套档案。他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在哪里上的学，是否喜欢足球，以及其他种种细节……通过调查局的索引，可以马上了解一个人对我们是否有用。”

随着选举的临近，埃德加给所有的候选人都准备好了贺信。选举结果一揭晓，信件就发往全国各地。“友好的”政治家所到之处，都受到调查局人员的欢迎。

在国会，议员们受到给埃德加充当间谍的人的监视。从1943年以来，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被“借”给国会的各个委员会担任调查员。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装作完全“离开”调查局去充当国会的工作人员。

埃德加在国会的重点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因为它掌握着政府部门的财权。到七十年代，光是这个委员会就至少有28名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控制联邦调查局预算的那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鲁尼是调查局的好朋友。鲁尼说，“我从来没有削减过他的预算，也根本不想这么做。”众议院犯罪委员会要求埃德加去作证，他加以拒绝，但每年必去拨款委员会作证，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并列举统计数字，说明调查局的成绩，其破案率通常占犯罪活动的96%。

这些数字是伪造的。破案率应当只指提交给法院的案子数字，而不是进行调查的案件数目。像盗窃汽车的案件，有许多是地方警察完成的。多年来，许多公共团体和学者对埃德加的统计数字持怀疑态度。五十年代的一位助理司法部长沃伦·奥尔尼说这些数字是“废话”。但鲁尼的拨款委员会则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

鲁尼同黑社会勾勾搭搭，有人看见他接受了犯罪集团给他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埃德加对他加以保护。有人说他接受了10万美元的贿赂，调查局也不进行调查。后来两次有人竞争他的位置，他都是在埃德加的帮助下险胜对方。

六十年代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同埃德加也有着特殊的关系。当他需要什么材料来对付他的政敌时，他便派人到埃德加那里去取。

埃德加为了争取一个人忠实于他，或者为了封住一个潜在敌人的口，其手段是毒辣无情的。特工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搜寻人们的短处。前高级特工人员柯蒂斯·莱纳姆说，“我们得到指示：记录将来可能有用的任何东西，我们把这叫作‘零的档案’。我在内华达工作时，有一次同妻子一起滑雪，看见一个男人跟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在农舍外面搞鸡奸。我们都认出他是商界的名人。我估计这件事以后可能有用，便向头头作了汇报。他说，‘这是一位著名人物，最好把材料发回华盛顿制作索引。’”

据沙利文说，在一位新的国会议员登上飞机赴华盛顿以前，调查局就开始调查他的材料：有无犯罪记录，是否被调查过，在性或道德方面有无过失等等。

在埃德加死后，一位官员计算，调查局拥有参议员的档案883份、众议员的档案722份。有些被销毁了，有些仍然保存。许多材料放在“机密档案”里，锁在埃德加办公室的档案柜里。他的秘书海伦·甘迪每晚都把钥匙带回家。

埃德加的档案里往往有不少与性有关的材料。1948年，参议员范登堡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颇有可能获胜，埃德加让特工人员不断搜集群众中对他的各种议论，包括他的婚外恋，及时告诉他。他对此深表感谢。埃德加非常喜欢打听可能成为总统的那些候选人的私生活。

三十年代末，克莱德的女朋友埃德娜·多利顿在饭桌上听到埃德加和克莱德谈论国会议员哈罗德·克努森。她回忆说，“他们显然做了一些有害于这位议员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样做。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问。”

克努森1917年至1948年一直在国会当议员。他是个光棍儿，同墨西哥的一位男友住在一起。传说他鸡奸一个青年，被人抓住了。多利顿回忆说，不管真相如何，她听见埃德加说，克努森被“掌握在我们手心了”。

机密档案表明，从1958年至1965年，华盛顿特工人员不断收集政界人士的丑闻。这些丑闻，有的是在进行其他调查时顺便搞到的，有的是窃听来的或者通过电子仪器记录下来的，都亲手交给埃德加。埃德加对这类情报极感兴趣。

1960年5月16日，肯尼迪和尼克松争夺总统宝座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特工人员把华盛顿一个妓女提供的情报急忙送给埃德加。她谈到她曾同许多国会议员在“五月花”饭店、在家里、有一次在“国会办公室”发生过性关系。那年秋天，当竞选运动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候，特工人员特别忙于做妓女的工作。9月2日，一个妓女接到一个参议员的电话，约她中午见面。她接电话时，特工人员在场。后来的报告写道：

“妓女告诉特工人员关于这位参议员到来的时间。他离开时，听他说，‘真有味儿。’他离开院子后，这位妓女评论说，这位参议员的性能力‘非常好’。”（参议员的名字被删去了。）

特工人员收集到这类情报，总是直接交给埃德加。其中有些报告是由特工头头约瑟夫·珀维斯签字的，他说，“我无意不适当地探听别人的隐私。这些东西主要是胡佛感兴趣，将来可能有用。”

以前的特工人员康拉德·特拉赫恩对埃德加并不抱幻想。他说，“胡佛

对人狠毒，他是个暴君。他对国会的人是不择手段的。既然他喜欢这一套，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汇报给他。”

诺曼·科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调查局的指纹专家，他说，收集丑闻已是家常便饭了。早在四十年代，同事们就抱怨“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调查公职人员，而不是用来侦破人民的公敌。任何可能对局长构成威胁的人，我们都要翻翻他们的老底，我们的想法是，找到任何把柄，以便用来对付那些敢于对局长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

在水门事件中鼎鼎大名的戈登·利迪，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亲眼看到那些丑闻情报是如何处理的。

他说，“有一次，某地发生银行抢劫案。情报员告诉我们，匪徒隐藏在斯基莱因汽车旅馆里，在华盛顿国会山以南，隔着六个街区。特工人员搜索旅馆时，发现某参议员跟一个15岁半的姑娘露西·施瓦茨科夫睡觉。他们表示歉意，赶快退出来了。但这一切情况都必须记录在案。看到这份报告的主管人也许认为没有必要保留关于某参议员生活小节的材料，但他无权销毁，必须送交局长办公室。”

利迪说，在埃德加的办公室，搞了一份摘要，送交犯罪记录处的加德纳小姐。负责同国会联络的人迟早是会看到这份材料的。“如果局长想会见这位参议员，我得准备一分备忘录，同加德纳小姐的卡片进行核对。如果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则另写在一张普通纸上，标明‘只供局长审阅’。”

利迪说，有时，埃德加也许会派一位官员会见那位名誉受损的政治家。“这位送信的人只说，‘胡佛先生表示道歉，在合法的调查中侵入了你的隐私，但请你不必担心，这一情节已从档案中去掉。’关键的一点是让这位政治家（参议员）知道胡佛已掌握了他的短处。由于这个缘故，当胡佛去拨款委员会时，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他掌握的情况。”

别人证实了利迪的说法。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说，“以前在胡佛的办公室工作过的一些人后来到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许多情况。我常听说，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逛妓院被抓住。当有关的报告送上来时，胡佛把它们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如果某议员出了什么问题，胡佛会对他说，‘你不必担心，我把那些材料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他很善于玩弄这一套花招儿。”

伊曼纽尔·塞勒在国会当了50年的民主党议员，曾多年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曾对《纽约邮报》发行人多萝西·希夫说，他不敢揭露埃德加滥用职权的情况，因为他的“小辫子”被抓在调查局的手里。他继续在公开场合把埃德加捧为公职人员的“最好楷模”。

老资格特工人员阿瑟·默塔格说，“调查局往往炮制一些在政治上会对某些政界领导人物造成损害的情报，而且这类情报总是在对当事人最不利的时候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或某些别的对调查局友好的报纸上。”

同埃德加关系密切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沃尔特·待罗安谈到了受这种策略之害的某些人。他说，“国会中一些给他以大力支持的人就是受制于这种讹诈，有礼貌的讹诈。”

参议员萨姆·欧文由于主持水门事件听证会而被人们永远铭记，然而他在1971年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当时他作为宪法权利小组委员会主席否决了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调查。他在谈到埃德加时说，“我认为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工作。”据沙利文说，欧文“有短处掌握在我们手

里，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大捧调查局的原因。”

埃德加也喜欢揭白宫政治家的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前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回忆说，“据我所知，他也有我的档案，因为林登·约翰逊给我读过这方面的材料。有一次，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调查局收集了一些关于你的传说……，他还给我读了关于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思拉斯顿·莫顿参议员的档案和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档案。关于尼克松的档案就更多了。许多人都是惴惴不安的……”

尼克松被赶下台以后回忆说，“情报是埃德加·胡佛手中主要的威力源泉之一。他通常对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了解一些情况，这使他既成为有用的朋友，又成为危险的敌人。”

第十九章

把触角伸向法院

埃德加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政界人士。从 1945 年开始，30 年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至少窃听了最高法院 12 位法官的私下谈话。有些法官是在同调查局监视的其他对象进行电话对话时被窃听的。按照宪法规定，是不准窃听最高法院的电话的。然而，埃德加并没有销毁这方面的录音稿。他继续保留它们，以便对自己有用。

调查局奉杜鲁门白宫之命对持不同政见者托马斯·科科伦进行电话窃听时，听到了道格拉斯法官的谈话。杜鲁门看到录音记录以后，决定在 1946 年不提名道格拉斯为最高法院院长。道格拉斯的自由派观点激怒了埃德加。他连续整理了他的档案。这位法官结婚 4 次，3 个妻子都比他年轻得多。特工人员不断向埃德加提供关于他的最新情报。有一份情报说，“道格拉斯经常陶醉于晚会，习惯于追逐女色。”调查局还了解道格拉斯周围的朋友，发现其中一些人的“忠诚性可疑”。这位法官本人发现他的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

1957 年，当调查局调查所谓“左翼律师小集团”时，收集了一些法官本人的政治态度。埃德加的档案表明，在 1953 年罗森堡间谍案期间，关于最高法院，他有三个情报来源。甚至在汽车里谈话也是不安全的。当法官伯顿在联邦调查局的汽车里谈及一个案件时，陪伴他的特工人员便直接向埃德加汇报。

关于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档案已经发表了两万页，但是调查局坚持，为了国防或对外政策的利益，其他一些档案，主要是电子仪器监听的记录则“必须保持秘密”。法院还必须进行更多的斗争，才能使公众看到埃德加对全国的法官收集了多少情报。

法官劳伦斯·西尔伯曼 1974 年代理司法部长时检查了调查局的机密档案，认为埃德加在窃听电话和安装窃听器方面太不慎重了。今天，他肯定在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采用这些手段，这些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1965 年，司法委员会请来专家，清查了参议院的过厅，他们在莫里斯·纽伯格和拉尔大·亚巴勒这两位参议员的办公室发现有“安装窃听器的许多迹象”，结果在亚巴勒写字台上的对讲机中找到了一个窃听器。他认为，这是调查局奉约翰逊总统之命安装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说，参议院办公室进出的所有电话他都知道。

国会议员们感到不安，曾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开会研究此事，但认为无能为力。直到埃德加死了一年以后，这个问题才公开捅出来。参议员约瑟夫·蒙托亚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博格斯说调查局窃听了国会的电话。博格斯指责埃德加采取了“苏联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手法”。埃德加当时断然否认，并散发了贬低博格斯的情报。

据博格斯的儿子托马斯说，他爸爸的指声是有物证的，即窃听的谈话录音记录，这是良心不安的调查局官员向他提供的。切萨皮克—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一位调查员还对博格斯说，他家里的电话也被调查局窃听了。

据电子专家伯纳德·斯平德尔说，在六十年代中期，调查局窃听国会的电话是常事。在 1965 年，他在检查一位国会议员的电话时，

发现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的电线通到国会的电话总机室。他用侦察器查出了一根电缆，电缆通向国会两院和他们的监听室。这根电缆的终点是司法部租的一所房子。

斯平德尔本要就此事向参议员爱德华·朗领导的侵犯隐私小组委员会作证。然而，就在听证会的前夕，他被告知，爱德华·朗同调查局达成了“谅解”，他将不讨论调查局在这方面的活动。当斯平德尔坚持要作证时，爱德华·朗制止了他。据爱德华·朗的首席顾问伯纳德·芬斯特沃尔德解释说，这位参议员因受到调查局的恫吓而屈服。

在六十年代，爱德华·朗同“探听魔鬼”作了8年的斗争。所谓“探听魔鬼”是指窃听电话、安置窃听器和私拆信件等行为他曾希望能够让公民查阅政府的档案。

1963年，爱德华·朗作为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开始调查政府的效率。他发现政府机关每年花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窃听设备，便下令对此进行调查，听证会持续了3年多时间，最后以这位参议员的失败而告终。

当爱德华·朗决定专门对联邦调查局举行听证会时，埃德加发火了。一位助理在此以前曾经建议，“应该施加点压力，不涉及思想原则，而只牵涉到个人利益。”后来，芬斯特沃尔德讲述了1966年发生的事情。

他说，“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将是委员会听证会的下一个对象。胡佛的一个官员（助理局长）卡撒·德洛赫约定时间，同另一个特工人员一起来到爱德华·朗的办公室。他们从来不单独行动。爱德华·朗让我也参加会见会，大概他预料到是要谈关于联邦调查局的听证会的。他们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德洛赫说，‘参议员，我认为你应当读读关于你的这份档案。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它，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你决不会知道，不慎重的人会用它干些什么事。我们认为，你应当了解一下这些材料的内容，它们对你可能是有害的。’”

“他们把文件夹递给他。我记得，文件夹并不厚。他坐在那儿，读了几分钟，然后把文件夹合起来，递给他们。他们便走了。随后，我们便奉命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下一个单位的听证会。据我所知，后来马马虎虎进行了一些听证会，主要是为了挽回面子，根本就没有调查窃听电话这个重点问题。”

德洛赫是联邦调查局和参议员爱德华·朗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否认芬斯特沃尔德的说法。他谈到对爱德华·朗的一次访问时说，“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打算举行关于联邦调查局的听证会。他说无此意图。我又问，他是否愿意向我们保证决不干扰联邦调查局。他说他愿意作出这样的保证。……我对参议员爱德华·朗说，概括起来说，可以这样理解：他向我们承诺不干扰联邦调查局。他说，是这样的。……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打算把联邦调查局作为其他单位效法的一个光辉榜样。”

德洛赫写道，“鉴于这位参议员的性格多变，我们必须经常同他保持接触。虽然被他的委员会打扰的威胁已经消除，但是还存在其他一些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形势的发展。”

一年以后，爱德华·朗成为《生活》杂志一篇揭露文章的对象。该文说，他接受了卡车司机工会的赠款；他之所以要调查联邦调查局窃听事件，是受了该工会友人的鼓动，旨在削弱政府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努力。

经参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上述说法不能成立。然而，《生活》杂志的

文章和随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却断送了爱德华·朗的政治前途。在 1965 年的选举中，他未能连任。

在六十年代中期，科尼利厄斯·加拉格尔被认为是民主党中最聪明、最好的年轻人之一。在朝鲜战争中，他曾经是战斗英雄。1958 年以来，他就进入国会。40 岁出头，他满头银发，不久便成为军备控制署顾问和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他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很好，1964 年曾经被认为可能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

像参议员爱德华·朗一样，加拉格尔也担心数以千计的人的隐私遭到侵犯。他对数据库、测谎器、遗传工程和儿童心理测验等感到关切。谁能看到这些情报呢？公民有什么保障呢？

这位国会议员担心的结果是，1963 年建立了隐私小组委员会，它是从众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派生出来的。

加拉格尔第一次跟埃德加发生冲突，是因为他拒绝做调查局要他做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他意想不到地受到埃德加的亲信罗伊·科恩的压力。

科恩自称是代表埃德加说话的，他要求这位国会议员举行关于联邦调查局进行非法监听的听证会，其目的是使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处于尴尬境地，因为安装窃听器是他批准的。

加拉格尔拒绝举行这样的听证会，说这不属于他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科恩马上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他说，“胡佛先生给你很大的面子。如果你够朋友，那么，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你不够朋友，不肯合作，那就是敌人。”

几个月以后，有人要他在一封非出自他的手笔的信上签字。他说，“有一封打印好了的信等着我签字，其中说我要求司法部长给我的委员会提供关于批准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的文件的复印件。关于这次窃听，我是知道的，因为约翰·鲁尼很乐于向我谈其中的性材料。但我并没有要求提供档案，也没有口授这样的信。我把我的秘书叫来，问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加拉格尔的秘书伊丽莎白·梅伊对这件事作了生动的回忆。她说，“罗伊·科恩通过电话向我口授了这封信。他说，他是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指示这样做的。我用打字机打出了这封信，把它放在加拉格尔的其他信件里。我想他一定知道这件事。当加拉格尔先生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时，我说他装疯卖傻。他立即给科恩打了电话。”

科恩再见到这位国会议员时，对他说，这封信又给了他一次合作的机会，要他签发。加拉格尔断然拒绝。科恩对他说，“你会后悔的。”这位国会议员全然不顾这个威胁，继续搞他的隐私听证。1967 年复活节，加拉格尔的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窃贼，他偷盗的只是文件。报警后，警察说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加拉格尔回忆说，“当时，我在贝尔电话局认识的一个人对我说，调查局在窃听我的电话。”

不过，真正严重的打击，是那年秋季《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它说，黑社会通过威胁和贿赂，取得警察和公职人员的帮助。它具体提到犯罪团伙的头目贝恩·齐卡雷利，说他“同受人尊敬的民主党议员加拉格尔的关系最好……”。文章说，这位议员与这个黑帮成员定期进行碰头会，有时于星期日在郊区的旅馆共进午餐。

加拉格尔坚决否认这种关系，并向《生活》杂志的负责人提出申诉，但毫无结果。当他考虑以诽谤罪提出诉讼时，律师告诫说，这样一来会产生更

大的轰动，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公职人员打诽谤罪的官司很少能赢。后来，1968年7月，《生活》杂志的三名记者在这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承认同齐卡雷利见过两次面，因为他在当地颇为有名，但否认有任何不正当的接触。

同一个月，加拉格尔的律师劳伦斯·韦斯曼要他乘飞机到纽瓦克航空港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他说，要研究的问题不能在电话上谈。在纽瓦克，韦斯曼解释说，他在罗伊·科恩的办公室度过半天的时间。在科恩的建议下，当他同调查局的卡撒·德洛赫通电话时，韦斯曼在分机上旁听。

德洛赫说，调查局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新泽西失踪的赌徒巴尼·奥布赖恩是在加拉格尔的家“躺在他妻子的身边”死于心脏病的。尸体已被同齐卡雷利有联系的一个黑帮成员卡约·科尼格斯伯格搬走。德洛赫暗示，他最近已同《生活》杂志进行了接触。他说，“最好告诉那家伙从国会辞职。这个消息抖出去，他的日子维持不了一周。”

这个消息在1968年8月8日见报。这是二十世纪新闻史上对一个公职人员进行的最粗暴的攻击之一。报上的大字标题是：“国会议员和恶棍”。加拉格尔被描写成一个“多次充当黑帮头子的工具、与之串通一气的人”。

《生活》杂志的报道在公众中引起长期的辩论。然而，使许多人吃惊的是，那年这位国会议员居然以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他继续为公民的隐私权而奋斗，鼓吹制定法律，限制联邦调查局的权力。

经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这位议员跟犯罪团伙并无牵连。《生活》杂志所说的在加拉格尔家发现的那具尸体纯属捏造，因为所谓提供消息的人卡约·科尼格斯伯格当时正在联邦犯人精神病中心，科尼格斯伯格后来说，《生活》杂志的报道是“虚构的”，调查局对他做工作，要他诬陷这位国会议员。

在这个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回忆说，1986年，当罗伊·科恩知道他病危时，曾对他说，加拉格尔的妻子仍然被所谓一个赌徒死在她怀里的传说所苦恼。于是，科恩签署了一封正式的信，说关于奥布赖恩的传说来自德洛赫。德洛赫说，“如果加拉格尔不停止关于隐私的听证会，他将公布这个情报。”

前司法部长拉姆塞，克拉克对加拉格尔和参议员爱德华·朗的处境深表关切。他说，把未经证实的情报向新闻界透露，是“不可原谅的”。他叹口气说，“这是调查局那个老人干的事：”

第二十章

大搞个人迷信

1959 年的一天，当联邦调查局总部放映室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人们看见埃德加在流泪。他刚刚看完好莱坞的电影《联邦调查局故事》的预映。他流出了愉快的热泪。他认为这部电影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它描绘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由一批模范的特工人员组成的单位。

同年，他在拨款委员会讲话时，列举了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鉴定处现在拥有 1.5 亿多个指纹档案，其中大部分是警察提供的，已经被鉴定过了。实验室进行了 16.5 万项科学检测，这个数字是空前的。联邦调查局的警官学院已经成立 23 周年，培养了许多执法官。调查局拥有 3500 名特工人员和 1 万名雇员，他们的破案率接近于完美无缺。主席鲁尼感谢这位“杰出的局长”，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让他过关了。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新一代特工人员也开始问一些问题。自 1924 年改组以来，组织机构再没有变动过。但现在实际上是有两个调查局。一个是干外勤的，它有一支勇敢的、勤奋工作的特工队伍，他们战斗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第一线。另一个是总部，埃德加喜欢把它叫作“政府所在地”，它的官僚机构日益膨胀，那里都是些成年累月坐办公室的人。许多能干的特工人员认为总部是随波逐流者和追求官位者聚集的地方，是产生文牍主义和愚蠢命令的源泉。

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的官员彼得·怀特同埃德加和两位助理局长会见以后颇为震惊他说，这些助理们“外表上很强硬，资格也很老，然而在局长面前却胆小如鼠”。

在联邦调查局，人们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的。代理助理局长霍华德·弗莱彻由于想改变不合理的工资制度而受到惩罚，再也没有被提拔的希望。纽约办事处的助理主任伯纳德·布朗由于未经允许擅自向记者发表谈话而被贬职，派到偏远地区。

至于局长大人，他当然是永远正确的。一位教官对一批新来的工作人员说，“小伙子们，埃德加·胡佛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舞力量。人们说得好：‘他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道路。’”对新人的讲课稿事先要经过埃德加和他的助理们的批准。

在训练结束时，新的特工人员的第一个考验是，他们要排成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一一同埃德加握手。他们在接待室等待时，都拚命地在自己的裤子上擦手。如果用潮湿的手跟局长握手自己的职业就断送了。如果脸上有脓疤或者秃顶，也干不了这行。

有一次，一批新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埃德加把教官叫回来说，“其中一人的头太小了，不要他！”教官不敢问究是指的哪一个人，他偷偷地测量了所有学员的帽子，发现有三个人头太小，于是，把他们全都解雇了。

前特工人员杰克·肖说，“在我们班上，有一个来自堪萨斯的小伙子，名叫勒鲁瓦。他以前当过教师，声音尖细，不符合调查局的标准，因为调查局要求的是：个子高高的，雄壮魁梧，白皮肤，蓝眼睛，声音浑厚。教官们帮助他降低嗓音，恢复男子气概。他在其他各方面都是没挑儿的。但是进行最后测验时，助理局长看着他问，‘你一向是扇风耳吗？’勒鲁瓦的耳朵特

别大，下垂着。他们对他说，他的耳朵不合标准。当天他就离开了。”

五十年代，总部听说旧金山一个特工人员退休时举行的晚会上有一个人表演了裸体舞蹈。埃德加命令参加晚会的 200 人每人都写一份报告。结果人人都说表演这个节目时他们正在男厕所解手。这一次，由于人数太多，埃德加总算是息怒了。

在六十年代，有一个名叫托马斯·卡特的办事员被讯问，因为一封匿名信说他同一个小年轻女人睡觉。卡特承认同一个小女人过夜，她是他的未婚妻，而且他并没有脱衣服。接着询问了同房间的一个人，问他是否听到床上有什么响声。他说没有听到。然而埃德加还是把卡特解雇了。卡特告到法院，说这种解雇是不公平的。法院判他胜诉。

人们之所以容忍这类无理的对待，是因为特工人员的职业有很大优越性。它的待遇优越，工作性质有时很激动人心，工作 20 年就可以退休，养老金可观，有了调查局的背景可以找第二职业。

然而有些规章制度似乎变得越来越荒谬。例如，外勤特工人员每年必须在外活动一定的时数，即使无事可干，也必须这样做。当总部的视察组来时，尤其要这样做。一位官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看过了所有的电影，那么，可以去图书馆或别的什么地方。……主要的是，要离开办公室。”

纳尔逊·吉本斯从 1954 年到 1962 年在调查局工作。他的厚厚的档案中，不乏遭罪的事例。吉本斯来调查局工作以前，战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又在警察局干过一阵子。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曾受过 6 次表扬，多年来从未受到批评。他由于揭露一个苏联间谍而受到埃德加的称赞。他 33 岁时，成为内勤特工人员，在总部有自己的一间小办公室。

他的麻烦是从 1958 年开始的，当时埃德加 63 岁，过份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然而，从他就诊的医生之多看来，他得了多疑症。同年，埃德加读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说明书，上面列举了以身高为比例的理想体重。根据这个标准，他的体重太重了，于是他根据科学食谱，改变饮食习惯，把体重从 203 磅降到 170 磅。

埃德加是如何注意健康的，特工人员也必须照办。特工头头被要求监督调查局每一个人的体重。适当地提醒大家注意健康，本是好事。但如果作为一种铁的纪律，强制推行，则成为一场灾难。

吉本斯肯定属于肥胖型，他身高近 6 英尺，体重超过 190 磅。当埃德加开始进行体检时，他的体重为 195 磅。检查者建议他减肥 7 磅。虽然医生认为，根据他的身高，他的体重是可以的，但他还是遵照上级的指示办。他的体重果然减少了 7 磅，但是，过后不久，体重又回升，超过 190 磅。这在总部可是不行的。

1960 年，他由于体重不合标准，没有升级。他不服气，他说他喜欢自己保持 190 磅的体重，并要求见见埃德加。埃德加拒绝见他，命令把他调到底特律，每 30 天称一次体重。

不久，他又被调到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两个月后调到俄克拉荷马城。在那里，他两次受到批评，并且停发工资。尽管受到这些折磨，他声称他要继续为“世界上这个最好的组织”工作。

埃德加不依不饶，继续谴责吉本斯不是一个“协同配合的工作人员”，把他调来调去，小的处罚不断。后来竟然毫无道理地问他来调查局以前在海军陆战队是否酗酒，他终于忍无可忍，离职了。他给埃德加打电报说，他“精

神有病，无法继续工作”。

虽然吉本斯从来没有精神病，但调查局还是请精神病医生给他诊断为“妄想狂症”。他领的是失去工作能力退休金。埃德加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一个胜利。他在最后的备忘录上写道，“总算搞掉了一个讨厌的家伙。”

吉本斯算是幸运的。在纽约，特工人员乔治·布卢为了达到埃德加规定的体重标准突击减肥，结果死在写字台上。

10年以后，杰克·肖和他的妻子梅伊的经历又是一场噩梦。杰克毕业于法学院，在海军陆战队当过上尉，自1963年到调查局以来，他的工作一直是出色的。当他37岁、已有4个都不到10岁的子女时，他到纽约的约翰·杰伊刑法学院硕士学位班进修。他希望在那里取得学位后，到调查局的警官学院当教官。

当他的社会学教授对调查局提出严厉批评时，他挺身而出辩护。但他后来决定对这个机构的优缺点作一个详细的评价。他写道，调查局幻缺点是，它已经变得僵化了。他说，“我们不仅固守传统，而且每一根神经都渗透着传统。它围绕着一个主要人物，围绕着埃德加·胡佛的生活和功绩转。”

虽然这并不是革命的材料，但杰克很害怕，他给他的教授写道，“我确信，我所说的一切，你将为完全保密。我写的东西只是学术上的探讨而已，然而在调查局看来，这将是异端邪说。我希望不要成为本年的殉难者。”

由于他自己没有保密，他受到了折磨。他犯了个错误，把信的草稿交给调查局的一个受到信任的秘书去打印。这个秘书又给了一个同事看。很快，杰克就被助理局长马隆叫去讯问。

杰克回忆说，“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我要倒霉了。讯问从下午4点钟一直持续到9点钟。我对马隆说，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行动，没有造成危害。我的批评信也没有邮寄给我的教授。”

然而，不论怎么讲道理，也无法挽回杰克和调查局之间的关系了。他“由于进行批评和可能不服从调查局”而暂时停职，被要求交出徽章和手枪，回家去。对他的处罚是：无薪停职一个月，六个月察看期，然后调往外地；罪名是：没有报告他的教授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

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官员给约翰·杰伊学院的院长唐纳德·里德尔打电话说，如果杰克的那位教授继续留在学校，调查局的所有学员都将离开该校。那位教授没有调走，所以调查局的人全部撤回。

杰克在家里为他的前途和生病的妻子发愁。妻子重病在身，他到外地赴任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提出辞呈。埃德加接受了他的辞呈，在上面批了“犯有错误”几个字，这个批语实际上使杰克无法在其他联邦机构或大的公司找到工作。一个卓有成绩的特工人员由于一封谁也没有读过、尚未寄发的私人信件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杰克辞职的几个内，她的妻子被确诊为晚期癌症。起初，她在医院时，丈夫在调查局的同事还来看看。有两位特工人员主动表示愿意给她献血，但后来又撤回了，因为他们被告知，不要同杰克发生关系，因为他同“调查局的敌人”保持接触。

当杰克在医院陪他的病危妻子时，调查局甚至找借口对他进行侦察。另一个特工人员的妻子是护士，她穿着两个不同医院的工作服，假装表示同情，同杰克攀谈。后来，杰克看他的调查局档案时，发现了关于这些谈话的详细报告。这个护士由于“打入杰克的内心世界”而受到她大夫的上级的表扬。

杰克在妻子死后，就他的问题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申诉。老资格参议员们在国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位前特工人员的案子轰动一时。结果是，联邦调查局付出现金赔偿，从杰克的档案中去掉“犯有错误”的字样。杰克现在是移民归化局负责调查事务的助理专员。

埃德加写下“犯有错误”的批语，实际上是封死了人家就业的大门，而且也完全知道杰克的妻子正患重病。他说，杰克和其他发牢骚的人都是“刺儿头”。埃德加从来不认为他有错误。

在联邦调查局，弥漫着个人迷信的气氛，超过美国的任何其他政府部门。当埃德加和克莱德外出时，人们狂热地为他们开道。加油站的卫生间事先经过检查，以备局长使用。如果埃德加的高级轿车的发动机出了毛病，特工人员赶忙开动警车，截住班机，到全国各地买回有关零件。埃德加到了饭店的套间，特工人员迅速撤走已经部分饮用过的饮料瓶，换上新的。

全国各地的特工人员都学会了定期给他们的上司写信，祝贺他的生日、任职周年纪念日等等。沙利文说，“他喜欢这样的信件。怎么夸奖他，都不会过份，如，说他为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托尔森有一句标准的话经常使用：‘局长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载入史册。’”

1958年，特工人员阿瑟·默塔格就调查局的人事政策给埃德加写了一封致敬信，照例通过他的头头罗伊·穆尔邮寄出去。性格温和、经历丰富的穆尔说的一番话使他大为吃惊。

穆尔说，“阿瑟，这封信，我不能寄……你不懂得调查局的政治斗争……你应当明白，你是在为一个疯子工作……我们的任务是了解他需要什么，创造一个他相信的世界，告诉他现在事情进展的情况……”

这些话应当是20年以后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的。在五十年代末期，虽然许多人认为埃德加已经失去心理平衡，但很少有人敢于公然这么说。

在埃德加死去4年以后，司法部对调查局滥用资金的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埃德加贪污腐化。这是从小事情开始的。据官员们说，及时的礼品可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这也许是一个特工人员怀里抱着一块生日蛋糕，从迈阿密送到华盛顿。也许是总部的人经常送来一束鲜花。卡撒·德洛赫说，“他喜欢美丽的花朵。我自己或者我们一批人常送他杜鹃花，这是他最爱的花。”

官越大，送的东西越贵重。沙利文说，“我们常买些很贵的东西送他。例如，我听说他需要一个废物捣碎机，我们大家掏腰包给他买了一个。”

埃德加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用公家的钱买的。司法部关于他在岩溪公园的寓所的报告透露这方面的情况：

“每年，当胡佛去加利福尼亚休假时，他的寓所里里外外要大修一番，油漆一新。展览处在他寓所的前面设计、建造了一个门廊，修了一个带灯光和氧气泵的养鱼池。公家给他提供了书架、电话机架和其他家具，还为他制作了一个东方工艺品式的水果盘……家用电器、空调、立体声音响设备、录音机、电视机、电话等都由无线电工程处的职工负责维修……整个房间和场地的维修工作，全部由职工负责，昼夜随叫随到。”

调查局的职工还负责维修埃德加的草坪剪草机、扫雪机，每年给他换两次草皮，种植灌木丛，修红木篱笆，铺石板路。吃早点时，埃德加嫌熏猪肉有味，调查局赶忙给他安装上强有力的电扇。他抱怨电视机出图像太慢，调查局的技术人员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灯泡坏了，都由调查局来换。

负责进行调查的检察官约翰·多德说，“当你了解整个情况时，你会觉

得很荒谬。然而这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没有自己掏腰包的时候，一切都是公家出钱。”

联邦调查局的娱乐基金并没有用在促进职工的体育活动上，图书基金也没有买一本书。这些基金都用于埃德加个人的公关活动上。他死后不久，他的助理就把记录销毁了。

如果埃德加和克莱德还活着，他们将被起诉，被革职查办。司法部检查官多德的调查报告表明，这两人犯有好几项联邦罪，其中包括私用公家财产和收取下级的礼品。埃德加滥用职权的程度足以使他蹲 10 年监狱。

多德说，“我调查贪污腐化多年，其严重程度以此为最。”

然而，埃德加还有更大的读职情节呢。他由于不可告人的理由，没有去打击黑手党。

第二十一章

同黑社会的关系

1990年有人问老牌黑手党的最后一个头目卡迈因·隆巴多齐，他们对埃德加·胡佛采取什么态度。他回答说，“埃德加·胡佛掌握在我们的手心。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他。”

美国黑手党兴起之日，恰好是埃德加的生涯开始之时。当埃德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意大利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黑手党的细菌。他们拉帮结派，互相争斗，也同当局对峙，并开始用暴力敲诈勒索。

埃德加长大后，这些匪徒仍然分散在各地。他1924年春天当了联邦调查局局长。那时，由于推行禁酒法，有20万家非法酒店开业。这些酒店迎合群众的需要，很少有人把它们同恶棍联系起来。然而正是在酗酒、卖淫、高利贷和敲诈勒索的基础上形成了黑手党的帝国。

乘机大发横财的卢西阿诺、科斯特洛、卡彭、西格尔、托里奥、舒尔茨、兹威尔曼同禁酒时期的非法大酒商罗森斯蒂尔等勾结在一起。当酿酒业再度成为合法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其中至少有两人同埃德加勾搭在一起。1930年左右，美国犯罪团伙的头头们举行第一次高级会议以后，建立了正式的联盟，商定把美国划分成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埃德加的飞黄腾达跟这个黑社会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重要阶段。他的初期表现是不错的。二十年代初，调查局在俄亥俄州贯彻执行禁酒法，是卖力的。正是埃德加的特工人员于1929年第一次以藐视法庭罪逮捕了卡彭，后来国内税收局又把他关进监狱。

三十年代，埃德加集中力量打击像迪林杰这样的绑架匪徒，但他仍认真注视着黑手党。他建立了恶棍监视网，要求调查局的各地办事处搜集当地犯罪头目的情报。他发起了全国性的打击“有组织的商业犯罪分子”的运动。

1935年，当时的纽约特别检查官托马斯·杜威咄咄逼人，埃德加不甘心落于人后，宣布舒尔茨是“第一号公敌”。不久，他就发动了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讨伐。1936年初，他说，“敲诈勒索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最终会破坏美国工商界的安全，使人民丧失对美国制度的信心。”

1937年，当巴尔的摩人正在普雷克奈斯舞厅通宵狂欢的时候，埃德加率领几十名特工人员对该市的妓女进行了围剿。有一个人拒捕，被克莱德一拳打倒。他从此获得了“拳击家”的外号。他们搜查的妓院是意大利匪徒经营的。据组织这次行动的一个特工人员的笔记说，埃德加“感兴趣的是大敲诈勒索者及其肮脏的钱的流向，这些钱从妓院流向敲诈勒索者手中，又从他们那里流到他们的保护者——警察和小政客口袋，最终流入州政治机构的金库”。

埃德加继续采取行动。8月份，在对3个州进行突袭以后，埃德加决定告诉新闻界，在那些由于开妓院而被捕的人中，有一人是为“幸运儿”卢西阿诺工作的。

埃德加抓住了事情的核心。专家们一致认为，卢西阿诺是美国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之父。他同迈耶·兰斯基一起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组织。1929年在大西洋城举行的黑社会代表大会上，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后来发生的团伙之间的交战中，他取得了胜利。1936年，杜威对他提出起诉，把他关进监狱，

但他仍有很大势力。逍遥法外的兰斯基、科斯特洛等人继续控制着犯罪分子的帝国。埃德加把打击的矛头瞄准卢西阿诺的网络，就直接威胁到黑手党的心脏。

不料，埃德加的态度突然改变。从三十年代末期开始，联邦调查局对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斗争变得有名无实，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到了1938年，埃德加的口气不一样了，竟然说美国犯罪分子“并不是来自外国，而是植根于美国，有着一个高度爱国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罪组织大为兴旺。纽约的黑社会领导人获得官方的批准，帮助防范纳粹破坏分子，从而为卢西阿诺的获释和被驱逐出境铺平道路。战后，科斯特洛、兰斯基和犯罪帝国猖獗一时，失去控制，而埃德加则视而不见，袖手不管。

有时，他似乎是有意识地阻挠对黑社会的斗争，在詹姆斯·拉根事件上就是如此。拉根是赛马通讯社的老板，这个通讯社的报道面涉火半个国家的赌事。谁掌握了该通讯社，谁就可以左右赌博业务。1946年，黑手党想要插手。拉根加以抵制，并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调查局。然而埃德加拒绝给以保护，结果，拉根被黑手党杀死了。

调查局关于芝加哥黑社会的主要专家威廉·罗默说，“拉根事件是研究埃德加·胡佛和犯罪组织的极重要线索。当拉根开始谈他的问题时，调查局第一次对芝加哥的犯罪组织展开了真正的斗争。但是，拉根被杀以后，胡佛就停止了这方面的调查。”

尼尔·韦尔奇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他回忆说，“我在波士顿工作时，我经常调查州际盗窃案。整卡车的盗窃物资，全是黑手党和卡车司机工会干的事。我们很失望。我们只是企图解决鞋、鸡等单项盗窃问题，这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整个事情是由犯罪组织控制的。但从来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这是不可原谅的。对胡佛干的事，谁能负责呢？只好置之不理。”

1951年，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看了犯罪头目们在参议院调查州际商业犯罪特别委员会（今天被人们叫作凯弗维尔委员会）作证的情况。在听取了800个证人的证词后，它得出结论说，的确“有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全国性犯罪组织”，“弗兰克·科斯特洛和迈那·兰斯基等人从中央进行领导和控制”。

埃德加在委员会讲话，祝贺它的成员揭露了“犯罪分子和官府之间的肮脏勾结”，并向参议员们致敬。然而，在幕后，则是另一种态度。

参议员凯弗维尔向杰克·安德森（当时是一个年轻的记者）透露，埃德加曾竭力阻挠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凯弗维尔回忆说，“他对我说，联邦调查局反对建立这个委员会。他们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斯科特·卢卡斯一起进行阻挠。埃德加知道，如果公众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感到不安的话，这个工作将由联邦调查局来做。而他是不想承担这个任务的。”

凯弗维尔的助理顾问约瑟夫·内利斯在1990年回想起埃德加对待这个委员会的态度时仍然十分气愤。“我们跟他一起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对纽约的黑手党一无所知。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他说，我们所了解的关于黑手党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但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话。我们力求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但是，我们一无所获。胡佛对参议员是客气的，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控制着他的钱袋。而他则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

调查局关于凯弗维尔的档案表明，埃德加收集了诽谤这位参议员的材料。他不让特工人员同其他执法人员一起参加凯弗维尔的会议，并且拒绝保护委员会的证人的安全，甚至在两个证人被害以后，仍不肯保护他们。

埃德加对这个委员会说，对付有组织的犯罪是地方警察的事，不属于调查局的职权范围。当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全国犯罪问题委员会时，埃德加百般阻挠它的建立。

前特工人员威廉·特纳说，“在总部，没有一个研究犯罪组织的单位。我们搞到的关于犯罪团伙头目的材料被放到一般情报档案里，不久便被遗忘。”

尼尔·韦尔奇认为，埃德加的态度是一个谜。他说，“胡佛及其高级官员都知道黑手党的存在。他的态度完全违背实际情况，是个谜，只能胡乱猜测一气。”

要了解埃德加的所作所为，还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中期。当美国黑手党形成气候的时候，埃德加已经名闻全国。在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的怂恿下，他经常到纽约度周末，参加那里的社交活动，难免接近犯罪组织。

这样的危险首先从温切尔开始。任何一个有深度的犯罪问题，记者都亲自结交犯罪分子，但温切尔不知如何划清界线。这位记者同奥尼·马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马登外号叫“杀手”，是迈那·兰斯基的副手。当《先驱论坛报》屡次提到他过去杀过人的历史时，他进行了干预，赠送该报一辆汽车，作为酬谢。

温切尔跟兰斯基的关系更是称兄道弟，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经常同他一起吃饭。他在写关于黑社会的敏感文章之前，甚至征得兰斯基的同意。他对弗兰克·科斯特洛更为了解。两人在中央公园西区 115 号同住一个公寓，经常在那里见面。五十年代，当凯弗维尔委员会瞄准科斯特洛时，温切尔写文章，说他是好人，被人误解了。

埃德加和克莱德跟温切尔一道经常光顾的“白鹤”俱乐部实际上控制在黑社会手里。它的名义上的主人是谢尔曼·比林斯利，他以前曾非法制售酒，有过前科，但埃德加把他称为“非常好的朋友”。而这个俱乐部的真正老板则可能是科斯特洛。

在埃德加经常度假的佛罗里达，情况也是这样。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他在迈阿密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乔氏石蟹俱乐部，而卡彭、科斯特洛和兰斯基也常去那里。这个饭店的老板杰西·韦布说，他同黑社会的头目关系很好，而同埃德加也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埃德加还保护了赌场老板德尔·韦布。司法部的法官威廉·亨德利说，“胡佛给韦布开了绿灯，他是韦布的好朋友。他没有在韦布的地方安装窃听器。调查局的人和黑社会的安全人员证实，韦布拥有的机构从未被调查过。”

韦布深深卷入有组织的犯罪达三十年之久，他通过一系列外围组织和中间人进行掩护。通过代理人，他参与了兰斯基等犯罪分子的勾当。据拉斯维加斯的前特工头头说，当埃德加来拉斯维加斯时，他免费住在韦布的饭店里。像埃德加一样，韦布也是默奇森在加利福尼亚的德尔查罗饭店的常客。

五十年代中期，默奇森的两个儿子进一步卷入了黑社会，这个家族的财产同黑手党的钱纠缠在一起。从 1955 年至 1965 年，国会的两个委员会和九个联邦机构多次对默奇森家族进行调查。

据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在五十年代初期，默奇森石油公司的 20% 股

权掌握在维托·吉诺维斯犯罪家族的手中。默奇森拥有的汉德里奇石油设备公司也同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勾勾搭搭。在埃德加的建议下，默奇森家族雇佣了他以前的一个行政助理托马斯·韦布，后者插手于默奇森的一项肉类交易。

五十年代末，在对芝加哥的默里·汉弗莱斯进行监听时，特工人员吃惊地听到他提到埃德加的名字。汉弗莱斯是“联系小组”的头头，这个犯罪集团负责拉拢腐化公职人员。他显然知道埃德加同默奇森的友好关系，并对此津津乐道。

博比·贝克在1990年回忆道，“默奇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埃德加。富人总是愿意在大官身上花钱，因为他们寻求保护。胡佛就是法律的化身，同他打成一片，对富人是有好处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默奇森故意让人人知道胡佛是他的朋友。如果这个执法的头头是你的好友，你就可以放手干违法的事情了。”

埃德加和克莱德不论到哪里，都陶醉于赛马。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马里兰、西弗吉尼亚、纽约等州的赛马场，人们都熟悉埃德加的面孔。那里有埃德加和克莱德的专用包厢和桌子。有些赛马甚至以埃德加的名字命名。

观看赛马和下赌成了埃德加的嗜好。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特工人员，他的头发白的很快，原来他必须在交通高峰时把局长送到赛马场。埃德加还派人到国会图书馆收集赛马的资料。他下令，星期六他看赛马时，不准打扰他；有一回，约翰逊总统要他回来参加内阁会议，他都置之不理。

埃德加的所作所为，好像他不知道赛马赌博是犯罪组织的重要财源似的。据加利福尼亚的警察说，埃德加经常利用跟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登记赌注。

有人说，赛马行业被黑社会所掌握，埃德加对此淡然置之。他说，“联邦调查局有比逮捕赌博业者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跟美国的一个最著名赌博头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个头头以“黑社会总理”而闻名。

第二十二章

埃德加的丑闻被黑社会掌握

埃德加跟黑社会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关系已经保持多年了。他们是在街头偶然相识的。

埃德加在同一位老资格记者诺马·艾布拉姆斯私下交谈时谈了当时的情况。艾布拉姆斯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989年她逝世以前才讲出来。

她说，“胡佛是一个喜欢溜达着观看橱窗的人。他对我说，三十年代的一个早上，他正在第五大街闲逛，有人在他的身后走过来说，‘早上好，胡佛先生。’他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科斯特洛说，‘我不想难为你。’胡佛说，‘你不会难为我的。我们并没有搜捕你。’他们一直沿着第五街至第七街边走边谈。幸而当时没有摄影记者。”

他们后来又进行了接触。埃德加曾对佛罗里达的一个饭店老板迪萨诺（他也认得科斯特洛）说，“他和科斯特洛曾经都在沃尔多夫饭店住过。科斯特洛要他去他的房间坐坐。胡佛说可以见见他，但不是在他的房间，而是在楼下。”

科斯特洛在培养同埃德加的感情。有一次他们甚至冒险地在“白鹳”俱乐部坐在一起。埃德加还主动请他喝咖啡，两人称兄道弟，非常热乎。

1939年，埃德加抓获敲诈勒索者路易斯·莱普克·布查尔特，得力于科斯特洛的帮助。8月24日午夜以前，埃德加叫来记者，宣布轰动的新闻。他亲自在纽约街头接受了莱普克的投降。埃德加戴着墨镜，在他的高级轿车里等待着美国最危险的罪犯之一。埃德加说，调查局通过自己的关系促成了这次投降，他的朋友温切尔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埃德加享受着胜利的荣耀。而纽约当局和区检查官社威则大为恼火，说他背着他们采取行动。

埃德加得感谢黑社会的帮忙。“幸运儿”卢西阿诺从监狱给科斯特洛和兰斯基下令，为了减轻执法机关对黑社会的压力，必须使莱普克投降。还说如果这个歹徒向埃德加投降，他将得到宽大处理。这是假话，因为他最后还是被坐电椅处死。在此期间，科斯特洛秘密会见埃德加，作出了安排。

卢西阿诺回忆说，这件事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减轻了执法机关对他们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让埃德加和社威各自分得了“一份蛋糕”。牺牲莱普克，是一件干得很漂亮的事。

司法部的法官威廉·亨德利了解了科斯特洛是如何对付埃德加的。那是1961年，亨德利在他的朋友的公寓里作客，这位朋友是黑社会头目的律师。亨德利回忆说，“早上8点钟，有人敲门。进来的人戴着大帽子，嗓音很粗，原来是弗兰克·科斯特洛。我们正在吃早饭。科斯特洛说他认得胡佛，一起吃过饭。他说‘胡佛绝对不会知道，我给他安排了多少次赛马的赌注。’他警惕地望望四周。我估计他不会说更多的东西了。”

科斯特洛在黑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控制赛马和赌博。谁不跟他合作，谁就要倒霉。科斯特洛把赛马和赌注的秘密信息告诉埃德加。他们有时在沃尔多夫饭店的理发馆接头。

科斯特洛的主要生意是赌博业，而赌博不属于联邦罪。所以，科斯特洛一直安然。但埃德加对他的放任态度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代初，当局一度想把科斯特洛流放到意大利，但他并没有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压力。有一次，

埃德加还亲自出马保护他。

科斯特洛寓所的看门人说，有一天，调查局两个特工人员在附近转悠。科斯特洛打电话告诉埃德加。埃德加调查以后对他说，这两个特工人员并没有接到这样做的命令，而是他们自己主动干的。他表示歉意，第二天就把他们调往阿拉斯加去了。

科斯特洛和兰斯基认为，黑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腐化政府官员、警察和法官。兰斯基精干此道，所以他成为犯罪组织的全国性教父。

另一个黑手党头目约瑟夫·博南诺说，黑社会有一条严格的规则，绝不要对一个执法官员采取暴力手段，“应当设法使他不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他。”据几个黑社会的人士说，黑社会对付埃德加的办法，就是抓他搞同性恋的这个辫子。

黑社会的头头们有办法在重要的时间、地点窥探埃德加的见不得人的秘密。1936年元旦前夕，他们看见埃德加和克莱德在“白鹤”俱乐部吃饭以后两人手拉着手。这个俱乐部在厕所安装了反射镜，在名人使用的桌子下面安置了窃听器。

兰斯基的助理普洛克在1990年说，埃德加搞同性恋，是无人不晓的。他本人亲眼看见过。他说，“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我经常看见他同自己的男情人克莱德一起看赛马。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包厢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很清楚。……他们鬼鬼祟祟，干见不得人的事。”

许多黑手党人都抓到了埃德加搞同性恋的证据。迈耶·兰斯基掌握了埃德加搞同性恋和行贿受贿等许多短处，所以他不怕调查局。

像科斯特洛一样，兰斯基似乎是碰不得的。这种现象甚至在调查局内也引起人们的怀疑。1966年，一个年轻的特工人员被派去监视兰斯基，他认真地干起来，并发展了一些告密者，结果他很快被调到佐治亚州的农村地区。接替他的的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明白底细。他退休以后，到原先兰斯基拥有的一个赌场找了一份差事。兰斯基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983年病逝为止。

掌握埃德加丑闻照片的，并不光是兰斯基一人。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军官约翰·韦策五十年代在一次宴会上回忆了一个插曲。他说，“谈到埃德加的情况时，我们的主人到另一个房间，取回一张照片。那是远距离拍摄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男人正在搞同性恋，他们是埃德加和克莱德。”

韦策暗示，宴会的主人同情报机关有联系。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电子专家戈登·诺维尔说，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头头詹姆斯·安格尔顿给他看过同样的照片。

诺维尔说，安格尔顿是在1967年给他看这样的照片的。当时诺维尔卷入了同调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有关的事件中。他说，“胡佛要我放弃此事，而约翰逊总统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则要我继续进行。我被告知，如果我搞下去，会引起胡佛的忿怒。但是，安格尔顿说，胡佛不是没有弱点的，中央情报局有办法使他屈膝。我有这样的印象：利用性照片，这并不是第一次。安格尔顿要我去告诉胡佛，我看到了这样的性照片。我到‘五月花’饭店，向埃德加谈及此事。埃德加同克莱德坐在房间里，当我说，安格尔顿派我来，我已经看到性照片时，正在吃东西的克莱德几乎被噎住。胡佛大怒，对我说，‘滚出去！’我就出来了。”

诺维尔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安格尔顿对我说，这些照片是在1946

年拍摄的，当时他们正在争夺国外情报的控制权，胡佛想要弄到手，但未能如愿。”

1941年，埃德加跟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闹别扭，曾经搜集包括性淫乱在内的有损名誉的材料，以便用来对付他的对手。但他什么也没有搞到。杜诺万以牙还牙，秘密调查了埃德加同克莱德的关系。战略情报局掌握的性照片可能就是这种调查的结果之间样值得注意的是，丑闻照片既掌握在战略情报局手里，也掌握在迈那·兰斯基手里。战略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黑手党有广泛的接触，利用犯罪分子来帮助雇佣盗窃者和暗杀者，试验新药，保卫美国港口不受纳粹分子侵袭和入侵西西里岛。兰斯基亲自协助完成了后面两个行动。

兰斯基有一次还同美国情报官员一起搜集了用来讹诈著名的公职人员的材料。1942年，他组织了对布鲁克林鸡好男妓院的监视，那里被怀疑成了德国特务的目标。兰斯基回忆说，“嫖客来自纽约和华盛顿，其中有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如果掌握了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讹诈……从墙眼里或反光镜里拍下他们的照片，然后对他们进行恫吓，要钱，要情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兰斯基由于同战略情报局有联系而搞到了性照片。埃德加本来想搞关于杜诺万的丑闻材料，但没有搞到；而杜诺万却搞到了关于埃德加的丑闻材料。这些丑闻材料又被黑社会的头头所掌握，结果埃德加终生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第二十三章

性狂欢

1957 年 11 月，热心的乡村警察查明，的确有一个黑手党，这个庞大的全国性组织是由一些著名犯罪头目领导的。

纽约州阿帕拉钦的警官埃德加·克罗斯韦尔在进行一次例行调查时，偶尔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会。来自 15 个州的 63 名高级黑社会头目聚集在西西里的杀手乔·巴巴拉的宫殿般的寓所里，举行黑手党的年会。

尽管埃德加否认，但是，几个月事态的发展使任何读报的人都意识到犯罪组织的存在。纽约州黑社会内部的厮杀几个月来一直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消息：科斯特洛在其寓所的门廊里发生枪战，并受伤；弗兰克·斯卡利斯在布朗克斯被杀，他的弟弟失踪，传说也被枪杀；最轰动的是，科斯特洛的主要保护者阿纳斯塔西亚在喜来登饭店的理发室身中数弹而亡。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了。据前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说，埃德加是被迫勉强采取行动的。罗杰斯针对阿帕拉钦事件建立了一个打击犯罪组织特别行动组。埃德加进行种种阻挠。

特别行动组的芝加哥办事处是由理查德·奥格尔维领导的。他后来当了伊利诺斯州州长。他回忆说，“胡佛下令，调查局有关犯罪组织的情报档案对我们封闭。而且他禁止特工人员同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交谈。”

埃德加拒绝会见特别行动组的领导人米尔顿·韦塞尔，鄙称他为“老鼠”。调查局对韦塞尔进行侦察，还可能窃听他的电话。

不过，为了装作对犯罪组织感到关切，埃德加突然发现了一个老法令，即霍布斯法。根据此法，联邦调查局可以调查敲诈勒索者。在阿帕拉钦聚会两个星期后，调查局的特工头头突然奉命采取新的行动，即打击大恶棍计划（简称打恶计划）。

打恶计划要求各地的办事处各提出一份关于黑社会 10 名嫌疑分子的名单。这是很可笑的，因为黑社会的活动因地制宜，有的城市可能很难找到两个以上的黑社会成员，而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则有数十名之多。尽管如此，特工人员认真地干了起来。在华盛顿，当时担任研究分析处处长的沙利文则汇报犯罪组织的性质。埃德加似乎终于干实事了。

在以后的两年中，联邦调查局以空前的干劲搜集了犯罪组织的情报。正当特工人员开始取得真正进展的时候，埃德加却悄悄地使事情冷却下来。打击黑社会的运动先是缓慢下来，接着就实际上陷于停顿，原因不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科斯特洛的一个盟友刘易斯·索伦·罗森斯蒂尔对埃德加进行了新的讹诈。

1957 年罗森斯蒂尔已经 66 岁，他身材高大，戴一副茶色眼镜，大雪茄烟不离口，俨然是当代最大的富翁之一。他年轻时就从事酒业，因为他的叔叔有一个酿酒厂。禁酒时期，他囤积了大批威士忌酒，以便美国有朝一日重开酒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的申利公司已成为美国的主要酿酒厂，年利达 4900 万美元。五十年代末，他在曼哈顿已拥有一所豪华住宅，在康涅狄格州拥有 2000 英亩房地产，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座别墅和一艘游艇，还拥有一架私人专用飞机。

表面上，罗森斯蒂尔堂堂正正，是腰缠万贯的商业大亨和慈善家。多年

来，他先后给布兰代斯大学、圣母大学、纽约和佛罗里达的多家医院共捐款一亿美元。暗中，他则同美国黑社会的大头目互相勾结，并同埃德加有一种不正当的腐化关系。根据新的材料，他同埃德加一起参与了性狂欢，而此时正是联邦调查局受到压力、不得不对犯罪组织发起进攻之际。

罗森斯蒂尔同黑手党的终生勾结，只是在 1970 年才暴露出来。当时纽约州犯罪问题立法委员会查明，在禁酒时期，他同黑社会的人组成一个集团，偷运偷售酒类。禁酒时期结束后，罗森斯蒂尔参加了科斯特洛掩护的一次商业会议。一位证人说，“科斯特洛在那里，就给人们一个信息：罗森斯蒂尔是他们的人。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要帮助解决。这样，一个有头脑的犹太人和一个有实力的意大利人就勾结在一起了。”

这个委员会的许多情报是由罗森斯蒂尔的第四个妻子苏珊提供的。52 岁的苏珊已经跟罗森斯蒂尔打了 10 年的离婚官司，在此期间，他花了 50 万美元编造假证据。她非常生气。犯罪问题委员会主席约翰·休斯完全相信她的证词。

苏珊在委员会的作证大部分是秘密进行的，至今仍然保密。20 年以后，有人在她的法国寓所访问她时，她对往事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使纽约的调查人员惊讶不已。她说，同罗森斯蒂尔生活在一起，无异于同犯罪组织的司令部生活在一起。

她第一次同这个百万富翁的约会是在 1955 年在沃尔多夫饭店的宴会上，当时作陪的有兰斯基的助理乔·林赛。后来，她认识了黑社会的许多大小头头。在罗森斯蒂尔的生日庆祝会上，黑社会的头目们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法官们肩并肩地饮酒作乐。

1957 年是黑社会的危机时期。这一年，阿帕拉钦会议暴露了，黑社会的头头为争夺纽约地盘的控制权而交恶。在此期间，罗森斯蒂尔经常同弗兰克·科斯特洛进行接触。在科斯特洛短期蹲监狱时，罗森斯蒂尔还到狱中探望了他；他出狱后，罗森斯蒂尔在家中盛情款待了他。同年早些时候，访问古巴时，这位大富翁介绍他妻子认识了迈耶·兰斯基。她向纽约的犯罪问题委员会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她说，“我们到哈瓦那，住进了国民饭店……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套间，里面摆满了鲜花……我看到那里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欢迎最高司令官到哈瓦那。迈耶和杰克。’我问丈夫，迈耶和杰克是什么人。他说，‘就是迈耶和杰克·兰斯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罗森斯蒂尔夫妇那天晚上跟兰斯基共进晚餐。他们在哈瓦那的全部费用都是由兰斯基来付的。当兰斯基去纽约或佛罗里达时，这位富翁也回报以热情款待。

苏珊知道他丈夫同兰斯基搞交易。“他经常是搞秘密交易，因此，他不通过银行，而是用现金。兰斯基往往拿出很多钱。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他们给我丈夫巨额现金，成捆的美元现金。”

罗森斯蒂尔同埃德加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彼此很熟，常常一起吃饭。埃德加有时同罗森斯蒂尔一起坐他的私人专机。

苏珊认为，这两人自二十年代以来就相识了。1939 年，兰斯基曾利用罗森斯蒂尔作为中间人来策划莱普克向埃德加投降。到了四十年代，埃德加欣然接受了这位酒业大王的盛情款待。1946 年，埃德加和克莱德曾经是包括罗森斯蒂尔在内的大酒业公司举行的野外宴会上的座上客。两年以后，罗

森斯蒂尔进行斡旋，使埃德加和抨击他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言归于好。

罗森斯蒂尔精心培养同埃德加的感情。他曾经不声不响地买了 2.5 万册《欺骗大师》，散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六十年代，他给埃德加·胡佛基金会捐赠 100 多万美元。这个基金会的宗旨是“保护美利坚合众国的遗产和自由……维护埃德加·胡佛先生为之献身的思想和目标……以及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埃德加参与赛马赌博时，罗森斯蒂尔总是为他提供下赌注的钱。

他如此慷慨解囊，当然是为了换取埃德加的帮助，如帮助监狱的伙伴获释；当罗森斯蒂尔打官司时，能给法官做做工作；甚至在税收当局面前说说情。

苏珊是在 1957 年秋季认识埃德加的，当时他去她家。她回忆说，“这有点神秘，谁也不知道他要来。克莱德没有陪他，他是独自一人来的。

“我记得，他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样子。他个子不高，态度傲慢，自以为是。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命是从。大约半小时以后，他们示意我离开。我上楼去我的房间。”不久以后，给埃德加当了 23 年助理的尼科尔斯离开调查局到罗森斯蒂尔那里工作。

据苏珊说，几个月之内，埃德加便卷入了一个拉拢腐化国会的事件。这就是 1958 年通过的福兰德法案。广大公众对这个法案是不大了解的，但它对罗森斯蒂尔的生意却至关重要。申利公司 8 年以前由于估计错误，现在陷入困境。朝鲜战争爆发时，这位大富翁估计，敌对行动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从而造成酿酒的一些原料奇缺。根据这个设想，他的公司比平时多生产和囤积了数百万加仑的酒。他想，一旦市场缺酒，价格会暴涨，他就可以大发横财。

不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朝鲜战争于 1953 年结束，市场货源充足。罗森斯蒂尔囤积的酒找不到销路。1958 年，政府要对酒征收高税，每加仑 10.50 美元。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修改税法，这意味着必须对国会施加压力。

正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对国会施加影响的尼科尔斯来为罗森斯蒂尔工作。他立即给国会议员们打了许多电话，会见了许多人。他的游说成功了。国会通过了福兰德法案，对酒业公司再延长十几年免征高额税收。在这个期间内有足够的时间抛售掉囤积的酒。这个法案使申利公司可以少交 4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的税款，它囤积的酒一天之内就增值 3300 万美元。

苏珊说，在这个法案通过几个月前，她参加了他的丈夫、埃德加、尼科尔斯、科恩和索科斯基在纽约的一次会晤。“胡佛对他们说，这个法案将获得通过。他同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谈过话。他说，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值得的。”这位富翁的妻子说，尼科尔斯是秘密行贿的中间人。“他把钱送给议员们。申利公司的专机穿梭般地把现金运到华盛顿。”

罗森斯蒂尔夫人说，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接受了丈夫的钱。当时担任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接受了 50 万美元。当罗森斯蒂尔亲自把一笔巨款交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曼纽尔·塞勒时，她在场。她说，整个行贿行动，埃德加都是知道的，并且得到他的同意。

1958 年，正当福兰德法案处于最关键阶段的时候，罗森斯蒂尔两次到办公室访问了埃德加。

苏珊最轰动的揭露是，他的大夫和科恩使埃德加卷入了性狂欢，这样，就为犯罪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把柄。

苏珊以前的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同性恋者。然而，

现在她又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她今天的丈夫似乎对跟她性交不大感兴趣，倒是喜欢跟男人性交。

她回忆说，“有一天，我走进我丈夫的卧室，发现他跟科恩睡在一起。那时大概已是上午9点钟了。我大吃一惊。”

科恩不以为耻，反而在苏珊面前炫耀他的同性恋。他当着她面，公然亲吻一个年轻人。他津津有味地把她丈夫朋友的性淫乱告诉她。

1958年春天，罗森斯蒂尔问他的妻子，她在巴黎居住的时候，是否亲眼目睹过性狂欢。她说，“我的第一个丈夫是同性恋者，我同他一起生活了9年，对生活应当有所了解。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广场饭店。如果去，将会看到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我说，你们去，我就去。”

几天以后，罗森斯蒂尔带他的妻子去广场饭店。他们从侧门进去，乘电梯上到第二层。她的印象是，他丈夫似乎以前去过那里。她回忆说，“他敲敲门，科恩应声开了门，那是个宽敞豪华的套间，整个房间呈浅蓝色。胡佛已经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

罗森斯蒂尔夫人说，埃德加打扮得像个女人。“他穿着非常蓬松的黑礼服，衣裙呈荷叶形，穿着花边长袜和高跟鞋，戴着卷曲的黑假发。他的脸部经过美容，植了假睫毛。他坐在起居室，跷着二郎腿。科恩把他介绍给我时，称他为‘玛丽’。他对我说声‘晚安’，好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似的。他显然不是女人，因为脸上有刮胡子的痕迹。他是胡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联邦调查局局长竟打扮成女人模样。

“那里有个酒吧，我们去喝了点饮料，喝得不多。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科恩悄悄对我说，胡佛不知道我认出他来，因为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称他为胡佛先生。

“接着，来了两个男青年，白白的，满漂亮，大约十八九岁。科恩示意我们去卧室，那里很宽敞，床古色古香，床罩是蓝色的。他们走进卧室，胡佛脱去花边衣服和裤子，贴身有一根吊带。他躺在双人床上，两个男青年用手给他揉身上，其中一人戴着橡皮手套。

“过了一会儿，他们重新回到起居室。科恩弄来一些吃的东西，都是冷的，用不着服务员。

“接着，罗森斯蒂尔同这两个孩子发生性关系。胡佛和科恩在旁边观看。然后，科恩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些可怜的孩子！但是，胡佛只让他们玩弄他。我没有看见他参加鸡奸。罗森斯蒂尔让我也参加进来，我不干。”

后来，罗森斯蒂尔夫妇坐着他们的高级轿车回家了，房间里只留下科恩、埃德加和两个男青年。罗森斯蒂尔没有谈论埃德加参加那天晚上放荡的狂欢，但科恩却津津乐道。苏珊说，“他说，‘同玛丽·胡佛在一起，真有趣儿，是不是？’他说，他先到广场饭店，胡佛从侧门进来，不走前厅，以免被人注意。”

一年以后，罗森斯蒂尔要妻子再陪他去广场饭店一趟。她同意了。科恩把他们领进一个套间，发现埃德加又穿着女装，而且这次更加稀奇古怪。他穿一件红色上衣，脖子围着黑色羽毛围巾，好像一个不受传统拘束的女人。

苏珊回忆说，“大约半小时以后，像以前一样，来了两个男青年。这回，他们穿着皮衣服。胡佛拿着一本圣经。他要一个男孩子读圣经，另一个男孩子戴着手套。玩弄他。接着，胡佛夺过圣经，扔在地上，让第二个孩子也参加性动作。”

罗森斯蒂尔夫妇那天夜里回到家时，发生了争吵。他驳斥了妻子提出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要求她去广场饭店那个套间。

性放荡，特别是跟罗森斯蒂尔这样的人一起干这种事，对埃德加来说是很愚蠢的。有几个人对纽约的犯罪问题委员会说，罗森斯蒂尔给他在曼哈顿的寓所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安装了监听器，以便监视他的工作人员和来访的客人。埃德加同罗森斯蒂尔及其好友的交谈肯定是录了音的。这个富翁很可能把埃德加穿女装以及在广场饭店的性淫乱的场景录制了下来。

兰斯基说埃德加不再是一个威胁，已被掌握在他们手里，兰斯基是罗森斯蒂尔的一个好朋友，苏珊说他的丈夫曾经说，“由于有兰斯基这样一些人，我们随时可以使胡佛帮助我们。”他们手中的把柄就是埃德加搞同性恋的照片。

1958年7月，在第一次广场饭店性狂欢以后不久，埃德加要他的国内情报处提出一份关于犯罪组织的报告。这份长达两卷的报告仍然是保密的，它的结论是：

“中央研究处编写了关于黑手党的研究报告，请局长批准。这份研究报告包括下列各点：在美国的确存在黑手党。它是一个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特殊犯罪集团。黑手党主要是由意大利西西里人及其后裔组成的。”

这个结论当然是同埃德加的公开看法相反的，尽管他私下也承认黑手党的存在。当他听说这份报告已经发送给包括司法部长罗杰斯在内的其他高级执法官员时，他大发脾气。

埃德加下令把在几个小时内发送出去的报告全部追回来。调查局以外的人都没有看过这份报告，埃德加说它是“胡说八道”。

1959年，埃德加发表公开演说，希望“对恶棍和敲诈勒索者保持压力，使他们无处藏身”。9月份，在芝加哥，调查局在监听方面取得很大成功，听到萨姆·贾恩卡纳屡次提到“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一个统治全国犯罪组织的阴谋集团。它甚至逐一提到它的成员的名字。

特工人员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却未能使埃德加改变其立场。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并没有一个控制全国犯罪活动的全国性组织。

到1959年底，执行新的“打恶计划”的特工人员发现不对劲。到洛杉矶办事处视察工作的特工人员威廉·特纳认为，这个计划“名存实亡”。在芝加哥，专业人员从10人减少到5人。芝加哥的比尔·罗默回忆说，“胡佛先生似乎对这个工作失去了兴趣。有组织的犯罪问题不再是他的重点。”

在纽约，特工人员安东尼·维拉诺被告知，最近对黑手党采取的行动可能“只是暂时的行动，旨在应付一下各界提出的批评，一俟风头过去，也就随之停止”。在纽约，那一年有400名特工人员对付共产主义，而对付犯罪组织的特工人员仅有4人。

埃德加大事宣扬的对黑社会的进攻到头来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两年以后则要动真格的了。罗伯特·肯尼迪当司法部长以后，黑社会的头子们——以及埃德加——将面临真正的打击。

第二十四章

肯尼迪家族和埃德加

1955年10月，约瑟夫·肯尼迪从国外度假归来，发现美国处于动荡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患致命的心脏病，刚刚痊愈。许多人怀疑，他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1956年的竞选活动。艾德莱·史蒂文森会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吗？如果是这样，老肯尼迪的儿子、38岁的约翰将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吗？

肯尼迪的政治机器开始运转起来了。父亲未能得到的那块肥肉，如今出现在儿子的地平线上。然而，那年秋天，约瑟夫·肯尼迪却热心于另一种可能性——在12个月以后美国可能选举埃德加·胡佛为总统。他在家口授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埃德加：

我垂垂老矣，也许有点迂腐吧。然而我如今十分重视的两位担任公职的人碰巧都叫胡佛——一个是约翰·埃德加·胡佛，另一个是赫伯特·胡佛。我自豪地认为，你们两人都受到我的尊敬……我听说沃尔特·温切尔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对美国是再好不过了。不管你是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是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我相信你会得到所有人的最大支持。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将为你作出最大努力。我认为美国需要你。我希望它得到你。

我始终对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约瑟夫

埃德加可能竞选总统，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他在国会的老盟友对他恭维的姿态而已。埃德加把约瑟夫·肯尼迪的信放在镜框里，终生挂在他的办公室的墙上。这是他们互相吹捧的许多通信之一。

调查局关于老肯尼迪的档案，说他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67岁的老肯尼迪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势的人，但他的历史并不那么清白。传记作者一致认为，像罗森斯蒂尔的财富一样，肯尼迪的大部分财富也是在禁酒时期同犯罪组织互相勾结非法制售酒类而聚积起来的。弗兰克·科斯特洛常常说，他“帮助约瑟夫·肯尼迪发财致富”，他们是伙伴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约·肯尼迪在伦敦当大使。他的表现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他认为德国是欧洲的领袖，反对美国参战。他说，希特勒只是虚声恫吓。他在政治上还反对罗斯福总统。于是，罗斯福把他调回国内，解除了他的职务。

罗斯福认为肯尼迪是个“贼”、“最坏、最令人讨厌的人”。杜鲁门也说他是“美国最大的坏蛋”。然而，肯尼迪和埃德加却建立了持久的友好关系。

有些人说，他们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了，当时肯尼迪资助着好莱坞的影业。他把埃德加介绍给许多电影明星，不相信关于埃德加搞同性恋的传说。20多年以后，埃德加和克莱德偶尔到肯尼迪在佛罗里达的冬季别墅作客。当谈到要建立埃德加·胡佛基金时，肯尼迪答应捐赠巨款。有一次，他还高薪聘请埃德加到他的机构里当“安全负责人”。

从1943年起，肯尼迪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人，利用他在工业界和

外交界的影响，为调查局提供服务。后来，他得知埃德加忌妒中央情报局，便把他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国外情报委员会

成员所了解的情况透露给埃德加。

从 1951 年起，调查局在海恩尼斯港建立了一个常驻地，有 4 个特工人员。它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所以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它“完全是为了安抚肯尼迪家族，并为他们服务的”。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支持这位“大使”，照顾这个家族，并向埃德加汇报这个家族的活动。

到了五十年代末，埃德加的地位巩固了。他已经获得许多荣誉。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授予他一项总统杰出文官奖。印第安纳州在 1959 年宣布了埃德加·胡佛日。伊利诺斯州也准备这样做。

尤其重要的是，埃德加同他认为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当政治家们准备参加 1960 年的大选时，人们看到埃德加常常同副总统尼克松在一起。他们多次一起去看赛马。当埃德加庆祝他当局长 35 周年时，尼克松亲自到他的办公室致敬。

尼克松显然是共和党的宠儿，但是，这个党的声望正处于 20 年来的最低点。埃德加命令特工人员搜集材料，供尼克松讲话时使用，并注视着民主党的动向。

民主党物色的对象是：老肯尼迪的儿子约翰·肯尼迪，他现年 42 岁，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角逐老手艾德莱·史蒂文森，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以及林登·约翰逊。虽然老肯尼迪对埃德加百般奉承，但埃德加对他的儿子约翰·肯尼迪不感兴趣。如果要搞一位民主党人执政的话，他宁愿选择约翰逊。

埃德加自三十年代以来就认识了约翰逊，从四十年代起他们是近邻。埃德加有时到约翰逊家吃晚饭或中饭，还给他们看孩子。他们都把他当作叔叔。

林登·约翰逊是华盛顿最有野心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认识到同埃德加交朋友的重要性，决不能成为他的敌人。约翰逊的历史有许多政治污点和其他短处。他乱搞女人、行贿受贿，更严重的是，据说他在 1948 年伪造选举结果。

那次选举后，舆论哗然。埃德加亲自到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调查此事。人们看见他同支持约翰逊的默奇森和理查森过从甚密。调查局对这次选举作弊案的调查马马虎虎，不了了之。

约翰逊私下称埃德加为“奇怪的杂种”。但他给他写了许多奉承讨好的信件，其中一封说，“我认为，你和你的部下都是非常出色的人才。”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周，克莱德拚命游说，主张通过一项特别法律，以保证埃德加退休以后继续领取全薪。这个目的之所以能够达到，也要感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施加的压力。

埃德加同样热情地回报约翰逊。他经常到这位参议员的办公室出谋献策。1959 年 11 月，他甚至乘飞机到得克萨斯州发表演说，盛赞约翰逊的优点。这次旅行包括到约翰逊的农场访问，约翰逊热烈拥抱埃德加，让记者拍照。

默奇森是个造就总统的人，他在把艾森豪威尔推上台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现在，他又为总统候选人花钱了。他给了尼克松一大笔钱。他派助理给肯尼迪家族送去 2.5 万美元现金。他当然不会忘记约翰逊，这位总统候选人肯定会保障大石油公司的利益的。

默奇森只关心权力，倒不管你属于哪个党派。在他的政治日程上，始终

保留着一个人，那就是埃德加。在大选两年前，当右翼参议员威廉·诺兰有可能成为总统的时候，他在写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中献策说，“如果你能同诺兰、尼克松和埃德加合作，你就可以控制美国。”

1960年，当约翰逊的名字取代了诺兰时，他耍了同样的花招。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埃德加开始考虑一个年轻人的优点和缺点，他就是独立思考的约翰·肯尼迪。

“当约翰·肯尼迪夺取总统宝座的势头很猛时，”卡撒·德洛赫回忆说，“胡佛先生要求克莱德·托尔森（托尔森又告诉我）仔细研究一下档案。他们都知道肯尼迪好色，只要是女人，他就想跟她睡觉。胡佛先生说，‘老肯尼迪对我说，约翰小的时候，应该给他阉割去势。’”

关于约翰·肯尼迪丑闻的档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建立的，它所依据的是英国军情五处关于他看望其担任驻英大使的父亲期间在伦敦的社交生活的报告，他当时刚20岁。这些报告是一个外国的盟友信手提供的情报，后来，1940年，埃德加开始收到关于一个28岁的美女英加·阿瓦德的报告，她目前居住于华盛顿。

阿瓦德是一个新闻记者，交际花，她出生于丹麦，但是在德国广泛的有社会联系。她采访过戈林和希特勒，有一则消息说，她还跟希特勒睡过觉呢。她说希特勒“非常和蔼、有魅力……并不像人们所描写的那么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起初，她并没有引起调查局的警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作为《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记者，会见了调查局的头头脑脑。她恭维埃德加的秘书海伦·甘迪“有男子汉的智慧和女性的温柔”，说克莱德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总是露着“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希望得到一块糖果的笑容”。在一次晚会上，克莱德甚至把她介绍给埃德加。

然而，1941年底，官员们赶忙进行掩饰，因为阿瓦德的采访突然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埃德加下令进行调查，发现“美国海军的一个年轻少尉约翰在阿瓦德小姐的房间里同她过夜”。

约翰·肯尼迪当时在海军情报机关工作。他的姐姐凯思林把他介绍给阿瓦德。到1942年1月，调查局的情报证实，他们两人谈得火热。肯尼迪称她为“英加小妹”，她叫肯尼迪“蜜哥儿”。他们谈到结婚的问题，但老肯尼迪激烈反对这门婚事。

为了拆散这对恋人，海军领导把肯尼迪调出华盛顿，不料分离反而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炽烈。调查局的特工人员通过窃听器多次听到这对情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堡饭店寻欢作乐。当阿瓦德发现她被窃听的时候，监听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1942年夏季又恢复了。此时，爱管闲事的老肯尼迪设法把他的儿子调到了太平洋，在那里，小肯尼迪击沉PT—109的英雄业绩带给他永久的名声。

像许许多多战时的风流韵事一样，肯尼迪同阿瓦德的爱情只持续了几个月。调查局的监听是合法的，并没有发现他们干不忠于祖国的事。然而，这却成为肯尼迪同埃德加结怨的开端。

1946年，肯尼迪成为职业政治家的时候，他开始担心埃德加掌握的他的材料。他的朋友兰登·马文回忆说，“约翰当了国会议员后，他心头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局档案中有关他的那些录音带。他想从调查局要出那些录音带。我对他说，不要那么干。10年以后，他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竞选中获胜，

他又想迫使胡佛交出那些录音带。我对他说，‘别那么做。如果胡佛知道你拼命想弄回那些录音带，他就会意识到他卡住了你的脖子。’”

肯尼迪到参议院不久，他就要求有机会同埃德加握手言和。从那时起到1960年，肯尼迪总是想方设法恭维被他私下称为“痞子”的那个人。甚至在他举行婚礼时，他还告诉特工人员，他随时准备“支持胡佛先生的工作”。几周以后，他的恭维又加码，说只有联邦调查局才是“恪尽职守”的机构。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对埃德加也比过去更加热情了。

埃德加一方面作了彬彬有礼的答复，不断写信加强友谊，另一方面继续收集约翰·肯尼迪的黑材料。他获悉，1958年的一个晚上，伦纳德和弗洛伦斯·凯特夫妇突然听到有人从楼下往楼上的一个窗户扔小石子。这个窗户属于他们的一个房客——20岁的帕梅拉·特努尔，她是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的秘书。特努尔那夜放进来的那个人，就是肯尼迪。他成为更深半夜来访的常客。

凯特夫妇笃信天主教，他们很讨厌这个“偷情者”，便安装了录音机，录下了这对男女作爱的声音，并拍摄了肯尼迪半夜潜入室内的照片。他们对肯尼迪监视了好几个月，甚至在特努尔搬走以后继续盯着他。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肯尼迪对一个助理说，他觉得他家的电话或者他的秘书的电话被窃听了。这位助理主动地要求调查局查查此事。然而后来，他又同肯尼迪谈及此事之后，又给调查局打电话，要他们“忘掉此事”。肯尼迪担心调查局参与了窃听。

不过，埃德加很快就知道了肯尼迪同特努尔乱搞的事，这要感谢凯特夫妇的帮助，1959年春天，随着竞选运动的临近，凯特夫妇把这个“好夫”的详情寄给了一些报纸。各报不敢发表，但斯特恩出版公司把凯特夫妇的信转给了埃德加。不久，他就悄悄地弄到了性交录音带的复制品，并把它们送给林登·约翰逊作为竞选的炮弹。

肯尼迪在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公然摆着一幅他和一些男人同几个裸体姑娘的合影。他的好色已经无人不晓。

7月13日，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那一天，德洛赫收到了调查局关于肯尼迪档案的摘要，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阿瓦德的恋情以及纽约两个混血儿妓女的证词。然而比这更为可怕的是，“黑社会同肯尼迪参议员的关系”。

像他的父亲一样，约翰·肯尼迪显然也同犯罪组织卑鄙地勾结在一起。这损害了他的名声，而不仅仅限于性淫乱。甚至在他当总统以前，他就陷入了黑社会的勾心斗角之中。也许就是这一点，终于导致他的被刺吧。

肯尼迪家族同黑手党的关系并没有随着禁酒时期的结束而终止。约瑟夫·肯尼迪同黑社会保持着个人的和商业的关系。四十年代他在芝加哥的代理人是迈阿密黑社会的一个头头。从三十年代起他就时常同黑社会在西海岸的头头约翰尼·罗塞利打高尔夫球。

约翰·肯尼迪走了一条同样的危险道路。据兰斯基的遗孀说，肯尼迪1957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了兰斯基，甚至问过他，去哪里找女人。此后不久，他在亚利桑那同格斯·巴塔格利亚勾搭上了。巴塔格利亚是黑手党头目乔·博南诺的好朋友。后来，他又结识了博南诺本人。

竞选运动进入高潮时，老肯尼迪在纽约的扬氏饭店会见了许多犯罪组织的头目。显然，肯尼迪家族利用黑社会的关系作为攫取权力的垫脚石。他们要求卡洛斯·马塞洛利用他的影响争取路易斯安那州支持肯尼迪，他拒绝了，

因为他已经答应支持林登·约翰逊。但是，芝加哥的黑手党头目贾恩卡纳支持了肯尼迪。

联邦调查局在监听中听到贾恩卡纳和罗塞利谈论他们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预选中捐赠的款项。据朱迪思·坎贝尔（她在1960年春天曾经是约翰·肯尼迪的情人）说，肯尼迪冒了很大的风险来争取贾恩卡纳的支持。他至少两次秘密会见这个黑社会头目，并派坎贝尔作为信使给他送去大笔现金。

坎贝尔回忆说，“我觉得，约翰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委托我办。我虽然不知道这些钱的去向，但我知道同竞选运动有关。……要给某人送钱，要用这些钱买什么东西。”

大批情报表明了这些钱正是这样用的。肯尼迪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以及黑社会的大笔捐款是用来购买选票。

从一开始，埃德加就对这一切有所了解。早在1960年3月，调查局总部就听说黑社会的某些成员在经济上支持肯尼迪，争取使这位参议员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7月份，在洛杉矶举行年会的前夕，罗伯特·肯尼迪被告知，埃德加的特工人员正调查西弗吉尼亚州的预选情况。一份对他哥哥不利的长篇报告正被送往司法部。

约翰·肯尼迪对此是否感到不安，他没有流露出来。他玩女人的行径在民主党的年会上引起普遍的不安。多年来，他玩过朱迪思·坎贝尔、玛丽莲·梦露以及各种各样的应召女郎。洛杉矶的执法部门还注意到他玩过黑社会控制的窑子的妓女。这些情况都被报告给埃德加。

有人警告说，他玩女人的癖好可能有一天会毁掉他。他听后耸耸肩，满不在乎。他对一位密友说，“当我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碰我。至于我死后，谁还在乎呢？”好色成性，是肯尼迪性格中的一大缺点，它危及他的事业。埃德加首先抓住他的这根小辫子。在1960年民主党洛杉矶年会上，埃德加利用这一点影响了副总统候选人的入选。

埃德加欣赏的民主党人是林登·约翰逊。约翰逊去参加洛杉矶年会，不仅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提名，而且也是为了击败肯尼迪。这是一场激战。约翰逊的人说肯尼迪患有艾迪生氏症（这是真的），说他的父亲曾经是亲纳粹的（这也并非不公平）。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收买代表的选票。肯尼迪由于钱多，组织工作搞得非常出色，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击败了约翰逊。约翰逊气得要死。

他的助理博比·贝克回忆说，“他对助理们大发脾气，骂骂咧咧，把电话哆地一声挂了。他也不去对那些被竞选活动弄得精疲力竭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约翰逊已经获悉，西海岸奈特报系的各报午夜版说，约翰·肯尼迪正在考虑副总统候选人的三个人选，其中没有约翰逊。”

然而，20来个小时以后，形势大变。经过一天的议论、猜测，约翰逊终于站在照相机前面宣布，他将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同肯尼迪一起参加竞选。

“约翰·肯尼迪要求我服务，”他平静他说，“我同意了。”

几乎任何人都没有料想到事态会如此发展。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屡次试图分析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之间是如何通过紧张的讨价还价导致约翰逊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肯尼迪悄悄地对他的助理皮埃尔·塞林杰说，“整个情况绝对不会让人们知道。还是不透露为好。”罗伯特·肯尼迪说，“参加讨论的只有约翰和我。我们两人互相保证绝不泄露内情。”

根据新的证据，讨价还价中使用了讹诈恫吓手段。对约翰·肯尼迪来说，让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关键因素是他受到了威胁：如果把他的性丑闻透露出去，就会毁掉他的前程，破坏他在全美国人的心目中精心塑造的形象，当总统的机会就会让人家夺走。而进行讹诈恫吓者不是别人，正是约翰逊自己，还有埃德加。

提供这个新情况的是在肯尼迪当总统以前和当总统期间给他当了 12 年私人秘书的伊夫林·林肯。她亲眼看到了肯尼迪的光荣岁月，接过她的上司的私人电话，看过他的最机密的信件，目睹他为作出极其重要的决定而绞尽脑汁。在洛杉矶开会时，她也在他的身旁。

林肯女士无限忠于这位已故的总统，除了谈与洛杉矶插曲有关的事情外，不肯多谈他的性生活。不过，她现在也承认，她的上司是“属于女人的男人”。她咯咯一笑，把这归咎于女人。她笑着说，“肯尼迪没有追女人，而是女人追肯尼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林肯女士说，在 1960 年的竞选运动期间，肯尼迪发现，他的贪色成为他最容易受攻击的弱点。性讹诈早已成为林登·约翰逊惯用的手法，再加上埃德加的推波助澜。她说，“埃德加·胡佛向约翰逊提供了关于许多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性情报，以便用这个办法控制某人。肯尼迪在年会上击败了约翰逊以后，胡佛、约翰逊和他们那一派的人便如法炮制，把约翰逊强加于肯尼迪。”

埃德加此时掌握的关于肯尼迪的材料已经足够用了。特工人员又补充了一些他最近搞女人的情况。还有同黑社会的关系。肯尼迪长期担心的是他战时同阿瓦德谈恋爱的经历。

196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 15 年。如果选民知道他曾经同一个跟希特勒和戈林关系密切的女人谈情说爱，许多选民、特别是犹太人选民很可能不投他的票，他父亲同情纳粹，对他也是不利的。约翰逊和埃德加利用这些把柄，把肯尼迪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就范。

约翰·肯尼迪在约翰逊问题上作出决定以后，便为自己解脱。他对他的助理肯尼思·奥唐奈说，“我才 43 岁，我不会死在岗位上。副总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林登·约翰逊可不这么看。他对他的助理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据我调查，每四个总统中就有一位死在岗位上。亲爱的，我是一个赌徒。这是我得到的唯一的机会。”

如果林肯女士的叙述是准确的话，那就证明，埃德加对美国政治进程的干涉比过去人们所担心的更为阴险。这实际上表明，他像极权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头子一样，无情地破坏着民主制度。

埃德加不久便有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力。就在民主党年会结束以后的那一天，报上有一篇报道预测，如果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他将解除埃德加的职务。

卡撒·德洛赫回忆说，“克莱德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应当了解一下他对调查局局长有什么打算。你是否可以让你的新闻界朋友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合众国际社的副社长是我的好朋友，我打电话给他，请他问问肯尼迪，他是否将保留胡佛的职务。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约翰·肯尼迪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说，‘那将是我作出的第一批任命之一。’”

果然，在他被提名还不到 3 周的时间，肯尼迪就保证重新任命埃德加。3

个月以后，在他当选为总统的那天晚上，在同海恩尼斯港的朋友们聚餐以后，就出现了埃德加的名字。

当时担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的本·布雷德利回忆说，“那是一个欢乐有趣的夜晚。肯尼迪夫人杰基和我的妻子托尼都怀孕了，肚子挺大的。我记得总统说，‘好啦，夫人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你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谈到，如今他已当选，该如何称呼他。他说，‘就叫老总吧。’接着，他开玩笑地对比尔·沃尔顿和我说，‘我给你们俩每人安排个职务。你们想当什么官呀？’我们之中的一人说，‘有一个人，你不能重新任命，他就是艾伦·社勒斯。’他当时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之中的另一人说，‘只要你不重新任命埃德加·胡佛，你干什么，我都不管。’他只是哈哈大笑……”

次日上午，当新总统给埃德加打电话的时候，布雷德利在旁边。布雷德利说，“肯尼迪对胡佛说，他非常需要他，要依靠他，请他留下来……对他恭维了一番。”

几个小时之后，肯尼迪重新任命埃德加的决定就成了报纸的头版新闻。肯尼思·奥唐奈说，“他从来没有同我们任何人讨论此事。我想，他大概下决心不在此时引起震动吧。他也没有跟我谈及此事。”

作为总统，肯尼迪没有把埃德加的问题放在心上。他认为埃德加是一个“公共关系能手”。在私下，他是很讨厌埃德加的，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但又怕他。

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说，“约翰·肯尼迪不敢不重新任命他。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同总统谈过这件事。他承认，他要任命胡佛，因为不这样做，会在政治上产生破坏性后果。”

在肯尼迪当选之日，埃德加假惺惺地给他写了一封甜言蜜语的信。“亲爱的参议员，请允许我同无数祝福者一起，祝贺你当选为美国总统……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有你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人当舵手，美国真是最幸运的了……你当然知道，调查局愿意为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在写了这封信几小时以后，埃德加要求纽豪斯报业集团编辑主任菲利普·霍赫斯但从纽约飞往华盛顿。霍赫斯坦回忆说，“我到他办公室后，祝贺他得到当选总统的重新任命。他忿然回答说，‘肯尼迪不是当选总统。’他说，许多州的选举都作了弊，包括新泽西州和密苏里州，纽豪斯集团最近在那里收购了一家报纸……”

“他慷慨陈词，发了一大通议论。我觉得，胡佛想要我同他一起揭露这些选举。我没有那么做，当时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后来我看到，一个同胡佛关系很好的作家写了一部书，报道了胡佛对我说的那些事。胡佛想设法出版此书……我记得，他叫来一位助理，大概是德洛赫。他要我以后同德洛赫谈谈，他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告诉我，原来是关于约翰·肯尼迪搞女人的事……”

罗伯特·肯尼迪在他的哥哥死后谈起埃德加时说，“我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这个危险，我们是能够控制、能够驾驭、能够对付的。他毫无办法。”

罗泊特知道，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对肯尼迪的总统地位来说，埃德加始终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当约翰·肯尼迪飞往达拉斯时，对付联邦调查局局长，成了一场噩梦。

第二十五章

罗伯特使埃德加的日子不好过

在总统就职以后不久，司法部的工作人员接到一些奇怪的命令。完是要他们从仓库里拿出一尊被遗忘的塑像，掸去灰尘，摆在司法部大厅的显著地位。接着又要他们拿走。过一会儿，又来了命令，要他们重新摆出来。如此折腾了好几回。

这尊塑像是斯坦利·芬奇的，他是在埃德加以前担任调查局的三名局长中的一位，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现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似乎埃德加是唯一的一位局长。重新摆上芬奇的半身塑像，就提醒人们：在埃德加以前有过局长，在他以后也全有局长的。据传，拿走的命令来自埃德加，摆出来的命令来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总统的这位弟弟本来不想当司法部长，因为他怕人家说裙带关系，同时他也缺乏经验，又大年轻，当时只有 35 岁，从来没有搞过法律工作。他的一个有力的条件是，如果将来出现什么风暴，他是忠于约翰·肯尼迪的。

“我需要你，”新总统在吃饭时对罗伯特说。选举一个月后就这么定了。罗伯特·肯尼迪成为 150 年来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司法部长。

罗伯特先征求了埃德加等人的意见，才同意了其兄的安排。埃德加含糊其词地劝他挑起这个担子。罗伯特就任部长后，埃德加写信恭维说，他“非常愉快”，并在报纸上说了一些赞扬他的话。然而，两人各怀鬼胎，都知道对方是虚伪的。埃德加对沙利文说，“我不想那么说，但我怎么办呢？”德洛赫说，“他谈起这件事时，仿佛这是他一生中出的最坏的馊主意。”埃德加骨子里是不希望罗伯特在司法部挂帅。

今天在司法部挂的罗伯特·肯尼迪的标准像，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人，头发卷曲，身穿 T 恤衫和皮前克。而他的 63 位前任的像片则都是穿着礼服，面部表情严肃。埃德加也是遵守老规矩的人。更重要的是，以前的司法部长仅仅在名义上是他的上级。实际上，自罗斯福当总统以来，近 30 年的时间，他只对总统负责。罗伯特·肯尼迪执掌司法部以后，这一切都变了。

罗伯特·肯尼迪一到司法部，就决心改弦更张。他不满足于以俞历任司法部长用的那间办公室，搬到了通常作为会议室用的一间宽敞的木板嵌镶的大房间。他撤掉了政府的家具，换上了大沙发，在壁炉架上放了一条旗鱼，在火炉旁边摆了一只假虎。他在墙上挂了他的七个孩子画的画。有时，他的孩子也来办公室玩。他的名犬（叫布鲁穆斯）常常躺在办公室的地毯上。

罗伯特·肯尼迪打的领带常常是斜挂着的，他的蓝色衬衫的领扣是敞开的，他的两条腿不是放在桌子底下，而是翘在桌面上。

有一次，埃德加和克莱德到肯尼迪的办公室去，他正在对着墙上的目标投掷飞标，有时未能击中目标，便刺到木板墙上。他们俩看得目瞪口呆，转而满腔怒火。

不久，助理们便发现办公室外面的地上扔有啤酒罐，大概是从部长的窗口扔出来的。冬天，肯尼迪把自来水抽到司法部的院子里，结冰后，让他的孩子们滑冰。

多年以后，当罗伯特·肯尼迪被杀后，埃德加戏称他为“代沟的救世主”。埃德加 40 年一直教育他手下的人循规蹈矩，甚至在假期，他也打着领带，穿

得整整齐齐。罗伯特的放肆作风使他极为不满。

罗伯特有一种习惯，事先不打招呼，就闯进调查局局长的办公室。在政府部门，没有任何人这样做。有一天下午，他推开惊慌的甘迪小姐，闯进局长办公室，发现埃德加正打盹。

罗伯特坚持要随时同埃德加联系，于是安了一个对讲机，随意呼叫局长。埃德加把它撤掉了，结果罗伯特又叫技术人员安装了热线电话。罗伯特第一次使用它时，埃德加的秘书来接。他不耐烦他说，“我打这个电话，只跟局长谈，立即把电话机搬到他的桌子上。”

有了这个电话，埃德加简直不堪忍受。他有时拿起话筒，听见罗伯特的孩子咯咯笑。曾经在司法部当过法官的威廉·亨德利回忆说，“有一次肯尼迪打电话说，‘我要胡佛来一下。’他砰地挂了电话。胡佛气得满脸通红。两人当着我的面就于起架来，别的司法部长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胡佛。”

罗伯特·肯尼迪一举打破了埃德加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方式。他恢复了被埃德加削弱了的司法部长的权威。他割断了埃德加最宝贵的联系——跟总统本人的直接接触。据约翰·肯尼迪的秘书伊夫林·林肯回忆，在肯尼迪当总统期间，他和埃德加之间从来没有通过电话。

奥唐奈表明，这是白宫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如果他给总统打电话，他就会被伊夫林·林肯或奥唐奈挡住。“罗伯特是他的上司。在胡佛的一生中他第一次不能越过他的上司了。”

有一个顶头上司，这是66岁的埃德加不能忍受的。这不仅是因为罗伯特的作风跟埃德加不一样，而且还因为他要坚决地贯彻他自己的意图。当埃德加不忠实执行时，两人便产生敌对情绪。

埃德加在“自己人”面前不掩饰他的情绪，大骂罗伯特，称他为“小狗崽子”，说他“脾气暴躁，言语尖刻”。

在另外的场合，他则言不由衷。他给肯尼迪家族的朋友库欣主教写信时说，“司法部长肯尼迪和我精诚合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

罗伯特的人发现埃德加为人古怪。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律师乔·多兰接受了45分钟的关于体重问题的教诲。他的行政助理约翰·西根撒勒被教导说：主要报纸被共产党人渗透了，艾德莱·史蒂文斯是个同性恋者。埃德加还先后向罗伯特和总统本人汇报著名的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同性恋者。

肯尼迪兄弟觉得很奇怪。当权者第一次表示这样的看法：埃德加神经有点毛病。罗伯特·肯尼迪1964年发表了一次谈话，不让公布，仅供未来的历史学家参考。他说，“埃德加的行为稀奇古怪，他有精神病。他那个单位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我想，他已经变得老胡涂了……大可怕了。”

埃德加很快就开始揭总统的老底，有时通过罗伯特，有时通过给白宫写信，触及约翰·肯尼迪乱搞女人的事。在总统就职10天以后，意大利一家杂志发表了英国演员埃德蒙·珀多姆的妻子艾丽西亚·珀多姆的谈话。她说，1951年，在他们两人还没有结婚以前，她和肯尼迪曾有过恋情。如果不是他父亲进行干预，他们可能结婚了。

这件事不是美国报纸报道的。埃德加在罗马的人获悉后告诉埃德加，他立即转告总统的弟弟。现有的情报和档案表明，甚至在大选以前，这就是一件伤脑筋的事，肯尼迪家付了大笔钱来掩盖此事。埃德加得到的情报说，肯尼迪同珀多姆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后者怀孕。以后，这类事情他知道得越来越多，他让肯尼迪兄弟明白他已掌握他们的老底。

帕梅拉·特努尔以前在约翰·肯尼迪当参议员时曾经跟他风流过一阵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现在当了总统妻子的秘书。她当年的房东太太念念不忘此事，想再度给抖落出来。罗伯特·肯尼迪办公室问联邦调查局是否知道此事。它故意假装说不知道。埃德加是在玩花招。肯尼迪兄弟只好忍气吞声。

他们还不得不忍耐埃德加对白宫人员的任命的干扰。皮埃尔·塞林杰要被任命为新闻秘书时，吃惊地接到《时代》杂志的一个电话，问他小时候是否接受过共产党的训练。塞林杰澄清了此事，他的所谓“共产党训练”不过是参加过码头工人工会组织的一次夏令营而已。《时代》杂志解释说，这个消息来自埃德加的办公室。埃德加还亲自警告约翰·肯尼迪，塞林杰曾经蹲过监狱。这是事实。他作为《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年轻记者，曾经装扮成犯人了解情况，写了一组关于监狱状况的文章。塞林杰的任命被批准了。

当约翰·肯尼迪审查联邦调查局关于任命人选的报告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十分了解内幕，特别是关于男女关系的事。有一个著名的插曲，据一份报告说，有一位美国大使跟一个已婚的女人通奸被当场抓住，他仓皇从卧室的窗口逃走时连裤子都没有来得及穿。联邦调查局逼着总统表态，肯尼迪最后传话说，他希望他的外交官跑得更快些。有人对他说，白宫的一个女秘书乱搞。他笑着说，“很好嘛，我还从来没有听说她干过这种事。”

当约翰·肯尼迪知道埃德加对他监视得非常之深时，他再不说这类开玩笑的话了。在总部工作的一个特工人员戈登·利迪看到了有关约翰·肯尼迪的档案。从1961年年中开始，他在总部研究关于政治家们的材料，看到关于肯尼迪总统的材料非常之多，而且不断增加。

埃德加对总统的性秘密了解得一清二楚，一旦揭露出来，足以断送他的政治生命，所以对他始终是一个威胁。由于肯尼迪只是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统，1964年他能否连任还成问题，所以肯尼迪兄弟不敢得罪埃德加代表的那些选民。

当罗伯特·肯尼迪派美国执法官们去亚拉巴马保护民权积极分子时，他看到联邦调查局给他出了更多的难题。有人对罗伯特说，当抱有偏见的白人袭击这个州的黑人时，埃德加的特工人员只是袖手旁观。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到情报，说三K党可能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它没有向司法部汇报这个情况。埃德加不愿做任何事情来疏远南方保守的选民，因为他们在国会支持他。这使他站在种族主义者一边。

埃德加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展开的斗争是由于罗伯特对他施加压力，要他雇佣黑人特工人员而引起的。他没有承认他雇佣了几个黑人当他的仆人，而是干脆置之不理。后来，在罗伯特的一再催促下，他才雇佣了少数黑人特工人员。不过，对罗伯特来说，民权问题只居第二位，更重要的是收拾犯罪组织，而这更使埃德加头疼了。

1961年2月4日，总统就职后还不到两周，德鲁·皮尔逊就利用他的定期广播，报道了罗伯特同埃德加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他说，“新的司法部长想要全力以赴地打击黑社会，为此，他建议成立特别行动队，而埃德加·胡佛表示反对。”

肯尼迪兄弟都在参议院犯罪问题委员会工作过，约翰的身份是参议员，罗伯特的身份是首席顾问。约翰承认，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出于他弟弟的要求。

罗伯特第一次在参议院进行调查时，发现有组织的劳工同有组织的犯罪

分子勾结在一起。他把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戴夫·贝克拉下马，关进监狱。后来，在第二次调查中，他又揭露了贝克的腐化继承者吉米·霍法。这样，就使他同霍法和贾恩卡纳这样一些黑社会头头之间结下了深仇大恨。

他们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由于长期同犯罪组织有联系，认为这种做法简直是发疯了。在准备 1960 年大选期间，他设法进行了疏通。但罗伯特不听劝告。作为司法部长，他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不仅是为了伸张正气，而且成为他着迷的事业。

罗伯特一到司法部上任，就使黑社会第一次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但埃德加甚至在罗伯特正式到职以前，就劝他着重打击共产主义。他的备忘录说，“美国共产党对我国的内部安全构成比过去更大的威胁。”罗伯特不同意这种看法。他那年说，“浪费时间去检举共产党，是很无聊的。它现在已经非常衰弱，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何况它的党员大部分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罗伯特已经知道，埃德加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是不力的，实际上是失职。他在参议院时曾经要求调阅在阿帕拉钦逮捕的那些黑社会头头的档案，但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反应。他回忆说，“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黑社会这些大头目的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这使我非常吃惊。……我给反毒品局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对每个犯罪分子都有所了解。”

当罗伯特代表参议院着手调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时，调查局在边远地区的办事处的特工人员接到特殊的命令，叫他们不要协助他。这些命令是埃德加直接下达的。

在上任以前，罗伯特曾建议成立一个全国犯罪问题委员会，这将是一个负责协调各个机构工作的情报交换单位。埃德加公开表示反对，说这样一个联邦机构将对“我们的民主理想构成危险”。他说，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害群之马。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的助理卢瑟·休斯顿在新司法部长就职几天以后去看埃德加。他回忆说，“我与之交谈过的最疯狂的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大动肝火。如果我把他说的话公诸报端，那将引起轰动。罗伯特·肯尼迪显然想建立某种补充性机构或重叠的机构来接管联邦调查局的一些调查工作。我猜想，胡佛先生对罗伯特说，‘如果你那样干，我明天就辞职。’”

关于这种分裂的消息很快就泄露给新闻界。在佛罗里达，约瑟夫·肯尼迪跟托尼·柯蒂斯打了一轮高尔夫球以后，试图对上述消息加以掩饰。他对一位记者说，“我不知这些可笑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约翰和罗伯特都崇敬胡佛。他们认为，由他担任调查局局长，是他们之幸。胡佛是一位忠实的大好人。”

幕后，约瑟夫恳求他的两个儿子迁就一下埃德加。1961 年 2 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晤可能就是为了促成双方的和解吧。约翰·肯尼迪当总统期间只有六次同意会见埃德加，这是其中的一次。不过，罗伯特并没有停止对犯罪组织的打击。他避开埃德加对建立一个犯罪问题委员会的反对，把司法部打击犯罪组织处的人员和预算增加了 3 倍，不管埃德加愿意不愿意，扩大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纽约和芝加哥等重点地区，联邦调查局重新加强了工作。在纽约办事处，特工人员原先还不到 12 人，现在扩大到 115 人。在芝加哥，特工人员的

队伍从 6 人增加到 80 人。1961 年，犯罪组织的成员只有 19 人被指控；而在肯尼迪当总统的第一年，就有 121 人被指控，96 人被判刑。

联邦调查局打击犯罪组织的特工人员抓起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尊敬罗伯特·肯尼迪，喜欢他亲自征求他们意见的工作方式。芝加哥的特工人员比尔·罗默回忆说，“罗伯特使这项斗争重新启动。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极为能干的人。”

尼尔·韦尔奇说，“罗伯特和他的人充满了活力。他们星期六也不休息，照常上班，向各地下达指示。罗伯特年轻有为，令人高兴。他干事泼辣大胆，使所有其他的司法部长相形见绌。这使埃德加十分烦恼，他无法控制局面了。”

埃德加对特工头头肯尼思·惠特克说，“罗伯特·肯尼迪不成熟、鲁莽。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声音可能被他毁于一旦。”惠特克回忆说，“当罗伯特追捕霍法，深入各地指示特工头头如何行动时，上面传下话来，说他虽然是司法部长，但特工人员的行动必须听从调查局总部的命令。”

尽管埃德加进行种种阻挠，但罗伯特打击的对象很快就受不了啦。卡洛斯·马塞洛和萨姆·贾恩卡纳成为搜捕的主要目标；多年来一直使他们平静度日的那个机构现在对他们穷追不舍。

肯尼迪家族对犯罪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当涉及贾恩卡纳时，这是极其危险的。据说，他曾通过非法收买选票，帮助约翰·肯尼迪赢得了大选。他原以为肯尼迪的司法部会让他过个安稳舒适的日子，没想到竟对他没完没了地进击不休。

1961 年 7 月 12 日夜，贾恩卡纳走进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候机室，稍事停留后将飞往纽约。陪同他的，有他的情妇菲莉斯·麦圭尔。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他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许多特工人员，其中包括比尔·罗默，他是追捕这个黑社会头头最卖力的人之一。贾恩卡纳大发脾气。

他对特工人员说，他知道，他说的所有的话都会传给埃德加·胡佛的。他大骂起来，“埃德加·胡佛，我操你妈！操你的上级，操你的上级的上级！你知道我指的是谁；我指的是肯尼迪兄弟！”贾恩卡纳对这兄弟俩骂了许多脏话，接着咆哮说，“罗默，你听着，关于肯尼迪兄弟的事，我们全知道；关于他们的事，菲莉斯知道得更多。总有一天，我们要捅出去。操你妈！总有一天要捅出去……”

罗默始终不明白贾恩卡纳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全知道”不那么神秘了。这指的是肯尼迪收买选票、阴谋推翻卡斯特罗，当然还有他乱搞女人的事。这个黑社会头子经常同朱迪思·坎贝尔接触，她被总统用作中间人。他同肯尼迪的妹夫彼得·劳福德的关系也很密切。有一天，有人听到他们谈论“给肯尼迪兄弟提供的姑娘”。这就是说，罗伯特也是个登徒子。

据以前当过调查局督导员的威廉·凯恩说，1961 年 9 月初，一个情报员对调查局说，有人看到罗伯特·肯尼迪最近“跟两个姑娘在拉斯维加斯的荒郊野外睡在一条毯子里。犯罪组织的人拍下了照片。他们将用此对司法部长进行威胁。这一点从不同的来源多次得到证实。”

凯恩说，埃德加细心听取了这个情报，然后派他同司法部的联络人考特尼·埃文斯去警告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听后，一言不发，只是问埃文斯节日（那是劳动节周末）做什么，就结束了这次会见。

肯尼迪兄弟 1961 年的圣诞节是在郁闷中度过的。12 月 19 日在棕榈滩

的高尔夫球场上，总统的父亲患了中风，他的身体和脸部的右侧瘫痪了。虽然他又活了 8 年，但他的神志已不那么清醒，再也不能调解他两个儿子和埃德加之间的不和了。

第二十六章

跟肯尼迪兄弟斗

1962年1月6日，专栏专家德鲁·皮尔逊作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埃德加·胡佛不甘心对罗伯特这样一个年轻人委屈求全、屈居人下……即使不发生大的争吵，他也会被排挤出去。”在电台广播中，这只是很短的一句话，但皮尔逊的评论却在华盛顿产生了影响。三天以后，罗伯特给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写了一封信，恳求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对联邦调查局说句好话。他说，“虽然这只是一句话，但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好处。我希望你保留这句话。”

1月11日，在济济一堂的参众两院议员面前，约翰·肯尼迪谈到越南战争、人权、赋税等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急速念的一句话：赞扬联邦调查局作了“协调一致的、艰苦奋斗的努力”。这是给埃德加的一个甜头。

一个月以前，埃德加的间谍警告他，肯尼迪兄弟不仅打算解除他的职务，而且接替他的人选也定下来了，他就是国务院的安全主任威廉·博斯韦尔。不久，总统传话说，他“想同胡佛先生谈谈”。

3月22日下午一点钟，埃德加的高级轿车开到了白宫的西北大门，他走出汽车，被领到椭圆形办公室。他和总统一起乘电梯到了总统官邸餐厅。在场的只有肯尼迪·奥唐奈。

这次会晤持续的时间很长。4个小时以后，当埃德加离开时，肯尼迪的助理西奥多·索伦森和阿瑟·施莱辛格才走进来。华盛顿的保守派讨厌他们，所以总统没有向埃德加介绍他们。他后来向他们解释说，他“不想使胡佛先生太感到不安”。

肯尼迪是否想在那一天把埃德加解职，不得而知。肯尼迪图书馆也没有那天午餐谈话的记录。埃德加访问白宫后通常总要写一份备忘录，然而在调查局也找不到这样的记录。多年以后采访奥唐奈时，他只是说，总统终于失去了耐性。他对他的助理说，“搞掉这个混帐东西，他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当参议院调查美国秘密情报的阴暗面时，偶然发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埃德加同总统坐在一起，拿着更具有爆炸性的丑闻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材料大部分是在罗伯特·肯尼迪追捕黑手党头目贾恩卡纳期间搞到的。

甚至在艾森豪威尔离职以前，埃德加就获悉，美国有一个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的计划，贾恩卡纳也卷进来了。在肯尼迪当总统的初期，埃德加发现贾恩卡纳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到了1962年3月，他得知，同贾恩卡纳和约翰尼·罗塞利进行接触的朱迪思·坎贝尔是总统的情人。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他的特工人员提供的，但有些情况可能是他从罗塞利那里直接了解到的。据说，罗塞利和埃德加在拉霍亚曾经打得火热。

埃德加此时已经掌握证据：美国总统同一个跟黑手党头子密切来往的年轻女人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而这个黑手党头子正同中央情报局合作谋刺一个外国领导人。埃德加有一切理由认为这个谋刺计划是得到总统批准的。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又根据总统弟弟的命令大力追捕着同一个黑手党头目。

联邦调查局局长促请总统注意这一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埃德加恨透了这兄弟俩，他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该是很开心

的吧。

朱迪思·坎贝尔结婚以后改名为埃克斯纳。据她说，埃德加那天也提到她的名字。她说，“约翰·肯尼迪那天下午给她打电话。他要我去我妈妈家给他回电话，因为我房间的电话不安全，可能被窃听。他说，他同胡佛会晤时，胡佛用他掌握的情报对他进行要挟。胡佛知道总统要解除他的职务，他便使出这一招儿。”

坎贝尔说，还有一些更具破坏性的事情需要隐瞒。肯尼迪当总统的初期，重复了他在大选期间的愚蠢做法——再次会见了贾恩卡纳。总统对坎贝尔说，这次新的接触“同消灭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关”。肯尼迪有20多次把坎贝尔当作信使，让她把密封的信送给贾恩卡纳。

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肯尼迪兄弟参与了刺杀卡斯特的计划。在猪湾大失败以后，他们不再信任中央情报局。鉴于总统同贾恩卡纳的关系，他完全可能直接同这个黑社会头子谈论刺杀卡斯特的事情。虽然这样做是极其愚蠢的，但倒是挺适合肯尼迪喜欢搞阴谋的性格。

据坎贝尔说，总统送给贾恩卡纳的信封内装有同刺杀行动有关的“情报材料”。但由于信封是密封的，她不知道其中的内容。肯尼迪在从事极其危险的行动。贾恩卡纳原指望，他帮助总统当选，又参与刺杀卡斯特的计划，总会得到联邦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吧。不料罗伯特·肯尼迪对犯罪组织的打击目标不仅把他列在其中，而且把他作为重点对象。

这个黑社会头目认为总统背约。对黑社会来说，背约是要处死的。贾恩卡纳是个杀人老手。他在达拉斯策划刺杀肯尼迪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埃德加在1962年3月对贾恩卡纳的行动计划究竟了解多少，现在还弄不清楚。只知道他了解得很多，并且告诉了总统。坎贝尔说，“我从约翰那里得到的印象是，胡佛对他说，他知道我向贾恩卡纳传递约翰的材料，并以此对约翰进行威胁。”

不久，这兄弟俩就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埃德加攥在手心里。罗伯特早就知道贾恩卡纳参与刺杀卡斯特的计划。对罗伯特以及他的当总统的哥哥来说，掩盖自己同这个阴谋计划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在3月份同埃德加会晤后，总统并没有中断他同坎贝尔的联系。白宫的电话记录表明，他同坎贝尔的联系至少持续到1962年夏末。坎贝尔说，她和总统使用别处的电话，以避免被调查局窃听。肯尼迪怀疑埃德加甚至也在窃听白宫的电话。

坎贝尔不堪联邦调查局的骚扰，她请求总统帮忙：“我实在没有办法，他们老是盯着我。”总统说，“别怕，你并没有干什么错事。”总统十分恼火，他显然想搞掉埃德加。

总统不敢贸然踢开埃德加。除了贾恩卡纳的事情外，埃德加还知道总统的其他许多丑闻。早在3月份那次对抗以前，埃德加就让总统心里明白，他掌握了他在1960年民主党年会期间利用妓女力量的内幕，还有一桩老底在政治上同样是有损的。

3月底，纽约的一家小刊物《现实主义者》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婚姻内幕》，其中说，肯尼迪在1947年曾经同佛罗里达的一位交际花社里·马尔科姆短期结婚。马尔科姆在她的私人印刷的家史中说，她的几个丈夫包括“前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约翰·肯尼迪”。

这就是说，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曾经离过婚，这是违反他的宗教信仰的。

他隐瞒了这个事实，欺骗了全国选民。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61年11月，当此事传到调查局时，一个特工人员立即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了马尔科姆的家史。他的报告以及来自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的类似报告直接送交埃德加。埃德加便把此事提请罗伯特·肯尼迪注意。

1962年埃德加同总统共进午餐后不久，这个消息便出现在报刊上。种族主义的《雷电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登出这个消息：《肯尼迪的离婚被揭露！现在的婚姻是否有效？》右翼团体把马尔科姆家史的复印件向全国散发了数十万份。报业辛迪加和通讯社都在作这方面的文章。

《新闻周刊》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本·布雷德利讲了他是如何写这方面的文章的。“我给总统谈了根据《雷电日报》等的材料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调查局进行了调查，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提供调查局的一些材料。条件是，我们只能使用一个晚上，以后再也不能使用。塞林杰充当我们和调查局之间的中间人。我不知道肯尼迪是以什么条件从调查局弄出这些材料的。”

埃德加出面帮了忙。如果不是温切尔、亨利·泰勒和《雷电日报》写的那些文章的话，这种帮忙也许是不必要的。温切尔早就受调查局的操纵。泰勒和埃德加是好朋友。埃德加向他提供材料，他忠实地撰文攻击埃德加的对手。泰勒关于“第二次婚姻”的专栏文章之所以在最后一刻钟被砍掉，是因为埃德加在白宫的要求下进行了干预。

《雷电日报》还揭露了肯尼迪当参议员时跟他的秘书特努尔偷情的事，标题是《约翰·肯尼迪被人指控通奸》。这篇文章的出现是因为特努尔以前的房东给几个官员写信揭发了此事。埃德加也收到了这样的信。他把这对通奸者作爱时的录音带给了林登·约翰逊，供他在1960年大选中使用。

这表明，关于总统私生活上的丑闻都是埃德加秘密煽动起来的。

仿佛这还不够似的，又把总统跟好莱坞女演员安吉·迪金森的关系以及他们兄弟俩跟玛丽莲·梦露的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据说迪金森是在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不久前成为他的情人的。肯尼迪的朋友、传记作家斯利姆·艾伦回忆说，“在总统宣誓就职以前，迪金森和肯尼迪有两三天时间躲在棕榈泉别墅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所有的人”当然只指了解肯尼迪内情的人。不过，陪同肯尼迪旅行的记者也风闻此事。《新闻周刊》的记者迪克·舒马赫回忆说，他推开了棕榈泉的门，看见迪金森躺在床上。当时的记者群以男性为主，他们颇羡慕肯尼迪的风流史。他们认为政治家的私生活是属于他自己的事，不应去调查或报道。安全人员也持这种观点，并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则服从上级的指示，把情况向埃德加汇报。

据特工人员说，肯尼迪去西海岸出差时，他租了一架飞机，从伯班克机场飞往棕榈泉，迪金森同机前往。这架飞机有卧室。飞行员安装了窃听器。他想利用录音带，从总统那里讹诈一笔钱。但这些录音带落入特工人员手里。

埃德加搞到了关于迪金森的情报以后，进一步又盯上了好莱坞最著名的美人玛丽莲·梦露。

奇怪的是，梦露不仅是肯尼迪总统的意中人，而且也成为埃德加墙上必挂的美人照。她的裸体照片同其他裸体美女照片一起挂在埃德加华盛顿家里地下室的酒吧间墙上。有些人认为，埃德加之所以挂这些女人的照片，大概是为了消除关于他是同性恋者的议论。

1954年，当肯尼迪作背部手术时，他在医院病房的墙上贴了一张梦露的招贴画。画面上，梦露穿着短裤，两腿撇开。肯尼迪把画倒贴着，这样，她的双腿便呈向上撇开的姿势。梦露和肯尼迪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发生关系。1960年大选期间，他们也不时接触，睡在一起。总统的妹夫彼得·劳福德说，他们还拍了一起在浴池洗澡的照片。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这种关系继续保持着。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金发女郎戴上黑色假发和太阳镜，被空军一号专机偷运到纽约卡莱尔饭店的总统套间。这种越轨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鉴于梦露的神经有毛病，这就更加危险了。

除了梦露的医生和最要好的朋友外，很少人知道梦露神经不正常。她同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婚姻破裂后，便吸毒消愁。她曾在精神病诊所呆了一段时期，然后又吸毒、酗酒，情绪忽高忽低，精神极不正常。

任何自尊自爱的公职人员都不敢接近她。然而，肯尼迪却继续同她幽会。埃德加对此密切监视。当时在犯罪记录处工作的戈登·利迪回忆说，“有关肯尼迪兄弟同梦露的关系的情报属于绝密文件。”

罗伯特·肯尼迪的司法部搜捕的主要对象、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吉米·霍法肯定收到了一些这样的丑闻材料。他后来被关进监狱时对同房间的犯人讲了这方面的情况。他的律师威廉·布法利诺在1990年会见记者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期间，有些窃听可能是黑社会头子贾恩卡纳安排的。如果肯尼迪兄弟不予照顾的话，他准备利用这些材料进行讹诈恫吓，这是黑社会的拿手好戏。

对埃德加来说，这类现场录音带只是丰收的开始。1962年2月1日，梦露和罗伯特·肯尼迪在劳福德大厦的宴会上首次相识。那天夜里，两人单独在房间里交谈。她问，埃德加·胡佛是否真的要被解除职务。罗伯特回答说，他和总统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过，他们是想这么做。在华盛顿，埃德加看到这些录音带的记录，心里有点安慰。他从罗伯特的口中知道了他们兄弟俩暂时还不敢动他。

在以后的几周中，埃德加同肯尼迪兄弟俩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很紧张的。罗伯特和埃德加很少携手合作。但表面上，两人仍彼此礼貌相处。总统给埃德加打电话，祝贺他担任局长38周年。埃德加愉快地表示感谢。同一天，他却拒绝参加罗伯特组织的切蛋糕庆祝会。

梦露的故事突然出现转折。约翰·肯尼迪5月19日在纽约又同梦露幽会一次，但以后再也不见她了。梦露不甘心他们的恋情从此结束。她陷入绝望，又是吸毒，又是酗酒。她给约翰·肯尼迪写了无数缠绵悱恻的情书，打了数不清的电话，甚至扬言要张扬到新闻界。总统最后不得不派罗伯特·肯尼迪到加利福尼亚安慰安慰她，使她冷静下来。

不料罗伯特步其兄的后尘，也投入她的怀抱，两人同床共枕，难舍难分。她爱上了罗伯特，说他答应娶她。她仿佛分不清兄弟俩。

罗伯特没有多久，也想疏远她，然而为时已晚。他促成了梦露的精神崩溃，也陷入了双重陷阱——他的丑事被黑社会头目贾恩卡纳和霍法以及埃德加录制了下来。

埃德加很早就得到了情报。据梦露的看门人说，罗伯特从别人那里借了一辆轿车，单独一人到梦露的家。那是6月27日。梦露同这位司法部长在劳福德大厦共进午餐，席间谈到“原子弹试验的道德”问题。在冷战的重要时

刻，罗伯特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任何意见都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所感兴趣的。埃德加知道，梦露有许多左翼朋友，因此，这类谈话关系到安全问题。

8月4日，星期六，梦露被发现已经死亡。尸体解剖报告说，死因是“吸毒过量”。验尸官认为“可能是自杀”。别的人认为，过量的毒品不是用嘴吸入的，而是别人注射的。

贾恩卡纳的同父异母兄弟查克在1992年说，梦露是芝加哥的这个黑社会头子谋杀的。他说，“杀了她，就暴露了罗伯特·肯尼迪跟她的性关系。”

不管梦露之死是否有贾恩卡纳插手，反正向公众作的报道是不真实的。首先，罗伯特·肯尼迪那个周末的所作所为没有交待清楚。

这位司法部长当时去加利福尼亚给美国律师协会讲话，并同家人一起度假。8月4日，罗伯特飞抵洛杉矶，跟梦露摊牌，要她以后再不要给约翰·肯尼迪和他写信或打电话，不要找他们的麻烦。梦露说，她星期一将举行记者招待会，告诉世人，肯尼迪兄弟俩是如何玩弄她的。双方争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梦露的精神病犯了。第二天凌晨，梦露死在床上。人们在梦露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张揉碎的纸片，上面写着白宫的电话号码。

梦露之死使总统认识到，他在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白宫的记录表明，他在凌晨6点零4分接到彼得·劳福德的电话，说梦露死了。一个小时以后，劳福德雇人埋藏了肯尼迪兄弟跟梦露来往的一切证据。

黑社会的头头原想利用梦露这张牌搞垮罗伯特·肯尼迪，但他们未能如愿，因为掩盖工作搞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归功于埃德加。他把录音带全都掌握起来，使肯尼迪兄弟不得不依靠他的保护。

8月7日，在埃德加为他们兄弟俩效劳48小时以后，罗伯特肯尼迪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福特基金会为促进公民自由而建立的共和基金会副主席费里几个小时以前指责埃德加拿共产主义的危险吓唬人。我们知道，罗伯特本来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可是现在，罗伯特突然站出来为埃德加辩护，赞扬他在共产主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说，“我希望胡佛继续为我们国家服务许多许多年。”

然而1962年秋季，埃德加和罗伯特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冷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中断了，放在桌上的专用电话机再没有使用过。

总统在以后的一年中只同埃德加见过两次面。兄弟俩尽可能地疏远埃德加，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了可以甩掉他的机会。

第二十七章

肯尼迪总统的桃色丑闻

埃德加通常是在迈阿密海滩度过自己的假日的，然而 1963 年元旦他却呆在纽约的一家饭店里。他刚做完前列腺手术，正在康复，他突然感到岁数不饶人，一种孤独寂寞之感袭上心头。

再有两年，他就满 70 岁了，那是联邦官员法定的退休年龄。只有总统签署命令，才能延长他在联邦调查局供职的期限。埃德加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2 月份，埃德加在接见记者时说，“我同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一向是诚挚、愉快的，我同总统的会见也是这样。”记者问，“传说你可能退休，是不是这样？”埃德加说，“情况不是这样，我希望在这里长期呆下去……总统有权延长我的任期。”

其实，总统并没有这个意图。他们兄弟俩早就腻味他了。他们可以利用 70 岁退休的规定让他下台，而又不致被认为是解职。现在的问题是拖延时间，等到 1964 年大选以后再动手。肯尼迪兄弟的意图传遍了调查局的上下下。这使埃德加怒火中烧。

1963 年春天和夏天，他继续收集肯尼迪乱搞男女关系的材料。5 月 29 日，他写信给奥唐奈，重提肯尼迪同特努尔的关系。一周以后，又发掘出一件丑闻：总统 1951 年跟艾丽西亚·珀登多次发生性关系，使她怀孕。为了不让这件事张扬出去，据说给了她 50 万美元。

与此同时，肯尼迪兄弟也以同样的手法对付埃德加，也给他立了档案。不幸的是，埃德加走到了前头。1963 年 6 月，查到了一件非同等闲的女人案件。当肯尼迪兄弟忙于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权危机时，埃德加不声不响地设立了一个新的档案，代号叫“蝴蝶结”。这个档案逐渐增加到 1000 多页。这个丑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另一个国家的问题。

英国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承认他曾同一个跟苏联驻英国的海军武官叶夫根尼·伊万诺夫有勾搭的女人睡觉。虽然这个大臣引咎辞职，但这场危机并没有结束。支持普罗富莫的麦克米伦首相的政府受到彻底的震撼，因为报纸每天不断揭发出英国政府要员的通奸行为，使舆论哗然。

在华盛顿，约翰·肯尼迪非常注意此事，仔细阅读普罗富莫案件报道的每一个字，并要求有新情报，立即送他。起初，人们以为他不过是对异国桃色新闻好奇而已，后来才知道他也陷入了跟这个丑闻有关系的两个年轻女人的情网。

当他阅读来自伦敦的报道时，他特别注意跟一个名叫马里拉诺沃特尼的 22 岁的妓女有关的材料。1961 年初，她曾经来纽约，据她说，是彼得·劳福德为当选总统拉的皮条。他们在曼哈顿发生了几次性交，有一次还有其他一些妓女在场。就普罗富莫案件而论，它还可能涉及到安全问题。

1963 年 6 月份的第三周，约翰·肯尼迪在同马丁·路德·金谈话时，提到普罗富莫案件。在经历了动荡的两年以后，这位民权领袖面临新的危机。埃德加早就认为马丁·路德·金“不是好东西”，他一直对肯尼迪说，这位黑人领袖受了共产党的影响。

他劝告罗伯特准对金的一个顾问进行监听，因为埃德加认为他是苏联的一个特务。但是，肯尼迪兄弟俩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害怕一旦被揭发，不

仅对金产生影响，而且对支持金的政府也会产生影响。

6月22日，总统在白宫对一批民权领袖讲话以前，把金带到玫瑰园，要求他把被埃德加指责为共产党人的两个工作人员解职。

肯尼迪说，“我想你大概知道，你受到严密的监视。”他警告金，在电话上说话要小心，如果他被埃德加抓到同共产党联系的证据，埃德加就会用来破坏将来的有关民权的立法。

总统为什么小心翼翼地把金带到花园里讲话：金认为总统怕埃德加进行窃听。

6月23日，总统离开华盛顿去欧洲访问。他也到伦敦会见了麦克米伦首相。他抵达的那天晚上，同英国首相共进晚餐。他获悉，普罗富莫案也把他牵连进来。那天纽约的《美国人日报》中午版刊登一则报道，大字标题是《美国大官同女人丑闻有牵连》。报道的第一句话是：“一位担任极高的民选职务的美国政界要员同英国的安全丑闻有牵连……”只是没有点总统的名，但意思是很明白的。

这则报道只在该报的中午版有，其他版则没有，未解释原因。罗伯特迅速采取了行动。当约翰·肯尼迪正在同麦克米伦吃饭时，他就接到了罗伯特的电话。总统表示“关切”。联邦调查局驻伦敦的代表查尔斯·贝茨奉命在次日上午总统启程赴意大利以前向他汇报情况。总统对贝茨说，“如有什么新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可转到罗马。”

在华盛顿，《美国人日报》发表那条报道24小时以后，司法部长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文章的两位作者——詹姆斯·霍兰和多姆·弗雷斯卡，前者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后者被认为是“最好的调查性记者”。他们是从纽约他们的家，被用专机接到华盛顿的。

这两位记者已经死了，但他们在罗伯特那里受到的折磨却被联邦调查局记录了下来。总统的弟弟问。他们所说的“美国大官”是指谁。霍兰回答说，是指总统，那个“女人”是他当选为总统不久前认识的。罗伯特要两位记者讲出消息来源，他们断然拒绝。罗伯特不肯罢休，扬言控诉该报，该报的编辑于是撤掉了这条报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纽约的《美国人日报》又报道了第二个神秘的女人、“一个目前住在伦敦的漂亮美籍华人姑娘”，名字叫张苏姬。

张苏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和模特儿。没有证据表明她卖淫。不过，她移居伦敦，同富有的人打得火热，跟普罗富莫案件有牵连。1987年有人问她时，她不安地说，“每个人都看见我跟他一起吃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很有魅力的人。”她笑了笑，又说，“我怎么能说别的呢？”

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的大量文件表明，张苏姬1960年的确来过纽约，据说那一年她同肯尼迪相识。1961年，她又来过，1962年底在这里度的圣诞节。最能说明问题的文件指出，1963年底“张苏姬抵达纽约……她被讯问跟普罗富莫案件有关的事”。

华盛顿极其严肃认真地对待普罗富莫案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国防情报局长约瑟夫·卡罗尔将军和埃德加的一个高级助理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个案件在联邦调查局是由两位助理局长处理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分别送交肯尼迪总统办公室，他的弟弟和埃德加。埃文斯回忆起那些严重的日子时说，“发现总统跟英国安全丑闻中的某个人有牵连，每个人心头都是沉重的！”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埃德加。当总统从欧洲回来，关于张苏姬和马里拉·诺沃特尼的情报材料已经有一大摞。这些文件表明，在《美国人日报》的报道传遍纽约市 24 小时以前，埃德加已经就张苏姬的问题同他的纽约办事处进行接触了。

他很早以来就利用《美国人日报》以及其他赫斯特系报纸来散布关于“赤色威胁”的消息。调查局以前的工作人员甚至打入该报的员工队伍。埃德加的电话记录表明，他经常跟赫斯特报系的一个头头理查德·伯林通话。伯林保证使编辑方针激烈反对肯尼迪政府的政策。

肯尼迪总统由于跟朱迪思·坎贝尔、玛丽莲·梦露、诺沃特尼和张苏姬等女人的关系而使自己受到了损害，这些关系都涉及到安全问题，而且都是被埃德加发现的。然而他们兄弟俩跟联邦调查局头头表面上则保持着诚挚的关系。

当罗伯特的第八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出生时，埃德加写信表示祝贺。当总统的新生婴儿出生不到两天就夭折时，他致函哀悼，兄弟俩也分别写信致谢。

与此同时，埃德加始终耍阴谋诡计，利用报纸歪曲关于犯罪组织的事实，施加压力，说马丁·路德·金是共产党人。8 月份，当埃德加对总统丧子表示哀悼时，他的特工人员正在调查可能危及安全的另一个女人的事。

她叫埃伦·罗默茨，是来自东德的一位年轻美貌的流亡者，她 1961 年同其丈夫一起来美国。她的丈夫是西德的一个军官、在西德驻华盛顿军事使团工作。她以倾城倾国之貌，很快赢得“舞会女郎”的美名。在社交活动中，罗默茨认识了博比·贝克，他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秘书、林登·约翰逊的好朋友。他协助在国会附近建立了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参加的精选俱乐部。罗默茨很快就穿着鱼网状短衣裤出现在这个俱乐部。

1961 年夏末，总统的密友比尔·汤普森常去这个俱乐部。他很有钱，又是光棍儿，了解总统许多寻花问柳的秘密。

贝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精选俱乐部举行鸡尾酒会，汤普森走过来，指着罗默茨对我说，‘那小妞挺够味儿的。能不能请她跟我和总统一起吃饭？’于是我把她介绍给汤普森，她又认识了总统。总统传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她又见了他几次，他们的关系保持了一段时间。”

罗默茨是个碎嘴皮，大侃她认识华盛顿的许多要人。有人把她的情况向调查局汇报。1963 年 7 月，特工人员对她进行了讯问。由于她是最近从东德流亡出来，而且参加过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她很可能是共产党安插的一个人。在德国当局的合作下，她和她的丈夫很快被调回德国。

这件事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了。不料在罗默茨离开 3 个星期后，博比·贝克丑闻暴露出来了，他的问题同性无关，是属于贪污性质。然而幕后，精选俱乐部的社会联系却触发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10 月 26 日联邦调查局的一份高级备忘录说，“有人在搞情报，这同高级政府官员的一些可疑活动有关系。据说，总统和司法部长也享用着花花女郎的服务。”

当调查局发布这份备忘录时删去了其余的部分，也没有说明消息来源。

同一个星期六，艾奥瓦州的《得梅因纪事报》第一次在头版报道了罗默茨被驱逐的事。该报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个美丽女郎经常参加有国会领导人和一些政府要员出席的晚会……人们关切的是，她的活动可能同间谍有关，因为她交往的男友都是地位很高的。”

写这篇报道的克拉克·莫伦霍夫是同埃德加友好的一位记者。他的文章说，参议员约翰·威廉斯掌握了一份关于罗默茨活动的报告。原来他弄到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这显然是得到埃德加的批准的，他的材料包括罗默茨在美国政府中的朋友的名单。他打算把它交给调查博比·贝克案件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

肯尼迪兄弟慌了手脚。白宫的一个助理给埃德加办公室打了一系列电话，恳求联邦调查局制止其他报纸转载《得梅因纪事报》的报道。他说，“总统本人关注制止这种报道。”但调查局不肯帮忙。

幸而这篇报道只是刊登在外地一家报纸的周末版上，影响还不太大。司法部长给肯尼迪的一位朋友达菲打电话，派他立即赶赴西德，制止罗默茨接受记者采访。几天以后有报道说，“戴着美国安全机关徽章的人在星期日会见了罗默茨女士，要她签署一份声明，正式否认同要人们有任何亲密关系。”罗默茨后来写信给达菲，感谢他寄来的钱，并向他保证，“我当然会保持沉默的。”

星期一凌晨，在参议员威廉斯打算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发表讲话 24 小时以前，罗伯特·肯尼迪在家里给埃德加打了电话。作为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只有埃德加能够说服参议院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听证会既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国会的利益。

这位司法部长苦苦哀求埃德加，设法使参议员们就范。

那天，正当首都盛传要爆出大丑闻时，埃德加会见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为了绝对保密，他们是在曼斯菲尔德家开会的。埃德加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耍了花招。傍晚以前，参议院讨论罗默茨问题的计划突然被取消了。

这场危机算是过去了。真够悬乎。罗默茨事件本来有可能变成普罗富莫式的因色情而导致安全问题的灾难，从而迫使总统下台。肯尼迪兄弟为掩盖这件事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他们更加感激埃德加。他们跟埃德加之间的权力之争持续近 3 年的时间，结果他们还是输了。

埃德加选择 10 月 29 日，即他帮助总统摆脱罗默茨丑闻以后的那一天，同罗伯特讨论了他的前途问题。他问，国会盛传他将被解职，这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向他保证，那是无稽之谈。两天以后，他到白宫同总统共进午餐。

对总统来说，这是很丢面子的事。在罗默茨危机进入高潮时，他不得不打破惯例，直接给埃德加打电话。现在，两人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总统不得不继续留用埃德加。

自 1961 年以来，埃德加和约翰·肯尼迪之间只有过 6 次会晤。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在白宫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2 天后，总统飞往达拉斯。

第二十八章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死

像全世界的报人一样，埃德加也是从安装在他办公室的合众国际社电传机上获悉总统遇刺的消息的。第一条快讯是华盛顿时间下午 1 点 34 分，即行刺 4 分钟后发来的，当时总统的轿车正急速驶往达拉斯医院。

9 分钟后，合众国际社的电讯说，总统“受了致命的伤”。埃德加拿起了他和司法部长好多个月来都没有使用过的热线电话。罗伯特正在家里吃午饭，电话转到了他那里。总统的弟弟回忆说，“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否则，胡佛是不会给我家里打电话的。”几分钟以后，他挂了电话，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转身走了。埃德加在只有五行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已传递了这个消息。罗伯特回忆说，埃德加当时的声音“还不如他汇报他在霍华德大学（华盛顿的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大学）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时那么激动。11 月 22 日他跟我的谈话是令人不愉快的。”

埃德加只是发出了一条简短的通知，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在罗伯特继续任职的 9 个月里，两人很少说话。当热线电话又响起时，埃德加没有理会，等响声停止后，他命令说，“把这该死的东西挪到甘迪小姐的桌上。”

当总统遇刺 40 分钟后，埃德加给罗伯特第二次打电话时，他仍然只是说“伤势严重”。司法部长有更可靠的消息来源，他打断埃德加的话说，“告诉你一个你可能喜欢听的消息吧：我哥哥死了。”他的话使埃德加一震。

那天晚上，埃德加回家看电视了。次日，他去看赛马。

在总统遇刺身死几个小时以后，埃德加在离开办公室前给林登·约翰逊写了一封讨好他的信。约翰逊曾经打赌说，命运将把他推上总统宝座。不料他竟言中。埃德加的信说：

亲爱的总统先生：

今天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我深感震惊。对国家丧失你的朋友，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的员工和我重申，我们真诚地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给你以协助。

这完全是违心之言。埃德加很清楚，约翰逊和肯尼迪兄弟不和，最好也不过是互相容忍而已。相比之下，约翰逊和埃德加倒是称兄道弟，好得不得了。

约翰逊当总统后打的首批电话，就是打给以前的两位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以及埃德加的。几天以后，约翰逊在白宫表示担心，他自己也可能遭到暗杀。埃德加主动表示把自己的一辆防弹车给他用，约翰逊十分感激。

约翰逊当副总统时，就谈到将来要继续依靠埃德加。现在，他掌权后，埃德加可能重新走好运。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把达拉斯事件查个水落石出。

由于官方有不同的说法，千百万美国人对暗杀事件的凶手也弄不清了。由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委员会认为，总统是被 24 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德杀害的。奥斯瓦德以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叛逃到苏联，最近回国。暗杀行动是他自己主动干的。然而委员会的 4 个著名成员对此有怀疑。1978 年，国会的暗杀问题委员会断定，这可能是一个共谋行动。

它认为，奥斯瓦德只是两个枪手之一，这次谋杀很可能是黑手党策划的。

另一些人则认为，鉴于奥斯瓦德跟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

沃伦委员会的情报大部分依靠联邦调查局，否则，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混乱了。从一开始，埃德加就竭力保护他自己和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奥斯瓦德是唯一的刺客。然而次日，埃德加向新总统汇报时，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不久，奥斯瓦德被杰克·鲁比枪杀，更无法查明这个问题了。在奥斯瓦德被枪杀两个小时后，埃德加对白宫说，“我关切的是，发表一个文告，以便使公众相信，奥斯瓦德就是真正的凶手。”约翰逊总统说，他希望联邦调查局尽快起草一份报告。

肯尼迪总统的两个高级助理肯尼思·奥唐奈和戴维·鲍尔斯认为，枪弹是从总统车队前面的篱笆后面射来的，而不是从奥斯瓦德埋伏的建筑物后面打来。奥唐奈回忆说，“我把我听到的枪声的方向告诉了调查局，但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证时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说的。”

作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本应在这次调查中起关键性作用。但他由于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刺杀事件发生后离职休养了几个星期。据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埃德加命令助理们把暗杀事件的报告“赶在罗伯特·肯尼迪回来之前”从司法部发出去。

在罗伯特休养期间，副部长卡曾巴赫代理了一段时期，他回忆说，埃德加和联邦调查局垄断了一切重要情报。“我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政府里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沃伦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奥斯瓦德的人名录原件和调查局的打字件不一致，后者删去了调查局特工人员詹姆斯·霍斯蒂的姓名、地址和汽车驾驶执照号码。

霍斯蒂是驻达拉斯的特工人员，他的日常工作是监视奥斯瓦德，因为后者曾经叛国。霍斯蒂作证说，在发生刺杀事件以前，他没有见过奥斯瓦德，只给他妻子留下一个口信，要他回电话。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调查局要对沃伦委员会隐瞒霍斯蒂同奥斯瓦德的关系呢？

这导致一个重要的发现。奥斯瓦德对他妻子的一个好朋友鲁思·佩因说，在霍斯蒂访问他家以后，他给调查局达拉斯办事处留了一个便条。刺杀发生后，一个特工人员对佩因的妻子说，没有这回事。然而，1975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获悉，这个刺客的确在刺杀事件两周前给调查局办事处的霍斯蒂留了个便条。

据一个接待员说，奥斯瓦德的便条提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对他妻子的骚扰，他就要炸掉调查局的办事处。而霍斯蒂则说，奥斯瓦德并没有以暴力相威胁，只是说“可能采取适当的行动，向有关当局汇报此事”。

这个便条没有列入官方档案，因为据霍斯蒂作证说，达拉斯的特工头头戈登·香克林命令他把它销毁。刺杀事件发生后，这个便条掌握在香克林手里。两天以后，当奥斯瓦德遭到枪杀后，香克林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便条，对霍斯蒂说，“奥斯瓦德现在已死，不会有审讯了。销毁它吧。”霍斯蒂当着香克林的面把它撕碎，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了下去。

据传，销毁这个便条的命令是埃德加亲自下达的。两位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和马克·费尔特说，总部官员当时是知道这个便条的。埃德加下令，对沃伦委员会隐瞒此事。

得克萨斯州的司法部长瓦戈纳·卡尔报告了这样一个说法：奥斯瓦德是调查局的秘密特工人员。埃德加断然否认，他对沃伦委员会说，不论是奥斯瓦德，还是鲁比，都没有当过调查局的情报员。然而后来查明，在发生刺杀以前，调查局至少同鲁比进行过9次接触。在调查局的档案中甚至还有他的名字，他被列为潜在的犯罪情报员。

奥斯瓦德的遗孀玛丽娜说，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在为美国政府工作”。新奥尔良的两个证人说，他们看见奥斯瓦德同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一起。

然而，沃伦委员会从来没有对这些说法进行彻底的调查。

有些人认为，埃德加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名声，从而导致他处处封锁消息。他秘密写信谴责17个特工人员和头头，因为在发生刺杀事件以前，他们都曾参与处理奥斯瓦德案件。他说，如果他们做得恰当的话，奥斯瓦德的姓名本来应该上“安全索引”。后来，当沃伦的报告批评调查局不够警惕时，他又惩罚了其中的一些人。他说，“调查局要永远汲取教训。”埃德加对他的特工人员的惩罚，只不过是保护他自己而已。

暗杀问题委员会1979年报告说，联邦调查局对肯尼迪被暗杀的调查是“有严重漏洞的”。委员会自己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3年多以前，奥斯瓦德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定居苏联的叛逃者。一份以埃德加的名义写的关于他的材料在1960年6月30日警告国务院，“有一个冒名顶替者可能在使用奥斯瓦德的出生证。”

在刺杀事件发生几周内，美国官员发现两个奥斯瓦德出生证和两个奥斯瓦德护照，被两个不同的人使用着。1961年1月，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古巴流亡者商谈购买10辆福特牌卡车。其中有一个卡车购买者自称是奥斯瓦德，代表一个名叫“民主古巴之友”的反卡斯特罗组织。当时那个真正的、亲共的奥斯瓦德远在苏联。这个反卡斯特罗组织曾经一度雇佣真奥斯瓦德担任他们的“交通”。1961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盖伊·班尼斯特，他曾经为联邦调查局服务20年之久，后来由于脑部受伤、神经不正常而中断这种关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反共战士。他积极支持中央情报局推翻卡斯特的活动。

奥斯瓦德那年夏季曾去新奥尔良，以亲卡斯特的面目出现，这正是班尼斯特所反对的。不过，他们之间建立了秘密的工作关系。班尼斯特的同事戴维·费里也跟奥斯瓦德有联系。许多人看到，在发生刺杀事件3个月以前，奥斯瓦德曾同这两人在一起。

刺杀事件发生几小时后，班尼斯特曾同调查人员马丁一起喝酒。班尼斯特指责马丁看他的机密档案，并用手枪砸他的头部。马丁问班尼斯特，“你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杀死我，像你们对待肯尼迪那样？”他们吵了起来。这本来应该成为调查的重要线索，然而调查局马马虎虎问了一些问题，就结束了。

多年以后，国会的暗杀问题委员会表示了这样的疑问：佛罗里达州的桑托斯·特拉菲坎特和新泽西州的卡洛斯·马塞洛这两个黑手党头目可能参与了暗杀行动。

马塞洛，像特拉菲坎特和贾恩卡纳一样，一直是罗伯特·肯尼迪打击的对象。他在1961年担任司法部长几周内就把马塞洛作为不受欢迎的异己分子流放到危地马拉。当这个黑社会头子溜回美国时，罗伯特重新作出努力，要把他永远赶出美国。马塞洛使用一个假出生证，以免被流放。费里和班尼斯

特都帮助他进行辩

如果从马塞洛这个线索顺藤摸瓜的话，本来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奥斯瓦德的叔叔达茨·默雷特在马塞洛的赌场工作，这个刺客 1963 年曾跟他在一起。同黑社会有许多联系的杰克·鲁比在行刺三周前曾同马塞洛的助理佩科拉进行接触。在暗杀事件发生后，马塞洛的工作人员曾给奥斯瓦德现金。

所有这些线索，调查局都没有提到。在沃伦的报告和 26 卷证词中也没有出现马塞洛的名字以及特拉菲坎特和贾恩卡纳的名字。

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黑手党的主要头目同这个案子有关系。帮助马塞洛建立起他的犯罪帝国的黑手党巨头科斯特洛在死以前曾说，在刺杀总统的行动中，奥斯瓦德“只是个替罪羊”。

在谋杀总统的前夕，杰克·鲁比曾在达拉斯的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的老板是马塞洛的好朋友约瑟夫·坎皮西。他当时曾同鲁比交谈过，鲁比入狱后又去看望过。总统遇刺 4 天后，调查局得到情报说，默奇森和韦布（他是调查局的老手，默奇森是在埃德加的推荐下雇佣他的）都认识鲁比。他们两人否认此事。但鲁比认识默奇森最要好的朋友、石油大王比利·拜厄斯。

拜厄斯跟埃德加的关系密切。记录表明，在总统遇刺的那天下午，埃德加除了给罗伯特和安全头头打过电话外，只给拜厄斯打过电话。

现在老拜厄斯已死，他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还是个大学生。小拜厄斯次年夏天曾在德尔查罗见过埃德加。他在 1988 年回忆说，“那年我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星期。我父亲、默奇森、胡佛等人一起吃过饭。胡佛的情绪似乎不对头。他跟约翰逊的关系显然比同肯尼迪的关系要好。他跟罗伯特的关系简直坏透了。有一次，我问到关于总统被刺的事。

“我说，‘你认为那是奥斯瓦德干的吗？’他停下来对我凝视了一阵子，然后说，‘如果我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告诉你，那对美国将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就会垮台。’他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不能再多说了。”

总统被刺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罗伯特·肯尼迪对犯罪组织的打击受到影响。在此以前，总统弟弟成功地迫使埃德加追查黑社会。不管埃德加喜欢不喜欢，联邦调查局成为黑手党惧怕的一支力量。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总统被谋杀后，一切大变。司法部助理威廉·亨德利说，“枪弹一击中约翰·肯尼迪的头，一切就都完了。打击犯罪组织的计划停止了。胡佛重新控制一切。”

总统一死，他的弟弟就成了“跛脚的”司法部长。而埃德加则成为霸主。1964 年 5 月 7 日，正当埃德加暗中阻挠沃伦委员会的工作时，国会却作出了第 706 号决议，纪念埃德加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40 周年，赞扬这是“在我国历史上为上帝、为国家服务的最出色记录之一”，说埃德加“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对美国的犯罪黑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次日，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了仪式，当着埃德加的面，约翰逊总统宣布第 10682 号总统令：埃德加可以“无限期”任职，不受年龄限制。他赞扬埃德加是一个“谦逊的人……令坏人惧怕的人”。

第二十九章

约翰逊入主白宫埃德加重新走运

1964年6月4日，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被领进司法部第五层埃德加的办公室。在接待室，曼彻斯特看到了埃德加的全身铜像。

曼彻斯特正在撰写史诗般的著作《总统之死》。他是来讨论肯尼迪总统被刺杀那一天的情况的。几周以前，这位教授在白宫也经历了奇怪的事情。约翰逊总统害怕接受采访，他坚持让一个助理代替他回答教授的问题，而他则在另一个房间倾听他们的问答。

现在，曼彻斯特单独地同埃德加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意识到，这位局长也不愿意谈论总统遇刺那天的经过，倒是滔滔不绝地谈起他过去如何追捕迪林杰等人的光荣史。

肯尼迪总统被刺以后，林登·约翰逊的一张新照片很快就出现在埃德加办公室的墙壁上。照片上的题词是：“赠给最伟大的朋友埃德加·胡佛。”约翰逊的夫人伯德在埃德加活着的时候对他赞不绝口，而在1988年谈起这位局长时却改口说，“我不认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别的人更加直言不讳了。

《时代》周刊采访白宫的记者休·赛迪说，“约翰逊并不喜欢胡佛，他只是看中胡佛的势力，但对胡佛是怀疑的、甚至有点鄙视他。”

事实是，约翰逊只能在埃德加愿意的时候，利用他，但不能对他发号施令。约翰逊暴露了他的恐惧心理。他每次打电话时，总是问埃德加，他当参议员时，是否窃听过他的电话。

埃德加对约翰逊的隐私了解得太多了，不能不构成威胁。他知道：约翰逊1948年通过选举作弊才得以当选为参议员；约翰逊通过不义之财而致富；他的婚外恋也是不少的。

正是由于埃德加掌握了他的丑闻，约翰逊当总统以后赶忙延长了这位局长的任期。也许他们两人达成了某种妥协吧，调查局关于约翰逊的秘密档案大部分不见了，有些丑闻材料退给了他。

华盛顿的知情人士都知道约翰逊说过一句最有名的话。有一位助理要求解除埃德加的职务，约翰逊回答说，“不，小伙子，如果你有一只臭鼬，最好是让它从帐篷里向外撒尿，而不要让它从外面往帐篷里撒尿。”

在埃德加当调查局局长的40年中，他同白宫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当过两朝助理的理查德·古德温把埃德加以后的4年比作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同斯大林的关系。

埃德加下指示，在靠近约翰逊农场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调查局办事处。不久，特工人员就经常坐着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来来往往，尽管总统的安全是安全人员负责的。

在肯尼迪死亡几小时后，埃德加任命卡撒·德洛赫为白宫联络官，以取代跟肯尼迪兄弟过份亲密的埃文斯。德洛赫起草了关于埃德加满70岁以后继续留任局长的公文。

德洛赫来往奔波于联邦调查局和白宫之间达5年之久。他同“第一家庭”建立了空前亲密的关系，经常在白宫吃午餐，跟总统玩多米诺骨牌，同总统一家人在戴维营度复活节周末。不久，总统经常就政府人员的任命征求他的意见。

总统常说，他喜欢他周围的人非常忠于他，“甚至亲吻他的屁股，还说像玫瑰花一样香”。德洛赫颇符合这个条件，他不仅保证贯彻约翰逊的意志，而且使他的意志同埃德加的意志相吻合。

约翰逊总统经常担心有被暗杀的危险。他总是觉得肯尼迪政府留下来的人想要推翻他。他认为新闻界企图搞垮他。他还认为报界和政府有许多共产党人。

埃德加终生同真实的敌人和假想的敌人作斗争。他的警察职能早就干预政治了。行政和司法两者互相分离、互相制约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

对他们两人来说，第一个明显的敌人是罗伯特·肯尼迪，他现在仍然是司法部长，要一直干到1964年9月。约翰逊认为罗伯特是个“矮鬼”，罗伯特认为约翰逊是个“卑鄙小人”。尽管如此，罗伯特认为约翰逊需要他在未来的大选中助一臂之力，当副总统竞选伙伴。这当然是幻想。约翰逊从一开始就踢开了罗伯特和他那帮子人。

埃德加和罗伯特两人互相耍花招。1964年1月在司法部举行的元旦晚上，罗伯特送给埃德加一对金丝袖链。埃德加写信致谢说，这对袖链“使我经常想到我始终珍视的友谊”。

然而就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给约翰逊总统送去许多情报，说肯尼迪的人仍然在捣鬼。明尼阿波利斯的特工头子汇报在一次宴会上听到的议论：肯尼迪派正在策划造成一种局面，迫使总统选择罗伯特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埃德加让德洛赫把这个情报亲自送给总统。

德洛赫说，“约翰逊总统知道如何用人。他早就认识到，把联邦调查局拉到他这一边，作为他的工具，对他会有帮助的。”

在白宫工作的人想起埃德加的一次恶作剧，就不寒而栗。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伦敦的特工人员查尔斯·贝茨听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跟他的助理马西娅·威廉斯发生了性关系。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埃德加，还说威尔逊是苏联的工具。而当时正是威尔逊很快就要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贝茨说，“我后来见到胡佛时，他对我说，关于威尔逊的情报非常好。他把它直接交给了约翰逊总统。我一听这个，大为不安，天哪，那是素材，我不希望使用它。”

这个情报在外交上造成尴尬的局面。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说，“总统不喜欢威尔逊，因为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不支持美国。胡佛知道约翰逊的脾气。约翰逊喜欢收集他不喜欢的人的色情丑闻。总统高兴地对我谈到威尔逊这方面的情况。当威尔逊带着马西娅·威廉斯参加第一次会议时，约翰逊对我说，‘不要让那个女人参加。’我不得不找个借口，对威尔逊说，这次会议只限于直接有关的政府官员参加。当时是很尴尬的。”

今天，有资格的人士一致认为，埃德加那份关于威尔逊的“得意”情报实际上是威尔逊的政敌炮制的诽谤性谣言。鲍尔说，“胡佛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恶势力。我讨厌那些荒谬的造谣。它们往往影响总统的态度，以致于歪曲政策。”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很快就同埃德加发生了冲突，部分原因是，麦克纳马拉坚持通过正常的渠道——即罗伯特部长——同调查局打交道。埃德加给总统送去了贬低罗伯特的材料，总统把这些材料读给麦克纳马拉听。埃德加对总统说，这位国防部长参与了罗伯特企图把他赶出联邦调查局的阴谋。麦克纳马拉认为埃德加在窃听政府官员的电话。他对总统说，埃德加是一个“威

胁”，应该把他解职。

然而约翰逊对埃德加的偏爱胜于对他的阁员。他把联邦调查局当作他自己的政治警察来使用。据估计，埃德加向他提供了 1200 份关于美国公民的档案以及许多新闻记者的材料。公民们致电总统，对某些政策提出批评，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调查局跟踪他们，收集他们的材料。

总统夸口说，他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知道富布赖特参议员在苏联大使馆的午餐会上说了些什么话。

1964 年 8 月，当民主党在大西洋城举行年会时，约翰逊最需要调查局的帮助。代表们一到达，调查局就在一些主要地点安装了窃听器。德洛赫带领了 27 名特工人员、一个无线电技术员和两名速记员。埃德加在白宫的默许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监听活动。

约翰逊的提名已经事先定了下来，但他对 1960 年败于肯尼迪兄弟手下的往事记忆犹新。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计划纪念约翰·肯尼迪，由罗伯特发表讲话，他很可能促使年会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约翰逊在华盛顿观察、等待着。他巧妙地安排时间表，使提名工作刚好在罗帕特登台讲话颂扬他的已故兄长之前结束。恰好那时约翰逊赶到了大西洋城，作为胜利者接受大家的欢呼。

有人奇怪，为什么约翰逊对年会操纵得如此高明。李普曼写道，“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能如此彻底地控制局面……”调查局的档案提供了答案。

德洛赫的一份报告说，“我们通过情报员的汇报、通过让秘密特工人员打入关键性集团、通过特工人员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等办法，使白宫充分了解情况。”另一份备忘录说，“通过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合作，我们的特工人员搞到了记者证。”

全国广播公司的负责人说不知道此事，暗示假记者证可能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提供的。德洛赫说，这个办法是很成功的。可见调查局常玩这个花招。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当场发现一个特工人员冒充记者提问题。

克利福德说，联邦调查局的主要任务是窃听参议员、众议员、年会的重要代表、民权活动分子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原则上讲，只有作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才有权决定进行电子监听。

总统后来对埃德加说，在大西洋城的“工作”是他所见过的最出色的工作之一。对约翰逊和埃德加来说，年会之后，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罗伯特去当参议员了。沃伦报告发表了，从而结束了肯尼迪时代。到 1964 年 10 月 14 日，离大选只有几周的时间，约翰逊总统突然碰到了性与安全方面的丑闻。

约翰逊的一个关系最密切的助理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厕所同一个退役的士兵发生性关系而被捕。詹金斯承认自己的过错，引咎辞职，住进了医院。调查局迅速进行了调查，认为他并没有危害国家安全。

然而仍有一个麻烦的问题：为什么这次逮捕在事发之后保密一个星期。调查局在安全审查方面据说是很有效率的，为什么却没有告诉白宫：詹金斯 6 年以前在同一个厕所犯过同样的错误而被捕过一次。

埃德加想出一个办法，试图找一个医生，让他说詹金斯脑部受损伤，神经不正常，才犯这个错误。但医生不肯这么做。

在埃德加的默许下，也许是在他的建议下，约翰逊试图把詹金斯事件的影响转嫁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身上。

詹金斯曾在第 999 空军预备队服役，而这个预备队的司令官当时正好是戈德华特参议员。他们两人曾一起乘空军的飞机旅行。根据这一点，在詹金斯辞职 3 天以后，调查局的两个特工人员便去讯问这位参议员。他正忙于竞选运动，讯问使他很恼火。如果戈德华特知道幕后情况的话，他会更加恼怒。

对詹金斯事件调查 9 天后写给德洛赫的一份报告表明，戈德华特的 16 个工作人员也被调查了。其中一人“经常在他的办公室同妓女约会”。这份报告是“根据局长的指示写的”。

约翰逊总统收到了调查局关于他的对手的档案。他甚至通过电话向民主党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读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至于埃德加，他之所以要对戈德华特进行破坏，当然也有原因。戈德华特犯了个错误，他说，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要撤掉埃德加。此话是私下说的，但他没有想到，在场的人中有一个人以前曾是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1964 年大选的胜利并没有使林登·约翰逊安下心来。次年的某天，约翰逊坐在得克萨斯的游泳池边，满面愁容地谈到日益加深的越南危机。他说，“我将作为一个失去东南亚的总统而载入史册。我将作为一个失去目前这种政体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三大广播公司和 40 家传播媒介。沃尔特·李普曼是共产党人，特迪·怀特也是如此。成为共产党人的，不仅仅是这些人。如果读读联邦调查局的报告透露的情况，你会大吃一惊。”

他的妻子伯德说，“林登，你不必过于看重这些报告……其中有许多是未经核实的情报，有些指责和道听途说还没有得到证实。”总统咆哮着说，“且不管那些，你看看他们对一些人了解之多，就会惊讶不已……我不想成为麦卡锡式的人物。但是美国面临的危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必须揭示这种情况。”

埃德加助长了约翰逊的神经质，直到他的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与此同时，他对马丁·路德·金展开一场最恶毒的人格毁损运动。而马丁·路德·金今天则被尊崇为英雄。

第三十章

马丁·路德·金之死

1963年年底，《时代》周刊提名马丁·路德·金为当年名人。埃德加颇为不满。他在该刊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他们只有深挖垃圾，才能找出这么一个玩艺儿。”

埃德加反对民权运动，不愿雇佣黑人特工人员。他在种族问题上采取的态度，要追溯到他的家世渊源。他诞生在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时代。当时黑人只能当佣人。他小的时候，他家雇佣一个黑人女仆。他上的中学只招收白人。多年以后，当这个学校也招收黑人学生时，忿怒的校友回校把它的校徽拆了下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学校是体现白人体面的堡垒。

不过，埃德加的种族偏见还有深刻的个人原因。在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华盛顿盛传：在埃德加的血管里有黑人血液。对这个传说，他自己肯定也是知道的。

1958年，记者威廉·达夫蒂在研究《纽约邮报》上发表的几篇关于埃德加身世的文章时，请反毒局的一位黑人特工人员帮助他秘密采访了埃德加的黑人男仆萨姆·诺伊塞特。当他们三个人一起谈话时，两个黑人屡次提到埃德加是“某种黑人”。在东区黑人社区，人们普遍认为埃德加有黑人的根子。许多人认为他是个混血儿。他的父母亲是白人，但祖辈难免有种族杂交现象。华盛顿是个种族歧视很厉害的城市。有些人发现自己是混血儿，甚至自杀身死。

不管这些传说是否真实，这肯定使埃德加感到不快。正如他为了掩盖自己偷偷摸摸搞同性恋而对其他的同性恋者特别狠毒一样，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血统问题而形成了他对黑人的态度。

虽然埃德加对三K党采取了一些有效的行动，但是当黑人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他的重点显然转移到这方面。

在肯尼迪当总统期间，埃德加不管是否愿意，不得不卷入种族问题的斗争中。民权运动和南方白人作出的暴力反应，成为国内的重大政策问题。埃德加被迫顺从司法部民权处的要求，同联邦政府一起处理美国的种族问题。

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调查警察的残暴行为和制止剥夺黑人选举权利的行径。联邦调查局被迫承担这些任务。埃德加感到气愤。

马丁·路德·金是亚特兰大一个和平主义传教士的儿子。他这个黑人有点不安分。他争取到的东西正是埃德加失去的东西——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听取意见的耳朵。

虽然马丁·路德·金抛头露面已经5年了，但埃德加仍然把他跟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混为一谈。现在对金可不能等闲视之了。1961年5月，联邦调查局的一份简报说，这位黑人领袖可能跟共产党有联系，调查局还没有对他进行过适当的调查。埃德加在简报上批示：“为什么不去调查？”从此开始了对金的迫害。

40年以前，埃德加在迫害黑人方面就初显身手。1919年，埃德加作为一个年轻官员在迫害上一代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加维出生于牙买加，他向美国的黑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幻想：大批迁移到非洲，建立一个黑人帝国。埃德加想把加维下狱或流放，结果他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埃德加对黑人歌唱家和演员保罗·罗伯逊的迫害也不遗余力，因为罗伯逊是为穷人说话的政治活动家。特工人员监视罗伯逊，散布谣言，说他是共产党人。

埃德加对加维和罗伯逊的迫害，成为他将来工作的蓝图。给人家扣共产党员的帽子、利用黑人特工人员打入内部、安装电子窃听器侦察人家的私生活——所有这些手法都被用来对付马丁·路德·金。

到 1963 年底为止收集到的各种情报并不能证明这位黑人领袖是共产党员，但对他的私生活的道德却提出许多问题。马丁·路德·金好色。虽然他是牧师，又已结婚，但不愿因此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每月有 25 天到 27 天离家在外。玩女人是消愁的一种方式。”金牧师到全国各地布道时，通常有 3 个情妇，有时还嫖妓女。他的许多随员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联邦调查局干预的话，金牧师玩弄女人的事本来是可以保密，被他周围的人容忍的。玩女人尚未被联邦列为罪行。但对埃德加和他的助理们来说，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则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埃德加的助理们精心策划，想败坏金牧师作为黑人领袖的名声。他们的办法是，揭露金牧师是“骗子”、“不道德”。为此，他们利用了许多牧师、“对他不满的熟人”、大胆的记者、黑人特工人员、甚至金牧师的妻子和看门人，还在金牧师办公室安插了几个漂亮的女人。司法部长对这些做法一无所知。

半个月以后，当获悉金牧师将要住进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时，特工人员赶忙在房间安装了窃听器和录音机，两天时间录了 15 卷录音带，其中包括金牧师、他的两个同事和两个女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声音。

他们把这些录音带像战利品一样送给埃德加。埃德加兴奋地亲自给约翰逊总统的助理沃尔特·詹金斯打电话，讲了其中的内容，并派德洛赫把录音记录送到白宫。

埃德加的特工人员在华盛顿窃听到金牧师更多的材料，包括他讲的关于已故总统肯尼迪及其夫人的粗鲁的性笑话。埃德加把有关的录音记录交给罗伯特看，他大为吃惊。

约翰逊总统听了其中的一些原始录音，有一天下午同埃德加讨论此事。不管埃德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动摇约翰逊对民权的支持。不管约翰逊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失误，但他却设法通过了许多有关种族问题的新立法，这是自内战结束以来最激进的措施。总统 1965 年在国会就黑人选举权问题发表演说以后，激动得泪流满面的马丁·路德·金给约翰逊打电话表示感谢。

1964 年春天，有消息说，密尔沃基的马克特大学打算授予金牧师以名誉学位，埃德加闻讯后，派一名特工人员去该校说服他们改变主意。由于干涉成功，这个特工人员获得现金奖励。

威廉·沙利文向基督教全国委员会讲了金牧师的“个人行为”后，全委会保证以后也不会给金牧师一文钱。根据埃德加的指示，同样的材料也送交浸礼会世界联盟。特工人员还奉命阻挠他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

1964 年 9 月，当金牧师要去梵蒂冈访问时，调查局曾经劝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不要接见金牧师。罗马教皇置之不理，照样会见了这位黑人领袖。更使埃德加生气的是，这位民权运动领袖还要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了。

埃德加说，“道德沦丧到极点了，竟然让他获奖。他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获得此奖的人。我鄙视他。”

埃德加既生气，又忌妒。原来他自己早就想得此奖。亚特兰大的警察头子赫伯特·詹金斯后来透露说，“多年来，胡佛一直动员美国的许多名人向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写信推荐他，但始终没有获得通过。倒是南方的一个黑人荣获此奖。胡佛真有点受不了。”

埃德加把有关金牧师的丑闻材料分发给美国的国务院以及联合国等单位。在伦敦，调查局的代表查尔斯·贝茨奉命到斯堪的纳维亚向美国大使们揭露金牧师的真面目。调查局的技术人员作好了准备，当金牧师去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要对他进行监听。

在华盛顿，埃德加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有 18 位女记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采访他，都被他拒绝。现在，他突然同意会见她们，大谈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最臭名远扬的骗子”。这成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调查局的一些官员认为他们的局长失言了。金牧师也认为他说漏了嘴。

金对可能造成的影响感到害怕，便要求政府安排他同埃德加见见面。1964 年 12 月 1 日，在动身去奥斯陆几天前，埃德加、金牧师和他们的助理们相聚于局长办公室。埃德加面部表情冷冰冰的。金牧师则力求表现得很热情。

埃德加提醒金牧师，他是“穿衣服的人”，“如果你没有做错事，你就没有必要担心。但是如果你干了错事，我们就会知道。……”金牧师神情不安，咬着手指的指甲，他后来对记者说，他和埃德加有了“更好的了解”。

在飞往欧洲的长途旅行中，金牧师心情郁闷。陪同他前往奥斯陆的妻子回忆说，“这本应是愉快的时刻……但他却担心那些谣会损害民权运动，他也担心会影响黑人群众对他的看法。……”

马丁·路德·金返回美国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给他提供了一架私人专机。与此同时，埃德加赶忙给当选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写了一封关于金牧师“个人行为”的信，因为汉弗莱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的招待会上致词欢迎金牧师。

1965 年 1 月初，金牧师的妻子在家里收到了邮寄来的一个小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卷录音带。助理们原以为是金牧师某次讲话的录音，不料却是调查局综合复制的窃听录音。金牧师听了这些东西以后说，“他们是要骚扰我、折磨我、在精神上搞垮我。”他被折磨得失眠了。

24 小时以后，埃德加从监听录音中知道了受害者的反应。他达到了目的，颇为满意。

这种骚扰仍在继续，有一段时间，金牧师更加烦闷。后来，他又振作起来。他决心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他说“我们不能让埃德加和联邦调查局得逞，因为我们在为一个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被杀害了，终年 39 岁。他站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一颗步枪子弹打中，几分钟内就死了。全国贫穷的黑人，群情激愤，万分悲痛。国家领导人同金牧师的遗孀一起出席了有 15 万人参加的葬礼。

埃德加没有参加葬礼，但次日上午也拍了他的照片，给群众作样子看。据说，他亲自主持了谋杀案件的调查。其实，像肯尼迪总统被刺以后一样，他看赛马去了。在以后的几周中，他也没有参加跟司法部长一起讨论调查进展情况的会议。

两个月以后，一个名叫厄尔·雷的无足轻重的罪犯在伦敦被逮捕并引渡回美国。他承认谋杀金牧师是他干的，并被判徒刑 99 年。然而事情并没有

到此结束。厄尔·雷的认罪是他的律师和检察官之间的交易的结果。他很快就推翻以前的供词，要求宣布审判无效。后来，法官病故。虽然多次作出努力，但给厄尔·雷定罪的证据并没有在法庭上经过检验。现在他已 65 岁，仍关在监狱里。

很少人认为厄尔·雷是单独一人干的。10 年以后，国会暗杀问题委员会重新作了大规模调查，认为这是一个共谋行动，他是被雇佣来刺杀金牧师的，他的两个兄弟也参与此事。

1988 年，电视台在监狱对厄尔·雷进行采访时，他说，他原先的供同是在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下作出的。他说，特工人员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要把他的父亲和一个兄弟逮捕入狱。他是被迫掩盖联邦调查局杀害金牧师的阴谋的。

暗杀问题委员会并不认为调查局参与了谋杀。不过，它认为，对此案的调查不够充分。即使埃德加和调查局没有参与实际谋杀，他们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罪责。他们造成了一种气氛，使得金牧师的被刺可以容忍。

1975 年，福特总统宣布，对联邦调查局诽谤金牧师负责的那些人应该加以审讯。接替埃德加担任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表示同意。那时，埃德加已死，克莱德亦然。其他有关的官员尚活着，然而任何人都没有被追究责任。

马丁·路德·金被刺两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谋杀。像他的哥哥被刺杀一样，他的死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1968 年夏季，随着罗伯特·肯尼迪离开人世，在埃德加的地平线上，似乎没有强敌了吧。然而这是幻想。

第三十一章

尼克松和埃德加

埃德加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但他的所作所为好像他可以使时钟不走似的。1968年，他73岁了，那个粗壮的身躯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医生说他很健康。助理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新闻界。关于克莱德，他们则很少提及。

虽然克莱德比埃德加小5岁，但他已动过心脏手术，得过一次中风。他的视力很弱，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看信件，有时完全不能上班。埃德加不能容忍他的朋友在公众的眼里显得很衰弱。当克莱德在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摔倒时，埃德加不让随从人员搀扶他。他说，“别管他，让他自己站起来吧。”

克莱德到70岁时，就自动“退休”了，但是，只退休一天，便被埃德加重新聘用。克莱德继续得到工作“出色”的评语。虽然他视力不好，但仍领到了工作手枪。调查局的宣传说，埃德加和他的这位得力干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一如既往令人敬畏。

不过，骨干们日益产生怀疑。洛杉矶的一批特工人员给司法部长写信说，“局长老朽昏庸，权迷心窍，妄自尊大。”有两个以前曾在调查局搞过特工工作的人竟然敢于写书批评他。埃德加发现，昔日的压制办法已经失灵了。他发现，甚至保守的报纸现在也刊登文章嘲笑他说，他当局长究竟还能当多长时间。

历史把埃德加抛在后面。过去，他总是知道如何随机应变，保持调查局的良好形象。现在，他未能认识到，作为他的群众基础的美国中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舆论是支持民权的；调查局本来可以利用这一点，显示出自己执法的作用。然而，埃德加则大骂共产党对黑人运动的影响，大骂马丁·路德·金的“谎言”。当千百万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的时候，埃德加却派特工人员渗入抗议团体，破坏游行队伍。他再也不能操纵舆论了。

当埃德加的衰落和垮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仿佛有某种历史的磁石把他们俩吸引到一起似的。自从埃德加第一次对尼克松投以赞许的目光以来，已经过去了21年。他和他的富有的石油大王们培养尼克松从政，使他在1952年当上副总统。在1960年的大选把尼克松推下政治舞台以前，人们多次看见他同埃德加肩并肩地坐着，一起观看赛马和棒球赛。

甚至在尼克松下野以后，埃德加仍然是他家的座上客。当水门事件把他拉下马后，尼克松说，“胡佛是我的好朋友。”

1968年，当尼克松竞选总统进入高潮时，他保证在他当政时留用埃德加。埃德加向他透露有关情报，以打击民主党反对派。他不想作为尼克松的竞选伙伴，争夺副总统宝座，而只希望乘坐共和党这只经得起风浪的大船过几天安全的日子。

他知道民主党现在的主要角逐者休伯特·汉弗莱仍然很有可能获胜。所以，当汉弗莱的人要求埃德加像几年以前为约翰逊效劳那样提供“同样的服务”时，他并没有反对。不过，这回没有电子监听，因为当埃德加要求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批准时，他被断然拒绝。

埃德加担心，如果汉弗莱当选为总统，他的官位难保。在白宫，心情郁闷的约翰逊又为他个人的安全担心。他对一位助理说，“自从我当权执政后，我一直照顾他。现在我要离职了，我希望他关照我……”

11 月份，当尼克松得胜时，埃德加给约翰逊写了最后一封讨好他的信。在他写出此信两天后，他就在纽约的皮埃尔饭店会见了尼克松，对尼克松说，约翰逊在竞选运动期间非法利用了联邦调查局。尼克松回忆说，“胡佛对我说，我的飞机的座舱在过去两周中被安装了窃听器。他分别告诉了米切尔（内定为司法部长）和我……是约翰逊下令这么做的。”

但调查局的档案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尼克松被窃听了，只是对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的电话记录进行了检查，因为约翰逊认为共和党在破坏越南和谈。尼克松的助理霍尔德曼证实，埃德加不仅说进行了窃听，而且他还在其他方面利用了尼克松的恐惧心理。

这位局长警告尼克松说，“当你进入白宫的时候，不要通过总机打电话。有些你不知道的小人会偷听你的电话。”埃德加说，美国陆军通讯队负责的总统电话线是不安全的，“总统应该知道，如果他在这条线路上通话，他很可能被监听。”

霍尔德曼回忆说，“我们常常看到胡佛带着一个小皮包来白宫，里面装着各种情报、惊人的东西。他的眼睛望着天空，不作出肯定的结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联邦调查局对总统十分有用。”

埃德加希望自己万事如意，重新恢复共和党上届政府期间他享有的那种权力和特权，在那届政府中尼克松担任副总统。霍尔德曼亲眼看到埃德加和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会见时的情景。他认为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尼克松说，“埃德加，你是少数可以随时同我直接接触的人之一。”

然而当时也在场的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则认为他的上司是“故意在表面上做做样子”。尼克松怀疑埃德加的能力，正在秘密地考虑把他解职。甚至当他向埃德加封官许愿的时候，他就同别的人接触，来取代埃德加。

在棕榈滩的一次会晤上，尼克松向戈德华特派的一个保守分子、前调查局特工人员皮特·皮彻斯提及局长职务。皮彻斯反应很谨慎。他说，“胡佛还没有说他要退休。”尼克松说，“不，他对我说，他将在他生日的那一天退休。”皮彻斯说，“是啊，但问题是，哪一个生日？”尼克松转换了话题。

为什么尼克松没有搞下去呢？皮彻斯说，“他害怕。每一位总统都怕胡佛。约翰逊总统是这样，甚至肯尼迪总统也是这样。他们全都怕他。尼克松也不例外。他说，‘我得巧妙圆滑地对付胡佛。’”

约翰逊总统对一位朋友说，调查局关于尼克松的档案很厚。他同白领犯罪分子的联系以及可疑的商业交易可能使档案增加得更多。不过，有一份材料也许使人意想不到，那就是尼克松同一个女人——一个异国女郎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 1958 年，当时尼克松 45 岁，已经结婚，并担任副总统；他认识了 20 来岁的香港导游小姐刘梅丽。尼克松在野时，他到香港做生意，又同她相逢，从 1964 年到 1966 年，他们每年都见面。那时她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间当服多员。两人还一起照了像。

据刘梅丽自己说，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饭店的套间访问了尼克松和他的旅伴——一个有争议的商人贝比·雷博佐。她和尼克松都否认发生过性关系。刘梅丽说，有一次尼克松来香港，她生病住院，尼克松送了她一束鲜花

和一瓶她喜欢的香水。

一个曾在香港工作的特工人员回忆说，尼克松同刘梅丽的关系曾引起安全问题。现在担任安全顾问的丹·格罗夫说，“有一天上午，我在美国其他单位的一个接头人对我说，他的一个提供消息的人说刘梅丽去见尼克松了。他认为，我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人们怀疑，她是中国的间谍，她认识许多美国海军军官。他说，他知道尼克松作了一个绝密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这使他同刘梅丽的接触具有危险性。”

格罗夫那天中饭时间去希尔顿饭店同刘梅丽进行了交谈。他回忆说，“我的同事对她说，‘昨晚你同一个大人物在一起，是不是？’她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他又问，‘同你们在一起的有什么人？’她回答说，‘他的朋友贝比·雷博佐。’刘梅丽和她的一个女朋友同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天一夜。

“这并不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但我决定向上级汇报此事，了解一下她是否有访问美国的记录。经查证，她的确访问过美国一两次。她的背景并没有调查过。这表明，她有间谍之嫌。我向英国特工处作了调查，他们说，‘她在我们这里已经记录在案。’她之所以引起他们注意，是因为她可能是中国间谍。她的活动主要是瞄准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所以他们没有继续盯下去。我把这些情况向调查局助理局长沙利文作了汇报。他回答说，‘尼克松的私生活，调查局不感兴趣……’”

据刘梅丽的律师说，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证实，她同尼克松的接触引起美方警惕，尼克松在香港的活动受到监视，通过他的卧室窗户用红外照相机对他进行了拍照。格罗夫说，这种监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请英国情报部门帮助进行的。

格罗夫回忆说，“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后，有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在办公室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了刘梅丽同尼克松的合影。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是在总统就职典礼的舞会上拍摄的。她是怎么到那里的呢？……我给调查局局长本人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回信。”

这并不能证明尼克松和刘梅丽睡过觉。调查局也从来没有在香港调查过此事。不过，未经核实的性材料始终是埃德加手中的王牌。据沙利文说，埃德加看到关于刘梅丽的情报时十分高兴，他在尼克松当选为总统以前曾给他看过这份报告。

尼克松访问香港时的旅伴雷博佐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大亨。他是尼克松的心腹。他干了许多值得怀疑的商业交易，还把他资助的竞选资金装进尼克松的私囊。埃德加对迈阿密的特工头头肯尼思·惠特克说，要特别注意监视雷博佐。

埃德加和尼克松之间关于他的香港之行和刘梅丽的关系究竟有什么交易，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尼克松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他同刘梅丽的关系无瑕可指，但由于涉及到安全问题，也会对他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危害。而这方面的档案掌握在埃德加手里。

1968年圣诞节以前，尼克松和埃德加在皮埃尔饭店会晤几周以后，他就宣布重新任命埃德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他还把他的年薪增加到4.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尼克松就职典礼的游行活动是在戒备空前森严的条件下进行的。埃德加的特工人员使用种种手法阻挠反对越南战争的人的抗议示威。

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办公室的窗户都奉命关闭了，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埃德加和克莱德像以前一样，站在总部办公室的阳台上观看了另一个政权的诞生。

尼克松对他的两位主要助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没有谈过刘梅丽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他害怕埃德加的其他因素。他只是指示埃利希曼要成为埃德加的“好朋友和在白宫的亲信”。

埃利希曼的第一个使命是使埃德加放心，他所关注的联邦调查局新的宏伟总部大楼的建设是没有问题的。自从国会同意联邦调查局建设新大楼以来，已经过去8年了。新大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最高处11层。埃德加正在催促规划单位早日破土动工。

埃德加担心，新大楼的开放式连拱廊可能为酗酒者、同性恋者和妓女大开方便之门。但他又想，那一排排圆柱将可以预防刺客的潜入。在公开场合，他表示，大楼不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其实，那正是他所希望的。

埃利希曼对埃德加说，大楼的兴建工作将加速进行。接着，局长便对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埃利希曼回忆说，“他是在对我做动员工作，告诉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共产主义、肯尼迪家族、黑豹党……他谈到黑人运动时，充满仇恨。”

这位助理后来对尼克松抱怨说，“我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总统说，“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尼克松特别为埃德加开脱。尼克松到全国警官学院，接受了成为联邦调查局荣誉特工人员证书。他为此奋斗了30年之久。他带着埃德加和多病的克莱德到戴维营过周末。

埃德加善于玩弄拉拢人的把戏，给人以小恩小惠，使对方觉得离不开他。当尼克松选择富有的律师、但显然不够条件的约翰·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时，埃德加要求总统不必由联邦调查局进行严格的审查了。他同米切尔的关系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真挚、通情达理的人，……我最为尊敬的一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由于在水门事件中说谎、共谋阻挠法律的执行而被判刑19个月。

早期，尼克松几乎每个月都请埃德加到白宫去。总统回忆说，“吃早餐的时候，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情报。我往往觉得，在这个政府里跟我站在一起的只有埃德加·胡佛……他把他掌握的东西给了我……那都是些小东西。”

在尼克松当总统期间，调查局把向白宫提供各种丑闻情报制度化了。尼克松的官员对此不感兴趣。亨利·基辛格和亚历山大·黑格公开嘲笑关于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的冗长累赘的报告。埃利希曼说，“我所看到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质量是很差的，都是些道听途说、主观猜测。我把质量特别差的东西退给了胡佛。重新修改后，往往也并无多大改进。”

在白宫，霍尔德曼阅读了特工人员在监视外国人时顺便收集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家的情报。他认为，埃德加是“故意想引起总统的好奇心”。霍尔德曼不安的是，埃德加试图通过总统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了解椭圆形办公室的情况。伍兹后来由于销毁了水门事件的一盘录音带而变得无人不晓。她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为尼克松工作。埃德加跟她的关系很好。在霍尔德曼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把这种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他同埃德加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

埃德加意识到这种变化是尼克松的顾问们造成的，他便以其特有的方式

予以回击。他利用伍兹小姐传递了一个惊人的信息：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德怀特·蔡平都是同性恋者。

原来这些情报是为调查局效劳的一个酒吧间服务员提供的，说他们参加了水门大厦举行的同性恋者晚会，有时间、地点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都是捏造的。这是埃德加的一个手法，旨在给他们造成威胁，使他们就范。

这只是这场戏的开始。仲夏，埃德加围绕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许多奇怪的言论，引起人们的不满。前司法部长拉姆奇·克拉克以及《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要求他辞职。据说总统也在想办法搞掉他。

尼克松否认了这个传说。使助理们惊讶的是，他竟去埃德加的家里同局长共进晚餐。这样的荣幸连阁员们也不曾得到。他让摄影师们拍摄了他在门口向埃德加道晚安的亲切景象。然而埃利希曼说，“总统那天晚上似乎有点心事。他在礼仪许可的范围内很早就离开了。”

在7月份各方发出要求埃德加辞职的呼声后，埃德加悄悄地访问了尼克松，谈到他新收到他的特工人员送上来的一份报告。总统的中国女友刘梅丽即将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权。她的保证人之一是威廉·奥尔曼，即同尼克松一起访问香港的一个商人。另一个保证人是雷蒙德·沃伦，他是尼克松时代的一个移民官员，他住在尼克松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

尼克松一直否认他曾利用他的影响，帮助刘梅丽获得在美国居留权。但据沙利文说，调查局的情报表明，刘梅丽获得“优先照顾”。她被允许进入美国，住在惠蒂尔，据说抵美后又同尼克松见过面。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到关于她去过白宫的消息时，刘梅丽非常不安。她大声说，“关于我和尼克松先生，我不想说任何话。你们是不是想要搞死我？”

1970年元旦，埃德加满72岁时，尼克松打电话祝他生日愉快。他让新闻界知道此事。他又说，不打算让埃德加退休。几个月以后，又出现关于埃德加要退休的新闻报道，埃德加生气地写道，“我不打算退休。”

现在，华盛顿出现一个新的笑话：正在作出计划，使埃德加自动连任——在2000年。

埃德加用所谓同性恋的谰言来诽谤总统的助理们。现在，他们倒要看看埃德加在1969年的所作所为了。警察局得到的情报说，埃德加跟克莱德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度假时，沉溺于跟10来岁的男孩子搞性交。

这件事是查尔斯·克雷布斯讲的。他是六十年代末一群打得火热的洛杉矶同性恋者中的一个。克雷布斯的一个朋友是小拜厄斯。小拜厄斯的父亲是石油大王，同埃德加要好。埃德加由于认识小拜厄斯，便通过他把几个10来岁的男孩子带到住地。

拜厄斯在洛杉矶的寓所一度成为同性恋者的乐园。大家都知道埃德加和克莱德是同性恋者。克雷布斯回忆说，“我从拜厄斯那里得到这样的印象：胡佛和克莱德年轻的时候，彼此发生过性关系。但后来年纪大了，彼此只是作为伴侣。据我所知，在胡佛的要求下，有三次把几个男孩子送到他那里。

“有两回，我跟着他们到拉霍亚，在一个名叫卢迪的酒吧间约会。胡佛和克莱德坐着高级轿车来到这里。然后，用两辆车，一辆是胡佛的车，另一辆是让两个男孩子坐的，把他们送到山上水库那里。两个孩子下车，钻进胡佛的车，在那里干他们的事。”

克雷布斯回想起此事，十分忿怒。他说，“原来胡佛自己就是个同性恋者。但他对别人搞同性恋，是深恶痛绝的。谁搞同性恋，他就给谁立档案，

派特工人员跟踪盯梢，进行调查。然而到头来，他自己也在于这种丑事。”

第三十二章

众叛亲离

1969年4月，忧心忡忡的尼克松总统召见埃德加，讨论由于越南战争问题而席卷全国的骚动。此伏彼起的学潮、青年拒服兵役、战场上军队可能哗变，这一切都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样的事态发展会“使政府倒台”。埃德加把当时的形势比作1917年俄国的革命。他对尼克松说，要解决学潮问题，“大学校长们就必须更加大胆一些，把闹事的人赶出校园”。

后来，俄亥俄州的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的群众开枪，打死4人，伤8人。埃德加无动于衷。他对总统助理埃吉尔·克罗说，“警卫队尽量克制，忍无可忍。这是学生自己招惹的，罪有应得。”

事实上，据官方调查，当向学生开枪时，他们离警卫队还有几百英尺远，并不构成威胁，被打死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当时的录像表明，有人先开了一枪，接着便是致命的齐射。这第一枪可能是特伦斯·诺曼打的，作为一个信号。诺曼伪装成一个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

所有抗议越南战争的组织都被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渗入。根据埃德加的指示，雇佣了一些情报员，负责汇报反战分子的计划和他们的生活，其中有些人很有名。女演员简·方达到北越访问，引起很大争议。她回到美国机场时，披头散发。她的名录本上有许多革命左派组织的人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结果被没收并复印，存入调查局的档案。她的邮件被拆开，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银行帐目被检查。在调查局的档案上，她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简·方达”。

有名的人由于他们名气很大而得到一定的保护。那些无名之辈就更惨了。老资格海军陆战队员斯科特·卡米尔从越南战场回国，身负重伤，曾获得9块军功奖章。他对这场战争产生很大的疑问。他协助建立了“越战老战士反战同盟”，并把他的奖章扔在国会前面。于是，埃德加下令对他进行全面的调查。他先是被加以绑架罪，接着又说他拥有大麻，被软禁在家，无法外出活动。

当时最厉害的一手是调查局的“共产国际计划”。这个计划原本是13年以前出台的，旨在用假文件、假电话、假新闻报道等卑鄙手法破坏共产党。1968年，在埃德加的批准下，特工人员编造了一封信，寄给《生活》杂志，署名为霍华德·拉斯马森，其实，并无此人。此信的目的是诽谤青年国际党（又叫易比派）领导人莫里斯·斯塔斯基。他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助教。他同时也是反战分子了。调查局给该校的负责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他被解职。

联邦调查局对激进团体分化瓦解，挑起矛盾，使它们互相争斗。调查局的宗旨本来是打击和防止犯罪活动，然而它自己也走上这条道路。新泽西州的一名调查局情报员哈迪作证说，特工人员鼓励他劝说反战分子闯入当地征兵局的办公室。他们需要共谋的证据。哈迪给这些反战分子提供梯子、绳子、钻具、斧头等。有一次，他奉命向他们提供枪支，但他们不肯接受。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调查局出钱的。结果，这些抗议分子被当场捉住。这样一来，全国就可以看到人证物证，说明政府警告大家注意来自左派的威胁，是正确的。

调查局在别的方面的做法更坏。黑人运动，特别是好战的黑豹党，受到无情的攻击。黑豹党同主流派的民权运动不同的是，它鼓吹革命，许多人拥有武器。埃德加说他们是“对美国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

黑豹党人的募款对象包括教会和妇女组织，它们吃惊地收到描写黑人儿童杀死白人警察的小册子。黑豹党领导不赞成这本小册子，下令全部销毁。但是，调查局弄到了这些书，广为散发，以阻止人们为它捐款。

在支持黑豹党的人中间，有几位著名的白人，其中包括电影演员琼·西伯格。调查局想在西伯格身上作文章。洛杉矶的特工人员赫尔德给埃德加出了个馊主意：张扬西伯格已怀孕，是黑豹党的雷蒙德·休伊特搞出来的。

调查局通过电话窃听，获知西伯格怀孕。埃德加建议先别透露这个情况，等西伯格“肚子再大些，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再发那封“栽赃”的信，这封信是用一个化名写的。两周以后，洛杉矶专栏作家乔伊斯·哈伯写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提到一位女演员，说她“腹中之婴的父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黑豹党人”。后来，《好莱坞报道》和《新闻周刊》也先后报道了此事。

调查局很清楚，西伯格在情绪上早已心烦意乱，接受心理治疗。在这件事传开以后不久，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片。在《新闻周刊》的文章发表几天后，她就早产了，婴儿只活了两天就夭折。这个婴儿的父亲既不是那个黑豹党人，也不是她已经疏远了的丈夫——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而是她在拍电影时结识的一个墨西哥人。

这位女演员念念不忘早死的婴儿。几年以后，当她了解到真实情况，知道调查局的阴险作用时，她悲愤交加，竟寻短见，死于1979年，差不多恰恰是婴儿夭折的9周年之际。悲痛的罗曼·加里说，“西伯格死于联邦调查局之手。”

埃德加给白宫送去一份关于西伯格的报告，说她是一个“性反常者……她现在怀孕是同黑豹党的雷蒙德·休伊特发生关系的结果”。就在同一天，《洛杉矶时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他还把这个报告的副本送给了司法部长。

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受到调查局恶毒的算计。他有三个缺点：他是黑人；他是民权运动的大力支持者；他公然说埃德加是“美国最危险的人之一”。因此，埃德加命令芝加哥（格雷戈里住在那里）的办事处“采取措施对他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情报界，所谓“无害化处理”就是“杀死”的同义词。这并不意味着死在调查局手里。实际上，可以借刀杀人。埃德加指出，格雷戈里最近直言不讳地攻击犯罪组织，说黑社会的成员是“地球上最恶毒的蛇”。他要芝加哥的特工头头马林利用格雷戈里的这句话，促使黑社会注意格雷戈里的攻击。这无异是煽动黑社会殴打、甚至杀死格雷戈里。现在已经退休的马林不肯说，他是否执行了这项指示。不过，格雷戈里仍然活着。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来发现，联邦调查局采取各种卑鄙手法，挑起黑豹党的撕杀、殴斗和骚动，造成黑豹党成员的伤亡。

但是，尼克松的白宫认为，在打击激进团体方面，埃德加做的还不够。1969年和1970年初，平均每天有80起炸弹爆炸事件或炸弹威胁事件。仅纽约市的一天就有400起炸弹威胁事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飞马石油公司等都在曼哈顿的办公处挨了炸弹。有43人被炸死，财产损失达

2100 万美元。

尼克松总统回忆说，那是“恐怖的岁月”。恐怖分子很少被抓获。在 4 万起事件中，64% 的投弹者未查到，动机不明。尼克松周围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联邦调查局收集人们私生活的丑闻不少，而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多少情报。还有一些情况，在目前情况下简直不能容忍。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自四十年代以来，埃德加就对中央情报局采取敌意的、不合作的态度。不过，虽然埃德加很少会晤中央情报局的历任局长，但他手下的人则早就设法同中央情报局合作了。但是，在 1970 年，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埃德加竟下令停止了同它的一切联系。在一个城市里，任何事情都是各干各的，互相扯皮，这使情报界所有的人都感到震动。

埃德加的负责同中央情报局联系的老手萨姆·帕皮契十分震惊，所以提出辞呈。他写信给埃德加说，“我希望你也同我一样感到不安。我绝对相信，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情报机关已经被苏联人打入……如果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破裂，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分裂……我呼吁你敞开大门。”

埃德加置之不理。不久，他就使联邦调查局割断了同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军队情报系统和特务处等单位的联系；除了白宫以外，他同任何人都来来往。

正像老人们常常使自己孤立一样，埃德加企图使联邦调查局孤立起来。尼克松的助理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他们还感到失望的是，特工人员现在不搞“黑袋”工作了。“黑袋”是调查局的黑话，指非法闯入。几十年来，埃德加一直支持这种活动，到了 1966 年他才下令停止，因为那时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受到空前严格的审查。他的这个正式命令主要是为了保护他的后方，倒不是突然遵守礼仪了。“黑袋”工作仍在继续，不过更加谨慎了。然而，尼克松周围的年轻人却不像这个老人那么谨慎。

1970 年 4 月，霍尔德曼向总统抱怨埃德加，并要求实行变革。尼克松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命令全国的情报头头们迅速研究一下安全形势。

鉴于埃德加看不起其他单位的同行们，尼克松迎合了他的虚荣心，让他担任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但尼克松却又任命总统助理托姆·休斯顿进行协调。休斯顿虽然是个右翼分子，但从一开始就跟埃德加合不来。他才 29 岁，年富力强，博学多才。他留着连鬓胡子和长头发。埃德加说他是“嬉皮派知识分子”。

从现在起在很长时期内，埃德加不得不派一位助理参加美国最有威望的情报组织——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会议。他对那个组织的态度从尼克松时代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来：当时要求每个机构把自己单位的牌子送一块来挂在会议室的墙上。埃德加送去的牌子直径达 3 英尺，为别的单位的牌子 3 倍大。现在，他当了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行为举止也是那么自高自大。

在第一次会议上，埃德加出语惊人，他说总统只是想了解现在骚乱的演变情况。同事们纠正他说，尼克松想要知道，在搜集激进运动的情报方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埃德加不好意思，涨得满脸通红，赶快结束了会议。

两周以后，埃德加在所有单位都已经同意的一份文件上又加了自己的批语，结果引起委员会其他委员的不满。在签字的会议上，他竟把这份 43 页的

文件全部大声读了一遍，使大家颇为吃惊。他读完一页，就围着巢子走来走去，征求大家意见，而且他总是把休斯顿的名字念错，不是念成“霍夫曼”，就是念成“哈钦森”。这次会议也是不欢而散。

休斯顿提出一项建议，已经被总统批准。这个建议要求：对“危及国内安全的威胁”加强监视，监听美国公民使用的国内通讯，减少对检查信件的限制，增加大学校园的情报员，全面恢复“黑袋”工作，建立一个联系所有情报机构的、统管国内安全的总组织。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任何总统批准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都会造成麻烦。埃德加也极力反对，但并不是出于原则方面的考虑。尼克松在 1988 年说，“胡佛是赞成休斯顿计划的，但最好是由他提出来。他不信任中央情报局，不相信任何别的人。他是个偏执狂。”

休斯顿面临一场激烈的后卫战。他给霍尔德里曼送去一份“绝密”文件，指出埃德加是表示反对的唯一官员。他说：

“有时候，必须提醒胡佛，谁是总统。他变得太不近情理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正使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让他得逞，他就显得比总统还要有权势了……”

当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尼克松也不是好惹的。埃德加去拉霍亚度假去了。休斯顿靠边站，最后也辞职了。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完全理解形势的变化。埃德加疏远了一些有权势的人，而正是他们的行动决定着他的晚年、联邦调查局的未来和美国的历史。

埃德加最信任的助理沙利文同休斯顿发生对抗，怨气冲天。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他早就对同国内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受到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他也开始耍两面派，一方面鼓励休斯顿干下去，另一方面又让埃德加觉得他是在维护调查局的政策。

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因为埃德加周围的人都盯着接班。如果从内部物色人接替埃德加的话，那么，沙利文和德洛赫将是两个主要的角逐者。

德洛赫认为没有必要等待埃德加退休了。总统的好朋友唐纳德·肯德尔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副总裁，他早就请德洛赫去他那里工作。德洛赫回忆说，“我去这位老人那里，相谈两个多小时。当我起身离开时，他说，‘如果你决定离开调查局，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正是来告诉你这件事。’他说，‘好嘛，我想，你到我这里来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在以后的两周中，埃德加不再跟德洛赫说话，不再让他看高级邮件。接着，他任命沙利文接替德洛赫的职务，担任助理局长，仅次于多病的克莱德，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三号人物。这对埃德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对德洛赫说，“我决不离开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岗位。”

埃德加那天还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沙利文是忠于我的。”不错，在过去 30 年中，沙利文的确是一直忠于他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沙利文在尼克松政府中找到了新朋友，他一只眼盯着局长的职务，另一只眼看到跟埃德加的深刻分歧，他并不可靠。沙利文已经变成犹太，等待时机出卖埃德加呢。

在白宫，休斯顿被一个名叫约翰·迪安的年轻人取而代之。他很快就得出了尼克松政府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同意的一个结论：“胡佛失去了他的势力。”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迪安不声不响地幕后策划，推进了埃德加未能搞成的国内情报计划。埃德加不妥协的态度使人们大失所望。白宫的那些傲慢的年轻人现在索兴甩开他大干起来了。

这个趋势会使所有那些被卷进来的人都逐渐背叛埃德加的。

第三十三章

竭力保住自己的官位

1970年，一个寒冬凛冽的早晨，埃德加仍然在家里睡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把汽车停在街上，沿着小巷子急速走着，收拾垃圾。不过，他并不是清洁工。他是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工作的记者，名叫查尔斯·埃利奥特。

一个来小时以后，埃德加坐进他的汽车去上班，埃利奥特一直盯着他。整个白天，当他知道埃德加已经离开汽车的时候，他便站在门口擦脚棕垫上，旁边是一个邮筒。他透过前门的玻璃看看里面的埃德加全身铜像。铜像傲然矗立于摆满纪念品的门厅中。接着，他便向左邻右舍问东问西。

1971年是埃德加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年，《华盛顿邮报》把这一年元旦调查的结果公诸报端。安德森写道，“我们决定对埃德加·胡佛的私生活进行一次联邦调查局式的调查。”实际上，从垃圾里面并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只发现一些手写的菜单，用的是上面印着“局长室”字样的信纸。其中的一个菜单开列着：蟹肉汤、细条实心面、肉元配芦笋、薄荷冰淇淋和草莓。这位伟人还喝威士忌酒、可口可乐、汽水等。

埃德加闻知此事，很生气。他把安德森称作“所有专栏作家中最大的揭丑专家”。清除垃圾的埃利奥特有一天晚上回家发现两个调查局的人在他的门口。他们给他拍照后，就奔向自己的汽车。埃利奥特同房间的一个人是调查局特工人员的儿子，他告诉埃利奥特，这个公寓不再欢迎他居住了。

后来几期《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刊登了一些严重的揭露文章。安德森的文章透露，埃德加在加利福尼亚度假的费用都是由他的百万富翁朋友支付的。他说，埃德加从《欺骗大师》和其他两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中收到的稿酬超过25万美元，而这些书并非出自他的手笔。安德森指出，“这些过失如果是其他政府官员犯的话，就会要求调查局去进行调查。”

这两篇文章使埃德加害怕，而第三篇文章更加使他胆战心惊。安德森写道，“有资格人士对我们说，胡佛曾经到著名的神经科医生拉芬那里去看病。”安德森非常接近于埃德加最敏感的秘密，因为埃德加多年以前曾就他的同性恋问题到拉芬那里进行过心理治疗。

埃德加惴惴不安。他跟司法部长米切尔谈过安德森，而在那篇关于心病医生的文章发表后，他跟副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谈过话。他说，“对这些混蛋，我不能放过他们……是否控告他们进行诽谤，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克兰丁斯特劝告说，“只要他们对你的名字拼写正确，就别理他们了。”

安德森报道说，克莱德身体十分“虚弱”，无法正常工作。这是事实。那一年，克莱德又得了一次中风。当他的外甥去医院看他时，他都不认得他了，连说话都很困难。然而同一年，埃德加却发给他这位朋友特别奖，表彰他的出色工作。

埃德加自己的工作情况如何呢？德洛赫说，“到我1970年离开的时候，他9点钟上班，呆到11点45分钟，便到‘五月花’饭店吃午饭，1点钟回来，呆到3点钟便回家了。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日程。”

外地的官员实际上根本无法见到埃德加。尼尔·韦尔奇说，“过去，他每年都要跟各地的特工头头见一次面。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

他不见任何人了。我们得不到任何信息。任何人都见不到他。如果问他像什么人，大概像俄国的沙皇吧。”

现在公众看到的是一个爱争吵的老头儿，动辄责骂他的敌人，包括那些已无法还嘴的人，如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当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在一本书中批评他“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名誉地位”时，埃德加立即进行反击，骂克拉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笨蛋”。

在尼克松的白宫，不安情绪在增长。尼克松之所以不敢动埃德加，是担心他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其实，实际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被征询的人中有 51% 的人认为埃德加应当退休。

1971 年 2 月，尼克松的讲稿起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向尼克松进言说，埃德加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包袱，应该尽快把他换掉。

当这封信送到总统那里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国内，他面临着 10 年来最高的失业率。国外，他卷入美国支持的、越南对老挝的入侵，接着又出现了美军在越南美莱的大屠杀。越南战争对尼克松来说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他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埃德加也接连碰到难办的事情。

在女权主义盛极一时之际，埃德加仍然为能否让秘书穿短裤而犹豫不决。他一年以前曾写道，“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来查明妇女解放运动造成的颠覆影响。”现在，他公然拒绝了两位女青年要求当特工人员的申请。她们控告了他。后来，他又解雇了两位女办事员，因为她们在业余时间帮助和平组织工作。

1971 年 3 月，一些窃贼闯进宾夕法尼亚州梅迪亚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偷走大约 1000 份文件，其中包括监视学生、激进分子和黑人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至少有一份文件标着“共产国际计划”，这是调查局最机密行动的代号。这些窃贼以“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自居，他们把文件的复印本分发给记者和政治家。他们从未被抓到，因此，埃德加终止了“共产国际计划”。

国会发出了忿怒的声音。1972 年同尼克松争夺总统宝座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公开抗议埃德加对待工人员杰克·肖的粗暴做法；杰克·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联邦调查局而被迫辞职。麦戈文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伟大的国家竟会变成这样一个国度：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自由会由于一个警察官员滥用权力而受到危害，他似乎认为他自己就是法的化身。”

埃德加在幕后重演故技。特工人员极力想从麦戈文的档案里找出点什么东西来诽谤他，然而什么也没有搞到。埃德加愤然称麦戈文为“精神变态的说谎者”。克莱德纠集了 21 名调查局特工人员写信支持埃德加。

在此期间，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发现调查局对环保主义者在乡村举行的集会进行了监视。国会议员亨利·罗伊斯从调查局的一个文件中获悉，特工人员对他斯沃思莫尔学院读书的女儿进行了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的重要职责是调查犯罪，而不是整千百万无辜的美国人的材料。”

4 月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发表演说时，指责联邦调查局对国会议员进行窃听并渗入大学进行活动。他说，“联邦调查局采取的手法跟苏联秘密警察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完全一样……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司法部长应该要求胡佛先生辞职。”

埃德加通过安装在国会的自动记录机，几分钟之内就知道了博格斯的攻击。他已经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生活》杂志，其封面是他的一张漫画像：一

个满腹牢骚的老人愁眉不展，看起来宛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一尊雕像。下面的说明文字是：“联邦调查局皇帝埃德加·胡佛 47 年的统治。”这篇文章认为，这种统治应该结束了。埃德加知道，《新闻周刊》也准备发表一篇封面文章，它的标题是：《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该有所变化了吧？》

据埃德加的档案记录说，埃德加那天下午表示愿意辞职。他给在比斯坎湾度假的司法部长米切尔打电话，把博格斯讲话的内容告诉了他。埃德加后来写道，“我让司法部长和总统知道，如果我的任职对政府造成麻烦，如果认为我对总统的连任是个负担或障碍的话，我随时愿意辞职。”

米切尔和尼克松政府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得记得埃德加曾主动表示愿意辞职的事。他和总统本来都想搞掉埃德加，可是，他们对博格斯的讲话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尼克松说，他认为埃德加“受委屈了”。米切尔要博格斯“立即撤回他的话，并向这个伟大的、忠诚的美国人道歉”。

尼克松和他的官员们别无办法，只好对埃德加委屈求全，因为他现在掌握的情报加强了他对总统的控制。即使在社会舆论广泛要求他辞职的情况下，解除他的职务也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两年以前，1969 年春天，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一系列新闻报道十分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报道损害了国家安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们认为，这些消息是受到信任的官员泄露的。他们征求埃德加和司法部长的意见，怎样才能最好地查出犯罪分子。这样，调查局就开始了窃听活动，他们瞄准基辛格的 6 个助理、其他 8 位官员和 4 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这种窃听持续到 1971 年。

据基辛格说，主张这样做的是埃德加。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法则不一样。他写道，“埃德加·胡佛总是说调查局以外的官员要求进行监听，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亲自听到胡佛自己向尼克松提出这样的建议。”

埃德加做的是诱使政府陷入危险境地，而他则——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保护自己的两翼”。他确保窃听的行动一定得到司法部长米切尔的书面批准。

被窃听的对象包括这样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的威廉·比彻和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这样，就使这种监听特别具有敏感性。这项工作一点也没有抓到泄露机密的证据，倒是成为一颗可能给总统造成麻烦的定时炸弹。

窃听工作是由尼克松批准的。这就是说，如果此事被揭露，责任将由他承担。这种揭露可能断送他 1972 年连任的可能性。埃德加知道总统是害怕被揭露的，因为尼克松曾下令把窃听的谈话录音摘要用密封信封只送给霍尔德曼。

负责窃听行动的是沙利文，他在调查局的地位仅次于埃德加和克莱德。他也知道保密的重要性。根据埃德加的命令，窃听录音记录的份数保持在最少限度，一份给白宫，一份给埃德加。埃德加对沙利文说，“这是白宫的行动，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所以它们将不列入调查局的档案。”

这项窃听录音记录掌握在埃德加手中，就成为对付尼克松的潜在武器。如果他由于非法窃听而受到责难，他将不会独自承担罪责。他曾经忿怒地给副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打电话，详细谈及此事。克兰丁斯特对这种电话早已听腻了，便让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在旁边听听。他听到埃德加说，“你要明白，如果国会要我去作证，我将不得不把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情况

原原本本全都讲出来。”

对克兰丁斯特来说，这种威胁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对尼克松下令搞的窃听一无所知。知道这件事的马迪安认为，埃德加是在“威胁美国总统”。他把这次电话谈话的内容向白宫作了汇报，两年以后，向水门事件调查人员作了汇报。

埃德加更进一步，于4月10日亲自给尼克松打电话说，如果国会要他去谈窃听问题，他“将不得不暴露调查局的敏感活动，这将是令人不快的，会造成损失的”。

5月份，当埃德加庆祝他任职47周年的时候，他说他无意退休。“只要我能够为国效劳，我将继续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岗位上服务。”6月12日，他参加了尼克松女儿特里西娅的婚礼，他作出微笑和挥手的姿态让摄影记者摄影，好像他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很好似的。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次日发生的事情使局面大大变糟。那天上午，《纽约时报》全国各地的读者高兴地看到揭示越南战争升级的材料。这些材料属于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调查局迅速查明，这是由前政府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提供的。虽然政府扬言要进行控告，但《纽约时报》对这种威胁置之不理，继续抛出机密文件。这是最严重的泄露事件。它促使尼克松采取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步骤，接近于水门事件的愚蠢做法。对埃德加来说，这导致了他同尼克松和沙利文的致命冲突。

导致这些变化的是在路易斯。马克斯问题上犯的错误。马克斯这位年长的大富翁既是埃尔斯伯格的岳父，也是埃德加的老朋友。而尼克松则认为埃尔斯伯格参与了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对他进行严密调查，也包括他的岳父。埃德加对此十分生气，由于马克斯是自己的好朋友，他指示特工人员不要讯问他。

埃德加下达这项命令后，也对尼克松作了汇报，尼克松“对马克斯表示道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命令未能执行，因为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布伦南把埃德加的批语“不调查”误读为“可调查”。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已经向马克斯进行了调查。埃德加大怒，立即把布伦南贬职，调往俄亥俄州。这又使布伦南的老朋友和老顶头上司沙利文大为不快。

沙利文不是唯命是从的人，他在一些问题上敢于公开顶撞埃德加。他认为，不应把种族骚乱和学潮归咎于共产党。他已忍无可忍，开始同具有相同观点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同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秘密接触。了解埃德加的马迪安认为他是一个“唠唠叨叨、反复无常、卑鄙讨厌的老东西”。

在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中，沙利文向马迪安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埃德加“居心叵测”。马迪安回忆说，“他对我说，胡佛掌握一些来自非正常渠道的文件，即通过窃听搞来的情报；他曾用这些材料来对付以前历届总统；很可能也用这些东西对尼克松进行讹诈。只要他掌握这些档案，尼克松就不敢动他。”

沙利文指的是埃德加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他的办公室的尼克松下令对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进行窃听的录音记录。马迪安提醒总统注意进行讹诈的可能性，尼克松果然极其认真地对待，他命令马迪安立即回白宫进行磋商。埃利希曼关于这次会议的书面笔记反映了当时的紧迫心情。“好……立即弄到所有的记录，加以销毁……告诉胡佛加以销毁……黑格要求调查局（沙利文）销毁所有特殊的材料。”

在华盛顿，沙利文交出两包窃听录音摘要。马迪安把它们放在一个上了锁的储藏室，等待白宫的进一步指示。

在联邦调查局，埃德加和沙利文发生了矛盾。8月28日，在同22名同事进行讨论后，沙利文给埃德加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写道，“我愿意奉告你，跟你持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这些人是想要帮助你，而不是伤害你。……这封信可能使你恼火。鉴于你拥有绝对的权力，你可以解雇我……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给我造成不快。那就听便吧……”

埃德加同他会晤时，对他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说教。他说，他为这件事已经作了“大量的祈祷”。接着，他便前言不搭后语地絮叨起来。沙利文劝他退休，他说他不退。相反，倒是沙利文必须退休。埃德加要他先休假，然后申请退休。

埃德加不知道尼克松下令要的窃听录音记录已经交给了马迪安，他命令其他助理们在沙利文回家的时候，去他的办公室寻找这些东西。助理们把每一个档案柜和抽屉都搜遍了，一无所获。当沙利文回来时，他拒绝说出这些东西的下落。他只是简单地说，“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去跟司法部长谈。”

10月1日，沙利文永远离开了联邦调查局。接替他的职务的马克·费尔特向埃德加汇报说，搜寻窃听记录，毫无结果。埃德加气得一句话也说出来了。他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提拔沙利文，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他凝思仁立良久。费尔特悄悄离开了房间。

第三十四章

争夺窃听材料

1971年10月3日，星期日，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要埃利希曼到他家里来。这个保管窃听记录的人有点惊慌了。

埃利希曼回忆说，“马迪安非常害怕，不仅为这些材料操心，而且也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觉得胡佛已经在监视他，胡佛迟早是会派特工人员闯进他办公室的储藏室，追回这些材料的。”

那个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埃利希曼和司法部长米切尔请总统指示如何处置这些材料。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到了1991年才为世人知晓。下面是新放的录音记录：

米切尔：胡佛正在想方设法搜寻这些材料。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防备胡佛撬开马迪安的保险柜，我们是否应当把它们从马迪安的办公室转移到这里来？

埃利希曼：我同马迪安谈话得出的印象是，胡佛由于没有掌握这些材料而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只有他掌握这些材料，他才拥有对米切尔和你施加压力的手段。

尼克松：是的。

埃利希曼：因为它们是非法的。他现在没有掌握任何副本。他的特工人员正在全市到处打听，想知道它们的下落。他已经派人监视马迪安的办公楼。

尼克松：为什么他连一个副本也没有呢？

埃利希曼：如果他有的话，他会以此为武器击你的头。

尼克松：哦……你必须把它们从那里转移出来。

米切尔：胡佛不会来同我谈论此事。他把他的盖世太保撒遍全市。

尼克松：是的……告诉马迪安，我们需要看它们，要把它们放在特殊的保险柜。

尼克松的命令被照办了。这些颇能说明问题的窃听材料从马迪安的办公室转移到白宫一个非常安全的保险箱里。沙利文还对总统的人说，他在退休以前，命令调查局华盛顿办事处销毁了关于窃听行动的档案。

关于如何把埃德加搞下台，尼克松的助理们讨论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过去这样做似乎在政治上有风险，因为他在全国的名气太大了。不过，现在的民意测验表明，群众对他的崇拜已经减退，而新闻界也经常对他提出批评。

埃德加曾经大放厥词，责骂“新闻妓女”，并且下令不准调查局的人接受《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这类做法只能使白宫认为，这位局长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令人讨厌的负数。

早在1月份，总统就曾说过，埃德加成了一个问题。副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接埃德加打来的电话时，已经习惯于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远的，在空中画圆圈。他曾在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后，对沙利文说，“那个老家伙发昏已经3年了，我们还必须忍耐多久啊？”

司法部长米切尔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埃德加，但私下对同事们说，“我们将很快搞掉他。”据基辛格说，尼克松自己也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早日搞掉他”。

在沙利文跟埃德加摊牌后不久的一个上午，马迪安请调查局的几位高级官员（包括沙利文）到司法部他的办公室。当时的气氛讳莫如深。在 10 点差一刻钟的时候，马迪安指着墙上的钟说，“到上午 10 点钟，胡佛的问题将得到解决，一切就将成为历史。总统要胡佛于 10 点钟来白宫见他，他将要求胡佛辞职。”

然而白宫的电话始终没有打来。期待变成了怀疑，怀疑变成了失望。人们不欢而散。他们很快获悉，埃德加从尼克松那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得意洋洋地口授起备忘录来。总统不但没有解雇他，反而为他开绿灯，让他在全世界各地新建许多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这种扩大机构的做法受到司法部长、国务卿、调查局局长一些助理们的反对。

马迪安在他的办公室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埃利希曼烦躁地对他说；“尼克松啃不动这根骨头……他害怕。”

“我很愿意跟他斗，但我不能这么做，”总统 1971 年 10 月 8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必须避免由于他的离职而可能留下一个爆炸性局面。……有一些问题。如果把胡佛解职，请想想看，发生起义、骚动，怎么办？……如果他去职，那也必须出自他的自愿。……”

两周以后，埃利希曼交给总统一份关于埃德加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报告。报告说，如果再拖延不决，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调查局特工人员士气低落，越来越坏。一切秘密活动都已停止。同情报界的联系遭到破坏。骨干力量都已外流。据说，胡佛已经在威胁总统。”

报告建议让埃德加在 1971 年底退休，尼克松表示完全同意。他对同事说，“胡佛应该认识到，他不可能永远呆下去……他年纪太大了。”

这回这个行动经过周密的策划，首先由米切尔给埃德加的前助理德洛赫打电话约见他。德洛赫回忆说，“我走进司法部长办公室，他关上门，出乎意外地对我说，‘我们想要胡佛下台，但又要使他下台后不折腾，你可有什么高招？’我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做，那就必须使他保全面子。让他保留他的防弹汽车和司机。’这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他喜欢这一套。让海伦·甘迪继续当他的秘书，替他干些杂活儿。给他一个‘名誉局长’或‘国内安全大使’的头衔。让总统过一段时期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在白宫，不安的尼克松达成了一项巧妙的妥协办法。他没有立即解雇埃德加，而是告诉他，他可以留任到 1972 年大选之前。这样，在竞选期间，联邦调查局的问题就不致成为一个政治足球。但是，为了缓和各界的批评，埃德加退休计划将立即宣布。为了维护他的体面，这件事将由他自己来做。

尼克松在 12 月底本来有机会这样做，那时埃德加到总统寓所有事要谈。然而，他们酒醉饭饱之际，尼克松竟未开口。新年元旦，总统跟埃德加同机飞回华盛顿，又有机会一谈正事，然而他却为埃德加祝贺 77 岁寿辰。

新闻界不再谈论埃德加退休问题，而是报道说，尼克松“想要胡佛继续留任”。埃德加在到佛罗里达旅游前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谈话，表示他要继续干下去。他说，“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是在 80 来岁完成他们最优秀的作品的。对他们的评判要根据他们的实绩，而不是依据他们的年龄。……请看，伯纳德·巴鲁克在 90 来岁，休伯特·胡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 80 来岁，仍然表现得很出色。”几个月来私下一直主张让埃德加退休的司法部长米切尔表示同意。他说，所谓让埃德加下台的传说“纯属无稽之

谈”。

总统到此刻为止至少举行了两次会议，他对他的助理们说，他要让埃德加继续干。埃德加历经风雨，仍然安然无恙。尼克松的顾问们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

实际上，虽然沙利文把窃听材料交给了马迪安，但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马迪安清点材料时，发现有一些材料不见了，显然被埃德加所掌握。

6 个月以前，尼克松大发脾气。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但他并未能制止《纽约时报》继续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他担心，如果继续连载，可能对他产生后不利影响。他还害怕泄露这些文件的埃尔斯伯格是某种恶毒的激进派阴谋的一部分。有消息说，埃德加对调查埃尔斯伯格“不卖力气”。对此，总统很恼火。他决定，“既然联邦调查局不干，那么，我们就自己干吧。”

1971 年 6 月底，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谈到此事。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助理查尔斯·科尔森。科尔森回忆总统说，“怎么做，我一点也没有底。为了制止泄密，阻止未经许可的泄露，做什么事都可以。……我要了解幕后的支持者……我要结果。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他们果然如此做了，然而代价则是太大了。这成为尼克松在垮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在白宫附近旨长楼的地下办公室里，安置了两个年轻人埃吉尔·克罗和戴维·扬。他们拥有一个会议室、一个特殊警报系统、一个密码锁保险柜和一些经过安全检查的电话机。由于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泄密事件，有点像堵塞漏水，戴维·扬便异想天开地给他的房门上挂了个牌子“管子工扬先生”。这些“管子工”将名载史册。

他们的阵容现在已经无人不晓：指挥系统从尼克松、埃利希曼，到克罗、戴维·扬，还有科尔森和总统顾问约翰·迪安。搞外勤的有：霍华特·亨特和戈登·利迪。52 岁的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军官，他已经退休，是个自由职业者。利迪自 1962 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以后，先是担任纽约的助理区检查官，后来当尼克松政府财政部的特别助理。

利迪喜欢玩枪，常常谈论外国的杀人方法。他既是一个“狂人”，又是一个“超人”，这使他非常适合于担任 1971 年白宫指派的工作。克罗以 2.6 万美元的年薪把他拉进来，负责协调总统“管子工”的外勤工作。利迪进入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地下世界。

他的前任约翰·考尔菲尔德曾经干过这样一项工作：搞一个装着窃听器的公寓，引诱一个妇女上钩，让她提供关于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丑闻。查尔斯·科尔森最近怂恿考尔菲尔德去放火烧掉布鲁金斯研究所，以掩盖盗窃同埃尔斯伯格案件有关的文件。

虽然这个计划放弃了，但另一个同样疯狂的计划却保持着。1971 年 9 月 4 日夜，在利迪和亨特的指挥下，三名古巴流亡者潜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洛杉矶办公室。“管子工们”希望，他的病历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可以证明同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有关的阴谋的证据，以及可以用来搞臭埃尔斯伯格的性材料。据埃利希曼说，总统对这两项计划都是知道的。

针对埃尔斯伯格的行动计划失败了，因为雇佣的古巴窃手搜查精神病医生的病历一无所获。但他们的这一罪行将来成为水门丑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使所有的参加者都被判罪入狱。不过，在 1971 年秋天，这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如果局外人知道这个内情，就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控制总统。

而埃德加是知道这一秘密的。

埃德加可能是通过电子监听掌握总统的动向的。据专门报道情报事务的记者塔德·肖尔说，1970年8月，特务处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墙上发现一个极小的窃听器。他说，“给我提供消息的人士说，这是胡佛干的。如果掌握基本情报，就可以知道总统在想什么。”

关于总统的一些极为机密的谈话，不需窃听，埃德加也可以知道。尼克松有些谈话，是录了音的，以供后人研究。这些录音带，埃德加是可以接触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知道这些录音带放在哪里。

正如埃利希曼作证时所讲的，尼克松把盗窃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病历的事情告诉埃德加，大概是相信他不会讲出去。然而1971年10月，总统做了一件事，如果被埃德加发现，他肯定会发怒的。

当时尼克松批准了白宫内部的一份关于要求尽快把埃德加解职的报告。报告起草人是戈登·利迪，他当时仍然定期同调查局的官员保持接触。几周以后，利迪担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顾问，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詹姆斯·麦科德。麦科德以前也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他跟尼克松的大多数亲信不一样，他认为埃德加是“世界上最好的执法官”。

通过各种渠道，埃德加很可能相当了解反对他的活动。到1972年元旦，埃德加跟尼克松的关系实际上是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剑拔弩张。

第三十五章

埃德加之死

1972年3月末，戈登·利迪同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进行了密谈。他们讨论的是一项代号为“宝石”的计划。这项计划即将得到批准。这是利迪根据上级的要求拟定的。两个月以前，在司法部长的办公室，他向米切尔、迪安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组织者马格鲁德阐述了他的设想。

利迪说，“宝石”计划应当包括：电子监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闯入房间拍摄文件；成立绑架队，捕捉激进派领袖，把他们偷运到墨西哥的一个安全房间；建立打手队，对付示威游行；雇佣妓女去把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勾引到特定的游船上，当他们性交时拍摄下来；破坏代表大会会堂的空调设备。整个费用约需100万美元。

利迪的计划太大胆冒失了，但他的上级并没有责备他，而只是让他回去把计划“冲淡一点”。经过修改的“宝石”计划集中于监视、窃听和偷拍。大家对这个计划反应较好。还讨论了一些注意目标，其中之一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处。虽然具体执行要等到4月份。但是闯入水门办公处之事已经定了下来。

在以后的几周中，利迪和亨特到全国各地推行这个鲁莽的计划。

一些人认为，水门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潜入者侵入了被政府视之“敌人”的许多人的住宅和办公室，至少有100起之多，全都是出于政治动机。激进分子和被认为进行颠覆活动的外国外交官也都是经常被注意的目标。有名的记者也是如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白宫的记者丹·拉瑟的寓所于1972年4月被闯入。著名的政治家也难免遭此厄运，民主党政治家罗伯特·斯特劳斯和参议员洛厄尔·韦克的家先后被入侵。

更为著名的一个受害者，便是埃德加·胡佛了。一些人的家之所以被潜入，是因为他们可能掌握对尼克松政权不利的材料。埃德加掌握的东西当然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

据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埃德加成为两次行动的对象。第一次潜入行动发生在1972年冬末，其目的是要追回可能被用来对白宫进行讹诈的文件。这次行动一无所获，失败了。接着，进行了第二次潜入，这一次成功了。据弗雷泽说，“这回，不知是出于误解呢，还是蓄谋的，给胡佛个人专用便器上放了一粒毒药。”

这种毒药原是由于杀死害虫的，如果人通过口、呼吸道或皮肤的微孔吸入，可以产生剧毒，使心脏停止跳动；只有在死亡几小时之内进行尸体解剖，才可以检查出来，时间一长，便查不出了。

今天，戈登·利迪不肯承认他知道潜入埃德加寓所的事。亨特只是简单地说，“我对此毫无关系。”不过，尼克松的前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承认，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

1972年4月初的一天，埃德加照例在华盛顿“五月花”饭店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吃完了早点。陪同他的有克莱德和托马斯·韦布。当埃德加谈到他跟尼克松总统的斗争时，他们俩吓了一跳。

前些时候，华盛顿的整形外科医生戈登·贝尔从埃德加的脸上切除了一小块皮癌。贝尔博士的遗孀回忆说，“他简直是一个老小孩儿，疑心很重，怕

做手术。克莱德站在他旁边，像个女人一样竭力安慰他。我们注射什么东西，他都要克莱德看看。后来，他送给我们几本他的著作。我的丈夫当时说，‘你看，这老头儿的神志不那么清醒了。’”

又有一次，克莱德凌晨给这位大夫打电话。贝尔夫人说，“他说胡佛先生摔坏了。我们打开门，他们走进来。胡佛的前额和眉毛处摔了个大口子。他们实际上是喝醉了酒。我的丈夫爱开玩笑，转身对克莱德说，‘下次你打你的老板，别打眉毛这个地方。’克莱德不好意思，离开了房间。我丈夫训了埃德加一顿，告诉他岁数不饶人，不能任性子喝酒了。”

过去几个月来，埃德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凝望着窗外，看着大街对过的联邦调查局新大楼的骨架慢慢升起。他在桌上放着一本关于新大楼进展情况的相册，助理们不断为他更新内容。他常说，“按照目前这个进展速度，等它竣工时，我们都将不在人世了。”

这个“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他的石油界朋友中，比利·拜厄斯和克林特·默奇森已经分别于1965年和1966年逝世。至于西德·理查森，死得更早。两个月前，沃尔特·温切尔在洛杉矶死于癌症。埃德加连去参加葬礼都没有。

其他一些人的健康情况也在迅速恶化。刘易斯·罗森斯蒂尔得了中风，克莱德心脏病复发，再次住院。埃德加比过去更多地谈到上帝。他对一家福音派杂志的记者说，“对我来说，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我知道，我可以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埃德加最近写下了他的遗嘱，几乎把全部家产遗赠克莱德。

4月底，在赫斯特报系在纽约举行的午宴上，卡撒·德洛赫见到了埃德加，当时埃德加似乎很精神。罗伊·科恩也在那里。他认为局长的气色很好，比77岁高龄要显得年轻。埃德加说，“我作了一次体检，一切均好。如果我退休的话，我会一下子垮下来。离开岗位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坚持工作。”

回到华盛顿后，埃德加出席了宇宙俱乐部的宴会，像往常一样观看星期六的赛马。4月30日，星期日，他同邻居一起饮酒，逛花园，看电视《联邦调查局》。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埃德加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五一节，这是他毕生与之作斗争的左派欢庆的节日。那天，埃德加独自一人上班，没有克莱德陪同。

在办公室，这并不是愉快的一天。那天上午，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专栏揭露了联邦调查局收集政治家、黑人领袖、新闻记者和影视界人士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几小时以后，他又在国会露面，答应将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这位专栏作家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联邦调查局对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进行秘密调查……其局长胡佛对华盛顿的桃色新闻有浓厚的兴趣……我要表明的是，这并非道听途说。我看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我研究了它的档案……我愿意把其中的一些文件提供给委员会。”

在1972年，这些透露是惊人的。那一天，在联邦调查局的走廊里，人们对安德森议论纷纷。不过，安德森的进攻仅仅是对埃德加发动的强大攻势的一部分。在此以前，埃德加已经收到两部关于他的著作。杰伊·罗伯特·纳什写的《公民胡佛》对埃德加的整个生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美国人不

知道该把他叫作什么人。他“既是恩人，又是恶霸；既是保护者，又是压迫者；既是真理提供者，又是谎言制造者……”

第二本书还是校样，那是联邦调查局以隐蔽的方式获得的。它的作者汉克·梅西克是一位记者，书名为《约翰·埃德加·胡佛》。书中揭露了埃德加纵容包庇黑社会的阴暗面。

那一天，埃德加在办公室呆到差不多下午6点钟才走。到克莱德的公寓吃晚饭后，他回到家已是10点15分，有两只汪汪叫的狗迎接他。埃德加喜欢在上床前喝一杯葡萄酒，他用的是音乐酒杯，发出“他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的清脆声音，使他颇为开心。

然而那个宁静的夜晚被一个不受欢迎的电话破坏了。据他的秘书海伦·甘迪讲，大约在晚上10点至于夜之间，尼克松总统给埃德加打来了电话，告诉他必须离职。埃德加一定是心烦意乱地上床的。

5月2日，星期二，在华盛顿是一个典型的春季天气，甚至在清晨，太阳也照得人热乎乎的。埃德加的黑人女管家安妮·菲尔兹照例从地下室走上来，为主人准备早点。埃德加总是在清晨7点半钟准时下楼吃饭。然而，今天却没有动静。

据说，汽车司机在7点45分钟就到了。接着而来的是他的前任詹姆斯·克劳福德，他退休后继续给埃德加当园艺工人。埃德加跟他约定那天早晨研究一下在哪里种些新的玫瑰树。

然而，局长没有露面。仆人们等待着，几只狗围着主人的餐桌跑来跑去，等着主人扔下点残羹剩饭。时钟走到了8点半。老仆人们开始发慌。今晨，楼上竟没有任何声响。

安妮·菲尔兹上楼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胆怯地敲了一下卧室的门，没有任何回应，她推了一下门，门没有上锁，这是极不寻常的。

安妮一踏进门，就瞅见埃德加的尸体。尸体躺在床上，上身裸露着，下身穿着睡裤。她没有再往前走，转身跑下楼，叫克劳福德。克劳福德蹲在床边，用手握住主人冰凉僵硬的手，他立刻就明白自己的上司已经死了。

克劳福德急忙给医生打电话，接着给克莱德打电话。克莱德差一点儿误了电话。他已经出门，慢慢走向他的轿车，这时，他突然想起他忘了什么东西。他患中风后手脚已经不灵，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听见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埃德加的医生罗伯特·乔伊塞在一小时之内就赶到了。他回忆说，“胡佛先生死亡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的猝死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病，我没有给他开过治疗高血压或心脏病的药。除了年纪大之外，没有任何症状会使人想到他在这个时候死去。”

乔伊塞认为，既然尸体已经僵直，那就说明埃德加大概是半夜两三点钟死的。由于在家里的死亡必须向验尸官报告，所以，他跟他以前的同班同学、现在当验尸官的理查德·韦尔顿博士进行了接触。在通常情况下，验尸官根据医生的报告，登记一下死者的姓名就可以了。然而，埃德加是赫赫名人，韦尔顿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卢克认为必须到现场察看一下。

他们在上午11点钟以后不久到达现场，经过检查，认为无异状。在走向汽车的途中，韦尔顿突然说，是否应当验尸。他问卢克，“如果人们在6个月以后说有人给胡佛吃了砒霜，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只是偶尔想起，转瞬即逝。

当时任何人都不知道，已经有水门窃贼，而且其中有两人向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专家征求了意见，询问关于如何杀死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的方法，包括在他的药柜里安放毒药。他们也不知道有人潜入埃德加的家，在他的便器上安放毒药，等等。

埃德加死亡 3 天后，验尸官卢克认为验尸已无必要，便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

约翰·埃德加·胡佛，男，白人。

职务：联邦调查局局长。

直接死因：心血管高血压病。

5 月 5 日，即埃德加逝世 3 天以后，将要潜人民主党总部的人转移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第 419 号房间，同现在已经无人不晓的水门大厦遥遥相对。3 周以后，他们作了第一次潜入，失败了。接着，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潜入，成功了。当他们在 6 月份再次潜入时，被当场抓获。于是，出现了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和大部分窃贼的被判刑，约翰·米切尔、H.R. 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迪安、查尔斯·科尔森、埃吉尔·克罗等人也锒铛入狱。

克莱德在听到埃德加逝世的消息后，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海伦·甘迪，她自 1919 年以来一直给局长当秘书。第二个电话打给司法部长办公室，由那里传给白宫的霍尔德曼。他于上午 9 点 15 分报告总统。

据说，总统对埃德加的死亡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担心档案材料。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有同样的担心。那天上午他下令搜寻档案材料，并决定在 11 点钟以前暂不公开宣布埃德加之死。

尼克松的特工专家戈登·利迪也认为找到这些材料极为重要。他是调查局的老手，曾经负责保管埃德加的一些最敏感的政治档案。他回忆说，“我马上就给白宫打了电话。我说，必须立即搞到这些档案。谁掌握它们，谁就拥有极大的控制权。”

当殡仪人员于中午 12 点半钟到埃德加的寓所时，那里已经翻箱倒柜，搞得乱七八糟了。殡仪人员威廉·里伯恩回忆说，“他们简直是把那个地方撕成碎片。他们都穿着军服，大约十七八个人，我猜想可能是政府的特工人员。胡佛的书籍、桌子、抽屉都被他们翻遍了……

“他们很有计划。有一个特工人员负责书柜，检查了所有的书，一页一页地翻。他们把所有的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察看底部和后面。传说胡佛有秘密档案，我想他们大概是找他的档案吧。”

不管搜查的人是什么身份，反正还有人比他们更早地到达那里。那天早晨，埃德加的两个邻居看到了某种神秘的事情。安东尼·卡洛马里斯在 1992 年回忆说，“那年我 17 岁，早晨我正准备上学，母亲喊我到她房间，去阳台上看看。有两个男人从胡佛的厨房抬出什么东西。女仆安妮站在门口。他们抬的东西很长，显然也很重，似乎是裹在被子里。他们把那东西放进停在巷子里的货车上，开车走了。”

根据那捆东西的形状，卡洛马里斯和他的母亲设想可能是包着一具尸体，埃德加是夜里死的，殡仪人员早点来收拾尸体，以避免新闻界的注意。不过，确凿的记录是，埃德加的尸体直到午饭时分才移走。根据现有的证词，在这两个邻居看到那两个搬运东西的男人时，埃德加的尸体甚至还没有被发现呢。

然而，卡洛马里斯和他的母亲坚持，在安东尼上学以前，他们看到了有东西被运走。这两个男人肯定不是潜入者，否则，女仆不会心安理得地送他们到门口。鉴于别人也想搞到埃德加的秘密材料，会不会是他的盟友赶在他死亡的消息传开以前把东西弄走，以免落入搜查者之手呢？

不管在埃德加的寓所是否搞到什么东西，尼克松手下的人对他办公室的东西是十分关切的。同一天上午，代理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在同白宫交谈以后，下令查封了埃德加的办公室，以保证档案的安全。同一天下午，尼克松任命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走马上任，他问约翰·莫尔：“秘密档案”在哪里？莫尔说，并没有什么秘密档案。

次日上午9点钟以前，格雷上班时，又提出同样的问题。莫尔回忆说，“从他谈话的口气来看，我想，他是在寻找可能给尼克松政府造成麻烦的秘密档案。……我明确无疑地告诉他，没有这样的秘密档案。”两人发生争吵，格雷大声说，他是“精明的爱尔兰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摆布我”。莫尔也说，他是精明的荷兰人，任何人也摆布不了他。两人争吵的声音很大，几个办公室之外都听得到。

不过，格雷最终可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埃德加逝世一周后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个年轻的档案员乔·戴蒙德回忆了一件有趣的插曲。

“我上班的第二天，上级要我和另外三个男人上楼办事。我们上楼后，看到有4个穿军装的先生已经在那里。他们让我们把几个装满文件的箱子搬到地下室粉碎机那里。从他们的神气看来，仿佛我们拎着的是黄金似的。我们花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把这些文件粉碎完毕。然后，他们便拿起包裹走了……我认出其中两个人，一位是帕特里克·格雷，另一位是助理局长马克·费尔特。”

尾 声

在埃德加逝世的那天，从华盛顿时间中午开始，美国政府大楼、军事设施和世界各地美国军舰上的星条旗都下半旗志哀。尼克松总统终于去掉了“胡佛”这块心病。然而，现在他却说，埃德加是“我最好的朋友和顾问之一”。他说，埃德加“象征和体现了最珍贵的价值观：勇敢、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献身精神、花岗石般的诚实和忠诚”。

在国会，议员们纷纷赞扬埃德加。总共有 149 名众议员和参议员对埃德加发出赞美之声。

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中包括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科雷塔。她说，埃德加留下了一份“令人遗憾的、危险的”遗产，他的档案系统“充满了关于一些最高级政府人士（包括总统）的谎言和卑鄙材料”。

处理埃德加尸体的殡仪人员来自威斯康星路的高勒氏公司，他们经常处置名人的尸体。埃德加的许多朋友和敌人，如约瑟夫·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等，他们死后的丧事都是这家公司操办的。这些殡仪人员虽然见过大世面，但他们在埃德加的寓所呆了半个小时以后，仍然惊叹不已。

殡仪人员威廉·雷伯恩回忆说，“这个地方简直像个博物馆，像给自己造的一个神殿。楼上他的画像俨然像个拿破仑。”

埃德加的尸体作防腐处理后，穿上克莱德为他挑选的西装和领带，放进用 3000 美元购置的棺材里。次日，瓢泼大雨，一辆柩车把埃德加的遗体拉到国会的中央大厅。最高法院的全体成员、内阁阁员和国会议员们迎接了柩车。这辆柩车曾拉过林肯的遗体，从那时以来只有 21 人的遗体享用这辆柩车。埃德加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文职官员。先后有 2.5 万人到国会向埃德加的遗体告别。

第三天，尼克松在全国长老会教堂举行的葬礼上致悼词。他说，“美国崇敬此人，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机构的局长，而且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近半个世纪来，在我们共和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历史上，埃德加·胡佛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八位总统来去匆匆，道德界舆论界的其他领袖兴起，又衰落，而这位局长则始终呆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每个人都永远欠他的情……他的逝世只会使我国和一切珍视自由的国度更加尊敬和钦佩他。”

尼克松本来建议把埃德加的遗体安葬在阿林顿公墓，但克莱德坚持要按照他朋友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国会公墓，因为他的父母亲安葬在那里。

由于埃德加终生未娶，没有妻子，灵柩上的国旗是由克莱德来接的。克莱德辞职隐居，再也没有上班。他搬到埃德加的寓所，余生是在那里度过的。他接受了埃德加的大部分遗产，据官方估计约有 50 万美元，按今天的币值计算约为 150 万美元。

1975 年 9 月 30 日，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联邦调查局新落成的总部办公大楼的院子里，奏起了“埃德加·胡佛进行曲”。尼克松总统在埃德加死后不久便决定把这座大楼命名为“埃德加·胡佛大楼”。工人们把这几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大字高高地镶嵌在大楼的正面，从宾夕法尼亚大街远远就可以望见。

但是，这座大楼的落成典礼是由接替尼克松的福特总统主持的。他讲话时，措词谨慎，赞扬的不是埃德加，而是“特工人员，他们是几十年来维护美国正义的传奇般象征”。他仅仅含蓄地称埃德加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

公仆”。

1975 年底，这种谨慎是必要的。埃德加当权时干的坏事开始泄露出来。惊讶的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从他们研究的文件中和听取的证词中发现埃德加滥用权力、践踏公民自由的恶劣事例。

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上的主色大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褪色。“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继续尊崇像埃德加这样的人呢？”利夫教授在 1992 年问道。“在西方同仇敌忾一致反对共产主义的时代，他当然是很吃香的。社会似乎总是需要有个对立面，而本世纪的对立面便是共产主义，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也可能是犹太人或别的什么东西。胡佛主要是抓反共的旗帜，我认为，他之所以受到崇敬，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在同魔鬼作斗争。

“美国社会对自己的英雄采取两个极端的态度。一方面，人们很喜欢发现自己的偶像原来是泥足，名人也有缺点。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似乎需要有一个崇拜的英雄，认为他比自己更聪明智慧、更强有力，从而增加自己的力量感。即使他们发现这个英雄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伟大，他们也不愿推倒他。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奇特的矛盾现象，有时这是很危险的。”

埃德加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执法机关，仅此一点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雄。换一个更加谨慎、比较尊重公民权利的人，同样可以建立一个联邦调查局，按照表面价值对待埃德加，是危险的，这就如同容忍一个“使火车正点运转的”独裁者一样。

当埃德加活着的时候，一位有远见的作家曾经说，他进入一个“不可触摸的王国、一个远离冷酷现实的世外桃源”。今天，当人们看清严峻的现实的时候，仅仅抱怨埃德加愚弄了美国，是不够的。埃德加·胡佛在假惺惺的阿谀奉承的气氛下生存了几十年，这种现象只能产生于这样一个社会：领导这个社会的人容忍了他在公开场合装出一种伪善面孔，而背地里却滥用职权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埃德加有许多共谋者，包括总统——既有民主党的总统，也有共和党的总统，他们默许了他的越轨行为，因为这适合于他们的政治目的。

如果说这方面有什么道德准则的话，那么，未来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 1975 年参加参议院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时倒是说了一段颇有教益的话：“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的教训是，我们是不能完全依靠拥有很大权力的人的好心来保障我们的自由。”

